中国冤案录

第二卷

廖亦武　著

目　录

序一：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

——为廖亦武《中国冤案录》所作的序言

郑义

我本来是许多血腥事件的目击者、追查者和记述者，读完这本书后，仍然产生了某种神智恍惚。我需要抬起头来看看天空，看看自己种植的小红花，还有远处那些在阳光下显得分外明丽的绿地。我觉得我的神经应该是比较坚韧的了，但仍然有些受不了。我还是需要再次确定这些讲述不是迷离梦境，而是我们中国人身在其中的现实。这本书由二十几位受难者的自述构成，从中共建政到今天，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残忍、难以置信的残忍、冷血，文字未加雕琢，与作者的诗人身份不符。我就不一一介绍那些可怕的故事了吧？就像医生对死亡的冷漠，我的心也相当麻木。最刺激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证词的记述者竟然是一位诗人？那些数以千计万计的记者、纪实作家和历史学者呢？都死绝了吗！这个问题存而不论，否则有失风度有失厚道。

但我仍然摆脱不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是一位诗人？

最方便的解释，是命运使然：命运先使他深具文字功夫，命运再把他投入地狱，并引导他在那里转了一圈又活着回来。于是，作为幸存者他责无旁贷。——我相信这是原因之一，但恐怕不是全部。我们有一位活着的先驱者——亚？索尔仁尼琴，他也走了同样的一条路。索尔仁尼琴十岁就读了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发誓要写出伟大的作品。青年时代，还特地选修了大学的文学函授班。我们有很多理由认为他的梦想不会是将来去做一名“古拉格群岛”的记录者。从劳改营出来后，他写的也是虚构性作品。他轰动俄罗斯的处女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是一部中篇小说，写作和出版纪实性作品《古拉格群岛》则是后来的事情了。当然，他是

幸存者，他责无旁贷。但据我猜测，更关键的原因恐怕还是他所面对的现实过于残忍，超出了人类想象力所能抵达的那种高远神奇的境界。那里的一花一草一人一事都绚烂魔幻，超出了一切艺术虚构。在那种魔鬼式的无以伦比的创造力面前，任何伟大的幻想天才，都只能由衷赞美，而低下骄傲的头颅！多年前读《古拉格群岛》，记得一个小小细节：劳改营向靠近中国的方向迁移，囚犯们都祈求离国境再近点，再近点……索尔仁尼琴写道：多年后，我们才知道，中国更坏！你说对了，老索，但还不够，你看见的是岛屿，古拉格群岛，我们中国作家所面临的，是大海，浩瀚无涯的古拉格大海！

对于廖亦武在本书中所记述的二十几个案例，无须一一加以转述。挑一篇不太魔幻的《冤死者杨继年》看看。

杨继年的案情实在简单：偷一只羊，坐牢 34 年。——是不是有点像《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但是，雨果认定的悲惨世界对于我们中国人大约还不算很悲惨。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了 5 年刑，我们的杨继年仅仅是——对不起，我搞错了：杨继年没有偷那只羊，是他的哥哥偷了一只羊被判刑 10 年。自然，一只羊比起一块面包是多了点，判 10 年还算不得冤。但接下来全家七八口都成了“偷羊贼家属”，被“管制劳动”4 年，这就有一点冤了。后来，因受不了国家煽动组织的群众批斗，“偷羊贼家属”举家外逃。黑夜里，弟弟杨继年迷路失散，转回家中，被警方抓获，在“严惩反革命偷羊贼”、“打倒破坏分子杨小娃”的口号声中开始了他漫长的牢狱生涯。那一年，杨继年刚刚 11 岁。

这就严重挑战了我们对一般事物的认知能力。怎么可能呢，11 岁？是的，11 岁。法院刑事判决书上是这样写的：“被告人：杨继连，又名杨志远，男 11 岁，内江县人，初识字，贫农家庭成份，盗窃出身，住高粱区奉天乡二联社，汉族。”——如何，你打算相信还是不相信？如若不信，下面还有两张加刑的法律文告为证：1963 年发出的加刑起诉书称杨继年 18 岁，推算回去，1958 年杨首

次判刑时应为 13 岁；而另一份文件，1970 年发出的加刑判决书则称杨为 21 岁，也就是说，1958 年进监狱时，杨竟然才 9 岁。——白纸黑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门一致认定“偷羊贼家属”杨继年是少年入狱。不管是 11 岁、13 岁还是 9 岁，反正离成年还很有些日子。也许，11 岁或 13 岁入狱应该算是创记录了。但就这个政权之毫无人性，我们还可以找到类似的更加极端的记录。刘宾雁先生在《红色纪念碑》的序言里写道：“……这七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同过去的和正在酿成的各种冤案的受害者接触中间度过的，因而，我便自以为再不会有什么中国人的悲苦和不幸令我惊异了。然而不久我便有机会纠正我的自满。那是到美国以后的事，偶然遇到一位患有精神抑郁症的江西来的留学生，听他的太太说起他的病因——六岁时（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以及那前前后后辛酸而痛苦的情节，我才发现我对于中国人的苦难的了解还远远没有穷尽。”

我们再来看冉阿让。偷一块面包，判刑 5 年。四次逃跑，共加刑 14 年，累计刑期 19 年。杨继年没有偷一只羊，（我们就算他偷了一只羊，）判刑 10 年，因抗拒改造等罪名，四次加刑共 24 年，累计刑期 34 年。如此看来，很有一点魔幻的味道了。

更加匪夷所思的还在后头：在不停申诉了三十来年之后，1991 年法院终于有了一个答复：“判刑时年仅 11 岁经查不实。”那么，法官老爷认为应该是多少岁呢？便再无下文了。杨继年说：“当时气得我自己搧自己百十个嘴巴，难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杨继年生于 1946 年（即被捕时 11 岁），是有出生证明和村民证词的。——其实，杨继年能否成功地证实自己 11 岁被捕入狱并不重要。他手上的三份法律文件（两份判决书、一份起诉书），已经铁定地证明了他首次判刑的年龄分别是 9 岁、11 岁或 13 岁。出现了矛盾的三个年龄是法院的渎职，而悍然将一位少年判刑，则是执法者明目张胆的残暴。

冉阿让出狱后改名换姓，成了大富翁，而且当上了市长。我们的杨继年没有冉阿让幸运，他不具备发财掌权的想像力，而仅仅是想重新开始一种微贱贫穷的生活。

杨继年回到阔别数十年的家乡。父母、兄嫂、姐姐、侄儿、侄女等一大家人都在那场大饥馑中死绝了。耕地和宅基地已被瓜分净尽，家乡不认他了。乡书记说："一个大活人还叫尿憋死？杨家冲生不了根，你就回监狱嘛，你在里头混了三十几年，那才是你真正的家，说不定还能娶上个女犯人呢。"杨继年问："你开玩笑么？"乡书记说："跟你这种人有啥玩笑可开？你回监狱吧。"于是乡政府就给杨继年开了回监的路条："原我××市东兴区凤天乡杨家冲村二组村民杨继年，因劳改释放，现家里无一亲人、财产等，所以无法生活。根据本人技术特长，故介绍前来××市第一监狱做工。望贵处给予支持，特证。"走投无路的杨继年一路乞讨着走回监狱，"轰地双膝跪下"，恳求入狱。"……我鼻子一酸就嚎啕大哭，监狱折磨我大半辈子，但此刻，高墙、电网是那样亲切，我真想长一对翅膀飞进去，我的监舍，我的双层钢架床，躺在上面，至少有一个房顶遮着，至少没人撵你，至少还算暖和。"杨继年恭敬地"双手呈上乡政府的路条"，并诉说了自己"重返监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监狱方面也对他很有感情了，但他牢已坐够，户口已迁回原籍，爱莫能助。狱方打电话开证明要求地方政府安置，把球踢回去。但地方政府仍然拒绝接收，称"再上门纠缠就打断你狗腿"。此时的杨继年，右手右腿已然残废，要再打估计就是左面的狗腿了。待他再次手捧乡政府的路条回到监狱，监狱也对他恩断义绝，绕大墙转了一星期，也无人理睬。他到省里告状，劳改局再次"介绍"他回乡。孰料小小乡政府横蛮依旧，终于把杨继年逼上了"上访作家"的惨痛生涯。"从市、省到中央，几级公、检、法，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信访办、省政府，我见庙就递申诉状。看来，还得告十年状，这条道走到黑了。"

——如此艰苦卓绝，不过是求一饭一榻一瓦一立锥之地耳！

杨继年是良善之辈，经常心怀感激地回忆起“坐牢的唯一好处”，那就是为了写认罪揭发材料，人人都必须学文化。他说：“我两、三年就脱掉文盲帽子，不用求别人帮我写申诉了。老威同志您看，这床底下，这几口纸箱和麻袋里都是我的杰作，从十几岁到如今，40 多年，我写的申诉材料能把人淹死。我无家无室，一条老光棍，所有财产就是申诉。”由此，杨继年先生又创造出另一伟大业绩：他写了几百万字的各类申冤材料，堪称世界上创作量最大的“上访作家”。两年前，他终于含冤而死，这几百万字所记述的荒唐与残忍，就成了留给我们的遗产。

我总是摆脱不了一种不由自主的猜测：杨继年和冉阿让之间存在某种合谋。最后当了市长的冉阿让居然大字不识，而共产党的牢房竟然把杨继年从文盲变成“作家”。冉阿让因持假释出狱的“黄色身份证”而不能就业，在中国，所有的杨继年从出生起就持“农村户口”而严禁脱离农奴地位……倘雨果真有在天之灵，不知当作何感想？

出狱后的冉阿让偷了米里哀主教的银餐具，旋踵被警察抓获。主教称那是送给他的礼物，而且还问他，那一对最值钱的银烛台为何忘记拿走？冉阿让深受感动，自此开始自己全新的生活。在杨继年所遭遇的现实中，没有那样一位主教，更没有那一对慈悲的银烛台。

花样翻新的酷刑……毒打，死去活来的种种毒打，土手铐，几十斤重的脚镣，假枪毙，陪杀场，枪一响泼半脸半肩红白脑浆渣子，嘴里打麻药塞棉花，严防临刑呼喊“反动口号”，打断肋骨并撬嘴塞大粪以检验是否装疯……这些，我们都见识过，心已变得铁硬。但仍然有令我心脏为之一紧的事情：杨继年被关进惩罚小号，不放风，不洗澡，不用筷子，象畜生一样锁在黑暗中长达四年。在我有关残忍的知识范围里，这早已超越了酷刑超越了地狱。再坚强的犯

人，在这种无人理会的黑牢里都会身心俱灭。我知道一位蔑视苦难的犯人，和狱吏较劲，死不低头，发誓把这黑牢底坐穿，一年之后，那狱吏前来巡视，他紧紧抱住仇人的双腿哭喊求饶，人格、尊严与意志荡然无存。杨继年，他如何能在四年黑牢后重返人世？也许全凭他 11 岁入狱，练的是童子功。还有，再来看看杨继年的即兴式“逃跑”：毫无预谋，从审讯室拔腿就跑。本来，这不是那种我们一般称之为逃跑的行为，而完全是一种应该送医治疗的精神现象。但没有医生，唯有士兵“赶鸭子一般”追撵。“……我抵拢墙了，九米高，墙头拉了几道电网，我向后退几步，再俯冲，一次又一次跌跟斗，一次又一次上窜下跳。脑壳撞大了，浑身血口子，哨兵懒洋洋地拉枪栓，鸣枪示警……”——够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到此该收场了！却不是，双方都兴犹未尽。疯狂了的杨继年继续喊叫着跳跃，一次又一次撞向那九米高的大墙……“哨兵射击了，左一枪，右一枪……”等杨继年舞蹈得力竭命尽，虚脱倒地那一刻，“那些追捕的解放军战士才笑嬉嘻地围上前，问我："逃够没有？"接着拳脚如雨点落下来。”写到此，我不禁深情地怀念起《悲惨世界》中反面角色——那位跟踪冉阿让，迫害孤女寡母的警官沙威，其一举一动是何等绅士呀！

被压迫者同样冷酷。

杨继年永远记得他被抓进监狱时乡邻们的掌声。警察先拽过他双手上铐，却不料手腕子太细，铐不住，就用麻绳捆。11 岁的杨继年吓得哇哇大哭。警察宣言道：“哭死骇不倒人民政府，无产阶级江山是铁打的！”于是，围观群众都鼓掌欢迎，喊：“整得好！”杨继年赖在地上不走，警察就把他拦腰夹在腋下。“我边哭边蹬腿，姓肖的稳不住，毛了，骂声“狗日的”，把我横搁在膝盖上，噼里啪啦打屁股。周围群众都被惹笑了，几个民兵笑得连步枪也背不住……”

一场轻喜剧。

“警车停在村口大路旁，同村人象过年一般热热闹闹"护送"我上车……”——这一去就是 34 年，真正是阔别了。再回来，就应该是贺知章的诗境了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那就太自作多情了：杨继年残了半边身子，一脚高一脚低在村里晃荡了几个来回。不见儿童来“笑问”，却来了一伙人抓贼。杨继年辩解。村长叫来几个老人确认了身份，然后说，“……耕地和宅基地早按人头分给各户了，你家又死得连毛都不剩，你一个孤人挂靠在哪儿？我拿啥子安置你？”杨继年哀求说：“无论咋样今晚你要给我找个住处，能遮雨避风就行。”治保主任说：“你到底滚不滚？”杨继年热泪横流，叫喊道：“我滚不动，我要去你家端碗。”治保主任叫来几个人，把他扔出村口，还顺手塞过一只破碗说：“这是我家看门狗老黄用的，免费送给你。”

在我们的故事里，永远不会有米里哀主教，永远不会有那一对慈悲的银烛台，永远不会有良心发现而投河自尽的沙威警官。亲爱的雨果，如果没有这一切，你拿什么来构造你的“悲惨世界”？我们现在的故事是这样的了：“冉阿让”没有偷一只羊，判刑 10 年，四次加刑共 24 年，累计刑期 34 年。出狱后，他没有盗窃，当然米里哀主教大人就没想起来送他一对银烛台，而送他一只狗碗，并劝慰他重返监牢。“冉阿让”不想发财更不想当市长，而是乞讨着走回监狱，流着泪向“政府”倾诉自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他没有能力搭救芳汀、柯赛特。他被捕时所有人都拍手称快。他从来不敢想像革命，圣丹尼街上也没有起义者的街垒和旗帜。而沙威警官，则指挥着由教授学者和警察流氓混编而成的党卫队，早就把可能构筑街垒的一切物件焚之一炬。晚年的“冉阿让”流落巴黎以乞讨和上访为生，同时进行篇幅浩繁的开放式史诗写作：《我没有在 11 岁偷那只永难消化的羊》。他常常构思小说中自己的结局，说：“我与这个社会有太多的帐没算清，哪天感觉

自己不行了，就提前去买 10 公斤炸药，10 支铜雷管，1 公斤铁沙子，用四副电瓶接起引燃……”如果实现了，那就是行为艺术结尾，惜乎没来得及：在小说之外的真实世界里，“冉阿让”死于一次偶然的火灾。——如果是这样，亲爱的雨果，你如何来写你那部充满诗意的巨著？

——雨果的悲惨世界，被我们中国的冉阿让彻底颠覆了。

于是，嚎啕大哭之后，我们有望成为中国雨果的诗人廖亦武放弃了史诗的建造而转向记录证词。

我早就痛彻心腑地说过，在中国，作家的想像力一钱不值。只有你想像力难以企及的真实，而绝无超越真实的想像。遍地魔幻，遍地魔幻！当所有的人都浸淫于超现实的迷离梦境中时，想像还有什么价值呢？你只须据实以录。

如此，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超现实主义。我们与布勒东们一样，都承认了想像力之枯竭。他们喝醉了酒“自动写作”，试图在一百个句子中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奇组合。或者拓印木纹、叶脉，然后在长久的凝视中发现令人感动与震惊的幻象……我们中国人比他们棒。不管喝没喝酒，随便抓住一个“上访者”就可以开始“自动写作”。我们也玩拓印法，不过拓印的家伙比较大。我们拓印中国社会，每一幅画都是“令人震惊的一连串幻象”。

同布勒东们一样，我们也认同弗洛依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我们也部分地承认艺术创作如梦幻一般，是潜意识的表现和象征。但我们有所发展：我们借助于纪实手段所发掘出来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极权社会的深层潜意识，即在表层意识（共产主义理想、三个代表等等）之下，这个制度这个社会藏匿于意识深处秘而不宣的本质和原动力、支配力，比如残忍，自我毁灭的渴望。我们终于成为弗洛伊德最杰出的隔代传人：我们回到了精神分析学说病例纪实的源头。

——现在，让我们来回答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这些证词的写作者竟然是一位诗人？

是因为我们的现实是富于想像力的现实，是超级的现实。在这种魔幻现实面前，最伟大艺术家的想像都黯然失色！说过了雨果，再来说说与毕加索齐名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达利。他玩的超现实主义，最令人难忘的不就是那几块像生面饼一样软瘫的钟表吗？这种超现实的钟表首创于他的名画《永恒的时间》，此后多次在其他画作中出现，时而摊在桌边上，时而挂在树枝上，时而垫在马背上。无论人们作何解释，时间之变形、相对大致是错不了的。达利对自己这一杰作非常得意，宣称：“我能将非现实的事物表现得比现实世界还要真实。”“我的”挂钟””“会一直滴答滴答地走下去……”错了，杨继年一出生，达利的超级想像力就应该抹脖子自杀了。杨继年的钟表瘫痪在他 11 岁入狱那一年，虽然他与别人一样每年增长一岁，依次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的全部人生阶段，但他的整个生命皆凝结于 11 岁那一年。达利粘乎乎的“生面饼”“挂钟”不像是能走动的，尤其不可能“滴答滴答地”走动。而杨继年，他的人生之钟不仅始终在“滴答滴答地”走动，而且至死也走不出 11 岁那年。达利，还敢说你的“生面饼”比杨继年的“现实世界还要真实”吗？

于是，在神奇的超级现实面前，绝望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与绝望的诗人廖亦武放下了雄心万丈的艺术抱负，谦恭而无奈地开始记录原始案件。当然，还有绝不自我欺骗的良知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派。这是集圣徒、苦难代言人和行吟诗人为一身的那种大文豪的基本素质。

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

他还说，“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因此，说在奥斯维辛之后你不能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但提出一个不怎么文雅的问题却不为错：在奥斯

维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

对于生活在共产国度的诗人作家而言，我们所经历所目睹的大规模灭绝、饥饿、酷刑、残忍、铁石心肠、不义、堕落，与奥斯维辛极为类似。而且，这个红色奥斯维辛曾占据半个世界，所蔓延的时间已将近一个世纪，仅“非正常死亡”一项，就是纳粹奥斯维辛的十几二十倍。（为了展开阿多诺的话题，有时我会不加区分地使用“奥斯维辛”这个关于人类残暴的代名词。）

索尔仁尼琴、廖亦武们的写作正是受刑者的一声尖叫。尖叫的权力是不应被剥夺的，但尖叫不是诗。《古拉格群岛》和《中国冤案录》等等纪实著作不能称之为诗。那末，奥斯维辛之后可以写诗吗？

阿多诺只说对了一半。在他的语境中，诗大约是指回避超级残忍的浪漫美文。奥斯维辛之后写这种诗，显然是可耻的。这种过于轻佻的美，将再次杀死受难者，而成为与凶手共谋的音乐伴奏。阿多诺认为，人们必得在“一种出于软弱的审美生活”跟“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但这“二者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问：“奥斯维辛之后，连《神曲》也不能写吗？”阿多诺，你将如何回答？你会喜极而泣吗？除了“软弱的审美”和与兽性同流合污，在人类心灵深处，还存在一种强大的审美。

有人如此强有力地补充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可耻的。”说得多么好！

但问题在这里：从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共产主义世界性崩溃，整整几个世代的诗人作家，为什么没有产生一部无愧于奥斯维辛苦难的《神曲》？

我没去过奥斯维辛，但去过达豪，还常去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与杰弗逊纪念堂相邻的二战大屠杀博物馆。在那一排排营房前，在锈迹斑斑的焚尸炉前，我确实听见了受难者对上帝的疑问和

抗议。奥斯维辛确实强有力地扭转了艺术史，几乎在一夜之间。敏感深思的艺术家们，在奥斯维辛不可抗拒的巨大冷酷面前，体验到自创世记以来从来没有的绝望。哪里还有什么“理性的动物”、“万物的灵长”？满目皆是人性的黑暗！他们说“上帝死了”，那是绝望，是抗议，是愤懑，是不甘。但后来，许多艺术家再说“上帝死了”这句话时，已经失去了前辈们当年面对奥斯维辛时的那份痛苦与真诚。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从来就不敢正视我们饶有特色的红色奥斯维辛，却也满脸深刻地走上了无主题、无意义、无故事、无情感、无英雄、甚至无聊无耻无赖的“先锋”之路。当然不能说他们的探索毫无意义，但他们的自恋自怜胜过了真诚。上帝没死，是他们的心死了。在需要以大美大爱来对抗大丑大恶的艰难时代，他们审美的能力和爱的能力过于“软弱”。

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是一种对诗的误解。诗既是生活的美好装饰，有如恋人明眸里的晨曦、荷叶上滚动的雨滴；诗也是苦难的拯救，如惊涛骇浪中可靠的锚链、长夜孤旅的遥远灯火、沙漠戈壁中的点点绿洲。是的，诗绝不仅仅是华丽的饰物，诗更是对于苦难与死亡的抗拒。说在奥斯维辛上帝缺席，上帝死了也是浅薄之论。比如，在威塞尔的《夜》中，上帝不仅在受难者彼此的抚慰和救助里，在拒绝出卖的坚守里，在出生入死的逃亡里，还在那些绝境中惊人的美丽——诸如悲哀的微笑、晶莹的泪滴、一小块留给孩子的面包和尸堆边的小提琴声里。还有，上帝也在那些在诺曼底、在台儿庄、在伏尔加河、在中途岛浴血奋战的反法西斯战士心中。我猜想，上帝在造人时肯定盘算过：应该把什么东西设置为人之根本？即应该把什么设置为生命最可靠的基本程式或原逻辑？上帝选择了感性、情感，即美与爱这种原始能力。上帝把它们存储于人类心灵最深处，使之成为理性的基础、规范甚至禁忌。每一个人，无论贤愚贵贱，也无论是否拥有知识和逻辑的能力，美与爱的原始本能都是你漫漫人生中最可靠的向导与依恃。黑色的和

红色的奥斯维辛，不是理性的灭绝，而是荒谬的理性压倒了自然的感性。人种学说和共产学说不仅有道德缺陷，也存在逻辑错误。但美与爱这种情感本能是永远不会错误的。

美与爱，这就是诗的本质。

这就是诗所凭借所赖以的对抗黑暗的力量。

所以，不是欢乐幸福最需要诗。恰恰相反，是苦难、深重的苦难，是奥斯维辛的苦难最需要诗。所以，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可耻的。

我在前面说过，在我们中国红色奥斯维辛无以伦比的魔幻现实面前，我们自愧弗如。但我没有说文学仅仅是想像力。与之相比，审美能力和爱的能力是艺术家更为基本的素质。如果想揭破、展示黑暗，你只须从旁纪实。如果想对抗黑暗抚慰灵魂，你就必须“进入”，要有光，创造一个情感的世界。遗憾的是，在极权社会连续几代的残酷调驯下，我们变得越来越怯懦、猥琐、冷血、自甘沉沦，已不知美与爱为何物。我们的时代，已经被驯化到难以产生可以和苦难相匹敌的大作家。

正因此，在奥斯维辛之后写《神曲》充满挑战。这不是争勇斗胜，不是试图超越大师的功业心，而是命运之驱使，是无以推托的责任。

最后我仍然想回到《悲惨世界》。冉阿让问米里哀主教，为何要送给他那对贵重银烛台。主教回答说，我要用它来赎买你的灵魂。那末亦武兄弟我问你：

拿什么去赎买凶手们残暴的灵魂和杨继年们仇恨的灵魂？

唯有爱。

但爱与美来自诗，而不是纪实。

这就是雨果及其光辉著作《悲惨世界》、《九三年》存在的价值。

亦武兄弟，你应该成为可与红色奥斯维辛相匹敌的大尺寸的诗人作家。换言之，你应该具有足够的审美能力和爱的能力。你要用心倾听来自于心灵深处的声音。

奥斯维辛以降，留下了半个多世纪的大空白。因此，这是我们的时代。

我总是劝那些不乏担当和勇气的年轻作家不要无休止地与那黑暗贴身缠斗。要多少保持一点审美距离，要善用自己的生命。在这种缠斗中我耗费了太多的生命。当我终于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我们的时代”之际，气力也许不够用了。

旧约创世记起首，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与其理解为创世纪实，毋宁说这是关于爱的隐喻。新约则整个在讲述由耶稣所体现出来的神圣的救赎之爱。现代艺术所丢弃的，恰恰就是这种拯救之爱。他们不厌其烦地说“上帝死了”，却有意无意忘记了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当然他也死了，早在奥斯维辛一千四百年前，被人们以最残忍的方式杀死了。但他复活了。

我确信，奥斯维辛的罹难者，在他们自知必死而神智尚清之际的最后愿望，是祈求他们的后代拥有一种美和爱的生活，即富于诗意的生活。

我的朋友，多年游学波兰的诗人一平，曾创作了长诗《奥斯维辛、春天与复活节》。在这首一千三百多行的长诗里，他庄严地表达了一位中国诗人在奥斯维辛所感觉到的悲悯、谴责、控诉、慰藉、祝福、祈祷、希望……他把难以想像的苦难和春天和复活节连接。在长诗的尾声，他站在残雪刚刚消退的松软潮湿的奥斯维辛土地上，眺望着迎接复活的队伍由教堂走向苍茫旷野……

“……又是雪/寒冷中给人温暖和慰籍/告别吧　奥斯维辛/无论我多么悲哀/我还是要祝愿/人总是要走出这里/即使你再次来临/死亡为复活提供开始……复活的钟声/震荡残雪　青绿的枝条/和

飞回的鸟群/复活的日子世代的节日/这一天人们忘记悲哀/准备酒着上新装/牵著孩子喜悦地走向教堂/草篮、面包、鸡蛋/冬青叶围绕黄油雕刻的小羊/弥撒　祈祷/管风琴的乐声/由开化的冰河拥抱大地/神圣的水滴祝福/家庭、生活和土地/穿越苦难死亡/那涌现的光、爱/融化黑暗/大地升起广阔清洁的歌声/诞生黑暗的也诞生光明”

那些关于土地、春天、残雪、农舍炊烟、发绿的草芽以及放在废墟上的黄雏菊的柔软的诗句，都打湿了我的眼睛。

2004 年感恩节于华盛顿 D.C.

附录：廖亦武给北明的信

亲爱的嫂子：

你的好心肠叫我不好意思。请别为我担心，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我属野狗，能管好自己。义兄的序言对我有些震动。拿什么赎买扬继年们的灵魂？这两天，我老是想，我多年为什么一直坚持干这个，爱？赎买？

不，还是自己的一种需求，无论我承不承认，我是在利用冤魂追求不朽，满足一种悲壮

的虚荣。至于扬继年们的过去，现在和消失之后的灵魂，我没有能力问，也问不了。

我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将来的人也许能通过这些文字，知道世上还有过扬继年们，为我

们这个时代，为他们的祖先感到耻辱。爱和恨都应该从耻辱开始。一个人就是一份耻辱，如果仅仅记载了残忍，而不能让人蒙羞，那这就是一个不要脸的种族。死绝活该。

所以我在《证词》和《底层》里，一边是苦难一边是无耻，死

到临头了，还在以本能的游戏消解苦难，缓解恐惧，这是血液里流淌的东西呀！像金圣叹砍头时的戏言：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味。我们的命就这么不值钱。

至于爱，至于绝境中的向上的升华，有些奢侈。我们这个种族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有的只是无尽头的苦难。大饥荒，文革，六四屠杀，这些用血和尸体堆起来的资源，如果放在别的种族身上，会产生多少如泣如诉的永恒的声音，图画和文字呀！别人一听一看，就晓得这些家伙是灭绝不了的，是有永世的痛感的。可我们，只有上书，申明，抗议，时局分析。年复一年，我们同暴政对抗的代价是：表达私人空间的文字能力被自我剥夺掉了。真是一群被道义和悲愤所充满的废物文人啊！

亲爱的义兄和嫂子，谢谢你们的情感和提醒，我已知耻了。再给我些时间，让我学会怎样去爱。

亦武

序二：廖亦武的肉体意义

王怡

我在最近一篇文章，评述被遮蔽和被损害的当代知识分子。我说。

廖亦武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肉体意义，是当代中国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曾和一群碎尸犯、强奸犯关在一起。也没有一个书生像他那样在底层卖艺挣扎多年之后，依然拥有一个如此强悍的肉体。依然在每个夜晚下楼去长跑 5 公里。依然坚持为活在底层的、活在冤曲中的人物一个接一个的立传，为一个时代写下最重要的、且被遮蔽了的证词。廖亦武的存在，向着孱弱的知识分子发出这样一个拷问：你的思想的强度，是否能够支撑你的肉体的强度？

在一种自由的政体下，肉体的强悍之于知识分子，显得并不必须。但在我们这里，自由的写作首先是一种肉体的写作。因为自由意味着一种消耗。你有多少思想可以表达，看你有多少生命力可以消耗。肉体不能支撑的部分，无法成为有效的思想。就像金钱不能支撑的部分，不是公共生活中的有效需求。这个看法来自廖亦武的显赫存在，对于我长年的刺激和震撼。

在评论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文章中，艾晓明从身体的角度理解林昭。与我对老廖的理解方式非常相似。艾女士下面这段，是我认为迄今最精彩的对林昭的解读。我摘录。作为阐释廖亦武的一种互文。

（影片）疏离了林昭本人、一个青春年华的女子每天都要承受的、作为女人的身体经验；一边是疏离了观众——有着男性的身体或女性的身体，有着同样的食欲、性欲、生死爱欲的凡人的身体感觉。我们理解林昭不是光凭理念的，正如林昭成就她的信仰，也不

是空穴来风；她以自己的青丝白发、伤痕眼泪、涌流或枯竭的经血、背拷 180 天的所有创痛以及狱中每一天每一分钟的肉搏……拷问我们对身体和精神的理解。林昭的血不是象征性的血，是她千百次疼痛着刺破自己、手臂创痕累累的血。正如友人吴敏回应这篇文章时说，因为精神上的剧痛远远超过了肉体，林昭承受了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肉体之痛。而我还要说，她的身体，是“被着镣铐且在绝食之中的负病而衰弱的囚人”的身体，是在“历时十天的绝食中，被苦苦逼迫、虐待得命如悬丝”的身体；这是中国当代思想先哲中最脆弱的身体啊。在她之前，有过张中晓、与她同时者，有过顾准、遇罗克；可是我们何尝有过林昭这样在镣铐下、在不过双人床大小的囚室中以血书写了几十万思想檄文的身体？假如林昭可以变成我们的精神遗产，她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肉体的实践。林昭挑战了我们所有人理解女性的政治生命、思想生命和肉体生命的限度。

多年前我还不认识老廖，在深夜的“自由亚洲电台”里，有幸听他朗诵诗歌《屠杀》。那一个深夜颠覆了我对朗诵的全部概念。因为那正是一种肉体的实践，是写作的继续。是用肉体的强度去抵御苦难，是生命往外面哗哗哗的倒。相比之下，金斯堡的嚎叫距离自己的肉体就显得太远。就像更早时候读老廖的长诗《三城》，读一遍下来已接近虚脱，心中就想这和诗艺无关啊，这种文字不知要多强横的人才写得出来。后来我替老廖找人把他朗诵诗歌《情兽》的磁带转成 CD。录音师也说，这什么人啊，听得我一个人在录音室毛骨悚然，觉得天地都垮了，差点要自杀。

《屠杀》是廖亦武在六四当天写作、朗诵、灌制和拍摄的一首长诗。加上一年后的另一部《安魂》。使他被判四年的反革命徒刑。但这却是国内知识分子在六四时期的恐怖中，几乎唯一的一场喊叫。廖亦武是一个误入白虎节堂、从此被政治裹胁的写作者。老廖喝酒时常说自己胸无大志，是对于政治和关乎政治的言说不感兴趣的人。据我偷窥也确乎如此，譬如他在朋友们开始讨论民主法治的话题时，

逐步就会睡着。这似乎会有碍他的斗士形象，但并不妨碍当真正的政治苦难降临，当那些侃侃而谈民主自由的教授们闭门不出，老廖就惊醒。就以他的强悍的肉体粉墨登场。这是一个我至今不能完全解释的人物。不能解释到底是他思想如此粗糙而强悍，他的自由渴求如此根深蒂固，因此支撑了这一具反复受难的肉体。还是他的肉体如此与众不同，如此埋伏能量，暗藏杀机。能让他的写作即使呆在一个专制主义的牢房，也能获得最大可能的解放。

老廖常说，如果可能宁愿出去吹箫卖艺，和一帮搞音乐的朋友混。也不做这个冤案访谈录了。但大家就开玩笑，说老廖啊，人家抓你、抄你、搞你、日你，你还天天半夜起来长跑 5 公里。你娃也太狠了点。这能让人家放心吗，能不严防死守你一辈子？这时候老廖就现出一副苦相。仿佛长了一身贼肉，就要如此。是没办法的事。这让我觉得老廖的良知，不是从脑子里养成的理性，是从肉体中生出的一种意志。因此廖亦武真的不是什么斗士，他就是一性情中人。一个血气和良知拌在一起的、知书而不达理的家伙。

这不是贬损。而是一种赞美。何谓良知，看老廖出狱之后，再历经磨难。对比他的写作历程，与充斥着中国知识界的各种犬儒式的写作。你会发现良知其实很简单，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良知是不会从养尊处优的肉体中生出来，良知是不会在高头讲章之中获得辩护的。对官方学者和作家们来说，写作是职业，是特长，是精神的按摩。但对老廖，写作的意义几乎只有一种，就是挣扎。

2002 年秋的一个夜晚，老廖和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吃火锅。完了各自回家，他去取自行车，被等候了几个钟头的警察带走。深夜宋玉给我打电话。随后反而安慰我，没什么，我都习惯了。一般过两天就会回来。第二天果然放回。然后一周后的凌晨，闪电般的抄家。这一次起因，是我们都有参与签名的王力雄发起的关于阿安扎西活佛案的公开信。之后我在关天茶舍转贴了他《中国冤案录》的第一篇《严打幸存者左长钟》。许多认识不认识的朋友都来帖子后

面发言。如作家冉云飞、汪建辉、唯色、杜导斌和律师秦少华等。这个帖子也收在本书的附录中。当时我在帖子后写道：

在 83 年严打中，还有许多依然幸存或呆在牢里的人，能为他们做一个访谈，将具有极高的价值。可惜也只有像廖亦武这样被当道者打入另册、在底层和当局的蹂躏中苦苦挣扎的知识分子，才有这样的勇气来从事这样的真正有良知的写作。

在一种频繁地被独裁者打断、监控、绑架、抄家、遣返的生活中，坚持下来的有良知的写作。令人流泪的写作。

老廖与左长钟一样，是被羞辱者，被践踏者。老廖的意义早已和诗人的意义相去甚远。他的生活早已全无诗意可言。他甚至根本已没有私生活。他的生活不断地遭遇当道者留下的大粪和罪恶，不断被当道者强行插入，不断在夜晚和凌晨被身穿制服的人带走。不断的在亲人眼前无端的消失，甚至在自己的婚礼上消失。他在无力为继的生活中所坚持的底层访谈和冤狱访谈，是令那些以社会底层的保护神自居的左派知识分子、令那些空喊与失败者、与穷人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无地自容的写作。

对曾经的诗人廖亦武而言，活在这个国家，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灾难。

像狗一样的活着。然后写作。写作仅仅为了见证像狗一样的生活。

有时候我庆幸、有时候惊讶，上天把这样一具肉体给一个中国当代的知识受难者。祂要做什么？我想神是需要一个见证人。我有时觉得廖亦武就是神的选民。不是选他为万世开太平，不是选他为这个卑微的国度做到什么。这种宏伟叙事会严重超出廖胡子的理解能力。神只是让他受难，给他一副像我这样孱弱的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强大肉体。让他受难时还有力量抬头去观察和他一样的难民。然后把这一切记下来。就当共产党不存在、就当共产党没有统治这

个国家一样的记下来。正如老廖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活下去》第四卷的名字，《证词》。老廖在 90 年代之后的全部写作，都是在为一个时代提供部分被遮蔽的证词。从最浪漫、最湿润的诗歌，退回最纪实、最干燥的文字。老廖的真正的肉体写作，最尖锐的证实了，在一个极权的时代诗歌是如何消失的。

后来结识老廖，他说自由亚洲电台那个朗诵是电话线上即兴的，不够好。以后我果然听到了更令人窒息的哀号，和着他的“箫与啸”。许多年来，老廖每年都要制作一次《屠杀》的朗诵盘。理由似乎是形而下的。就是拿来验证自己经过一年的磨难，生命里剩下的能量还够不够做这个朗诵。看看这具肉体还有没有弹性，还有没有废掉？这个理由曾经令我震吓。我从未对自己的肉体有过像对自己思想一样的自信，也未对自己的肉体有过像对自己的思想一样的要求。因为我想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是用思想而不是用肉体思考的，也是靠思想而不靠肉体去谋生。曾有一个同道的朋友开玩笑，说到了监狱千万不要刑讯逼供我，我信得过我的精神信不过我的肉体。身上的苦不能捱啊，一打我就什么都招了。我说我想来也是。

但看廖亦武，和看林昭，让我觉察到一个残酷和尖锐的事实。在一个极权主义的时代做一个知识分子，你就必须首先做一个体力劳动者。你不是仅仅用笔或电脑，更要用你的肉体去思考，去表达。在这个时代，仅仅用笔、或仅仅只准备用笔来表达的人就是犬儒。这是今天一个思想者、一个准备做公共知识分子的人的命数。你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就要把自己的肉体放进现实。就要先问，我的肉体是否足够支撑我说出和坚持真理，支撑我必要的勇气。

不是说我们必处在监狱生涯或刑讯逼供当中，才能考量肉体的张力。也不是说一个自由的写作者就要随时准备丧失肉身的自由。对一个文弱书生而言，肉体其实是一个随时随地的维度。譬如老廖对自己肉体力量的虚弱，也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和诚实。他讲起在北京上访村采访。说自己这些年的生活真是过好了。若是 5、6 年

前，可以和上访户们睡在一起呆个把月没问题。但现在呆几天就受不了。你思想上想和他们站在一起，你的理性告诉自己应当如何如何。没用。你的肉体先就有反应，产生抗拒。老廖说那里整个空气，对理性而言是弥漫着冤屈，但在肉体而言弥漫着的却是一种病毒。住久了就让自己不适，甚至会生病。

老廖的写作和我不同，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不同。因为他的写作历程就是赤裸裸的肉体历程。他在写作、访谈和受难中不断彰显着他之于知识界的肉体意义。当老廖说自己在上访村待久了要生病，我想当代中国没几个知识分子有脾气说：我就不会。廖亦武之肉体尚且如此啊，当我说我同情那些上访者、同情那些乞讨者时。我也许仅仅是基于理性，基于观念的力量，而在强迫和说服自己同情。我的肉体和我的灵魂一般强度的同情他们吗？我想起去年在遂宁步云乡调查农村选举的那段日子。不隔天到镇上吃顿肉，真是受不了。尽管我也一身贼肉，但我缺乏的显然还是某种肉体的力量，一种能够与思想的强度相般配的力量。

这并非一种民粹式的、对于卑微者的肉体崇拜。不是说一个知识分子要劳动改造，要和上访者一样衣裳褴褛，才够政治正确。但肉体之于知识分子的意义有两种。一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处境，使我们的肉体得到彰显，漂浮在精神世界的上空。肉体的强度支撑着我们对自由的坚持。但这一点却是知识分子很少敢于承认的事实。第二，正是意识到肉体的孱弱，肉体对于普遍正义的天然抗拒，使我生出一种强烈的自省。以往，自由主义总强调面对理性时的谦卑和知识者的道德自省。但这却是另一种自省，不是出于对理性的怀疑，是出于对肉身的怀疑。

如果说哈耶克式的谦卑，更多来自前一种。廖亦武式的谦卑则主要来自后者。尽管他拥有这个时代几乎最强悍的属于知识分子的肉体。尽管他尚未完成的《中国冤案录》在我看来，是这个时代最显要、最杰出的非虚构文本之一。但老廖摸着他的光头，坚持认为

吹他的箫，更让自己觉得自信，觉得无愧。而写作。写作不过是一种苦难。

如果你像廖亦武一样把肉体放进来写作，你的确很难把写作当一种值得炫耀的才华，甚至很难把自己的作品声称为一种成就。因为有了快感你就喊，和有了苦难你就喊。之间实在差得太远。

——当我此文中说廖亦武，我指的就是作家老威。就像我说极权主义，我指的就是共产党。

2004-9-29

盲人作家张紫葛（上）

采访缘起

张紫葛的名声，我早几年就晓得了。那时他写了一本算历史老账的书，叫《泪雨心香祭吴宓》，引起轩然大波。据说相关的争鸣也编纂了厚厚一本，各方都动了肝火，字间行间硝烟弥漫。去年，他又以“机要秘书”的身份，撰写了有关宋美龄的回忆录，同样激发了种种议论。

2003 年 12 月 18 日下午，冬日阳光一路铺洒，我受流沙河、吴梦华夫妇的倾力引荐，从成都西门转了几辆公共汽车，终于在西南民族大学教工宿舍的一幢楼房内，登门拜访了 84 岁的的张先生。在一阵“慕名”，“久仰”之类的客套之后，我切入访谈正题；张先生却以身体虚弱，经历过于曲折为由，再三婉拒。我拿出惯用的迂回手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嘴脸颇似一个不依不饶的政客。幸而有吴梦华师母频频敲边鼓，张先生拗不过，到底应允了。

我们商定，话题集中在反右运动和 15 年的牢狱——太痛了，不知我能否讲到底——张先生叹息道。

为了对后人有个交待，您就讲到哪一步算哪一步——我微笑着，目光却残忍而贪婪。张先生看不到，却感觉到了，他说——我自己正在写，暂时没拿出来。

我沉默着。

张先生眼全瞎，耳半聋，腿是瘸的，还气喘。这样的老家伙，活着本来是累赘，可他还要摸着、抖着，在一块钢板的空槽中填字，日复一日，弄成书稿。这种拼老命把记忆留下来的过程，让人看着，甚至想着都极不舒服。不料，在我一次次登门时，张先生总坐在沙发中，以他豁达的笑声相迎。虽然这笑声经常夹杂着惊心动魄的咳嗽和痰响。

根据记录，我们的访谈从 2003 年 12 月 26 日开始，至 2004 年 1 月 8 日结束，共进行了 7 次，每次两个小时。这种安排是考虑到张先生的身心承受能力。为了保证文字的气韵和连贯，我花了大约两个月对此进行调整和处理。

张紫葛：我的经历太复杂了，老威先生，您让我从何说起呢？

老威：我晓得，就您眼下的状况，是不可能把自己的人生再追溯一遍……

张紫葛：听您的口气，是在怜悯我？不，您弄错了，我的生活是满足的，至少是充实的，虽然眼全瞎，耳半聋，一只腿也瘸，但上天没端走这脑壳，拿劳改犯的话说，这吃饭的家伙还挺健全，记忆力过剩……我只有这件事可做了！把住膝盖上这块冷冰冰的钢板，往中间的凹槽，一笔一笔填字。我不是作家，倒像个很不高明的雕刻匠，左一戳右一戳，有时字压字，煮成一锅；有时五马分尸，头在赵国，胳膊和腿却跑秦国去了。这样的乱稿只有我妻子能辨认、整理，她曾经是我学生，比我小 40 岁——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回忆如洪水一般，快把我给淹死了！多少人与事，纷纷扬扬，在我眼前，仿佛一伸手，就摸着了，就感觉到几十年前的呼吸和心跳了。我热泪盈眶，我一个 84 岁的残疾人，力不从心，又热泪盈眶。能写多少算多少吧，我老是这么想。有一次，钢笔没墨水了，我还在戳字，直到天晚，妻子下班回家，一检查，啥也没有！唉，这种事故接连发生过几次。

老威：现在许多笔都不用墨水。

张紫葛：我太老，习惯用老式钢笔。

老威：哦？您就用老式钢笔写了一两百万字？

张紫葛：很多年了，自己也不晓得写了多少。97 年碰上好运气，出版了《泪雨心香祭吴宓》，险些吃官司。

老威：您揭露了真相，有的人就睡不着了。

张紫葛：其实这只是反右运动的冰山一角。

老威：我正是为此来拜访您，流沙河夫妇建议我花一些时间，记录您的右派和坐牢的遭遇……您差点就死在牢里了……

张紫葛：我这辈子已死过好几回了。

老威：讲一讲吧。

张紫葛：话太长太重，我恐怕撑不下去。

老威：如果您不拒绝，我就多跑路，多登门，尽可能缩短单次谈话时间。

张紫葛：好嘛，就试一试，如果中途而废，也没办法。

老威：行。

张紫葛：您让我从何说起？

老威：您的眼睛是怎么瞎的？

张紫葛：打瞎的，这是逮捕之前的一点插曲。当时反右已全面展开，各单位都下达了右派指标，而我成了右派中的重点管制对象。有一天，来了三个人，像做贼似的，溜进我的房间。

老威：做贼似的？

张紫葛：哦，您不明白。反右还不是后来的文革，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公开的暴力。当时报纸上火药味浓，但也有政策性，比如承诺对普通右派不抓不管不杀；开批斗会时不喊口号；不打不骂。对知识分子，共产党还得做做姿态，表示一种猫戏耗子的宽宏大量。于是，“个别帮助”很快在校内蔓延成风。

老威：他们怎么“帮助”您的？

张紫葛：简单地问一句：“张紫葛，您还不承认自己是右？”等不及回答，其中一人就从桌上拽下台布，把我的脑壳一蒙，一顿黑打。我被弄得遍地滚，右眼被什么东西扎了，嗡地一下，就啥也

看不见了。我不由自主地大喊:“我眼睛瞎了!你把我眼睛整瞎了!”他们才住手。

这三个人都是年轻老师，根正苗红的左派。就是农村娃娃，投军打仗，在部队学了点文化，解放后就转业到地方，然后又调入大学整治臭老九的那种。领头的专案组长是西政刑法教研处的副主任，最拿手的却是刑讯逼供。他按住我的手，凑近看，并压低声音说：“瞎了又咋样？”我说:“你们打人犯法!”他说:“我们没打你，有谁证明我们打你了？”我说:“我的眼睛还在流血。”他说:“那是你自己撞的。”我说:“我要求去医院验伤。”他说,“右派没这个资格。”我说：“你是共产党吗？”他说:“我们今天正是代表组织来帮助你，张紫葛，识相点吧，写份检讨。我们只要求你写一份深刻的检讨。难道你的命只值一份检讨？”

我没话说了，我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俄文教授彻底被整垮了。因为人家既然敢弄瞎你，那弄死你也就等于弄死一条狗。我承认了自己的各种右派言行，三个人才转身离开。20 多年后，受右眼的连累，左眼也慢慢看不见了。检查结果，是玻璃体破损，洞穿在视网膜当中，把光给遮了。

老威：西南政法学院可是培养执法人材的最高学府之一。

张紫葛：对，全国恐怕有三分之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员曾在这儿上学。

老威：虽然是反右，却没一个懂法的人？

张紫葛：懂法和研究法的都打倒了，连吴宓那样德高望众的专家都难逃劫数。50 年代，就没啥子法；到了文革，老毛的话就是法，包括胡话，包括放屁。一层层地贯彻下来，谁掌握了绝对权利谁就是法。在西政，院党委书记刘佑东就是法律，他当过重庆市的公安局长。这个人太复杂了，可绝对不是坏蛋。在反右之前，由于我工作中的成绩，再加上是老乡，他对我极好。他经常来我家串门

、喝酒，显得挺豪爽，没啥条条框框。56 年，院常委讨论改善知识分子待遇，他还特意让我作为两名非党教授之一列席，提建议。57 年春，全国上下搞大鸣大放，许多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毛主席掏心窝子，意见越提越尖锐激动。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刘佑东把我请到他家，泡上好茶，动员我鸣放。我犹豫了好半天，才说："刘书记，思前想后，我对党没意见呀!"刘佑东把脸沉下来说："咋可能没意见？"我说："解放后，我一直被重用，又教俄语，又教法律，又搞翻译，还经常坐轿车，陪苏联专家到处转，日子过得风光体面，特别是您，称得上是我的伯乐嘛。"刘佑东不耐烦地打断我："好了好了，你这千里马就帮帮伯乐的忙，在学校里带头，把鸣放有声有色地搞起来。上面催得太紧了，如果没人鸣放，我这个当书记的脱不了手。"我还是坚持不提意见，刘佑东生气了："你这人不够义气！书呆子，随便弄两句也成嘛。"我说："不成。"他说："啥子不成？你就说你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意见，与党组织有鸿沟。"我说："没意见，没鸿沟。"刘佑东气得跳脚，连叫："好个油盐不进的张紫葛!"

那会儿，广播里天天播"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还有"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任务，每个教授都要学习，要表态。西政的院刊转眼变成鸣放快报，我的"典型言论"登了上去，没意见改成"很有意见"，没鸿沟改成"很有鸿沟"。我大吃一惊，马上找刘佑东质问："咋全搞反了？"书记大人答："我叫人改的，路人皆知你我走得近，你不带头，难道你要我披挂上阵吗？"

稍后，储安平的"党天下"出来了，姓刘的意识到这不是闹着玩的。出于好意，他又找到我，叮嘱："张紫葛，该转向了，再这样鸣放下去要出大乱子。"我说："我根本没鸣放。"他说："屎都胀拢肛门了，你不拉也得拉。趁早表个态，与右派划清界限吧。"

为了自保，我写了一篇《坚决反对储安平先生的荒谬言论》，上了 57 年 6 月 28 日的《人民日报》，标题改成《白发三千丈的手

法是不行的》。可已经悔之晚矣！在同一天，校园内出现了《口蜜腹剑的右派张紫葛》的大字报。我气炸了，冲入党委办公室大吼：“我咋个划右了？！”刘佑东笑着说：“你不右，难道我右？”我说：“你把我当猴子耍啊？”刘佑东连叫：“紫葛歇火。”又拉开门，探头确认无人偷听，才压低声音说：“鸣放有任务，右派也有指标。昨天我上市委开会，任白戈（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老威注）要我汇报，我刚说西政的鸣放同其他院校比，属小儿科，没人够右派资格，老任就火了。截断话头，冲我扫机关枪，并摊牌说，这百分之十的右，别人没资格，只有拿你这书记去顶。我他妈差点回不来，你说险不险？”我不吃这套，因为这和我没关系。刘佑东叹气说：“两个蚱蜢已栓在一起了，还没关系？我亲自动员你鸣放，把你的言论引蛇出洞，见了报；不大义灭亲划你右，有人就会借你扳倒我。”

木已成舟，我捶胸顿足也没用。刘佑东说：“你非右不可，除非你给毛主席写信。”我犟道：“写就写。”刘佑东哭笑不得：“算了吧，张紫葛。看开些，过了这运动风头，右派还能摘帽嘛。我倒了，谁来给你摘帽？”

老威：这人太无耻了。

张紫葛：也不能这么说，他不这样，官就当不下去。

老威：你真善解人意啊。

张紫葛：我被专案小组整瞎后，人们议论纷纷，刘佑东就在大会上避谣，并扬言要追查传谣之人。可有一次，我又挨打，被一位小姑娘发现，立即报告给刘佑东。他急匆匆地赶到，爬上天窗，望见我倒吊在房梁上，气坏了。居然大吼一声，一脚踢开门喊：“他妈的，把张紫葛放下来！”专案组长吓坏了，刘却像袍哥大爷，右脚踏在椅子上，拳头擂着桌子说：“你他妈凭啥打张紫葛？他在中央挂了号，你闹出人命，我向上面怎么交代？还以为我把他转移到香港去了。”

组长连赔不是，刘佑东冷笑说："你的底细我还不清楚？我当过公安局长，把你送上法院还不易如反掌？"

组长顿时面无人色，扑通跪倒磕头，让刘救救他。可风水轮流转，刘却没想到在文革中，组长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带人把四处躲藏的走资派刘佑东抓回校，关进了黑屋子。"狗日的可没少打我。"刘咬牙切齿，"往死里整。"

老威："你咋晓得刘挨整？"

张紫葛：刘自己讲的。1983 年的某一天，我们在成都民院门外的一条街上狭路相逢，刘佑东一把扯住我，激动得发抖，"张紫葛！"他大叫，"我可差点见不着你了。"

我故意说："我这条命还是您给的嘛。"

刘佑东一脸疑惑地盯住我反问："你的命？我给的？是么？"接着又滔滔不绝地控诉文革，还牵我的手，去验证藏在衣裳底下的伤疤。我忍不住，就打断他，旧事重提。不料他还是一脸疑惑。

老威：他毁了你，还装糊涂。

张紫葛：不太像。因为他听完我的遭遇，连声感叹，并且挺关心地问："你真划了右派？还劳改了十几年？我怎么一点不知情呢？"

老威：这戏演得太好了。

张紫葛：我一下子被噎住了，甚至怀疑是自己的脑子出了差错。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呀，谁要较真，就一天也活不下去。

我右眼被打瞎的当晚，觉得平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不仅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痛不欲生。勾践能尝粪便，韩信能钻胯，图的是将来的雪耻；可我身心俱废，为了保命，还得把承认自己反党的检讨双手奉上，自我定罪，永无翻身之日……

我绝望了一整夜，次日早起，匆匆赶到校党委办公室，当众推

翻了昨天的“反党检讨”，指出那是在逼迫下胡乱写的。不料一下子炸了锅。几个钟头后，专案组的一个小伙子上门来，一把扯住我就开始泣不成声。我吃惊地问：“你咋个了？”还以为人家天良发现，就反过去安慰说：“过去了就算了，我不会计较的。”不料小伙子突然哇哇大哭：“咋能不计较呢，老张？我刚递了《火线入党申请书》，向组织上保证要把你‘帮助’成右派的，可一泡屎的功夫不到，你就出尔反尔。这一闹，我的入党计划泡汤了，人人都以为我欺骗组织。”

他伤心得捶胸顿脚，没完没了。我实在熬不过，只得再写一份检讨，成全了他。

老威：您很有人道精神嘛。

张紫葛：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随着斗争的深入，众右派纷纷落马，至1957年底，运动已近尾声。1958年元旦，康生代表党中央临校视察，我的问题立马升级。除了享受极右的轮流执班看管，还有一个叫蒋仁峰的专职管我。

蒋与我住门对门，是个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老地下党员。有一天，他隔老远就大叫：“张紫葛过来！我要教育你！”我立即应声而至。蒋四顾无人，就在他家门口悄悄说：“晓得不？康生来校，让将右派名单拿出来，逐一审核，并且点着你的名字命令：‘这个家伙必须逮捕。’——看这个架势，你通了天，两三年回来不了。”

我懵懵懂懂地瞪着他，蒋又说：“你回去与你母亲话个别吧。”

我说不行。因为一层叠一层的通栏大字报封门，谁也不敢从此进出，否则损坏了革命大字报就罪加一等。后门也钉死了，我只能在群众的监视下，每天由指定的窗口翻越。一顶象征活坟墓的招魂幡醒目地竖在一旁。

老威：什么时候了还守规矩？

张紫葛：蒋仁峰也这么说。并且让我从他家的屋后，猫腰穿过

灌木丛。“明早 7 点钟，你悄悄去，天黑前回来。”他叮嘱说，“看母亲是人之常情，你怕什么？你要有决心活着回来，回到西政来！极左也不是党的政策——我以一个八一老兵的身份告诉你——这不是党的政策！”

我依计而行。大冬天，路灯没熄就赶车抵北陪探母。当时，我妈正在蜂窝煤炉上烤馒头给娃娃吃，一听敲门，不禁哆嗦；再一开门，魂都飞了——手里的馒头卜卜落地，因为右派逃跑，全家都得遭殃。

我妈没文化，但经历的事情多，还算镇定得快。一会儿，又有人敲门，我急忙钻床底，却是在西师当助教的弟弟回来了。

我把一些信笺和照片亲手交给母亲，却不忍心就此诀别。无奈之下，就点着一张放大的照片开玩笑说:“妈，留一个遗像给您吧。”母亲闻言色变，生气地瞪我说：“娃儿，硬扎一点，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接着又轻柔地拍拍我：“来，让妈给你洗个头。”

刹那间，我重返童年。因为自出娘肚，刮胎毛，到小学毕业前，都是母亲替我洗头。我曾经产生过逆反心理，闪着不让洗，她就追赶说：“啥时候找门媳妇，就用不着老妈动手了。”

老威：当时您还没结婚？

张紫葛：哪里话，娃娃都四个了，在西师附小念书。前妻在高滩岩教小学，她还不晓得自己的教授丈夫问题有多严重，所以没来得及赶回。我妈替我一把一把洗完头，她叹气说：“娃娃，你的头发掉了不少。”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十多年后，母亲去世了，其时我正在劳改，不可能送终。

我掐着时间，一步三回头地离家。因怕人认出，就偷偷摸摸地沿西师河边埋头赶路，刚拢蔡锷路下面的拐弯处，有只手突然拍我的肩，一惊回头，原来是吴宓——这一情景，我在《泪雨心香祭吴宓》里写过——他笑道：“我一早就望见你过去，料想你还会原路

折回。”

来不及客套，他就问我的近况，我实言相告。他叹道：“毛公（指毛泽东——老威注）有负于天下书生啊！君不见明太祖时，不仅不能提相反的意见，连歌功颂德者也被怀疑其动机不纯。古今君王如出一辙，一网凭空撒下，不管鱼虾、黄鳝还是泥鳅，只要正好在网中的，都逃不脱。”

吴宓如此叮嘱我：“要学太史公，莫做三闾大夫。”许多年后，这话犹声声在耳，令我一再忍辱偷生，既不投江，也不服毒。

老威：象古代即将发配的士子，拜别高堂，就踏实上路了。

张紫葛：有点这种滋味。因为我 25 岁当中国文学教授，做过宋美龄的秘书，还主编过《新疆时报》，新旧朝代都曾吃香。在反右之前，由于精通俄文，能翻译苏联教材，经常陪同苏联专家视察，所以身价很高。“屁股冒烟”，意思是坐小轿车的级别。转眼之间跌下尘埃，真不知“今夕是何年”？

老威：此种遭遇也算个案吧。

张紫葛：运动如演戏，人人都是角色，所以我身上的戏剧性不算啥。西政有个地下党出身的老革命，叫孙某某，曾进军北平，做过全国首届政法委的法律起草组长。尔后因故连降三级，从最高政法委裁到省高级法院，然后再裁到西政任教务长。可就这么一个从政坛直线下降的书呆子，仍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本校内礼堂作报告。讲着讲着，他便脱离了稿子，由着性情乱说：“反右运动的关键，就是分清龙蛇。你是龙，就借机升天；你是蛇，不识时务，就只有钻草……”

孙某某云里雾里讲得兴奋，从台上下来还左右打招呼，却不料礼堂外早有新出的大字报等着他——《把在党内潜伏很深的右派分子孙某某揪出来》。他傻眼了，怎么一下子就成了敌我矛盾？

老威：这人还有点真性子。

张紫葛：所以要改造，并且把你一次次地改造，直到成为身经百战的革命骗子。我等不堪在日常环境里改造，就得改地方。1958年的 1 月 19 日，我被逮捕了。一场运动下来，被抓走的极多，而我却是西政第一个逮捕的教授。公安人员将我从家中押解出门，满路满操场都是人，而我满脑子想的是前一段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党的承诺："对右派不关不杀……"

经过教学楼，我把铐子举着走，将我"栽培"成敌人的刘书记正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我当时血气方刚，想以举铐子的动作促使他良心发现。

老威：您我还算是先后牢友呢。

张紫葛：哦？

老威：1990 年至 1992 年，我因反革命罪在石板坡羁押。

张紫葛：就是石板坡北里的重庆市看守所？

老威：对，一条溢满污水的臭巷子抵拢，大门就到了。

张紫葛：这么多年还没变化？

老威：鬼晓得。也许设施更完备，墙更厚了吧。

张紫葛：过去分东庄、西庄和老庄，我押在东庄，这在国民党时期就是监狱，关押共产党政治犯。重庆有好几处这样的地方，从前关共产党，朝代一变，要么被当作革命传统教育的场地，向广大群众开放，例如白公馆、渣滓洞、烈士墓；要么继续作专政工具。50 年代，蹲过国共两党班房的人多如牛毛，我还以为自己是漏网之鱼呢。

进门就一块敞地，公安人员把我搡进去，向里面的干部打个招呼就算交割了。因为一场运动下来，反动派太多，他们还得抢时间去抓其他的。

老威：到底关押了多少？

张紫葛：两个楼都封闭着，不晓得。但我挤在犯群中候了三个多钟头，还不断有人被塞进来。洋铐越来越紧，最后钢齿都嵌入肉里了，我忍不住，就挤到桌边，把铐子举给一个女干部看。不料她说："你享福惯了，还是自己担戴一点吧。等到你真进去了，恐怕又会觉得在这儿倒立着也比在里面强。"

我正不解其意，就轮到提舍房讯了。一男一女坐在桌后，男干部问："在哪儿工作？"我回答："西政。"不料对方骂道："混蛋！你凭啥在西政工作？"我愣了，正要再次作答，对方却敲着桌子一字一顿说："你只能说潜伏在西政，窃取了教授之职。还有你的帽子，不能这么正戴。取下来，对，就这么翻过来，里子朝外戴。既然是反革命，就要让群众一眼能识别清楚。"

简单的登记完毕，开始搜身。当众脱光衣裤，象帽子一样翻过来，一寸一寸捏每一段缝。口鼻耳、腋窝、肚脐掏检了，还把卵蛋仔细掐了数遍，最后命令"把勾子拱起"。无奈，我只好作狗爬，屁股朝天。那干部果然把两瓣肉掰开，用一根竹签捅了，再顺着股沟一路划下去。我当时臊得无地自容，因为此前的 57 年 4 月，我还充当俄文翻译，陪苏联专家以及任白戈书记前来视察过，当时由所长、处长等一干官员接待，狗日的一路点头哈腰，恭敬得比奴才还奴才。今昔对照，真是恍若隔世啊。

搜身毕，方闻一声断喝："滚进去！"于是我反穿衣裤袜帽，举双手入第一道门坎。喊报告，声音因颤抖而太小，屁股被踢一脚；接着上楼梯，又挨一脚。我象被马蜂蛰了一下，在第三脚没降临前大叫："报告！"结果还是被踢趴在地上。后来才晓得，给我下马威的是清洁班的红头犯，他们全来自公、检、法系统，被"运动"成罪人后，就送这儿洗心革面了。

专政系统的人被专了政仍然高尔一等，除了可以在监区活动的清洁班，号里的组长也由他们担任。组长下辖"清洁"和"学习"，算上层，替政府管理着几十个坏蛋。

我是独眼，加之监舍只有一个天窗，光线微弱，空气也不流通，所以我进房后就懵懵懂懂地靠着墙，适应了半天，周围的事物才慢慢从浑沌中凸现——一溜通铺抵拢拐弯，铺下是泥地，很潮湿。组长从犯群中鲨鱼一般浮出，命令道："1143，你过来。"

我应声坐在湿地上，组长则坐在垫包上向我一一交待监规。我发觉当所有人都翻穿衣裤的时候，黄鳝泥鳅的确一个样了。

老威：您没过手续么？

张紫葛：啥子手续？

老威：就是挨打，或者花样翻新的肉刑。

张紫葛：那是后来的事，当时已人满为患了。我的号码是 1143，没过三天我就听见有二零几几的号，这说明平常关几百犯人的看守所，已塞了 2000 多人，快爆了。接连两顿饭我都没吃，心事重，不觉饿。晚上吹哨点名，再吹哨睡觉，每人只有一尺宽，直挺挺地倒下去，手紧抱在胸前，否则手肘一放下，就侵占了别人的领地。我新进来，脚就蹬着大马桶躺着，尿胀了，先喊报告，得到口头批准，才一点一点起身坐便。

老威：撒尿还坐便？

张紫葛：必须象女同志一样坐便，还得手把生殖器往下按，让尿贴着桶壁淌下去，出了任何一点响，都叫违规。我抵桶而眠，方便容易；而远外过来，就如探雷似的，每一步，都得往人肉缝里下脚。我感到梦里梦外均被屎尿给淹了。可夜半时分，却有一串尿滴溅到我脸上。惊醒之际，我不禁埋怨违规发梦癫的站尿者："你咋搞的嘛。"不料组长闻声发话，反指我违规，叫站起来，没有口令不准躺下。我不服，双方一顶撞，清洁班就发现了，问明情由，批评了组长两句，又对我说："1143，这是监狱，放下你的教授架子吧。"

第二天，组长乘放风，主动凑过来，叫我"张教授"，在那种

环境下，真吓了我一大跳。他又自我介绍，叫刘某某，曾是西师外语系的学生。我不敢接受他的亲近，他却鼓励我说："多锻炼身体吧，人才放在哪儿都是人才，运动一过，教授照样吃香的。"

老威：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张紫葛：清一色的右派。

老威：是啊，总比刑事犯成堆的地方好。

张紫葛：惭愧。不过在那种环境下，我对刘某某还是存有戒心，他身上的恶习不比刑事犯少。比如放风上茅坑，他回回占先，然后才轮到其他人。有时他蹲坑时间长，后面的就遭殃了，收风哨子一响，连屁股也来不及擦，他却守在那儿配合政府催人。

老威：够缺德的。

张紫葛：其实人挺复杂。刘某某后来判得很重。送劳改不久，他想不通，就给周恩来总理写信，企图鸣冤出头。岂料信尚未寄，就被"截获"，成为反改造的典型。开会、批斗、关小间，几经折腾，就奄奄一息了。几年后，我碰巧又与他同处一室，那是在某某农场，他戴着脚镣手铐，骨瘦如材。看在他从前尊重我的份上，我挺照顾他。有一个黄昏，他说他不行了，看那鬼一般模样，我不禁叹息说："撑一下吧，喝两口米汤回回阳吧。"他摇头，几天没吃饭了还摇头。我凑拢他耳边劝说："想开些。"他却说："我想看一眼天。"我把他抱起来，朝上举，他的手臂都抬不动了，脑袋却伸向天窗，直到脸贴在铁栅上。他轻轻地哼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眼泪扑簌簌地下来了。我在下面叫唤："刘某某，看够没有？"他却不理，继续念叨着一段独白："在天的这一边，是毛主席、共产党；在天的那一边，是爸爸、妈妈和故乡。妈爸呀，毛主席呀，我没有对不起你呀！"说完身子一软，就咽气了。

这是平生第一回有人死在我怀里。

老威：说不定这刘某某是个诗人。

张紫葛：我不清楚刘某某所犯何罪，但那年头死个右派反革命，根本不值得感慨。

老威：您在看守所羁押了多久？

张紫葛：10 个多月。

老威：不算太长。

张紫葛：外头搞大跃进生产，里头搞大跃进审判。逮捕的人太多，十多平米的监舍，挤三十七、八人，到后来，挤五十多人，天气一热，人肉味薰得人晕乎乎的。晚上睡觉也由勉强平躺改为侧卧，每个人都如扁担，直挺挺、硬梆梆，连起夜回来都嵌不进去。在这种敌人激增的严峻形势下，大跃进精神是必要的，落实在政法工作上，就是草草审判，连姓名、年龄都从略不问，直接让你坦白罪恶，然后指出你的三种出路：枪毙、判刑、释放。任由选择，挽救的大门是敞开的。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每个落网者都土崩瓦解，自我坦白，并检举他人。有个湖南籍的小伙子，挖空心思，检举材料仍不上档次，竟狗急跳墙地指着某人说："昨天放风时，我看见你对着墙外发呆，明明就是有逃跑思想！"而对方反唇相讥道："你狗日的昨天不仅发呆，还直愣愣地盯住哨兵，盯住冲锋枪不放，足足有五分钟，可见想劫狱！"

老威：真他妈乱套了。

张紫葛：太正常了，因为都不愿死在牢里，连累子孙后代。

老威：此话怎讲？

张紫葛：如果你被枪毙了，或不明不白死在里面了，你的子子孙孙就将成为"血仇子女"——即与共产党结下血仇，世世代代打入另册，不得翻身。所以，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这么想——再大的个人侮辱都忍了，但"血仇子女"却万万当不得。

老威：绝大多数犯人都没犯死罪吧？

张紫葛：没犯死罪并不意味着你能活着出来。1958 年大丰收，本来人人都能吃饱，但人人却去砍树、炼钢、搞运动，结果粮食没人收割，烂在地里，城头的商品粮供应也紧张起来。我先是在石板坡接受预审，4 月份，又转到凤凰台的第二看守所。每天都是半饥状态，因为政府有话，如果让罪犯吃饱，就不肯交待问题了。凤凰台是一日两餐，麦麸加茄子。麦麸磨得太粗，有人饿急了，舍命胀，结果就拉不出屎来。要用手，用筷子，一点点往外掏。我比较理智，麦麸吃得少，可人却变得浮肿。盛夏天气，几十人的监舍只有一个天窗，空气和水都成了大问题，呼吸急促，挥汗如雨，每人每天只发一杯水，在可怕的窒息中，我们都渴望早日去劳改。

我总共经历了三次预审，第一次，我的罪名是"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不内行"；第二次，升格为"公然诬蔑"；第三次，就成了"阴谋推翻党了"。我想也不想，就一口承认，因为你稍一"抵赖"，审判员就起身要走，向外使个眼色……

老威：啥子意思？

张紫葛：马上"挺起"呗。

老威：不懂。

张紫葛：一种大跃进时期的肉刑。让你跪下，腰板挺直，四个人踩腿扯手，两个人用膝盖抵背，向后使劲掰肩。如此有节奏地"挺"几下，你就熬不住了。我亲眼看见被挺死过去的人，隔几个钟头，才醒转。原来这浑球被人检举："人家喊毛主席万岁，他却叫红烧肉万岁。"还不认账，结果一"挺起"，就喊爹叫娘地认帐了。

老威：您还笑得出来？

张紫葛：我心里没笑，嘴巴却老嘻着，这是中国式的一种习惯吧。总之，肉刑较普遍，揪乳头，掏下身，还有，我不一一列举了。所以，最后就不用审了，我干脆要纸笔，照政府要求一一呈供。按法律格式，他们加上头和尾，就成了我自己的"起诉"和"判决"。

老威：您真是破罐破摔了。

张紫葛：有个叫雷雨金的审判员，曾暗示我翻案。他先是打瞌睡，而后捏着我的供词说："你真是个混蛋，敢欺骗政府！知道么，对自己的罪，过分夸大和隐瞒都是态度不老实！本来可抓可不抓，但为了教育大家抓了你，而你……"后面的话我记不清了，我听出他想救我，可当时，我实在不愿在看守所多呆一天。

终于庭审了。那天早晨，法警提我出牢房，空气突然变得意外新鲜，脑袋受不了，闷胀起来。一会儿，又提出一人，我定睛一看，竟是我在新疆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汪志辉，现为四川外语学院的教授。师生两人铐一块，上囚车来到市中院的空坝前。我先解铐受审，审判长是中级法院著名的老虎判官。按程序，检察官念《起诉书》，把"肄业"念成了"肆业"，我出声纠正错别字，书记员反驳道："就是肆业，啃了？真是反动气焰嚣张。"于是我此后除了回答是和不是，一律不说话。十几分钟后，过场走完了。

我回到空坝前，换汪志辉受审。不料更"大跃进"，十分钟不到就结束。我悄悄问他咋回事？学生回答：《起诉书》念完后，法官问——属实吗？我说——一派胡言。法官说——你有辩护的权利。我说——说了也当放屁。法官说——根据你在庭上的种种表现，可见《起诉书》上全部属实。我说——你们好话说尽，丑事做完。

延期几天，我和二三十人一道，候在一间小屋外等待宣判。本来我排在头里，里面却一直不叫我的名字。直到最后，我才喊："罪犯张紫葛前来受审。"里面仍然无动静。我只好再报告，方听见低低的应答："进来吧。"

法警出去了，就剩审判员一人，我一认，原来是我在西政的学生。她注视我一分多钟，表情凄凉地问："怎么样？生活还行吧？"我嗫嚅道："都过来了，还活着呢。"她起身绕过桌子，握住我的手说："坚强些，相信以后您还会为人民做贡献的。"我暗吃一惊，这种举动可大大违规呀！

屋里暗，我感觉她呼吸急促。我想起她在西政反右斗争会上，态度激昂。她曾发言说："张紫葛假正经，真反动。"而此情此景，恐怕师生都感慨万千吧。

按程序，本该由她宣读《判决书》，但她起个头，却读不下去。她将两页纸直接递过来说："听清了，判 15 年，有 5 天的上诉期。"我会意地高声回答："报告审判长，我不上诉，判得太好了。"

这是 1958 年的 11 月，天刚转凉。几天后，我就如愿以偿地投入劳改。

老威：上诉期不是 15 天吗？

张紫葛：大跃进，各行各业的时间都依法缩短了。

【补遗】

在初入重庆市看守所之际，张紫葛先生曾亲眼目睹其监舍组长刘某某"吃桶"，令人叹为观止。特补遗如下，也许对治疗种族健忘症有些微功效。他的叙述如下：

1958 年 1 月 19 日黄昏，众犯于寒风透骨中列队开晚饭，由于我刚入监，心事重，暂无食欲，就在一偶旁观。所谓晚饭实为牛皮菜和包谷粉搅在一块的猪食，稀稀的一黄桶提出来，云蒸雾绕，我嗅一口就恶心欲呕，而众犯却直咽口水。桶中猪食晾在院中约 1 小时，才吹哨分享，一人一铜勺，施粥者边舀边抖，此时热粥也冷冻成冰砣矣。

大伙不及用筷，三两下便倒入口中，又滋滋卷舌舔净碗底，活生生一幅地狱图。眼看桶中已罄，我正准备转身回监，不料众犯仍无去意，均灼灼然死盯那饭桶。施粥红毛犯发问："今天该那个吃桶？"组长刘某某应声而出："该我吃桶！"

我愕然人非野兽，岂能将饭桶嚼烂吃掉？却见刘某某亮出右掌，把住桶沿，缓缓旋转，而后将收罗之余沥丝丝纳入嘴巴。掌过一遍，

食指再过数遍，把个饭桶搜刮得虎虎生风，比精心擦洗过还要亮净。

众犯啧啧叹息，我也以为见识了“吃桶”之风采。可说时迟那时快，刘某某竟突然翻桶，底朝天稳罩在自己头上，杂技艺人一般边旋边舔，达三分钟。待充分展示了中国犯人的舌头卷食神功，方揭桶亮相，神定气闲，大有苞丁解牛，踌躇满志的气象。

正要列队回舍，有眼尖者却指出，桶耳内侧还沾有一点粥浆，这也是粮食，不能浪费。我不平道：“你这是骨头里挑刺，侮辱人格。”刘某某却二话不说，勾指直掏桶耳，还厉声教训我道：“毛主席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多吃一点粮食，生命就多一分保障，要活，使劲往下活呀。”

可几年后，刘某某却死于精神崩溃。

盲人作家张紫葛（下）

采访缘起

至 2004 年 1 月 6 日下午，对张紫葛先生的马拉松访问已进行了一半。阳光透过大学校园的林荫道，星星点点地飘洒着，我和上个世纪 70 年出生的诗人蒋骥一道，行色匆匆地赶路；而在另一端，张先生从午睡中刚刚醒来。

我们入楼上二层，按响了张宅的门铃。开门的是 70 多岁的石琼生老人，他自称是“学生”，经常在此照顾老师的起居——这大约是我见到的最老的一对师生了。

室内一派昏暗，拉亮日光灯，张先生一身蓝布中山服，正襟危坐于迎门的旧沙发。“廖先生？”他微笑道，随即我们紧紧握了手。

我介绍蒋骥，并提出给他照个像。张先生的胸脯触电一般挺直了，还摘下圆顶鸭舌帽。“状态不好，就不拍了吧？”他说。“拍也可以，不过不能发表出去。”

“为什么？”我表示疑惑。

“我的书上有正在创作的工作照，挺精神。”他说。“而现在的这身行头，像个倒霉的劳改犯。”

蒋骥识趣地收起像机，张先生才放松了。稍后说到激动处，还把帽子朝后直掀，露出宽阔的秃脑门子，身子也如充足了气，不倒翁一般左右摆晃起来。

我和蒋骥不由自主地交换眼色，感到很可惜。

张紫葛：四川省第二监狱在重庆南岸的弹子石，对外的招牌是某某某某信箱。中国所有的保密单位都以信箱为代号，其实类似掩耳盗铃，因为附近的老百姓都晓得那是啥地方，出产的是什么。

老威：我也在二监呆过，知道里面的工种分翻砂、铸造、金工、钳工等。

张紫葛：造驱动、变压等各类大型电器，低成本高效率，很赚钱。当时还有女子队，做服装。

老威：里面有几个大队，多少犯人？

张紫葛：大概有 6 个大队，每个大队辖 4 个中队，我估计内圈至少关了 5000 余人。因为我是教授，文化最高，被狱长封为大组长，管日常事务。同看守所比，算飞黄腾达了。全体犯人就一个大厨房，灶台之大，可以并排走两个人。一把锅铲长约四、五公尺，锅盖用绳子往房梁上吊……开饭时，一条木杠抬大半人高的粗桶，热气腾腾，桶跟前排一个中队，一长溜，起码有一两百人。

老威：很壮观吧。

张紫葛：四个粗桶都抬出伙房，然后由小组到大组，层层上报到我这儿；而我又转身立正向管理干事报告：应到多少，病号多少，缺席多少，实到多少，请政府指示。于是上峰下令"开饭"，我这个高级传声筒又一个转身立正："全体听口令！预备！开饭！"

四条长龙依令向前蠕动，无论食物干稀，每人一勺。稍后，上千张嘴在同一时刻吧哒吧哒作响，我举目望去，觉得在大学里也没如此威风过。有一次，大队长巡视盛宴，竟对垂手作陪的我感慨："张紫葛，你他妈这个反革命教授，统领过这种饭桶部队吗？恐怕美帝国主义看了这排场，也会发抖的。"

老威：这家伙挺幽默。

张紫葛：工农干部，没啥文化，却喜欢开玩笑。还有一次，他弓下腰去摸一个犯人的胸脯："哦哟，多么资产阶级！还装假乳房！"没料到该犯反应贼快，竟投其所好地起立道："报告政府，这儿是真的！""是么？"大队长笑着又捏了一把，"狗日资产阶级吃得太好了，妈个屄"。

老威：当众耍流氓么。

张紫葛：大伙都笑得肚子疼，羡慕死了，那气氛如军民联欢。只有我们的管教干事马着脸，他是个长相清秀的小伙子，我私下取了个绰号，叫“普西金”。当时象普西金这样有文化的年轻人同大老粗有矛盾，我夹在中间，与大队长的关系也不那么融洽。有一回，两名死缓犯人借加夜班之机逃跑，与他们同一监舍的人均受株连，统统上手铐脚镣，打入小间。我是当晚总值星，几乎难逃劫数了，幸好我事先向大队长递了“死缓犯不宜加班”的书面报告。

两逃犯不久就被抓了回来，枪毙了。大队长借着这杀气腾腾的氛围，召集犯人大会：“你们晓不晓得外面的形势有多严峻？饿死了成千上万！连树皮、草根都弄来吃，或许还吃不着！而你们这些阶级敌人，都有基本口粮，至少有玉米芯子和土伏苓填肚皮。狗日的，身在福中不知福，还逃跑，拿我们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不当回事！”

接着，他挨着点犯人组长的名字，命令发言。狱中发言自有先大道理、后小道理的流行套路，于是组长甲开腔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

岂料话音未落，大队长却喝断：“马克思列宁教育你什么啦？不要脸的东西。来人，给我上脚镣！”

那倒霉蛋杀猪般叫屈，但 70 多斤的八卦重镣依旧叮当奉上。

组长乙在闻风胆寒中继续：“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

大队长照样拦截：“毛泽东思想教育你什么啦？给脸不要脸，来人，上脚镣！”

没一会儿，就有七八个组长被大铁镣钉住，直挺挺地趴地上。会场鸦雀无声，连一只苍蝇的嗡嗡也清晰得令人毛发直竖。

我浑身被冷汗湿透。终于，大队长喊道：“张紫葛！”

我立正答到。大队长又盯了我几秒钟：“轮到你这个大组长了。”

我再一次立正答是，连声音也哆嗦了。可普西金却瞅瞅手表，出面解围："时间不早了，张紫葛，你明天再继续发言吧。"紧接着又宣布："散会。"

大队长的脸色气变了，却不好当众发作。

老威：一个普通干警敢为了你驳上司的面子？

张紫葛：我初入监狱时，狱长亲自召见我，认为我"在大风大浪中没站稳立场，但经过改造还有前途"。加之多数干事对我优待，所以大队长也不能太过分。

老威：混得不错。

张紫葛：人在屋檐下，岂敢不低头？比如某个夏天，某个女干部坐在过道上纳凉，见我过路，就故意一摆腿，把拖鞋甩到大太阳底下。我就得闻风而动，窜过去捡起鞋，满面笑容地替她穿上。如果她再甩，我就再捡回来替她穿。

老威：您曾经是为人师表的教授，咋沦落如此？

张紫葛：她也这样问，并且叹息："张紫葛，你真的变了。"我心里说："是变了，犯人就得逮住任何一个讨好政府的机会。她却叫我跟着进值班室，边吹风扇边问我还认识她不？我想了半天，又经反复提醒，才记起在几年前一次有苏联专家参加的舞会上，曾有个姑娘邀我跳了一曲舞，她说："你那时多傲气多浪漫。"

往事如烟，如今角色掉换，该让我受宠若惊了。接着，她又逼我汇报当时的想法，为啥对她爱理不理的？我无言以对。她就优待俘虏，奖给我 4 个白面馒头和一床凉席。我已经大半年没吃白面馒头了，真是山珍海味啊。

后来，这事被大队长晓得了，就训斥我："你这张好吃的屄嘴！"还要我交待凉席的来路。我没法子，带他去找她。她与他当我面吵起来。她说："凉席不是我的，是张紫葛老婆探监送的，你想咋样？"他说："张已交待，你违纪了。"她顿时火了："我违纪？我又没把

女犯弄出去睡觉！”

大队长下不了台，一跺脚转身就走。

老威：她内心对你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吧？

张紫葛：应该不是男女之情，因为我灰头土脸，又瞎了一只眼睛，而教授的风光已一去不复返。逢年过节，她总是命令我担任乐队指挥，去为舞会伴奏。一张顶天立地的幕布把乐队和舞池隔开，我站在中间，半边脸欣赏干部和家属们翩翩起舞；半边脸瞅着穿囚服的众乐手，指挥这些苦着脸的家伙尽可能把舞曲奏得热情似火。首席小提琴是个极右派，曾红遍大江南北，此时却像拉肚子一般，蹲在地上拉琴。曲名叫《共青团员之歌》，五十年代非常流行，大家伙一唱，就如共产主义马上在自己手中实现了。

在彩灯的辉映下，舞池里人越聚越多，下饺子一般，在沸腾中陶醉。有领导还赞叹舞曲太棒了，太鼓舞士气了。却没料到制造气氛的却是一帮被打下十八层地狱的牛鬼蛇神，并且泪流满面。因为他们从前都是革命青年，曾经反抗国民党的专制，还唱着歌，奏着乐去街头迎接解放，共产党、毛主席比爹妈还亲啊——我记得奏最后一支曲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时，我都泣不成声了。

老威：我可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张紫葛：时过境迁嘛。

老威：你在牢里可一点没闲着。

张紫葛：改造嘛，就是折磨肉体，净化灵魂。不过总的来说，二监的管理还比较人道，算我的一段幸福时光。听说 1959 年庐山会议后，狱长因优待犯人，上了右倾的贼船，被撤职了。干部大调整，监内重犯，一部分发配到新疆，一部分送深山里烧硫磺，还有一部分，包括我，去了本地的华莹山。

那是 1960 年 8 月，监狱里先把死缓和无期犯人钉上大脚镣，

押上密封车带走。而大队人马被武装押解着出了内圈，在一小门口排队。大门外的卡车倒过来，直抵小门，众犯被点着名，两人一铐，依次上货箱，如待宰的猪进了铁丝圈钉的笼子。

几千人的“活动监狱”按部就班地出发了。一天一夜，每个犯人的干粮只有两个冷馒头。从重庆南岸到北碚，只几十里的路程，却从清晨走到午夜。这是秘密转监，不能过大桥，众犯一下车，即被赶入两个篮球场子大的北碚公共体育场，几千人肉贴肉地立正报数，监狱政委登高宣布宿营纪律××条，违者格杀勿论。

体育场的四周，巨大的探照灯交叉扫荡着，机关枪和哨兵更是时刻警戒。“卧倒”的口令一出，人们象被龙卷风刮过，呼啦啦地倾伏。山呼海啸中，身体压身体，宛如麦地的秋收，一排麦穗枕着另一排麦杆。大小便者，必须要在水桶粗的光柱中举手报告，经应允，方得起身，由几支冲锋枪指着，直线插入中间的小道，再由小道穿过持枪警察排成的走廊，抵达临时茅坑。沿途埋头快走，不准东张西望。

捱过五更，我才在饥肠漉漉中迷糊了一会儿。天不见亮，众犯依命列队，搭渡船过嘉陵江，再上囚车，抵三河坝。这时才每人发一个混合面馍馍，算开拔以来的第二顿饭。接着走毛坯公路，又窄又滑，汽车开不了，就换马拉大车。马不够，大队长就以押运为名，向老百姓强行征用，激起众怒，几乎与马夫打了起来。

到了华莹山脚下已近黄昏，坡太陡了，下巴朝天也望不着顶。这儿是个极大的煤矿，好像剥开一层薄薄的山皮，里面全是煤炭。煤质又好，亮晶晶的煤油浸得遍山都是。当晚就在山下露营，接管我们的矿部政委出面训话：“龟孙子们听着，这儿不比重庆，你们不是来享福的……”听这种口吻，众犯的心算凉到底了。

又饿又脏地蜷曲到次日晨，才吹哨集合；一人喝了一碗稀饭后，开始分队，认识新干部。这座山开了 4 个矿井，半山腰是 3 井，再往上，靠近山顶的地方是 1 井和 4 井，2 井则高踞山顶。我被分配

到 2 井。好几百体力稍好的犯人，把陡峭的山道爬了大半天，喘息方定，就跟“老犯”进洞实习了。

比生羊皮还硬的再生布工装套身上，头戴竹蔑条编的矿帽，背电瓶，顶矿灯，这就算全副武装了。我们跟着组长在黑洞七拐八拐，偶尔在脚步之外，能感觉到洞壁渗出的水和耗子的声音。我估计已钻了 1000 米，总之，已在山的心脏部位了。大伙在一块洼地停下，再鱼贯笔直向上，这是一个电钻打出的矿眼，刚好一腰粗，用木柴块子一层层垒架，成两三公尺高的人梯。众犯光着脚趾一下一下抠住木柴缝，手脚交替爬上去，钻进矿眼，在里面采挖。有时用电钻，有时手采。这矿很深，连一半都没采到，但犯人没任何安全保障。

采出的煤，用木轨和钢轨矿车运出去，一车 500 多斤，许多人刚开始推不动，可一旦速度快起来，就轰隆隆地呼呼生风，刹不住，就只好拼老命跟着车跑。这样很容易出事故，因为隔几分钟，又会有煤车冲过来，如果你跑不赢，后面的就直通通地抵上来。反应快的，一下子闪到旁边，擦层皮，伤条胳膊腿算走运了；反应慢的，咚地一声巨响，人就被车头车尾夹在当中，挤成肉饼了。

一年井下要死很多人。我熬了个把月，先挖煤装煤，后推拖煤车，整日神经绷直了。这儿同重庆天壤之别，从不政治学习，极右份子们碰面，也从不提过去。我们把罪行都忘了，只一心生产。偶尔有小组会，也是总结定额完成了多少。日、月、年，重重加码，完不成，口粮要扣，人还要被批斗，犯人和干部都对你拳脚相加。每日上班达 11 小时以上，一下班，人就疲做一滩烂泥。

在省二监时，因我个头大，体力甚好，能背 250 斤重的石头；但到了矿上，人软而易举就垮了。眼力也更坏了，我想如此下去，死了连尸骨也找不回来！

老威：你们的生活条件咋样？

张紫葛：一个监舍关 500 到 700 人，后面靠墙，出门见山。一

律通铺，众犯齐刷刷地躺过去，墨黑一片。因为太累，也缺水，莫提洗澡，大伙连脸和脚也不洗。煤油都浸进皮肉了，洗也白洗。在山上折腾过一段，或许你半辈子也洗不净，那种脏总是从骨头从梦里一股股渗出来。

山上的水含硝太重，涩涩地直冲鼻腔，不敢喝，所以水和食物等给养都是用索道吊上去，很珍贵。气候也太反常，冷，风大，夏季也穿棉裤，腰间扎绳子。夜里，穿堂风透过紧闭的门窗和瓦缝、墙缝、房梁，在监舍内冲荡，发出丝丝鬼叫。大伙睡觉前都搬条状石头压被子，人再蛇一般整个盘进去，作冬眠状，以免风将被子刮跑。

老威：要活下去真难啊。

张紫葛：一年到头离不开火，所以按规定，一年必须调一次班。因为那种致命的阴冷、潮湿，没有血肉之躯能扛一年以上。我在井下干了个把月，每次下班都有绝处逢生之感。幸好有一天错班，突然撞上一个犯人，他从头到脚打量我一阵，问道："老兄可是 1143？"我答是，他顿时如江湖中人一般拱手唱个肥诺："小人 1958！"

这个 1958 跟我有一段孽缘，先是在看守所同关一个号。有回看电影受教育，众犯每人一小凳，坐了满满一操场。由于不准中途离场解手，加之白天放风时间太紧，大伙不得痛快，就只有不约而同地劈叉着双腿，抵着跟前的屁股屙尿。结果你抵我，我戳他，一根一根地屙下来，大伙的裤裆和鞋都暗暗地湿了。而当后面抵我，我又戳前头时，那小子居然一反众态地回头笑道："你老兄的肾气太足，不但冲了我勾子，连我的脚也泡了个好澡。"

电影的内容早忘了，只记得 1958 回到号子，又一反众态，蹲下就屙。号里不准解手，大伙拉他起来，稀屎却流了一路。莫奈何，大伙就监督着他用棉裤擦干净，接着又批判他用棉裤擦屎的行径是浪费。

头一个月，大家认为 1958 很窝囊，总是使唤他，而他也总是应答："1958 听吩咐。"不料大跃进审判伊始，1958 突然活跃起来。向××干事立正报告："1958 请您亲自提讯，交待罪恶！"不晓得他交待了什么，总之几个钟头后，他一回房就成了组长。号里的原组长却被弄成了狱霸。

老威：此人心机很深嘛。

张紫葛：但毕竟是熟人。救命稻草嘛，得一把抓住。当时 1958 已从极右的政治错误降格为乱搞男女关系，只有 4 年刑期；加之队上的书记与他在川东地下党时期是上下级，书记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所以他成了劳改犯中的红毛，很吃香。

1958 念旧，去书记处一说情，我就不下井，在队部搞宣传了。

自由空间也大了，连去矿部杀猪分肉这种美差也有份。放翻一头猪，先分干部肉，我掌刀，1958 掌秤，轮到书记，刮刺一刀下去，20 斤打不住，却只算 8 斤。

其他干部也眼睁睁地占了便宜去，剩下的边角余料，才留给犯人打牙祭。

一次，书记带 1958 和我下山运粮，这是视我们为心腹了。我们抵溪口，拖个架子车去粮站，照单将一袋袋的米面装车，垒成了小山，然后拉过乡场，卸进一间小屋藏好。不用问，1958 一使眼色，我就明白这是个黑粮窝子。当时生活紧张，外头到处饿死人，书记却克扣犯人的粮票，倒卖黑粮。

转眼一个俊俏的农妇进屋，直奔灶台淘米切菜。1958 介绍，这是某某，又耳语："书记大人的皮伴（姘头）。"并吩咐我生火。农妇见我老实，与我聊天，原来她是武胜县人，背着丈夫和书记勾搭成奸，以此赚些粮食，捎回家救急。

1958 外出了 1 小时，提了块肉回来炒，四个人饭饱菜足。书记和农妇忙着亲热，我就跟 1958 去洗了个热水澡。当时的洗澡比

而今的出国旅游还安逸，我坐在脚盆里搓了三四遍，油泥如蜕皮一般去了几层，仍觉不过瘾。1958 连连催促，还嘲笑说："搓烂臭教授的皮，下辈子做劳动人民。"

两人出了澡房，内有油晕，外有面貌，顿觉天高地阔，陶醉得跟神仙似的。踏着落日余辉，一路哼着改造小调回山，人啊，真是一个容易满足的动物啊。

老威：祝贺您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张紫葛：岂料好景不长，黑粮案东窗事发。不久，书记换掉，1958 也下山了。我因澡洗得太彻底，混在大群一年到头不洗脸不洗脚的黑炭里，格外扎眼。我的体味也与众不同，因为犯人们上山后，天冷，活重，缺水，常常憋不住尿，每个人裆内都弥漫着较浓的骚臭。

由于面貌和体味，我因福得祸，被走马上任的新官留在了原地。本来按规定，病残和劳动力差的应该换下去。

老威：您的眼睛……

张紫葛：是啊，我找到新书记，痛陈冤情：眼残，臭知识分子，不适合井下作业。书记只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滚！"

这澡洗得我后悔莫及——我不仅被取消了红毛待遇，重新派井下；而且一年半下不了山。这期间，身边的犯人换了好几拨，我熬成了老犯。

老威：我看过您的一篇回忆文章，您的命几乎就丢在井下了。

张紫葛：那次瓦斯爆炸，30 个人，我是唯一从鬼门关逃出来的。

老威：难以置信。

张紫葛：在劳改队，炊事班是老虎，狱医是老虎，而井下还有电老虎，就是专门给矿灯冲电的。关系好的就冲得足足，不好的就

只充一点，让你在坑里瞎摸。那次下井的全是右派，其中有个探矿专家，他晓得矿灯重要，就仔细检查，结果电虽然充足了，灯却只有 12 个。专家说："这咋行？拿人命开玩笑嘛。"

这个专家是个书呆子，每天上下班，他都要提醒我警惕瓦斯、冒顶等等，搞得人心惊胆战。他还曾向矿上写了有关安全生产的报告，却遭到全队批判，打得他满地滚。"这个贪图物质享受，否定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的狗专家！"书记这样痛斥，并且把井下时间延长到 14 小时——也就是今晚 7 点钟入洞，明早 9 点出来，多快好省地完成采××吨的任务。

刚入马门，专家又像往常一样，耗子般落在身后冲我耳语："今天可能进得去，出不来。"我胆子一麻，就应道："是矿灯太少？"他抠我的肩说："走慢点，把耳朵竖起。"

一串人勾着腰，又深入了几百米，专家喘息着说："听见瓦斯没有？"我说没有听见。他说再把耳朵竖起。开始爬楼窑了，众犯分成几组，组内又分工，顺柴楼钻入顶上矿眼的有两三人，电采，并把垮下的原煤刨出来；而留在顶下的人除了接着刨，就是持一长铁钎戳顶上的垮碳。煤太厚了，有时一戳就刮刺垮一大片。大家刚按部就班，专家又喘气了："瓦斯叫唤了，真叫唤了！"我屏息一听，果然有卡卡声，就停下手中铁钎。组长说："天天有卡卡声，难道就不劳改了？"专家说："眼下的卡卡可不是以往的卡卡。"组长说："有啥不同？"就抬手又戳下一片垮碳。专家急叫："戳不得呀！戳不得呀！戳多了就会引起爆炸呀！"但是大家都七上八下地干起来，不理会他。专家一会儿拖这个，一会儿拽那个，像个疯子。组长呵斥道："这戳不得那也戳不得，完不成任务谁负责？"

我却相信专家的话，毛骨悚然。卡卡声更大了，我相信每个人都看见窜起来的蓝火苗了。因为铁钎都不约而同地落了地。大约 8 点钟，我刚下意识地举钎一碰顶，瓦斯的尖叫突然震耳欲聋，与此同时，垮炭将我直冲起来，犹如连续的闷雷。柴楼象积木一般塌了，

人与炭搅一块，从搂眼里直泻而下，我一屁股砸在地上，转瞬又随气浪翻起来，接着整个顶咣当盖下来。我昏厥过去。那一刹那，在极亮的光圈中，我看见了妈妈、老婆和几个娃儿的影子。

醒来时我已躺在井外的煤坝上。原来瓦斯爆炸引发大面积冒顶，埋了 30 个人在井下，惊动矿部，组织人力抢救，刨出来的却是一具具黑尸。你想想，花大半天刨出的 30 具尸体一溜摆在煤坝，全都血肉模糊，没鼻子没眼，壮观么？

埋人组出动了，从头开始抬，连席子也不裹就草草葬了。轮到我，刚好凑足 30 整数。不料我卜地吐口气，吓了人家一跳。有个熟人的声音说："还活着。"另一个声音说："活个屁，只剩张紫葛了，埋掉就完事。"熟人的声音说："真的还活着！"另一个声音说："是么，莫吓人。"熟人的声音说："的确鼻孔还在动！"于是许多脚步跑拢来，七嘴八舌议论："见鬼了！""狗日的命太大了！"

狱医是解放前叛逃过来的蒙古国卫生部长，有两下子，翻眼皮一检查，就叫人抬我到队部烤火。接着遇见一个对我有好感的干部，命令"马上送医院"。

被我党判刑的前蒙古卫生部长护送我，徒步 50 里地，入住矿部医院。犯人医生尽力抢救，我才从鬼门关归来。又扛过了三个多月的黑痰期。

老威：没得矽肺病？

张紫葛：黑痰一口接一口，比墨汁浓，两个月后，才渐渐淡了，咳嗽也没那么撕心裂肺了。幸好从小身体底子打得结实，倒霉前的生活条件也优越。

老威：您是怎么渡过大饥荒的？

张紫葛：天照应吧。我有一肚子苦水没倒出来，上帝也不忍心我做个憋死鬼。在山上，犯人每天的定量是 7 两米，只够熬两餐稀涝涝的粥，趁热喝下去，屙两泡尿就没劲了。三天两头死人。1958

下山后，我因得罪了炊事班，被诬蔑混吃混喝，消极怠工，粮食定量就叫扣去一半。这样一个星期，我就饿趴下了，想站起来，腿肚子就抽筋。胃里没一粒米，虚脱，正躺着等死，却遇见一个同情知识分子的干部。他悄悄塞给我一个冷馒头，并且提醒说，新书记与炊事班穿一条裤子，你先忍着吧。

可没过多久，炊事组长因偷肉案发，竟被愤怒的犯人活活打死，其他同伙也被整成残疾。我的处境又拨云见日了。

跟着经历了死里逃生。住院后，因会一点医术，就被留下来当中医。有一次，我跟一位姓冯的右派中医上山挖药，爬到中途，撞上埋死人，我们急忙躲在一丛茅草后偷看。只见七、八个人轮流用铁锹在山壁间掘孔，一会儿，孔渐渐扩大成洞，洞又扩大成一个穴。一堆人亮着枯柴样的膀子，干完这活儿，已累得不行，风箱般的喘息百米外均能听见。接着，一卷破席摊开了，为首的汉子从衣兜搜出一把尖刀，开始翻来覆去地割席中尸肉，屁股、大腿、小腿、肩背、手臂都剔了，再把整个生殖器官切下。最后，撬开嘴，另有两个人凑近帮忙，他们把死者的舌头一点点抠出来，齐舌根挖了。为首的汉子右手血糊糊地握住刀把，那死去的僵直的舌头黑红黑红的，在阳光下象一张扑克牌，不，象半截蘸了辣椒酱的黄瓜。那汉子还把舌头嗅了嗅，一笑，凄惨极了。大伙把被剔得七零八落的残尸塞入土穴，每个人都向里面扔了泥块，然后填石头密封了。

剩下的碎肉堆在席中，大家围着默哀一番，然后捡枯柴生火。人们吞着唾沫，井然有序地各捡一块肉，架在火上烤；待肉发出滋滋欢叫时，又撒上盐。肉终于熟透了，人们狼吞虎咽，每张嘴边都沾着一圈油和柴灰。一阵风把焦肉味吹送过来，很香，迷糊人心智的那种香，我和冯医生面面相觑，喉咙和肚肠均咕咕山响。神经起了一阵痉挛，那一刹那我们都忘了自己还是人。

肉吃光了，有人又蹲在火堆旁刨出黑糊糊的阴囊，捧在手中，边拍灰，边剥蜷缩的焦皮，白生生的卵蛋刚绽露，就一口下去。周

围的家伙发出惊呼，手爪从几个方向抓来。可惜，拖着一条软筋的蛋已塞了一满嘴。

为首的好汉主持公道，才虎口夺食，把面目全非的生殖器切成若干块，每个人都尝了。“很大的补药呵！”有声音意犹未尽地叹息。

剩下的一条人舌头被高挂在远离火的树枝上，任呼啦啦的风吹得摇晃。待人肉晚宴告一段落，大伙才一起把目光转过去，听为首的汉子即兴创作以下这段祭文——

安息吧，某某某！很对不起。你是我们的同类，你先饿死了，也算为你的同类作了最后一点贡献。为了活着，我们不得不将你的屁股肉割下来烤吃；为了活着，我们还吃了你身上稍微有些嚼头的地方；我们还吃了卵蛋和鸡儿，这是很大的补药——为了活下去，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对不起了，某某某。

我们没吃你的内脏，人毕竟与饿老鸦还是有区别，你好歹留了全尸。

我们把你的舌头高挂，任你随便乱说，对风，对太阳，对我们，你尽可以把讴在肚里的反动话统统倒出来。你生前不自由，三两句话就当了右派，现在解脱了，揭帽了，死毬了。说吧，你随便反动吧，一直反动下去吧。

安息吧，某某某。我们再不会响应号召检举揭发你了，而且还要向你道声永别。因分享了你的反动肉，大家还要——向你鞠躬。

至此葬仪完毕。为首的汉子垫脚伸臂，取下枝头人舌，宝贝一般揣进裤兜。

老威：这家伙该不会拿回家炖舌头汤喝吧。

张紫葛：冯医生讲，人舌可是灵丹妙药，不能晒，不能烤，不能焙，不能沾任何烟火气，否则就废了。正确的泡制方式是，晾除水气，用细麻绳缠于肚脐、后腰、大腿等贴肉处，以人的体温徐徐烘干。待其缩透变色，则细细研磨成齑粉。此为外伤奇效药，遇淌

血、发炎、化脓之新旧伤口，捻上舌粉少许，不大功夫就平复了。

老威：真是物尽其用啊。

张紫葛：那年头饿死鬼太多，估计这玩意不会缺货。

老威：您是怎么熬的？

张紫葛：转来转去，又得提到 1958。我充中医时，他又跟老书记"换防"到医院，任厨房和护理的大组长，比一般干部还有实权。1958 对我还算照顾，但这家伙太邪，最后连我也看不过去了。

老威：一个劳改犯能邪到哪儿去呢？

张紫葛：拿现在的行话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1958 随书记换防好几处，几乎成了贴身跟班，他经常狗仗人势，搞犯人的家属。比如有一次，一位杨姓犯人的妻子赶了几百里地来探望丈夫，门岗不让见，1958 就上前说情。于是夫妻抓住这难得的见面机会互诉衷肠，难舍难分了十几分钟。杨妻还把那年头比钻石还珍贵的一茶缸红烧肉带给了丈夫。

岂料探监毕，1958 就对女的说："天快黑了，我送你一程。"结果他在溪口的一间房里要强奸人家。女的反抗，他就凶相毕露地说："你莫吼，一来吼也没用；二来对你男人的改造不利。"女的继续反抗，他又说："你依我，我就给你 10 斤大米，还让你男人不受罪。"于是就得逞了。

老威：这也太嚣张了。

张紫葛：更嚣张的是他还搞干部。有两位高级知识分子因营养不良住院，按规定，只能开半流食；一个 20 来岁的女护士出于同情，就擅自开了全流。1958 一晓得，马上打小报告。那年月，这是立场问题，于是小护士被脱掉军装，押往矿部交待与反革命右派勾结的罪行。书记命令 1958 日夜监督，他终于逮住机会，在一个深夜把小护士给强奸了。为了封口，他给我拿了个白面馒头。

小护士来自知识分子家庭，了解我的背景后，就把种种屈辱私

下说了。我安慰她，莫着急。她说不着急不行，1958 还在死缠我呢。于是我找到了几个住院的少年犯，一拍即合，且群情激愤："犯人可以日干部了，成何体统！"

过了几天，该发零花钱了，可事务长的公款却不见了。如此通天大事，立即惊动了院长和书记。命令搜查全体犯人，却一无所获。事务长说："他妈见鬼了！"院长问："都搜遍了吗？"解放军报告："都搜了，除了他！"当时 1958 作为犯人最高头目，正耀武扬威地站在书记身后，见解放军指自己，还不服。院长说："是犯人就没有例外！"于是 1958 被搜身，当场查出公款××元。1958 大叫冤枉，书记却扇过去一耳光。院长命令："绑起来押往反审中队！"

此时，我与几个小贼对了一下目光，心里顿时明镜一般。

1958 被突击预审，扛不住，就把书记贪污公粮的破事抖了出来；继续牵连，整个炊事班都成了贼窝。1958 罪大恶极，差点毙掉；可接下来，他又戏剧性地被平了反。释放之际遇文革，参加造反，为××工宣队员；再往后，他旧病复发，在野合时被一个女的杀了。据说那女的先骗他脱光衣裤，然后趁宽衣解带之机，把匕首捅进了他的心窝子。

老威：善哉善哉。

张紫葛：死就死罢，悲惨世道那来"善哉"？现在我一闭眼，还常梦见 1958，梦见被 1958 搞了老婆的杨姓犯人。这家伙，把老婆送的红烧肉拴在腰上，舍不得吃，只在馋得受不了时才拣两颗放嘴里，惹得同监犯人眼睛发绿。

姓杨的时刻警觉，连上厕所也带着红烧肉。蹲坑时，先捧在手心，感到不雅，才把肉缸放在一尺开外的地上。不料这一刹那的疏忽，肉就被人抓跑了。杨提起裤子急追，一路滴着星星点点的屎……

老威：追上了么？

张紫葛：追上个鬼。姓杨的后来因一点小错，被扣口粮，只能

靠麦麸充饥，结果憋出了大问题。送医院一查，确诊是一节硬屎卡住肠道，任凭什么药都化不开，只有开刀。本来是犯人医生的分内事，可值班医生××却抢着来做，因为犯人的命贱，可以当试验品练手艺。姓杨的被送入手术室，但见××大步流星地赶入，连白大褂也不穿，就吆喝犯医“准备家什”。姓杨的吓出一身冷汗，竟从手术台翻滚而下，连连磕头作揖：“犯人×××，不够资格让干部亲自动手！”不料对方以毛主席语录相答：“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姓杨的哀号无效，被举回手术台，几人按住打了全身麻醉。屠夫军医一意孤行，全然不顾犯医在旁边的不断比划、提醒。结果一刀下去，堵塞物没有逮着，倒把肠子给挑断了。

手忙脚乱、草草缝合后，军医扬长而去。姓杨的挣扎了三天，一命呜呼。通知家属，杨妻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哭得死去活来。幸好此时，玷污过她的 1958 已东窗事发了。

老威：您在这种地方，可谓沦落到地狱底部了。

张紫葛：所以如《神曲》描绘的一样，我的命运又开始螺旋上升。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后，中央有精神，要对县团级干部、教授和共产党高知中的右派进行重新甄别。我被挑出来，送到四川简阳的平泉农场。这儿原是疗养院，现改为几千人的特殊农场。待遇极好。每人每月 36 斤粮，两斤菜油，两斤猪肉。我们在这儿养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全川 3000 多人集中一块，等待着揭帽松绑，重新安排工作。可天有不测风云，文革来了，刘少奇倒了，作为修正主义黑窝的平泉农场一夜之间就宣布撤消。1968 年秋天，我又被转押到雅安的苗溪茶场。

老威：您一个人么？

张紫葛：又是浩浩荡荡几千人。这儿横跨天全、芦山、宝兴三县，在深丘陵与大山区的交叉地带，是个劳改总队，下辖三、四十

个大队，专用输电线长达 500 多公里。有规模很大的制茶厂。据说，从前这儿的原始森林望不到头，解放后全伐了，开辟成茶山。

平泉来的几千人象一把沙子漏入沙漠，转眼就没影了。大约有两三百人分在地势最低的××队，统称为“新犯”，我虽有 10 年牢龄，也是新犯。当时正在学大寨造梯田，准备种旱作水稻，所以我们一来就投入挖土石方，垒宝坎（即石头砌起来的梯田边埂——老威注）。这是一面阴山，整日云蒸雾绕，湿气很大，人走在笔直的烂泥路上，得处处小心。我那阵儿不到 50 岁，虽然只剩下左眼，视力浑浊，却被当作强劳动力，派去挑土。我担起两百多斤的土石，右手柱一根棍子，战战兢兢在溜滑的陡坎上挪，不敢有丝毫偏差，因为脚边下去是 200 多公尺的深渊。

至今，我还梦见那情景，腿肚子一阵阵抽筋。有一个姓方的干事，看不惯我磨洋工，骂我死狗，还猛然从斜刺里踢翻了我的探路棍。我失去平衡，身子一歪，就同土石一道轰隆隆地滚下去了。那一刹那，我和在煤矿那次一样，以为报销了。我腾空而起，被抛出宝坎，在下坠的过程中，只觉得风声象一大片蛙鸣，透过身体，把内脏也变成向外蹦的青蛙。老娘和四个子女的影子一一闪过，我想叫声“完了”，嘴却张不开，直到嘭地一下，粪臭呛满了鼻孔。

原来有一辆粪车从坎下路过，这是三人拉的架子粪车，我恰好顺着飞入车上棺材大小的粪槽里，不偏不倚，连根毫毛也没伤着。不过臭粪四溅的壮观景象惊动了三山五岳，犯人和老百姓都奔过来，嚷着：“看空中飞人哪！”

我从粪槽坐起来，连打几个臭喷嚏，听见有人骂：“狗日的，屎泼了我一脸。”我连忙道歉，人们却纷纷避开。第二天，照常出工，我以坏了眼睛为理由，请求换工种，被方干事拒绝。

老威：这样下去会出大事！

张紫葛：天无绝人之路。此时我的一个学生冒充我老婆来探监，

文革中论派性，刚好管接见的陈干事与她同属一派。“亲不亲，阶级分”，她托她照顾我。于是，我被调到了集肥组。

集肥组长还提一双脚码子（鞋底带铁齿的防滑鞋套，山区专用——老威注）给我，称是我老婆送的。我穿上后，踏实多了。

当时劳改队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两派互相打，今天你掌权，说不定明天我就夺权。比如整过我的方干事造反起家，不久就做了革委会主任，将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场部政委弄成走资派，将关照我的陈干事搞成保皇狗。又打又斗又游乡，然后勒令加入收粪组，与犯人一起改造。

陈干事的腰被打坏了，连走路都艰难，我们私底下很照顾她，一见四下无人，就将政委和她抬着走。有次住在荒山野岭的农户家，就一间茅屋，里面除了一间大床，一张方桌，啥也没有。而热情的农妇却让我们歇床上，自己却在灶前蹲着。半夜，陈干事呻吟着，要解溲，就蹲在床沿，伸手让我拉着屙。床后是猪槽，两头瘦猪一闻响动就嗡嗡过来，以为喂食呢。

政委平时养尊处优，这回算真正见识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百姓，泪水不禁扑籁籁地往下掉：“唉，我们过雪山草地，打小日本，打老蒋，迎来的就是这种日子？社会主义几十年，还让人民过这种穷日子，作孽啊！我该挨斗啊！”可没多久，政委就解放了，被一辆轿车接走了。

老威：您的好日子有望了。

张紫葛：无望，方干事还掌权，他派了个姓苟的犯人心腹监视我们。姓苟的是个强奸犯，想打陈干事的主意，却有袁组长碍眼。袁组长是个血性汉子，有一次拉粪车，路滑坡陡，恰巧又遇见方干事。姓方的嫌爬坡累，就骑高头大马一般坐在车头上，吆喝着让我们拉。袁组长体力强，把中杠，我和陈干事一左一右，拉边飞。遇特别陡的长坡，三个人的脑袋一齐点地，背脊绷直了，只见那大颗

汗滴毛虫一般钻透衣裳。袁组长喘着气请求："方主任，您就下车走几步吧，上完坡……"可话音未落，头顶的杠子就下来了，并且在三人头上，崩崩崩连敲数下。我见打得狠了，就一躲闪，车把卡地一歪，就将陈干事撬滚到坡下，袁组长也差点被弄趴了。

姓方的还不下，袁组长火了，就抬手夺过杠子吼叫："我他妈一杠子干了你，大不了填命！"

姓方的顿时面色如土，乖乖下车。几人一路无语直奔场部，姓方的马上召集干部会议。袁组长晓得闯祸了，就亲手把自己在伙房存了一年多的油渣端出来，按收粪组人头，分成了 29 份，让大伙共同打顿牙祭，然后一一抱拳诀别："今天我得罪了姓方的，肯定没好下场。大丈夫死则死矣，本无遗憾，只可惜栽在一个祸国殃民的小人手里！"接着，又向方家走狗苟某呸了一口："油渣很香，可没你的份。"

话分两头，这边厢群情黯然，那边厢干部会议已结束，狱警荷枪实弹地出动。黑屋的门也森然洞开，一付百把斤重的脚镣哐当抛在门外。袁组长主动向前去，而陈干事正在另一群人中挨斗，交待罪行……

可说时迟，那时快，一辆吉普车拐过坳口，疾驰而来。姓方的刚杀气腾腾地露面，吉普车就猛然刹在他跟前，随着跳下三个军代表，宣布对农场实行军管。

姓方的一下傻了，他的领章与帽徽也被撕了下来。而正躺地上装死狗的陈干事初闻喜讯，若痴若狂，竟手脚并用，一跃而起，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

眨眼间乾坤倒转，姓方的及一帮走狗均被专政；而陈干事被结合为军管小组成员，袁组长和我也跟着扬眉吐气了。

陈干事把我当残疾人照顾到草鞋组，这儿有三个瘸子，一个双腿断了的瘫子。都是知识分子，相依为命，从此日子就顺多了。

1973 年 7 月，我刑满出狱，回到重庆，在西南师范学院继续管制劳动 4 年。此时，母亲已去世，前妻早离婚，我靠基本生活费过活。直到 1978 年，中共中央下达了给右派平反的 55 号文件，我的政策才得到全面落实。

1979 年 2 月，我重回西南政法学院，任中文教授；稍后，双目全部失明。

民运列传：许万平

一个真实的无产阶级、民运人物的故事。

许万平，重庆市大渡口人氏，身段细小，眼弯嘴瘪，酷似一只微笑著的狐狸。然浑浑然心窍未凿，认死理。许氏原为国营印刷厂一本份工人，三代根正苗红，地道无产阶级。不料受天公作弄，于1989 年学潮期间，随大众卷入街头政治，游行呼口号，合唱《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其亢奋之态，如两颊绯红的求爱的狐狸。

据右派诗人流沙河回忆，他曾于 1989 年 5 月某日在成都家中临窗俯视街巷热景，恍若隔世，居然将 1948 年夏天之群众示威与眼下的混淆。"反的政府不一样，但标语口号差不多，都是自由民主人权，打官倒和腐败。"他叹道，"历史和现实在轮回，过几十年又转一个圈罢。"然许氏的年纪及阅历比流沙河浅一半，所以他必然要把转瞬的爱国热劲落到实处。象小说描写的那样，他发起成立"中国行动党"，并于十几日后被捕，旋即以反革命组织煽动的罪名，被判刑 8 年。其时，北平屠城已成铁案，腥风呼啸，市面清静，几千万热血民众已作鸟兽散矣。

1992 年冬，老威戴罪北迁至位于大巴山中的四川省第三监狱，相遇二十余位六四反革命，其中，许氏算最矮的。与他仿佛的是前大学老师侯多蜀，但肤黑且壮，与体弱的许氏对照鲜明。许氏节俭成癖，常捧一大茶缸糖水，一匙一匙喂自己，慢条斯理，津津有味。因正在学写诗文，与老威友善，遂邀其共享。老威虽为文人，但身粗胃大，略言客套，就端过水缸，咕咚咕咚底朝天，末了，还挺豪气地揩一把坠糖珠子。许氏含笑恭候，连道："威哥慢点，莫噎倒了。"——这一镜头，许多年以后的今天，老威方嚼出些滋味。许氏家贫如洗，父早年亡故，母退休，工资仅够糊口。偶有三二十元

碎银汇达狱中，宽解一下不孝儿之碌碌饥肠。

许氏革命意志弥坚，在狱中因参与罢工、绝食等违规活动，数次遭罚，关入狗笼一般逼仄的小间。他还作为反革命之谈判代表上二楼队部，未及言语，就被放翻在地，捆成一只绽放出狐狸头的肉粽。于是他把口舌当作仅有的利器，指明要操政府的老奶奶和妈，可见其斗争艺术不甚高超。97 年许氏刑满开释，生活无著，曾携其诗文，不远数百里去投奔落魄中的老威，栖身威母之茶馆月余，殷勤肯干，颇得中老年客人赏识。无奈茶水价廉利薄，许氏赚不够伙食钱，饭量每况日下。然而在此期间，许氏博览群书，广纳朋友，舞文弄墨，思如涌泉，其水平和名气在满面菜色中见涨。

接下来的 1998 年秋，许氏作为“中国民主党”的活跃分子，在风声鹤唳中二进宫，罪名“颠覆”。这一次，重庆警方嫌司法程序太烦琐，直接将其送西山坪劳教三年。2001 年的一个秋日黄昏，老威接到许氏电话，气息微弱，夹杂著咳嗽。他说西山坪是人世间最恶毒的去处，他差点就活不出来了。老威心酸，就忘了怎么开口。许氏又说，一边关烂贼，一边关法轮功，他夹在其中，连个战友都没有。你该把经历记下来，老威终于插话。我被打坏了，许氏喘道。一提笔，脑袋就嗡嗡响。

生存如刀，人权不能当饭吃，头破血流的许氏不得不降低姿态，汇入亿万中国人民的挣钱糊口洪流。他跑过推销，守过货摊，名片上曾有“业务主管”的头衔。萨斯猖獗前夕，他终于用海外某人道团体援助的 500 美元，同另一难友蒋仕华合伙，开了一家面馆。据说生意由冷清到红火，许氏之底气逐渐充足。老威闻之，击额庆幸。不料，萨斯如洪水猛兽，逼得人们逃无可逃，大热天，满街口罩。餐饮业遭受重创，转眼工夫，许氏面馆，还有同一条街的张氏、王氏、无名氏面馆，均被政府勒令关停。

许氏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情急之下，就独自去警方抗议，要生存权，无结果。又给海外打对方付费电话，无端谩骂某某吃民运

的人血馒头，这无异于自断后路。某一傍晚，许氏与老威通话，告之已驾临成都火车站。老威详细指明路径后，放下听筒。一直恭候至深夜，再无动静。这疯狗日的莫不是被警察逮了？老威躺在床上不得其解，竟模模糊糊坠入了梦乡。

如此，许氏磕磕绊绊地赖活至六四屠杀 15 周年前夕，并且还结了婚，这真是天大的奇迹。好歹稳当了，老威闻之感慨。依稀记得新媳妇也是下岗工人——这两口子具有马克思指点的无产者家庭的全部特征。在互联网上，散见许氏时政文章，老威掐指一算，可挣稿费少许。各地开始纪念六四，许氏也宣称要在重庆搞，老威见多了，就不太在意。许氏于 6 月 3 日被捕，本来老威也不太吃惊——这些年，民运分子的抓抓放放已形同儿戏。

然许氏被栽脏“贩毒”——据网上报道，有人将一包海洛因塞进迎面而来的许氏怀里，旋即被四面埋伏的警方录像并“挡获”。真他妈象演港片，老威悲愤地想，脑海里顿时浮现许氏脑袋开花的镜头。可六月四日一过，许氏又释放了。他被公安辑毒大队拷打后，捆绑在椅子上达 48 小时！怎么熬的？没说；往后怎么过，没人问。世上的新闻太多，转眼就成旧闻。

许氏还活著。仅仅活著，就不错了。

2004 年 7 月 21 至 24 日，成都。

残疾妇女贾凤珍

采访缘起

2004 年春节后，我曾经在京郊上访村见过这不足一米四的残疾女人，可转眼之间竟忘掉。当时群情激愤，我、高氏和回地几乎被分割、围困，数不清的嘴巴冲我们喊冤，贾凤珍说，这当中也有她的声音。

半年过去了，由于政治气候敏感，我们重返上访村的计划泡汤。沮丧之余，我于 8 月 11 日下午在上访村外围的一条污水河边巧遇贾凤珍。经她一再提醒，我才对半年前的她有了点似是而非的印象。

“怎么会这样健忘？”我一边听她说一边内疚的想。“我已访问过 100 多个低层人，难道这种记录也象俗话说的猴子掰玉米，得到后面的就丢了前面的？”燥热和对自己的失望轮番夹攻着，我虚汗直淌。

然而贾凤珍平静地讲述着她的故事，挨打和受辱。她的两眼熠熠发亮，我被吸引住了。

两个多月后，为了给《中国上访村》一书补充图片，高氏兄弟终于故地重游，据他文章里说，当时我们接触过的上访群体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拨上访者，并且大部分是妇女。

男人们到哪儿去了？在经历过无数次的截访和清剿以后，那些向我们递过冤案材料，并且涌入过我们梦里的面孔如今在哪儿？

还有一把枯柴似的贾凤珍，她也曾被截访，下落呢？

许多年以后，是否还有人问：“他们的下落呢？”

贾凤珍：喂！记者，先生，同志！

老威：您叫我吗？

贾凤珍：对，您不记得我了？

老威：有点面熟。可好像，记不起来了。

贾凤珍：春节的时候，您，还有另外两人去过村里。

老威：哦。

贾凤珍：开始您们在村里东张西望地窜，大家以为是特务，就躲着不露面。后来您拿出录音机采访，人就全出来了。我个头小，腿残疾，动作慢。您们就被别人拽去了。上访的都是苦人，每次都一样，喊爹喊娘的，把外头的记者当救命稻草。我扎不进人堆，即使扎进去也挤不到您们跟前，更别提说话了。

老威：太惭愧了。请您坐下来慢慢讲吧。

贾凤珍：天气真热啊。

老威：大嫂您等着，我去买两个可乐，降降温。

贾凤珍：真凉快呵。

老威：哪我再去买？

贾凤珍：不要了，多喝坏肚子。我十几年前还批发过雪糕呢。

老威：日头这么毒，为啥不呆在屋里？

贾凤珍：板棚内像蒸笼，白天呆不住人；况且风声这么紧，只能在外头晃着。

老威：我刚才碰到警察了。

贾凤珍：明的暗的，到处都是。一不小心打个喷嚏，至少有三四张脸回过来盯你。李小成贴了告示，说要八七大游行，几万人开进天安门，这一闹，把整个国家都吓瘫了。这方圆几公里，虽然是有几万上访冤民，但锣齐鼓不齐，要一下子召集起来，还真不容易。

老威：讲讲您的冤情。大嫂，我可以记录吗？

贾凤珍：您可得防着四周的眼睛，因为我们长得不太一样，凑

一块，气氛就紧张了。

老威：是有些紧张。看运气吧。

贾凤珍：行，看运气（此时，她轻咳两声，挺了挺身板开始背书）。尊敬的报社记者先生，感谢您坚持正义，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采访我这残疾弱女子。我相信党中央、国务院、江泽民、胡锦涛里能出清官！几千万党员至少能出一个包龙图！用社会主义法制的虎头铡为我主持公道。

我叫贾凤珍，43 岁，家住辽宁省台安县台安镇一街道振兴委一组。我和丈夫都是残疾人，可我们人残志不短，为了生存，为了不给国家增加负担，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就起早贪黑，做批发和零售雪糕的生意，还能勉强维持温饱。

1992 年 6 月下旬的一天，太阳红火，我和往常一样，雇一辆拉苞米的小货车出台安县城，去几公里外的西佛镇批发雪糕。到站后，苞米车的司机在附近办点事，让我边装雪糕边等他几分钟。正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吱地刹到我跟前，司机于大勇伸出脑袋，招呼我上车。我急忙说："对不起，已经有车了。"于大勇钻出驾驶座，要来抢我手里的雪糕箱子。他说出租车又快又舒服。我躲闪说："我不能雇两份车。况且小本生意，也打不起的士。"于大勇有点恼火，骂我不识抬举，我不敢回嘴。不料，于大勇的兄弟伙李彦军出面了，他在团结粮站工作，是个人人都怕的街痞。姓李的甩着赤膊过来。踢了苞米车一脚说："就这破车？不准雇。"我说："雇不雇是我的自由。"姓李的冷笑一声，把货车钥匙拔出来，大吼一声："开车的在哪儿？！"开车的其实就在周围，见是街痞，就躲着。

气温高，耽搁一久，雪糕就不行了。可李彦军还逼着我打的士。我急得说不出话，姓李的就指责我"无言的反抗"，在我头上挥拳头，还把我买的雪糕一箱一箱抱到阶沿下，让太阳晒。我气得眼泪一串串掉，就大声说："我不坐你们的车！"姓李的抓住我的胳膊叫："你必须坐，还得多加一倍的费用！"我喊："不坐，就是不坐！晒

化了雪糕还要你们赔！”姓李的扇我一大嘴巴：“赔你个死矮子！”两人不由分说，按住我拳打脚踢，逼我答应打的士。我直喊：“打死人了！没王法了！”姓李的疯了，把我当皮球，踢得满地滚；见我还不松口，两人就把我抬起来，打夯一般朝地上摔，脑袋磕在砖头上，我一下子失去知觉。

醒来时躺在医院里，经检查为脑震荡。后来脑伤使我的肌肉都萎缩了，不得不住院 158 天，连大小便都失禁了，真是地狱般的日子啊！（话至此，她已成了个泪人。）

老威：当时有群众围观吗？

贾凤珍：街两边都站了很多人。

老威：没人出面阻止？也没人报警？

贾凤珍：我被打糊涂了，不知道。住院抢救，许多天失忆，连住哪儿都要想半天，才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不能想事，一想，脑门子就疼，眼睛直冒血。姓李的有后台，一般群众惹不起。为了讨回公道，我只好拿起法律的武器。

1992 年秋天，我出院，就去找台安县公安局和民政局，他们推脱说管不了，我就告到县法院；那儿的人让登个记，还是处理不了；我就再告到鞍山市中级法院。不久，中院判我胜诉，责令出租车司机于大勇赔偿我医疗兼营养费 1500 元，李彦军赔偿我 1714。47 元。

老威：在 1992 年，这个赔偿金额还算过得去，可行凶者应该拘留嘛。

贾凤珍：我们这样的残疾人，能忍就忍吧。

老威：法院判决执行了吗？

贾凤珍：于大勇的钱给了，李彦军至今分文没付。

老威：那法律岂不成废纸了？

贾凤珍：总算得了一半钱吧。本来我想，剩下的一半慢慢要，会有结果的。不料一拖就是 10 年，人民币都贬值很多次了。比如当时在银行存钱的利息是百分之十二点儿，现在连 1 点儿都不到。可姓李的就是不给。

2002 年 6 月 16 日早 8 点，我凑巧在县城恩良路碰上李彦军，就掏出随身揣了 10 年的《判决书》，向他索赔。但他一把推开说："要执行找法院，你个人无权向我要钱。"我一时懵懂，感到他说得有几分理，就去了县法院。我已记不清去法院的次数了。当时接待室内有七、八个人，都捧个茶缸，堆在那儿说说笑笑的。我一进去，他们的脸就板了，还没等我讲完来意，他们就吼叫："管不了！"我问："谁管得了？"于是有人说："中院判的，你找中院去。"还有人侮辱我"小得象只猴子"，应该找孙悟空。我气急了，就垫脚去摘法院门口"最佳单位"的铜牌子，还没够得着呢，他们就打电话报警，于是几分钟后，110 的警车就把我拉走了。

在南街派出所关了一会儿，被放出来。我越想越不通，就又返回法院评理。可这次，我迎头撞上民事庭的庭长梁彦山，他是李彦军老婆的同班同学。姓梁的一见我这个找茬的"老熟人"，眼睛一下子就红得象公牛，他不吭一声，拽我到法院内的一间空屋，关上门就打。还把人当作皮球，端起来朝墙上踢。屋子很空，他行凶的回声很大，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我抬手护住脑袋，他咔刺一下，把我柴禾细的胳膊反扭过来，屁股一脚，我被踢得腾空而起。

老威：法官打人？真没王法了！

贾凤珍：他还边打边笑："我打你了吗？谁是证人？你长成这样，活在世上多累赘！万一你现在断气了，那肯定是摘铜牌的时候不留神被砸的。"

老威：魔鬼啊魔鬼。

贾凤珍：他把行凶当作体育锻炼了，打热了，就脱下法官制服，

最后连汗背心也剐掉，光着上身将我踹出屋，又踹进来，再踹出去，搞了好几个回合。我昏迷了两次，终于吐血了，姓梁的才住手，把我扔到走廊外面。他拿起制服和背心，还有一顶嵌着国徽的大盖帽，洗澡去了。

老威：诺大个衙门，就没人出面阻止？

贾凤珍：同 10 年前一样，没人管。上次是大街，这次是法院，我不知道在地上睡了多久。苏醒时，我四肢着地爬出法院，觉得四周特别空旷，有脚来来去去，可都绕着。我坐在法院神圣的台阶下等车，好几辆出租车刹下来，又开走了。那些车主都探出头问："喂，你没事吧？"

老威：您该报警啊。

贾凤珍：让公安局去抓法官？您没犯迷糊吧？我在毒日头下熬了很久，心想这次是活不下去了。哦，对了，我在爬过法院大厅时，梁彦山洗完澡，还走过来看了一下。恍惚中听人说："老梁，哪来这么大的火？出人命咋办？"姓梁的说："可能是小鬼附身了，是小鬼用我的手打了她。"那人说："鬼话么。"姓梁的说："正经话，不糊涂我会动人一指头吗？"

老威：您已经在鬼门关了。

贾凤珍：我一直挺着，泪已经枯了，我怎么办？终于遇上一个好心的司机，扶我上车，问："去医院吗？"这时一个念头闪过，我回答去"沈阳第一时间".这是省高院为了健全法制设在这儿的一个点，意思是在"第一时间"接待告状群众。

不巧正撞上休息日，门卫和附近的律师都让我把告状材料备齐再来。无可奈何回到家里，熬不过，住进了医院。大夫一检查，马上抢救。

第二天，伤势稍缓，我又溜出医院去法院喊冤。院长拒不接见，梁彦山又出面，捉小鸡一般把我扔出大街。这次围观群众很多，梁

彦山缩回去，并给门警打招呼挡驾。

老威：您一个弱女子，真够顽强的。

贾凤珍：我豁出去了，我不怕死。我一边住院治疗，一边去法院评理。我天天去，扳不倒你这仗势欺人的梁庭长，我也要让天下人知道，你是执法犯法的恶狗。我在县城出了名，姓梁的不敢公开整我，可在 2003 年 7 月 13 日上午 10 点左右，这狗法官的岳母又欺上家门行凶。她牛高马大，象摔跤运动员，一下子把我这个一把骨头的残疾人提起来，扔出门外，再拎起来，两大嘴巴。真是雪上加霜啊，我本来就卧病在床，旁边还有 80 多岁的卧病的公婆，这是我第四次挨打，起因是 10 年前无意得罪了一个街痞。这次围观群众看不过，一齐叫："不准打人！"家才没被砸了。

老威：于是您就背井离乡上访来了？

贾凤珍：当时还想不到这茬儿。住院的费用日积月累，四次遭打，经医院诊断，已造成脑组织严重损伤，天天头痛，视力不清。再发展下去，就真成一个没有自谋生路能力的废人了。于是，我只能与法院，与梁彦山死磕到底。为了息诉，2002 年 10 月，姓梁的通过县人大转给我 3000 元钱——好心人劝我算了，因为从古至今，法官赔钱给小老百姓，在这台安县还是头一遭。

老威：3000 块钱治病都不够吧？

贾凤珍：县人大说，人家的面子是给够了。

老威：这种口气跟黑社会差不多。

贾凤珍：再黑也不怕，因为没活路了。于是病情一稳定，我就砸锅卖铁，凑齐旅费进京了。家里还有残疾的丈夫和公婆盼着，度日如年。

老威：您的冤情一目了然，应该一告一个准。

贾凤珍：经人指点，我住进花园路旁边的上访村，三四个人合租一间屋。我请人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写了

控告信，到处张贴和散发，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有记者还采访过我。

老威：您去了陶然亭的国务院信访处吗？

贾凤珍：才来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在找国家机关，我填了数不清的表格。2004 年 2 月 2 日上午，刚过完春节，我去中央纪委递材料。刚办了填表登记手续，还没走出门，突然有 5 个穿皮夹克的彪形大汉拦住我和另外一个上访同乡，让我们跟他们回家。我说："凭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们。"其中有个领头的回答："我们是鞍山的，你们越级上访，给鞍山人民摸黑。"我们心里害怕，就没敢再回嘴，但绝不跟他们走。当时街上人来人往，他们也不好硬拽，就让开了一条路。

我们慌慌张张地逃跑，急走半站地，到了北京第五中学门口。一直吊在背后的面包车却呼的超过去，车身一横，阻断我们的出路。四周行人稀少，他们就扑过来，把两个弱女人逮住，强行抬上车。我挣扎着喊了声："你们截访啊？"嘴就被塞入一只脏手套。我的同乡个子大些，一只手把住车门不进去，有个人就抬起皮靴，狠狠跺了一脚。我的同乡惨叫，一松手，就被塞进了后座。

截访车东拐西绕了一会儿，把我们拉到云翔宾馆，这儿有鞍山市政府住京办事处的牌子。我们被抬下车，弄到一间屋子看押起来，磨了几个钟头，直到天擦黑，外面亮路灯了，才又将我们倒入另一辆面包车。我注意到车牌照为"辽 H 15870"。

老威：你还挺有心的。

贾凤珍：每一个上访人员都会注意的，因为法律讲证据。第一辆截访车是辽西 O 牌照，只有政府和公安局才用 O 牌照，表示一种特权。而第二辆车显然是雇来的，或者换了个牌照。

老威：这有点像革命小说里的情节，国民党特务绑架中共地下党，才这么神神鬼鬼。没想到改朝换代了，这手段还没作废。

贾凤珍：可我们这种小人物算什么呢。

老威：在上访村有几万小人物，这就成了大事情。

贾凤珍：我不太懂。当时，我们两眼一抹黑，还以为这下子回台安县城了。我的同乡却发现方向不对头。她掐我一把，我就麻着胆子问："我们去哪里呀？"前排回答："送你们回家办案。"还嘀咕说："不就几千块钱吗。这么兴师动众地闹，丢人。"过了一会儿，车外连路灯也没有了，里面也颠簸地厉害。回辽宁的路挺好走的啊。我着急起来，啪啪直拍前排靠背，叫喊："这不是回家的道！"司机却呵斥我："你清楚还是我清楚？这就是回鞍山！"车摇摇晃晃地上坡，这是条碎石的盘山道。我们两个抱在一块，呜呜地哭了。前头的几个人却哈哈笑了："害怕啦？敢跑来北京告状，还胆小？"我说："你们干嘛跟一个残疾女人过不去？"他们说："是你跟我们过不去，害得大家年都过不清静。"车快上山顶了，他们才咔地刹住，拉开车门，命令我们下去。风轰轰地往里灌，外头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宁死也不下。有个人说："不是要逃吗？不是不上我们的车吗？怎么现在又不下了？"又有人说："与截访车有感情了吧？"于是他们又笑起来。

领头的掰下靠背，命令说："磨蹭什么？推下去！"任你怎么挣扎都没用，我们被扔路上，眼睁睁地瞪着面包车跑掉。大约过了一会儿，那车又晃着大灯返回，故意在我们身边轰了一脚油门，一眨眼就拐弯了。

这地方前不沾村后不沾店，仔细辨认，发现周围都是黑黝黝的山峰。风刮得哇啦啦地响，我估计至少 5、6 级，因为背着风也站不稳，我们只好互相抱着，蹲在地上。路旁是万丈深渊，我们就躲向靠崖壁的一边，又冷又饿又惊吓，我们不禁痛哭起来。我的同乡说："这样捱下去，只有冻死呀。"我点头："那就死得不明不白了。"我们挽着胳膊，顺着坡路朝下摸索，跌了数不清的跟斗，三个多时辰才下了山。累得够呛，可又不敢歇气，因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离城有多远，一歇就有危险。我说："多走一米，就多一点生存的希望。"风一直没有停，隔着棉衣还戳进去，象刀子在割。路面白白地结着冰，我们就捡了两根棍，小心地拄着走，我隐隐约约听见鸡叫了，才想起从上午到现在，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粒饭。人这种动物真是贱啊，心里怀着冤，怀着气，就不会倒下。

终于过来一辆货车，我们站在路中把它拦下来。我们在光柱里央求："带我们一段吧。"并且把受害的来龙去脉哭诉一遍。车主叹口气，就让上货厢，把我们带回北京房山区。并且帮忙联系区派出所。

老威：派出所警察对你们怎么样？

贾凤珍：当车主打电话时，我们还挺紧张，他就安慰我们说："他们是靠纳税人养活的，这时正好派出用场。"果然，警察初见已不成人形的我们，吓了一跳；问清情况后，就给我们热水喝，还让我们吃饭。接着，又在风雪交加中送我们回住处。

老威：真不错啊。

贾凤珍：还有那个车主，免费送我们回北京，没得一点好处。我说："大恩人，没您我们就成冻死鬼了，请问您的大名和地址，将来有能力，我们再报答。"车主说："有您这句话我就心暖了，出门在外，要小心啊。"

老威：天底下好人不少嘛。

贾凤珍：您也算好人，大热天，陪我两个多钟头。我 40 多岁，我们的年龄应该差不多。读小学时闹文化革命，加上残疾，没读多少书。但是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相信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可对比一下我们被截访的前前后后，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同是公安人员，鞍山的比谋杀犯还坏，北京房山派出所比菩萨还好？同是公民，不知名的车主那么好，李彦军、梁彦山比豺狼还毒？我一个奉公守法、自食其力的身残妇女，碍着谁了？挡住谁升官发财、

出国泡妞的道了？非要一次次加害于我？人总得讲点良心吧，你不讲良心也行，但损人总得利己吧？我死了，谁又能炫耀他的本事大，斗垮了一个不足一米四的妇女？

老威：您的事，起因为鸡毛蒜皮，却把整个人拖进去了。打人赔钱，就 1000 多块，10 年执行不了，要法院来干什么？我接触过许多人，性质和您一样，起因都小，久拖未决，于是上访，结果把全部生命都搭了进去。

贾凤珍：从前我还考虑值不值得，经过三番五次的迫害，我不考虑了。我要出这口气，中央总有清官！有一天我告赢了，回到台安县，总能抬起头来做人。我把狗法官也告倒——从古至今，还没有这种事。

老威：大嫂，还是祝您平安吧。

贾凤珍：谢谢。您也小心啊。

法轮功练习者陈氏

采访缘起

2004 年 12 月 6 日中午，我刚起床洗漱毕，突然响起轻微的敲门声。我迟疑了几秒钟，就将左眼凑拢猫眼，但见外面浮现出两位陌生农家妇女的人头。哦，原来是乞丐！我叹了口气，急速掏皮包搜出 5 元零票，脑子里却闪过年关唱着连花落乞讨的传统群丐图——有一年有一天的大早，我父母家门口一下子来了五个河南男女，一边说一边唱“新年大吉，福寿无疆”，闹得人不好不给压岁钱。

我右手开门，左手把 5 元钱递了出去，门外迟迟没接，我就抬起头。两个女人衣着挺旧，却显得朴素而干净，她们镇定地盯着我，目光中没有乞讨者惯有的畏缩和讨好。几经推让，我尴尬地垂下捏钱的手，她们却悄声说：“我们是练功的。”

声调轻若耳语，我的脑门却在一瞬间轰然炸开了。好半天，脸前的雾才散开。而她们也一直警惕四顾，把斜挎的黑塑料包搂紧——后来知道包里是法轮功的宣传单，她们大约已在附近的居民区挨门挨户散发了几百张。

我犹豫了分把钟，才顺水推舟地接待了她们，我感觉到自己怯弱的心跳得剧烈——由此证明，我不是一块当英雄的料，也不敢妄想做底层贱民的代言人——正如若干年前，我不该录制那盘招灾惹祸的《大屠杀》磁带，我怕得要命。

这些年，我听说过不少法轮功的事儿，除了报纸、电视和网络上的正反报道，就是朋友们在饭桌上的种种传闻。老李曾说，他们的西郊养鸡场发现了一包资料，我们急问什么内容？老李却叹息道，他都没来得及打开看，就被怕得要死的岳母夺过去销毁了。

王胖子接着讲了法轮功进四川大学校园撒传单，被大学生当场捉拿的事。“邪教的定性已深入人心了，”他板着宪政学者的面孔评

论道，“共产党洗脑太厉害。”

接下来，某记者谈起法轮功被集中关押的地方，“全省的法轮功都在那儿，大概有上千人，”他说：“官员、教授、农民、下岗工人，什么职业都有，把他们分别安插在普通刑事犯人中间，三个或者四个刑事犯对付一个法轮功，24 小时轮班监护，不准盘腿，两手不准互握，嘴巴也不准念念有词，否则就一窝蜂上去掰腿掰手掰胳膊，并吼读反邪教的正面报刊文章以干扰思维。”

“这么干？太新鲜了。”大伙议论道。

某记者继续说：“这叫转化。据说转化法轮功是有奖金的，按社会地位的高低，劳教警察转化了一名处级以上的干部或教授，得 500 元；科级或讲师 200 元，农民或下岗职工转化容易，只给 50 元。”

“教授和农民的差距这么大？”我觉得不可思议，就趁着酒劲吹牛说：“能混进劳教所采访就好了。”

“你是无业游民，”王胖子可恶地讥笑道，“比下岗职工又低一等，转化你也许只得 5 块，连买一斤猪肉都不够。”

大伙忍不住哄笑。火锅里的辣汤翻滚着。

这两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来自另一个世界，在我没有开门递出 5 块钱时，她们与我的生活是不相干的，也与绝大多数精英知识分子不相干。当我找出几页纸，克制住手脚的哆嗦，按习惯记录“天气：晴；姓名：陈某某；年龄：55 岁”之际，某种抽象的同情和可以作为谈资的正义感就随着血的涌动而变得具体——这也是日常生活！我想起昂山素季的话：“不要让恐惧成为你的日常生活。”

我访谈了三个半钟头，然后梦游一般送客。记得还握了手，说了“当心尾巴”。门一关上，我又从七楼窗口俯视她们的背影，眼眶不禁湿润了。

这个世道真是疯了，连这么平和的女性也进过精神病医院——

随后几天，我一直尝试整理记录，却始终心绪不宁——这种预感终于在 2004 年 12 月 14 日傍晚成为现实：刘晓波和余杰因言论罪遭传讯，在他们被拘留审讯的十几个小时里，互联网上炸起一片片“他们动手了”的惊呼。

作为两个著名文人的好友，我却在便衣们的阵阵擂门声中不明不白地翻窗而逃。我长跑多年，外表结实，内里却已吓破胆子。我竟忘记了 610 办公室的厉害——采访法轮功迟早要惹事！

老威：您们敲错门了吧？

陈氏：老师……

老威：哦，明白了……这是 5 元钱……

陈氏：您误会了，我们不是乞丐。

老威：我没说您们是乞丐。快过年了，在外头讨生活不容易嘛。

陈氏：谢谢老师的慈悲心，我们真的不要钱。

老威：就别客气了。哦，家里还有些女人穿的衣裳，我清理一下……

陈氏：我们啥都不要，我们是，是练功的。

老威：功？！

陈氏：法轮大法。

老威：是么。

陈氏：能进屋吗？

老威：这个，这个。

陈氏：我们没安歹心。

老威：你们……没长尾巴嘛？

陈氏：尾巴？没有。如果有，我们能感觉到。

老威：请进。

陈氏：谢谢。

老威：随便坐吧，我来泡茶。

陈氏：谢谢！看这屋里的布置，书和字画，老师您是文化人。

老威：勉强会写几个字。

陈氏：您和大法有缘啊。

老威：知道得比较早，但我生性懒惰，任何功都练不了。

陈氏：您能让我们进家门，就是缘分，就是真善忍。因为现在这形势，许多人都害怕，莫提进门，就是瞅见我们在门外站着，也心头发慌。有的还打 110 报警。

老威：这么近距离看，你们不是妖魔鬼怪嘛。

陈氏：我们不过是普通百姓，一辈子胆小如鼠，怕这怕那，可自从信了法轮大法，心里有了李洪志师父，心态就放平了，就不怕了。日夜不停的转法轮使人百毒不侵，所以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义务让更多的兄弟姐妹了解：法轮功是正，共产党是邪，不管他们动用如何的邪教手段污蔑、迫害，可邪不压正。我们的弘法行为也就正正大大。

老威：我曾在小区内捡到过法轮功散发的宣传单。

陈氏：只要有空隙，每家每户我们都送。今天上午，从温江县城一路过来，20 多公里，我们散发了几百张。提包里还剩一些，估计天没黑就能送完。老师您上网吗？我这儿有明慧网址，通过动态网、自由之门、无界浏览都能打得开。

老威：你们也能用代理服务器？

陈氏：我们岁数偏大、文化偏低、眼睛偏瞎，弄不了电脑。可功友中的能人很多，经常从明慧网、踩江网上搞资料下来，私底下印刷了再传播出去。

老威：你们的地下工作搞得不错。

陈氏：我们没组织，不搞地下工作，不违法乱纪。

老威：退回去五、六年，在我这楼底，天天有法轮功聚会。老头老太太，好几十，一早一晚都从五湖四海的家门口汇集到"法轮大法"的小横幅下，念书练功，秩序井然。我记得黄忠小区辅导站站长是位 40 多岁的女同志，笑模笑样的，经常在大堆人群里边讲边示范。说实话，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也会成邪教，顶破天，集体气功嘛。不管治不治病，中老年人成群结队，有自己排解孤独、苦闷的去处总是好的，比打麻将好，比扭秧歌好，犹如日日上心理诊所，将家庭里两三代人的鸿沟也填平了。还有，一练功就不吃药，又为祖国节省了大笔公费医疗。我还嘀咕呢，人人都"真善忍"，逆来顺受，共产党的江山岂不成了铁打的？

陈氏：老师您在开玩笑？

老威：没有，是江泽民在开国际玩笑。因为许多共产党员也练功，他担心练功的人数会超过党员的人数。风向转得太陡，功不敢再练，可一早一晚，不敢练功的人们还聚，干啥？跳民族舞。录音机里放的音乐很烂，宋祖英唱的《爱我中华》，《56 个民族 56 朵花》，那些粗腰肥臀扭得实在太难看了……而那个法轮功的女站长也经常在舞阵里，有时也站出来做做示范。看来，她是个文艺活跃分子。

陈氏：老师您只看了表面现象。练功不是凑热闹，而是为了消孽，清除心上的毒素，治人先治心嘛。不能公开聚会，就化整为零，在家里练嘛。如果家里不安全，要被告密，株连亲人，就找更秘密的地方。不瞒您说，我躲在公墓里也练过。当然，练大法也有层次，有些人，象您刚才讲的，外面不练了，和大伙一道换一副汤头，跳舞、做操、打麻将，好让政府放宽心，可私底下呢？内心呢？练不练？悔不悔？因为人一旦相信并练习过大法，尝过甜头，身体和精神自然会向往更高的层次；如果因为外部的逼迫而退缩，而放弃，罪就更大了。

老威：比不练功的人还大？

陈氏：对。我是温江和盛镇某某企业的退休职工，加入过共产党，有 30 多年党龄，可到头来孽报深重，不能自拔。我只拿几百元退休工资，一年却至少有一个季度在看病吃药打针。长期下来，不仅药罐罐越背越沉，身体也变成过敏性体质，每遇大病，任何医院都束手无策。当时我觉得下半辈子没救了。

1999 年 4 月的一个太阳天，我偶然在和盛街上碰到一个熟人，神清气爽，显得极年轻。我不禁大吃一惊：他过去也是著名的药罐罐，弓腰驼背，要死不活的，咋几个月不见就换了一个人？于是我拽住问长问短，这样，我才第一次听说法轮功。

老威：我 1997 年就看过《转法轮》，可惜没照着练过。

陈氏：我那时正处于病急投不了医的情况，心想死马当活马医，就借了本大法入门书，躲在卧室内对着镜子偷偷地学练，日夜不停地坚持了三个多月，感觉身心变轻松了，一做体检，长期折磨我的肾盂积水，肾功能衰竭，尿毒症，重风湿，以及心跳过缓（每分钟只搏 40 次）等病，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痊愈了。

老威：这么神奇？

陈氏：对，就剩过敏性支气管哮喘还没断根。

老威：我能感觉到你的喘息比一般人重。请喝点水。

陈氏：您住得太高，放在几年前，我爬不上这七楼。

老威：所以你成了大法弟子？

陈氏：对，并且带动我周围的人练。大家经常交流，邻里关系也变和睦了，只要碰面，开口闭口都笑；活了几十年，我也算过上了看得开、不发愁的幸福时光。可是到了 1999 年 7 月 22 日，镇上突然开大会，宣读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不准党团员和干部练习大法。我当时的反应是，明明是一种能治病的正派功法，咋会转眼就上升到政治高度，定为“非法组织”“歪理邪说”了？不过，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经历过文革等大小运动，晓得共产党的脸说翻就翻，象个情绪不稳定的泼妇。

我们先以为化整为零，悄悄练，过了这一阵风就完事。可后来，政府的调子越定越高，挨家挨户地查，跟抓逃犯一样，个人“犯事”，还要株连家属。于是，无立锥之地的我和另一个功友，在 2000 年 1 月 15 号进京上访。我一路打腹稿，准备心平气和地找上面评理，我想说：“你们搞错了，法轮功能治病，我自己就是证明。”那天我们下了火车，连水也没喝，就去了天安门广场，脚跟未稳，警察闪过来问：“法轮功？”我们答是。马上就被反剪胳膊弄上警车，押送到天坛公安分局。一群警察围着审，姓名，住址，哪里人，练功几年等等。

北京打电话通知四川，我们被关到第二天，就被当地的 610 办公室接了回去。临行前又搜身，我们的随身现金 680 元全没收了，并且没打收条。民警冯某某还说：“老子们这一趟太辛苦，就当出差补贴吧。”

回温江后我们被治安拘留了 15 天，行政拘留了 2 天。

老威：上访一趟，行程几千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说就叫弄回来了。

陈氏：是的。

老威：曾有句玩笑话：天安门广场上，每隔 5 块地砖就立着一个特务。你们为啥不警惕、一问就承认是？

陈氏：修炼大法不可以说谎，否则孽报就落到自己头上。

老威：原来如此啊。

陈氏：我从派出所的拘留黑屋放出来才三天，镇上又有功友继续上访。610 怀疑是我唆使，于是我第二次被治安拘留 15 天。再次释放后，我的房子被查封，政府指令我搬到一处便于他们监视的又臭又潮的猪圈房里。2002 年 2 月我的退休工资被扣，每月只发

放 120 元的最低生活费。由于我仍不承诺放弃大法，生活费又从120 元降为 50 元。50 元，连米面钱都不够啊！

这还不算解恨，2000 年 7 月 1 日，镇政府通知我下午 3 点去学习，但我刚刚按时进了门，就被镇党委副书记黄某某当胸揪住，噼里啪啦扇了十几个耳光。手打痛了，他又卜卜吹气，捏起拳头，凸出中指关节，雨点般敲我的脸。一会儿，我就肿得满脸花，看人模糊起来。支持不住摔地上，脑壳又挨了十几皮鞋尖。跟着，我被倒拖出办公室，在中心院坝内，我象一个肉皮球，被人们又踩又踢，我不由自主地遍地滚，却无缝可钻。围观者越来越多，许多街上的群众都拥入政府大门看热闹，还大喊："打法轮功啰！快来看嘛！"

老威：没人劝阻么？

陈氏：没有。

老威：无法无天呀。

陈氏：不晓得不晓得，我已看不见听不见了。只感觉到四周密密麻麻的人腿杆，一会儿退一会儿进，天和房子一会儿高一会儿矮。大概怕被群众当场打死影响太坏，我又被倒拖双腿，弄进大会议室。群众被隔在外头，又跳又喊："打死！打死！！"于是镇党委副书记黄某某，副镇长黄某和张某，在大堆人脑壳的鼓舞下，轮番上。一人整累了，就退后歇气，另一人变着花样上。我被弄跪着，光脚板被拧成股的铜芯电线细致入微地抽打。4 个小时啊，折磨没间断过。

老威：你当时的意识还清楚么？

陈氏：不晓得。晓得的只是"真善忍"。

老威：其他呢？

陈氏：偶尔也有一两句话飘进耳朵里："陈某某，你已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还有："打死法轮功不负责！"

老威：还有呢？

陈氏：没有。除了“真善忍”，除了李洪志师父。法轮在转啊，从五脏六腑向外，越转越开，把那些打你的手，踢你的脚都转没了。痛，这下子没痛过，接着又来了。但是减罪消孽，这是有人替你减罪消孽……

我浑身又青又黑，没一块好肉了。直到傍晚 7 点多钟，我突然听见 70 多岁的妈妈在隔壁哭。有人逼问她为啥哭？她都不敢承认是为自己的女儿哭！

当晚，我妈妈的家也被抄了。警察卷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电视机、被褥、蚊帐、衣服、暖瓶及各种家电，还有我从前收藏的旧银圆、铜钱、像章等，甚至菜刀和挂肉的钓钩都没放过。接着，我和妈妈被架进货车，强行送回农村老家看管——他们说，这是为了不给和盛镇的政府形象抹黑。

老威：真是暗无天日。

陈氏：这才开了个头。2001 年端午节前，我和两个功友结伴去郫县，刚在品东寺墙外写完“法轮大法好”，就被受共产党蒙蔽的和尚抓住报了警，我们被关进了郫县看守所。由于怕连累家人和功友，我始终不报姓名、地址。我还试着在号子里练功，可这边一动静，两个受政府指使的犯人就扑上来，掰开我的手脚，狂喊“报告”。于是所长出面，用胶皮棍爆打我，直到浑身青紫，才喝令给我戴上自制的铁枷。这种俗称“铁烟杆儿”的刑具是专为想自杀的死刑犯预备的，严重违规的犯人也用。我“披镣戴枷”，象小说《水浒》里描写的杀人放火、刺配冲军的梁山好汉，被扔回号子，整整 10 天，连大小便也不能自理。后来轮到集体洗澡，铁枷方被除下，脖子、手腕全溃烂了，下身红肿，出狱后疗了几个月的伤才平复。

接着是 2002 年 4 月 25 号，在成都郊区的机投镇龙门村，我再次被 610 抓捕。关押两个多月后，宣布判劳教两年。7 月 3 日，押送到蒲江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因新旧、内外均伤病累累，入狱体检不合格，我被退回温江和盛镇。

老威：打不死，活不了，镇里拿你怎么办呢？

陈氏：政府和派出所见“瘟神”回来了。个个气得咬牙切齿。他们开了一夜的会，最后集体决定“陈某某是走火入魔的精神病人”，7 月 5 日，我被五花大绑着投入了万春精神病院……

老威：有医生的诊断书吗？

陈氏：某某副书记说，组织决定就是最权威的诊断书。我进了三道铁门，终于哐当一声，被架入铁窗、铁床、铁椅、铁柜的 A 病房，里面的病人目光呆傻，抽筋、流口水，围着我嘿嘿地痴笑。我吓坏了，急忙拽住要转身离开的镇武装部长胡某某的胳膊叫：“这儿不是我呆的地方！”胡得意地大笑：“你老人家是首长，专门送你来疗养的！大家绞尽脑汁才选中这儿，还要缴 3700 元钱的疗养费呢。”

我又抱住胡某某的腿哀求：“我的脑子没毛病嘛。”胡笑得更厉害了：“这儿的人都说自己没病！喂，你练功去吧，地税局还有个杨崇玉在里面，你们做伴儿，往死里练吧！”

我被绑在铁床上一通宵，第二天，医护人员见我很老实，就松绑了。刚自由下地，我就追问杨崇玉的消息。医护不吭气，我就趁他们在晚饭后松懈，溜到各病房去查找，终于看见她了，骨瘦如材，跟鬼似的。我拉住她交谈，才晓得她已被关进来快一年，早不学法，不练功了。她说跟疯子学疯子，在里面如果显得不疯，病友们就要来掐你，吐你口水，甚至扳倒你，骑在你身上屙屎屙尿。我责备说：“你咋个要乱翻白眼乱唱歌呢？习惯成自然，假疯最后也弄成真疯了。”她说：“刚进来时，还一心想要练功，可一摆动作，手脚就被硬生生地掰开；嘴巴一蠕动，就有人贴着耳朵吼念《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扰乱思维，搞得你岔了气，虚汗直淌。这样下来，政府天天灌输报纸、电视上污蔑大法的‘科学’，乱了心智，就真假难辩了。”

我为她难过，就把明慧网上的消息告诉她，大法已在世界各地不同人种中弘扬、传播，千万上亿的人在练功呢。我说："澄清了谎言，继续修真善忍吧，没得错。师父说过，我们都是为了修法而来的，既然得到了，就应该珍惜，抓紧时间修炼。还要向世人讲清真相，救渡更多受蒙蔽者。"

第二天，我们又恢复练功，默诵师父的经文。医护们发现了，就赶过来阻止。医院的主任邓某某如临大敌，立马喝令周围的精神病人把我们拖出去电疗。杨崇玉先被绑在电疗床上，电源开关一动，她就不由自主地抽搐，惨叫"师父救救我"，那声音真不象人类发出的。我不忍心，就垂下脑袋，但是邓某某却上来抓住我的头发，抬膝盖顶住脊梁，逼迫我挺着身子去看，去"学习"。只见杨崇玉又抽了几个回合，浑身就由硬到软，皮肤由白到青，由青变紫，连那不象人类的喊声也发不出了。我受了感应，也哆嗦着哭叫："你们还是人吗？你们要下地狱，遭孽报的！天理何在啊！"邓某某说："喊天有个屁用，反正人早晚要死，你们活在世界上显得多余嘛。"

往后，我们被隔离开，24小时的"特级监护"。只要我一放风，就把她给锁起来，我只能隔着窗玻璃感觉到她模糊的身影。但是，我还是在窗下喃喃念叨师父的法音，盼望彼此有个心灵感应。没料到，这个也被检举了。恶人医护二话没说，就绑住我和杨崇玉的手脚，逼我们喊大法是邪教。我们不屈服，就选了一间紧靠厕所的病房，将我们一圈圈捆在屎尿四溢的床上，让我们喂了一夜蚊虫。第二天，扣除饭食，给我们输液。我们动不了，只见输液管滴得风快，一上午就要输好几瓶。我说："也不知输的是啥子。"杨崇玉说："万一是损坏脑神经的药呢？他们才是疯子，啥子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我点头说："日本电影《追捕》里就有这一招，用一种'新药'把健康人搞出毛病，最后连跳楼自杀也不晓得。"

我们越想越害怕，就拼命挣扎，我先撞翻了输液架。瓶子碎了，却惊动了一个疯子，他舞动双手，大吼"报告"。于是我又被结结

实实地捆了重新输液。

“医护”还逼我们吃“治疗”精神病的药，早晚一大把，吃后全身瘫软无力，老想睡觉；并且止不住地淌口水，嚼东西也没知觉。我吃了一回，就拒绝再吃，“医护”就命令一群疯子按倒我，撬开嘴，用开口器顶着，将药和开水强灌下去。我憋着气，卜一声咳出药片，他们又二次强灌，滚烫的水烧灼着喉管和舌头，滋地一下将我痛晕过去。第二天，我的头皮和脸都烫起了许多大泡，经过化脓、蜕皮，半个多月才结痂。

从此，我们只好像所有疯子一样，乖乖地吃药、喝水，并且主动向“医护”张嘴，搅动舌头，让他们用手电筒检查口腔，确认已经吞咽下肚。

老威：你们终于被炼成精神病了？

陈氏：开头脑子还念念不忘大法，接着就提不起精神，再接着就感到身子向下坠，眼皮比铁还重。日夜分不清楚，不吃药就心情烦躁。也许我梦中都叫“师父救救我”，院方又给我和杨崇玉转了病房。这一次，他们用拇指粗的铁丝封死了窗户，取走了灯泡，屋里黑漆漆的，跟停尸房一样。后来我们晓得，隔壁果然就是停尸房。病房的外间，还住了两个等死的老年精神病人，骷髅似的，已猜不出他们的年龄。她们除了靠两顿猪狗食维持生命，连药也不用喂，因为他们长年累月被锁在屋里没人管。她们已习惯光着身体，夜深人静，也自言自语，偶尔还唱两句农村的野调调，听得人起鸡皮疙瘩。

终于有一天，这房子要改建，老年疯子要被安排去别的病房。门一开，天光照进来，她俩象掉毛的老耗子，在光影中惊恐万状，用巴掌挡眼。她们还是拒不穿衣服，“医护”叫疯子给她们裹大衣，她们还呲牙裂嘴，边躲闪边拉屎尿，把“医护”熏得站在五米开外，捂着鼻子指挥。

老威：这精神病院真是个大粪坑！

陈氏：我被当作疯子"治疗"了 110 天，杨崇玉还比我早"治疗"近一年。有一天，和盛镇妇联主任和信访办的人来"探病"，我隔着铁栅栏会见。她们问我生活情况，奉劝我"改邪归正"，并且胡说："法轮功已害得你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精神失常……"我打断她的话，纠正说："我没有精神失常。"并且强烈抗议院方逼我乱吃药，损害了我的健康。

妇联主任答应去过问，可还劝我"回头是岸"。从此医院对我减少药量，由一日两次改为一日逼着服一次。虽然服药的"待遇"改变了，但是妇联主任代表政府，给医院下命令，不准任何人来探望我，除非镇政府出证明。

老威：这为什么？

陈氏：做贼心虚，因为是不是疯子，一眼就能看出来；即使看不出，通过摆谈，也能辩出异常。有一天，我妹妹骑自行车来探望，被拒之门外，她就在墙外一声声喊姐姐的名字。有个疯子听到了，赶紧来唤我。可等我跑到出声音的墙下，要答应，却被追来的"医护"逮住，捂了嘴巴拖回去。更可恶的是，我妹妹也被院方邓主任拖走了，他还威胁："再喊，连你也关进疯人院！"

老威：官方一再强调练法轮功会"走火入魔"，我以前虽然不相信，但也觉得过分迷信不好。可没想到的是，真正"走火入魔"的是迫害，那些制造疯子的人，真比疯子还邪。

陈氏：您觉得我们……

老威：我能理解。

陈氏：今天是一种缘分的开始。

老威：也许吧，机缘天定。我承认迫害也是成就圣人的机缘，例如达赖喇嘛，在 1959 年被中央政府污蔑为西藏叛乱的奴隶主头子，为了逃避迫害，他在藏人的沿途掩护下，经过异常艰险的旅程，

出走到印度，一去 40 多年。当时他才 20 多岁，可以说还是个十分单纯的活佛。如果说共产党、毛泽东宽容一点，对“信仰自由”的承诺有点诚信，达赖也许就在拉萨，在世俗政权的笼罩下呆下去了——他的前辈中的绝大多数都这样——今天具有世界声誉的达赖活佛不也是专制成就的吗？

陈氏：我晓得达赖，但是……

老威：对不起，我卖弄的毛病又犯了。我知道，你们的师父也算了不起，在海外修炼的路还长吧……

陈氏：大法是最高的。

老威：我承认。可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你何时从疯人院出来的？

陈氏：2002 年底，一辆警车将我接出来，直接送蒲江县楠木寺女子劳教所。一体检，又不合格。可这次，他们铁了心，一定要所里把我关进去。

老威：后来呢？

陈氏：劳教所医生说：“她是半条命，死了咋办？”610 回答：“死了就死了，还能咋办？”于是，我就进去了。

老威：后来呢？

陈氏：我趁外出劳动逃了，警察也懒得来撵。

老威：你劳教了多久？

陈氏：判两年，差两个多月就刑满了。

老威：那你逃啥子？

陈氏：我怕到时又生变故，不“悔改”不放人。

民刊《野草》主编陈墨（上）

采访缘起

我最早晓得《野草》是在成都学者肖雪慧的家里。记得时为 1995 年春夏之交的下午，我和友人李亚东前往位于西南民族大学宿舍楼的肖家拜访，闲谈之间，肖学慧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诗选对我说："你是诗人，你晓得《野草》这群人吗？"我摇头，肖说："他们从 60 年代就开始地下写作了。"

我暗暗吃了一惊，却故作平静的接过那本过时的诗集，随手翻阅。相隔多年，其内容已经淡忘，却还记得诗集选编者为九九。肖说："这个九九为国民党将军之后，长在新中国这几十年，吃尽了苦头，却突然于 70 年代末时来运转，去香港找到父亲，并继承了遗产，成为某某集团的董事长。"

后来，我上海外的网页时，读到过九九《魂断台北》的片段，也有些打油风格的诗，但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留给我的现代派文学的偏见，就本能地忽略了其中透露出的某种尘封已久的顽强信息。

1999 年 5 月在国内出版的《沉沦的圣殿——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地下诗歌遗照》一书为主编者的我赢得了广泛而持久的较好名声，但它却对发生在皇城北京之外的若干外省地下诗歌只字不提，这不仅受限于视野及地缘政治的屏蔽，而且受限于我的文字偏见，包括"什麽是能经得起时间自然过滤的文学"之类的偏见。

稍后，我与泊居美国的贵州地下诗元老黄翔夫妻有了电话和文字交往；日本的双语杂志《蓝》也开始从史料的角度，做贵州，上海，四川等外省的地下文学专集；特别是胡杰先生耗费 5 年时间而拍摄完工的记录片《寻找林昭》在知识界的流传，给了我更深的震撼。被谋杀的圣女林昭也是个应证种族灾难的诗人，她和另外两位同案诗人在 60 年代初就筹办了一份刊登有泣血长诗的油印民刊。

这份致使他们锒铛入狱，并最终引发杀身之祸的“反革命罪证”，比在 1978 年借着思想解放运动和北京西单民主墙而诞生的《今天》杂志早出现了近 20 年！

两年前，通过电话和电邮，我进一步结识了泊居美国的《野草》诗人蔡楚，他目前的职务是中文独立作家笔会副会长，并且以早年编辑《野草》的阅历和经验，主管着这个国际性作家组织的网络。在蔡楚的一再牵引下，我与住在成都另一端的《野草》主编陈墨见了面。

陈墨木讷，除了一张脸比较大，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他送了我一厚叠《野草》杂志，十六开本，每本 80 来页，装帧简单，黑白两色，封皮上印了些勘称文学思想格言的话。内文排版也比较老套，油墨味扑鼻而来，且有些字的颜色还深浅不一-——由此可推断，印刷此物的必是设备和工作人员均已老掉牙齿的不见光的小作坊。

从 20 世纪 80 年代算起，我也称得上是地下出版的老手了，凭直觉，我就明白《野草》及其主编因装帧过于简单而容易被忽视，容易将它混同于成千上万的自生自灭的文学印刷品——我当时接过有陈墨亲笔题赠的《野草》时，也只是随手翻阅，瞅见目录上除了老“野草”若干，尚添了流沙河、冉云飞、肖学慧、王怡等熟人的名字，就随口问:“他们也投稿啊？”陈墨笑了笑:“新鲜血液嘛。”我接着又问：“已办了 90 多期？”陈墨答：“断断续续几十年，也该有这么多期了。”

我终于从这平淡的回答中嚼出一丝辛酸滋味。

我和陈墨有了交往，但不是太多，印象中他总是驾着一辆八面透风的老面包车，并且乐于在文友们高谈阔论之际，不吭一声去付酒饭钱。有一次，他于茶桌旁当着众人称赞我的狱中诗，还说已从网上下载若干首，恳请我应允登在《野草》上——这一时期，《野草》刊登的外稿量越来越大，海内外著名的北明、贝岭、蔡楚、万

之、流沙河、王怡、肖学慧、冉云飞、蔡咏梅等等均成为常客，与老野草们交相辉映或旗鼓相当。海外一些杂志也有了事关《野草》的评价，以及历史追溯、定位——尽管作为老资格的民刊，《野草》也在 1979 年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上成都的闹市区张贴过，甚至风传被当时的成都市委取缔过，但它毕竟是个风格稳健，如今印量只有 100 本的文学交流杂志，我没想到它会出什么事。

我曾经与陈墨开玩笑，大意是："你和邓恳诸兄上个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写地下诗，并且从 70 年代末到目前，将《野草》断断续续地办了 90 多期，居然没有问题！"陈墨的脸红了，含含糊糊地检讨道："有问题，有问题。1979 年，《野草》被成都市委书记杨以希定为'反动'，差点就抓人，全靠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一句话，才保全了坛坛罐罐。我逃跑了好几次呢！"我问："没有人栽进去吧？"陈墨答："孙路坐过牢。"我问："是办《野草》吗？"陈墨答："是为六四。他在 89 年 5 月底因上人民南路广场拍学潮照片被捕，市电台还播过。"我嘴脸可憎地笑道："与《野草》无关？"陈墨悄声道："是的。"

我本想借势抬出自己在 80 年代为弄地下诗刊，曾跳下印刷厂二楼突围的革命事迹，向这位厚道得过分的老大哥吹嘘一番，却忍住了。我只隔靴搔痒地总结道："成都的文化政策还算宽松吧。"陈墨愣了愣，我又补充道："也许警察还看几本书。"

陈墨垂头丧气道："写了几十年，快到抱孙子的年纪了，我还没在官方刊物上发表过东西。办《野草》的目的无非是发出点声音。我们这些人，经历嗑嗑绊绊，只是觉得文学这种嗜好总比其它嗜好，例如打麻将、钓鱼、东家长西家短地搬弄是非，以及整人害人来得高雅些。可我们不搞政治，你让我们反动，也许都反动不来嘛。"

我被噎住了，反动派又不是天生的。即使令当局如梗在喉的中文独立作家笔会，也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政治诉求。有一次我和远在瑞典的笔会秘书长万之通电话，我极力称赞他登在《野草》上的

一篇坦白自己是好色之徒的随笔，不料他叫屈道："这个马虎的蔡楚！他怎么把我的私信拿去发表了？"我笑道："一个人在好色和正人君子之间举棋不定，岂不可爱？"他说："男人觉得可爱，女人看了就很麻烦。这个没睡醒的蔡楚！"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好色的国际长途通了没多久，《野草》就出大事了。大半年后，一直隐忍不发的陈墨终于在身心交瘁之际接受了我的单独采访，时为 2005 年 2 月 2 日下午。连续几天的阴雨连绵，把成都变成了一个似乎永恒的冰窖。陈墨依着头天的约定，缩头缩脑地浮现在金沙遗址旁，那张醒目的大脸在若干个不眠之夜里窄了许多。我们像两个特务在细雨中一声不吭地走着，约十几分钟后，钻进了一个茶楼。封闭的单间不另收费，我们坐了下来，相视一笑。我掏出笔记本和录音机，蓦然之间，我想起了前苏联流亡作家纳博科夫的一本书名："说吧，记忆。"

老威：在这次谈话之前，我把你送我的《野草》都找出来，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突然间觉得异常亲切，因为我读中学的时候，就有那么一种自办文学刊物的冲动。后来当了卡车司机，还和老同学杨然、荆纪民等油印过两种诗歌传单，命名为《行云》和《诗种》——按当时的出版政策，这种未经有关方面批准的少年文学冲动就已埋下了犯罪的种子。

陈墨：我们虽然相差十几岁，但"受害"的源头都是文学。

老威：我在近期《野草》上读到一个《悼念鲁连》的专辑，感到有些鄂然。因为对照你们自印的《野草之路》，我从照片上认出了这人，他是《四川文学》的编辑，自己也发表过不少小说。上世纪 80 年代，我进《星星》诗刊做见习编辑，还在布后街 2 号的同一个省作协大院里，天天碰见他。

陈墨："鲁连"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名叫周永年，因为与本城

的另一位作家同名，又更名为“周永严”。

老威：对，周永严，四川写过小说的人都记得他，贺星寒和林文峋比他成名还晚哩。我至今记得他的眼睛，非常忧郁，连点头微笑时也很忧郁。我还曾递诗给他，他仔细看了，啥也没说，就还回来，好像嘴巴打了封条。

陈墨：周永严是唯一从《野草》走向官方文坛的作家，但他的命比谁都惨。太冤了。1964 年，他才 16 岁，就参加工作，到了千里外的屏山茶场。那地方气候恶劣，工资非常低。前几年，成都电视台还专程去采访过，拍了长篇的专题片。那地方的知青，疯的疯，死的死，至今还有留在那儿，回不了故乡的。周永年最早到那苦寒之地，不过半年，就因为写“反动日记”被同一宿舍的人告发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当作典型揪出来，批斗，并判劳教。那时的劳教比劳改还厉害，由于不走法律过场，就没有期限。他在屏山茶场，一劳教就是 12 年

老威：有这么长的劳教？

陈墨：两三年期限满，就强迫留场当工人，天天有枪杆押着劳动和收监，其待遇同劳教也差不多。周永严的身体完全给搞垮了，茶场方面觉得榨不出油水了，才允许病退回乡。他有劳教背景，找不到工作，就进了街道生产组，与婆婆大爷们一起糊火柴盒。熬了两三年，邓小平复出，政治气氛开始转暖。

周永严最早化名“鲁连”向《野草》投的文章是《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写得太好了。他引用共产党老祖宗马克思的原著，指出“现代国家无不把‘出版自由’的条文，写在各自的宪法上”，因为“出版自由关涉到普遍的自由，预防性的法律不应存在，检查法永远非法。”

老威：这些一百多年前的论述似乎是针对目前的中共当局来的。

陈墨：的确，马克思正是一百多年前的《新闻检查制度》的激

进抨击者，他认为新闻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是支撑社会拱门的最后一块石头。没这一块基石，整个拱门就将垮掉。

在 1979 年的思想解冻初期，能读到这样的违禁文字，怎不叫人拍案叫绝？我和社长邓垦等编辑同仁一合计，就在《野草》第二期隆重推出。当时我们赶印了 495 册《野草》，如创刊号一样，往各处邮寄了 40 多份，还在盐市口和总府街大量张贴，围观者连日不断，社会反响强烈。

当时北京已开始查封西单民主墙，风声陡紧，我们甚至做好了入狱的准备，但几周后，居然没事儿！《野草》又印了第三期，却被成都市委正式定为"黑刊"，因此被迫改名《诗友》，不定期地在'地下'流传。而鲁连作为我们的主要作者之一，一直很活跃。

1980 年 10 月 19 日是鲁迅先生的逝世纪念日，我、邓垦、罗鹤、徐沛在鲁连狱友张仁荣的引荐下，见到了真真实实的鲁连，也就是你在作协大院天天见面的作家周永严。自然是促膝深谈，心意相通。他当时 30 岁，却坐了 12 年的牢，在谈到自己引起轰动的杰作时，他突然挺起弱不禁风的胸膛大声说："'检查法永远非法'这句在中国最反动的口号，却是马克思在 100 多年前喊出来的！"

鲁连和《野草》朋友们的蜜月持续了几个月，却有"内部消息"传来：当局查明《诗友》即《野草》的变种，已加强了对这些异己分子的监视。一时间人心惶惶，蔡楚接手编成的第 27 期《诗友》也不知所终。鲁连此时已是《四川文学》编辑，彼此的"热恋"自然在心惊肉跳中嘎然而止——这个匆忙划上的省略号直到 20 余年后才重新接上。

老威：同在一个城市，20 余年没一点联系？

陈墨：彼此如去了月球，音讯杳无。

老威：周永严在 80 年代还算有名啊。

陈墨：个中滋味，一言难尽吧。总之，在 2002 年 10 月 31 号，

九九突然打来电话，称已打听到鲁连下落。邓垦立刻照图索骥，电话那端终于传来那久违的弱不禁风的声音："真没想到……"在文坛混了这么多年，我们还以为他名利都有了，因为比他成名晚的好些作家都飞黄腾达，占尽了共产党体制的便宜。可没料到，当《野草》同仁们邀约着去西门茶店子一栋临街四楼拜访时，这位昔日文友的惨状叫人窒息。门开了，我们被一位长年累月在此看护的乡下汉子领进逼仄的卧室，一张大床横据了大半个房间，两只近一人高的氧气瓶触目惊心地竖在靠门的壁角，而鲁连盖一薄被，勉力支撑着斜躺床头，鼻孔还插着一根长长的输氧管。

老威：他才 50 多岁吧？

陈墨：不到 55 岁。20 多年前成为《野草》成员时，不过 30 岁；而他因写反动日记被抓起来坐牢之际，才 16 岁。人的一生就这么蹉跎而去，眨眼间就到头了。

老威：鲁连得的什么病？

陈墨：多年坐牢落下的病，我没忍心问。他够虚弱的了，凌乱的长发，脸颊没有一丝血色。塑料窗帘遮断了所有户外光线，却阻不断嘈杂的闹市声；无论昼夜，顶棚的日光灯都永远亮着。鲁连说，这也是坐牢，早年坐牢还有刑满释放的企盼，而现在是彻底没指望了。

老威：我坐牢四年，无论在收审所、看守所还是劳改监狱，顶棚的日光灯都永远亮着，没有一丝一毫的黑暗，连梦境里的黑暗也没有。我想，永远的光明就意味着无处藏身吧。

陈墨：鲁连说，他已卧床五六年，除了通过电视节目了解外界的变化，就与世隔绝了。"几乎没有人来，"他一一捏住我们的手，竟激动得大喘起来，于是又把输氧管往鼻孔里塞……

老威：唉。

陈墨：我们尽可能地回避眼前，只去回忆。比如 40 年前在茶

场劳教，鲁连和廷孝、剑秋往来的情景；《野草之路》上的某一篇文章，如何记录了邓垦、明辉、陈墨 1964 年春游昭觉寺“题竹”的逸闻；当然，也说起《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终于，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必须要告别。3 个多月后，我们才晓得这就是永别！鲁连是 2003 年 3 月 30 日夜里 11 点 40 分去世的，我们于次日上午前往灵堂默哀，耳边犹然回荡着他 1965 年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死者生前辗转于苦难/如今，他沉睡了/从此与世无争。”

老威：鲁连的一生也算《野草》的某种象征吧。

陈墨：《野草》的多数人都如鲁连，“生前辗转于苦难”。比如邓垦、九九、蔡楚、乐加等等，都是黑五类的子弟，当知青、社青，坐牢、打临工，却又不甘心沉沦，酷爱读书，始而与文学结缘。鲁连的命说不定还比其他人好些，因为他毕竟是唯一从《野草》走上官方文坛的人，享受过几天热闹。

老威：你遗憾文学没能成为你的职业？

陈墨：我已 60 岁，迄今为止，文学没给我带来一分钱的利益。

老威：据我所知，你曾经有过机会。

陈墨：我 1969 年就编纂过《中国新诗大概选（1918—1928）》，还通过向《诗刊》投稿引起重视，并进一步地认识了著名诗人孙静轩。79 年思想解放运动中，《野草》也曾“吐故纳新”，汲收四川作协里的开明人士组成新的编委会：主编贺星寒；编委骆耕野、万一、邓垦和我；艺术指导孙静轩，可没弄多久，风向急转，就宣布散伙了。

老威：黄粱一梦？

陈墨：我去文坛晃悠一圈，感觉不对劲，可能从根子上就是两路人吧。说实话，我对同官方合作兴趣不大。我，还有邓垦，九九等人，珍惜自己的在野身份，到老不悔。做个不在官办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在野的爷爷感觉也不错嘛。1999 年，你编著的《沉沦的圣

殿》一出来。我们就四处打听，托人买了七、八本，互相传阅。见书上只谈到北京西单民主墙，只谈到从白洋淀到《今天》杂志的那条线索，却没有一个字涉及《野草》和外省。就觉得郁闷。因在《沉》书之前，公开出版过《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其编者杨键，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曾专门来成都采访过《野草》同仁，搜集去大量珍贵资料。我们太看重非官方的评价了。

老威：就西方对中国大陆思想和文学史的开掘研究，西单民主墙和《今天》早已成为主流；虽然法国的高行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魏京生和北岛至今还是“地下”不可替代的象征符号。所以《沉》书的作用，不过是捅破了现行强权体制的屏蔽，向国内读者展示了部分为西方所认同的历史真相。然而，揭开一种真相的同时，是否就屏蔽了其它真相？我不敢再问下去。我受限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环境，当时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求索达到了顶点⋯⋯

陈墨：通过供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批判的“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和白皮书，《今天》派诸君接触现代派文学比你我都早一二十年；“太阳纵队”的张郎郎说，他们一帮人在 50 年代就听摇滚乐了，而我和邓垦最多在啃古典诗词或新月派诗歌。所以，《野草》和《今天》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老威：在对文学艺术实行垄断及配给的社会，“起跑线”不仅仅是个创作概念，它意味着你所处的阶层，有无资格进入某种特殊的文化环境。

陈墨：你的意思是《野草》在起跑线上就输了？

老威：这是我的检讨，因为单以作品论，我更认同《今天》派。我的确忽略了作品表层之下的漫漫人生——血泪、蒙难与挣扎终会因为时过境迁而失去观赏价值。

陈墨：作为中国大陆最早的民刊之一，《野草》几乎要成化石了。或许在二三十年前，它站在过思想文化阵地的前沿，吸引过人

们的眼球；但二三十年后，它就落伍了。其实在《野草》内部，总有分歧，一二三期社会反响巨大，大伙就情绪高涨，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风声一紧，有人就要退出，甚至要抽回底稿。我曾被当局点名要抓捕，后来又因赵紫阳的一句话，阴转晴了。《野草》好几次由公开转入地下，比如 1979 年，魏京生入狱不久，《野草》就被迫更名《诗友》，以手抄的形式流传；至 27 期，终于被成都市委查明，《诗友》为《野草》变种，要清查，于是大伙作鸟兽散达十年之久；1988 年，自由化气氛浓烈，《诗友》又恢复；可不久，老《野草》孙路卷入学潮，风声鹤唳，《诗友》又停办；1990 年 10 月，《诗友》又复刊。至 1994 年为止，共搞了 81 期，并在九九、罗鹤的张罗下，编了本《野草诗选》。

之后，又歇了七八年。海外成立了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已去国外多年的老《野草》蔡楚为创始人之一，他在负责笔会网络的同时，搞了个《野草》网页，作了大量的宣传，《野草》作为存在多年的文学社，才首次引起海内外的关注。著名流亡作家贝岭、万之、北明、郑义、蔡咏梅、黄翔夫妇都曾通过蔡楚和《野草》取得联系，热情鼓励。《野草》最近一次复刊后，他们，还有国内的肖学慧、王怡、流沙河、冉云飞、杜导斌、廖亦武等良心作家都成了我们的作者。

贝岭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地下文学》一文中最早介绍《野草》：“在四川成都地区，60 年代文革时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地下文学团体野草诗社，其中的诗人有邓垦、蔡楚、杜九森、陈墨、冯里、乐加等，他们相识于文革地下书市，他们的作品也流传于当时的四川地区。”

其实我们中的许多人相识得更早，在 1964 年，诗社的雏形就有了。

老威：我记得蔡楚和蔡咏梅都写过《野草》。

陈墨：许多人的论述中都提到《野草》，蔡楚和蔡咏梅的文章

更有影响。特别是蔡咏梅，在民运中资格很老，她的大作在《开放》杂志上头条登出，《野草》的地位一下子就提升了许多。

老威：她是怎样定位的？

陈墨：她着眼于地下文学反抗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特质。老《野草》们传阅后，一方面很振奋，觉得这反应了我们骨头里的东西；一方面却觉得自己目前的思想境界跟不上这种评价。但是，进入历史是每个文人的梦想，为了回应，复刊势在必行了。

老威：有些功利色彩了？

陈墨：都到抱孙子的年纪了，才得到这么高度的肯定，无论如何要搏一搏！可具体到复刊，矛盾就来了。我发现原来的某些老朋友，由于长期应付生存压力：菜米油盐，下岗问题，儿女，甚至孙儿孙女的问题，原来的棱角都磨平了。不仅不读书不思考，连这方面的兴趣都缺乏。也有人提出，应该坚持《野草》原有的传统文学方向，外界的评论是一回事，我们不要迎合，以免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老威：你们都是几十年的朋友啊。

陈墨：从少年一直交往到老年，现在剩下一条生命的尾巴了，人却变得如此现实和平庸，那还不如压根儿就没有追求，就与社会同流合污。平庸到底，说不定到老也成富翁了。尾巴上再改变最没意思，失败了嘛，过去的罪都白遭了嘛。想想鲁连的下场，搏一搏太值得了。

要配得起外界的评价，《野草》不能有名无实。我当时就这么想的，要把《野草》办成有质量、有激情、有锐气的文学刊物，依靠老一批的原始资源已经不行。必须争取外稿，注入新鲜血液。

我不顾一些老朋友的反对，把《野草》的门越开越大，既然我们没有政治诉求，没有社会改革的诉求，那不妨把嗓门放大些。逐渐，给《野草》投稿的海内外作家多了，与本地的自由派人士联系

也密切起来，流沙河夫人吴梦华还参与了编辑，使《野草》的内容历史性地焕然一新。

老威：你没料到会出事儿？

陈墨：这仅仅是个话语权嘛，况且在20年前，鲁连就发表了《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然而到了94期，果真出事了。

老威：就是在网络上影响很大的“甲申300年成都大屠杀祭奠专号”？

陈墨：对，就是张献忠的农民政权屠城300年的祭奠专号。这个题目冉云飞最先提出来，他此前已写了文章，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流沙河也写了文章，对当今政权把杀人不眨眼的张屠夫立为农民起义英雄表达了愤慨。

老威：沙河老师曾经说过，六四屠城之后的十几年，他读得最多的是记载清军入侵的《扬州屠城记》。

陈墨：流沙河的学问和人格，对后辈的确有较深的影响。

老威：请把筹备专号的经过讲一下。

陈墨：大约在2004年6月初，我邀约《野草》的无慧、维才、雨樵，还有王怡、冉云飞、吴梦华等下馆子，在饭桌上，冉云飞谈兴颇高，并在言谈中随之建议，《野草》作为本土老资格民刊，做这种关系屠杀的历史翻案文章最合适。其他人也一致叫好，我就当场拍板，与在座的诸位约定，每人为“成都大屠杀祭奠专号”写稿一篇，限一个星期后的同一时间交稿。

稿子很快就齐了，流沙河、王怡、冉云飞、余杰、肖雪慧等等，清一色的川籍上乘作家的上乘之作，使《野草》抵达了几十年来最辉煌的至高点。其“借古讽今，影射当政”，令我等拍手称快，却让有关方面难以容忍。王怡的文章揭露了某地发现张氏大西政权万人坑的史事，指出内族入侵比类似清朝的外族入侵更残忍；余杰甚至把张献忠和毛泽东作了比较。据说冉云飞还借张献忠屠城引申到

了六四屠杀，不过，被责任编辑吴梦华删掉了。

打印稿出来后，我在喝茶的时候，亲手交给吴梦华，由她做最后一校。吴梦华很谨慎，所有文章中较为露骨的地方和攻击性的字眼她都作了删节或修改，有的还用红笔作了记号与批注。她熬了一个通宵，在 6 月 9 号上午还给我，并翻着校稿作了些说明。

我当即送印刷厂，那是我们的一个老关系户，一直没出过问题。

老威：你估计是怎么暴露的？通电话？还是人多嘴杂，走漏了风声？

陈墨：我至今都没弄清楚。一些老朋友说，《野草》有案底，种种情况公安局早就掌握了，并且暗中监视，看你几爷子要干啥。如果一直保持原有的以老《野草》为主的纯文学风格，就不动你；如果要继续纠集牛鬼蛇神，太冒靶，太出格，就随时一网打尽。所以在出事之后，从《野草》分裂出去的一些人兴师问罪，要罢免和开除我，因为正是我的一意孤行（当然还有蔡楚的遥相呼应）把《野草》引向了绝路。

我虽然万分沮丧，却不同意这种分析，我认为事出偶然。我想起一个细节，6 月 8 号上午，我去取校稿，见印刷厂里人心惶惶的。一打听，原来那天全城的公安机关正在搞拉网清剿，名目叫“扫黄打非”，其实是搜查地下天主教的宣传材料。

老威：这和《野草》有关系吗？

陈墨：看上去是两码事，但地下传教太厉害，当局的神经都绷紧了。那天他们出动了上万的警力，搜查每一处个体和集体打印复印铺子，搜查每一个有印刷设备的地方。据说情报还挺准，他们终于在城南的某个“窝点”缴获大批违禁品。

老威：《野草》算此次“扫黄打非”的意外收获？

陈墨：也怪我的疏忽。因为我找的老关系户搬家了，新厂址在火车南站派出所的隔壁。由于经常替派出所打印资料，民警们天天

窜上窜下的。当时我认为厂家和派出所的关系不错，印《野草》不会出纰漏，哪晓得，一查地下教会，只要带字的东西都不放过。

老威：类似的“误会”也在我身上演过。那是 1999 年 3 月，我去李白故里江油。当时我带了一沓《中国底层访谈录》的打印稿，托一位税务局的朋友帮忙复印。可没想到，当这位朋友在一家理发店门口将一纸袋复印稿交给我时，一伙便衣特务一拥而上，在大街上“人赃俱获”。我气坏了，顿时在警车上破口大骂。经过一个通宵的突击审讯，原来搞错了——当地国安局不知从哪儿得到情报：中国民主党有大批宣传资料在江油印，他们就把正好在这时出现的我当作嫌疑人了。我要他们澄清并精神赔偿，狗日的恼羞成怒，竟反诬我“非法采访”。

陈墨：我是神鬼不觉地撞进天罗地网，可能是派出所民警一瞟见打印稿上有“大屠杀”等敏感字眼，就绷紧了。还来不及汇报，就查封了印《野草》的现场。6 月 9 号傍晚 7 点多钟，我忙碌了一天，刚回家，武侯区公安分局的两个刑警就脚跟脚地进门了，我被控制住，只好一筹莫展得坐在沙发上。大概十几分钟后，大批人马才轰地涌进来，领头的掏出一张没有公安局长签字的《搜查令》，逼我签字，接着抄家开始……

老威：没局长签字，啥意思？

陈墨：显然他们兀地遭遇《野草》，需要马上采取行动，就顺便摸了张还没生效的《搜查令》来抄家了。

附录：勇敢是信念和智慧的果实（蔡楚）

对于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来说，无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生活是完全没有区别的。诚实而富有进取精神的意志会为自己开辟道路。

——歌德

我的床头，放着一本长四十一公分、宽二十九公分、厚三公分

的大书，这是一本由三期《野草》和八十一期《诗友》的复印件，自行装订成册的地下读物。我常常捧读这沉甸甸的、真实地记录着我们的心路历程的大书，诗友们那狂躁的心跳声（邓垦语），那满足于一吐为快的心理本能的冲动状（阿宁语），那具有蓬勃的生命力的野性文章（陈墨语），都一一响于耳畔，到了眼前。

一九六七年秋，邓垦写出了《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秋雁呼唤的长空，/夜半冷月下的流萤徘徊在荒冢？/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神往于一个桃色的梦？/白云深山里几声清淡的清淡的暮钟？/不，我相信人们将真实地评价你，/正如落叶最懂得秋天，寒梅不欺骗春风，/当他们提起，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血，是多么红;心，是多么沉重。/形象地表达了他对文革的控诉。

一九七六年，野鸣写出《探监》：母亲带着小儿子去探监，/走过一道又一道铁栅栏。/这监狱又深、又冷、又阴暗，/从一九七六一直连着焚书坑儒那一年……/妈妈，这儿关的是老虎吗？/不，这儿不关老虎，关的是人权。/妈妈，人权是什么呀？/就是手不愿在地下爬，背不愿变弯。/生动地揭示了中国奴役人的劳改制度的黑暗。

一九七六年，冯里写出了《自由》：你在哪儿？/一个监狱接着一个监狱！/一把锁链连着一把锁链！/你痛苦地记在历史的卷帖上。/你在甚么地方？/一张书页连着一张书页，/一种思想接着一种思想！/你悄悄藏在人们的记忆上。/深切地倾诉了他对自由的渴望。

此外，陈墨在一九六四年写出的《蚯蚓》，一九六八年写出的《零碎的爱》和《她要远去》，一九七六年写出了《天安门》，一九七九年写出的《野草》，邓垦在一九六四年写出的《归来啊，我的远方的恋人》，一九七三年写出的《当春风归来的时候》，一九七九年写出的《三峡》和《海螺》；蔡楚在一九六一年写出的《乞丐》，一九七五年写出的《透明的翅膀》，一九七六年写出的《等待》，一

九八零年写出的《我的慢伤》；白水在一九六九年写出的《雨夜怀友人》，一九七零年写出的《复砚冰信》和《迟开的荷花》；万一在一九七六年写出的《纤夫》；徐坯在一九七一年写出的《夜巡》和《梦》；阿宁写出的《坑和人》和《危机是什么？》明辉在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八四年写出的《溯洄集》和《文革杂咏》等。都是在这"后代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下"（陈墨语），诗友们曾有过的挣扎、反抗、梦想和追求的真实见证。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邓垦和陈墨便显露出他们的文学才华。一九六三年，邓垦就编有自己的《雪梦诗选》、《白雪恋》、《海誓》等诗集。一九六四年，陈墨也编有《残萤集》、《灯花集》、《落叶集》、《乌夜啼》等诗集。二人志趣相投，并合编了《二十四桥明月夜》小诗合集。蔡楚亦在 1964 年编有自己的《洄水集》、《徘徊集》等诗集。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里，邓垦周围不知不觉地集聚起一个独立追寻的文学群落，仅是当时居住在成都锦江河畔的就有二十余人（后来发展成为成都野草文学社）。邓垦说："以诗的形式说自己想说的话。"他又说："这土地，这人世，不平事太多。我们的最大不平，就是不惯于喉咙被锁着链子，我们的喉头在痛苦地发痒。因此，我们唱出了这集子。"一九七二年，在陈墨的鼓动下，邓垦把众诗友的习作选编出一本《空山诗选》（十四人，一百五十首）。尚未油印成册，友人某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锒铛入狱。邓垦夫人恐连累众诗友，遂将这手抄孤本付之一炬。一九七六年，诗友吴鸿又编了一本《空山诗选》，也因文字狱之故，被迫又将这手抄孤本烧掉。一九七八年二月，《野草》的画家荀乐加、陈卡琳（女）等人，在成都草堂小学举办了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成都最早的民间画展——《二月画展》。展出了油画《人》，水粉画《华表坍塌了》等数十幅作品。一九七九年三月，在陈墨的发起下，诗友们创办了成都地区第一份民刊《野草》，并公开走向社会。陈墨说："《野草》不仅固化了诗友间的相互影响，也使探索成为凝聚力；而想在新诗史上

独树一帜的派别理想，也得以初步尝试——那就是卑贱者不屈不挠的野性，我们当然以此而自豪，并认定这便是我们人生价值之所在。”《野草》虽只出了三期，并被当时的成都市委书记正式宣布为反动刊物而被迫停刊。但影响还是有的。为了延续《野草》的生命，七九年十一月十八日魏京生入狱刚半月，诗友们决定《野草》以手抄小报形式，并更名为《诗友》继续办下去。从公开转入地下，作为《野草》同仁间联络感情，互学互勉的纽带。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垦终于手抄编写完《诗友》创刊号，但至二十八期又被当局定性为黑刊。社长邓垦痛苦地说：“我们人生这点点追求与乐趣，又被当局给剥夺了。”一九八八年二月，大约气候适宜，邓垦、陈墨、蔡楚和孙路共定《诗友》复刊。孙路说：“说真话，抒真情，捍卫自己的人生基本自由，用笔记录真实的历史和人生，已经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无法改变的道路。”

“六四”事件发生，诗友孙路、潘家柱、滕龙入狱，《诗友》再停刊一年，九零年复刊至九三年底共出八十一期。一九九四年，诗友们集资出了本没有书号，不能公开发行的《野草诗选》（四十五人，三百六十九首），九九年又出诗文选集《野草之路》。这种自悦自乐，相互切磋的方式至今不辍。

《野草》这个独立追寻的文学群落，在漫长的岁月里不知不觉地形成。她之所以能生存到今天，一方面因为她的个性极不张扬，而另一方面则是她的诚实、正直、坚定和执着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她没有任何纲领和章程，却表现出极强的凝聚力。无论中国的政治气候怎样变幻，诗友们从未因个人的遭遇而出卖这个群落。他们都十分珍惜诗友间那种神交意会的依托感，比较淡泊地看轻文艺的功利性。诗友阿宁说：我们都不是搞艺术的人，自始自终懒得去争什么桂冠。但却是些认真生活，愿意说真话的人。除了良知我们的诗不受任何的指使，我们并不企图反映什么规律、趋势，只满足于一吐为快的心理本能的冲动，因此，我以为

“诗友”二字，当以友字为重。如果说开初的几位诗友邓垦、陈墨、徐坯、明辉等，故然因年纪相仿，住宅相邻，社会背景大同小异，自然容易走到一起。但到了后来，这个群落的地域越来越宽，年龄跨度越来越大，社会职业也五花八门，艺术流派亦五光十色，从成都到荥经，从翩翩少年到耄耋老人，从工人、农民、知青、社青到学生、中医、教师、文史研究者、企业管理人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虽然都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却有固定的信念——坚持抒发自由的心声，用笔见证社会和人生中的真象，进而上升到置疑、反思和批判。陈墨说：“我们所处的社会，不但有几千年的专制道德，还有比专制道德更吃人的共产主义道德（雷锋就是这种道德的楷模、标准），不但有否定个人一切自由的法律（所谓的“宪法”），还有比法律更严酷，几乎等于中世纪宗教的信仰束缚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领袖意志的紧箍咒。再加上我们这个社会发扬了人性中假、丑、恶的一面，被扭曲的人们之间的互斗，精神生活的极度空虚，物质生活罕见的贫乏，是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深刻的人间苦。我们不得不表现我们的苦闷（用文艺），也不得不表现我们的追求。”诗友们有的坐过牢，有的曾被土劳改，有的进过派出所，但这个阴阳互补的凝聚体（谢庄语），并未沉沦，他们在仅有的条件下互教互学，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开启自己的智能，以图保持一个真我。陈墨说：“我们的挣扎是真实的，我们的求索是真实的，我们的反污染的搏击也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在文字狱的阴影下坚持创作，既不为名为利，也不想赢得唾沫或掌声，这只是我们找回一个真我的形式。”

此外，作为一个人，要想保持自己的尊严和独立，就应当有对正义的选择。因为人人都放弃对正义的选择，那么，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就会受制于政治，或者说受到一个利益集团的驱使。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说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他把正义的第一原则表述为：“每个人对与其

它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兼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因此，我们应当具有对正义的选择的道德勇气。《野草》这个独立追寻的文学群落，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还值得谈谈的是《野草》的艺术追求，我们知道，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上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他还在一九六五年致陈毅的信中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这是继他指定文艺要无条件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后，又武断地否定了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新诗，封闭式地切断了新诗借助白话和世界资源以求得探索发展的道路。而《野草》断然拒绝遵命文学。她的主要成员深受新诗史上新月派和现代派的影响，诗作风格大多有本真唯美的倾向。这明显的是对新诗几十年来建立起的基础和主流的肯定和传存。我的体会是经过反右运动后，当时的中国诗坛上除了大量的民歌体的，诸如《红旗歌谣》之类的伟大的空话外，剩下的也只有贺敬之、郭小川几个寥寥可数的承颜顺旨派。而少数有勇气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他们的追求，他们除了有自己的枕头文学以外，还私下在民间传递，人被批得丑不可闻，作品被贬得一文不值的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戴望舒等人的作品。一九六一年，我在诗人尹一之先生处第一次见到徐志摩和戴望舒的诗作。我的感觉是中国怎么还有这么美的诗？继而产生了阅读新文化运动主将们作品的愿望。于此同时，邓垦、陈墨、白水、万一、冯里等诗友都不约而同地受到了中国新诗主流的影响，选择了拒绝遵命的程序。从这里可以看出，人对艺术美具有认同感。任何指令或打压封锁，都否定不了文艺作品艺术美的魅力。艺术美是超越时空界限的。

《野草》中的几个主要成员，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语言美。诗，不仅应有悟性和境界，还应强调诗的音乐性，不但要有韵，更重要的是有节奏感和旋律感。诗的语言美，不仅应表现在语言的结构上有所变化，还应强调语音语调的起伏变化，以结构和语音语调的起

伏变化来烘托诗的情绪的变化。少数几个诗友还对新诗的格律化做了一些探索，特别是陈墨的诗作和他不愿在中国文艺领域内凑热闹的一贯态度，表现了一个唯美艺术追求者的深刻的孤独。从他们的诗作中，能明显地读出中国古典诗词天风海雨般的气韵和含英咀华般的琢磨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借鉴西方诗，受英国浪漫派和法国象征派影响的痕迹。《野草》到了中后期，还突出地展示了艺术美的包容性。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在《野草》中光彩夺目，恰好验证了“天上的星星是没有一颗相同的”灿烂的艺术景观。

《野草》诸友都是没有名望的人。如今，他们中除了一两个人被接纳进官方的作协之中，其余诸友都依然在中国大陆默默地守护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虽然，他们在功利上一无所有，然而，他们早已在精神上提前迈进了文明的门槛，他们至今仍是足以自豪的自由民。古希腊伟人伯里克利说：“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自由是勇敢的果实！”从《野草》的历程中，我的领悟是：勇敢是信念和智慧的果实。

民刊《野草》主编陈墨（下）

采访缘起

现在是 2005 年午后 4 点钟，茶楼的服务小姐敲门而入，换去桌上的水瓶，我受惊一般从笔记本上抬起脸，却见刚刚闭嘴的陈墨正死盯着玻璃窗外的泥泞街道。乌青的天色象浸饱了墨汁，而散乱的车辆和行人是溅动的淡墨点。我皱着眉头说："这种阴天已持续了半个多月了吧？"

陈墨道："或许还要长，我在成都生活了 60 年，记忆中的大半都是阴天。有时早晨起来，感觉上已是傍晚了。"

"所以成都人酷爱搓麻将，一进入麻城，夜与昼的界限就糊涂了。"

"我对麻将没感觉，我一生的嗜好就是书。"

服务小姐幽灵般地闪出门去，我想起一位朋友曾私下告诉，陈墨长期患忧郁症，甚至有过自杀的情结。我叹口气，嘴唇翕张两下，却问不出口。而陈墨似乎懂了，悄声而决绝地说："无论有多难，我都要撑下去。"

"你怪蔡楚吗？"我问，"正是由于他在海外宣传《野草》，引起关注，你们才应运复刊，一步步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老朋友们指责我犯了路线错误，该开除出党。"陈墨居然笑了，"其实这种路线错误，我、蔡楚、邓垦、九九、鲁连、乐加等等，一出娘胎就犯了。我们都是黑五类子弟，父辈往往非关既杀；接着又迷上诗歌，错误就更大了。比如蔡楚，上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写地下诗，21 岁就因为诗歌《乞丐》被揪出来批斗，25 岁因屡教不改被关押了 100 多天，26 岁被缺席判刑，并逃亡在江湖上打临工，直到 1979 年文革结束后，成都中院才撤消原判，宣判无罪。

后来，他移居自由世界，继续写诗，宣扬《野草》，筹建独立笔会，都是早年路线错误的延续。”

“如果你重新活一次呢？”

“没想过。总之，搓麻将是一辈子，爱文学也是一辈子，哪种错误更严重呢？”

“不晓得。”

“不晓得？那就继续访谈吧。”

老威：这是创办《野草》以来，你遭遇的第一次抄家？

陈墨：中共统治这几十年，政治气候总是乍寒乍暖，所以根据以往积累的教训和经验，老《野草》们暖则聚，寒则散，几乎每个人都有为避风头而逃亡的经历。我在 1970 年下乡当知青时，曾遭遇清理阶级队伍，那阵林彪副统帅刚爆炸，全国人民还懵头懵脑的，就开始集体学文件，民兵三天两头还查夜。我是黑五类子弟，又从成都带了几大箱子中外名著下乡，因此“做贼心虚”，就抓紧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半夜，在房子中央挖了一个深达几尺的大坑，忍痛埋书。

老威：九九在他的纪实小说《魂断台北》里，曾描述了你坑书的情景。你当时光着膀子，锄头、碗、盆交替使用，书坑刨成了，自己还跳进去，捡起一本本“贼赃”，东翻西翻，一副舍不得的守财奴像。后来，你听出暗地有人监视，竟吓得一哆嗦，失声尖叫：“哪个？”

陈墨：他只得现身了。这真是书生骇书生，他不睡觉，想干啥？莫不是分赃来了？于是我装着填坑，他也装糊涂，支吾着走开了。

我跟着又把书挖出来，转移到更秘密的去处，再坑一次。并在周围绕着圈子侦察，确认无人窥视，才松了一口气。因为那年头，谁说得准？直到几十年后，好奇的九九还在问：“墨黑兄，你把宝

贝到底藏哪儿了？”我也说不清了，只好回答：“广阔天地，藏几本书岂不容易？”九九不满地笑道：“狗日的警惕性真高过头了。”

老威：那你这次没把文字罪证先埋了？

陈墨：我算开窍了，是祸躲不过，根本来不及挖坑！两个刑警一进屋，就问：“你是陈墨吗？”我答是；又问：“你是否在火车南站的某某地方印刷非法出版物《野草》？”我也答是。于是他们宣布：“从现在开始，这屋子里所有东西都不准动，否则你要负法律责任。”

我只好陪他们在客厅里干坐，心里想着电脑里存着许多犯禁文字，很着急。刑警中的一位只有 20 多岁，同我儿子一般大，他稳操胜卷地冷笑着，大约是专门搞电脑的——待大队人马开到，他才如临大敌地坐到电脑前，开始检查。他们抄了两三个小时的家，抱走了电脑，里面存有网上下载的 500 多篇文章。除了廖亦武、王怡、余杰、肖学慧、冉云飞等的个人文件夹，还有与蔡楚、万之、北明、贝岭等海外作家的通信；我个人历年的文稿；中文独立作家笔会的所有资料。

我精心保存的从创刊至眼下的全套《野草》及《诗友》都损失掉，其中包括剩下的《野草》成品，作者和读者的来稿、来信。当然，《野草诗选》《野草之路》《野草》成员的照片，我与蔡楚合著的《鸡鸣集》，雪梦、九九等人的文集，我个人的《何必集》，北明送的光盘，王怡接受台湾采访的 CD，统统在劫难逃。3.5 吋的软盘就有 17 张哪！

老威：一个文人的一生被一网打尽了。

陈墨：我感到从里到外被掏空了，心脏一抽一抽地疼。这辈子逃过藏过多少次！十几个警察搜查时，我就翻江倒海地呆立一旁，脑子里走马灯似地转，文革中的黑书市，我和邓垦等人经常去“非法淘书”，正在兴头上时，突然有人喊：“联防来了！”于是没命地

狂奔……

为了看一点书，做梦都在狂奔！做梦都在埋书！被人发觉了，还在梦中把身子扑上去，盖住书坑，任人踢任人踩也不让开。还有关闭《野草》联络处，还有自我悲壮地宣称“我已做好坐牢的准备”，当然还有鲁连之死……可没料到，大祸当真临头时，却没有一点征兆！

我一生的主要价值就是《野草》啊，但面对国家的合法抢劫，我只能干瞪眼。

老威：你还算幸运，自 1949 以来，没被抄过家的文人很少。我先后被抄过 10 来次，神经弄得比耗子过街还过敏；而你虚惊了那么多场，才撞上一回真的。

陈墨：警察们满载而归，我也随之被押到火车南站派出所。这时成都市公安一处的人才出面，一直审讯到凌晨 3 点多钟。

老威：请把审讯过程讲一讲。

陈墨：公安一处又叫政治保卫处，很有些整人的经验。他们先由两个人来与我摆闲龙门阵，并声明不记录，这两人东拉西扯，绕了一个多小时，才换上正式审讯人马。开始前，还向我念了一段印好的官样文章，如“与本案无关，可不予回答；但与本案有关的，必须回答”之类，接着就在笔录抬头写：“非法出版《野草》案。”我看了，表示不同意，就争辩道：“《野草》只是个内部刊物，文学交流，谈不上非不非法。”

双方争论了一阵，主审警官就说：“好好，那就《野草》案嘛。”

审讯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野草》文学社的组织形式是否具有非法组织性质？是否有较为严密的章程及入会手续？这太可笑，因为《野草》们的交往很松散，几十年一直停留在“以文会友”的层面，所以我实事求是地否定了。2.花大量时间纠缠历史过程，比如《野草》那年创刊，那年复刊，哪年改刊名，谁和谁怎么

认识的？杂志上的作者情况，主要和次要人物，笔名和真实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等等。我拒绝回答，我说牵扯到《野草》作者的情况，你们自己去调查，我是不能回答的。

老威：老《野草》们几乎是笔名，要警察自己查清，还比较麻烦。

陈墨：但也有极个别真名。他们正是这样顺藤摸瓜，先后传讯了殷明辉、无慧、维才、雨樵等人，有的还不止传讯了一次。

老威：也就这么回事吧，让当局摸清一帮秀才的情况又能咋样？如今毕竟不是毛时代。

陈墨：他们最后追问我的工作单位和经济来源，我说这与《野草》案子无关，我有权拒绝回答，由于我的口气显得急迫，激发了他们的种种想象，认为有欲盖弥彰之嫌。

老威：欲盖弥彰？

陈墨：在抄家过程中，他们搜出了三张《房产证》，房主分别是我爱人李明达，以及她厂里的出纳和会计，并且还有收房钱的字据。

老威：这的确与《野草》无关嘛。

陈墨：我当时本能地产生了戒心，因为从审讯中，我渐渐明白，要从《野草》中找出漏洞，定我的政治罪，可能没那么容易。社会还是在进步，至少在面子上，当局还是在强调“依法治国”。公安编不出非法和反动的证据，那检察院、法院也通不过。所以，公安机关面临新形势，不得不改变策略，政治上寻不出突破口，就从其它方面搞垮你，比如在网络上激起公愤的“刘水嫖娼案”。刘水是中文独立笔会成员，在网上发表了大量抨击社会丑恶的时政文章，被深圳公安视为眼中钉，却无可奈何，就蓄意制造了“嫖娼案”，将刘水劳教两年……

老威：大约在七、八年前，上海著名诗人陈××被公安机关“现

场捉奸”，关押了 8 个多月，从此脸面扫地，精神垮掉了。陈 XX 我见过，小个子，老实巴交，就因为他曾是海外反动杂志《倾向》的国内编辑，公安老是找他的麻烦，却碍于国际影响不便直接下手。于是迂回作战，雇了一个鸡，去和陈××交朋友，双方逐渐混熟了，陈 XX 就领她上自己家。不料这厢刚一入室，公安就破门捉奸，把陈××搞傻了。

陈墨：我过分戒备，因为如此下三滥的手法令人汗毛直竖。但是，我越拒绝回答，他们越认为抓住了把柄。终于在几个月后，他们对我爱人下手了……没想到嘛……

老威：从凌晨 3 点你被释放回家的情况看，他们没在你身上捞到什么。

陈墨：11 天之后的 6 月 20 号上午，我被传讯了第二次，在成都芳草街派出所，直到下午五六点钟才放出来。审讯单位还是一处，开头还较客气，后来态度就变了，很粗暴。因为他们已根据《野草》上的某一真实姓名寻到线索，并由此追踪，掌握了较详细的情报。紧接着的 21、22、23、24 号，雨樵、维才、无慧、邓垦又被传讯，重复审问了《野草》的组织性质及形式，经费来源，有无海外资助，一期印多少本，发行方式等等。

老威：这些我大致了解。当时人心惶惶的，大伙聚一起喝茶，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海外的万之、黄翔、郑义等作家还提名《野草》群体为笔会“自由写作奖”的候选者。我记得你像一个闷葫芦，总是坐在那儿不吭气；蔡楚让你写写事件始末，你也迟迟不动笔。

陈墨：我生性好静，不想做新闻人物，更不想因此而接受海外采访，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风雨雨就过去了。我根底上是个读书人嘛。

电脑和其它东西都要不回来，按《扣押清单》上的单位找武侯区刑警大队，推说一处管；找公安一处，门也不让进，太窝火了。

一直拖到2004年12月份，一切风平浪静，我仍旧懵懵懂懂地过日子。许多朋友问我《野草》还办不办？我总是回答：再拖一段时间。

我永远难忘2004年12月9号下午5点，我爱人李明达刚开门进屋，随即涌入十几个警察。其中有第一次抄家来过的，也有从未露过面的。《搜查令》宣读后，我还以为抓我，就主动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来人回答："七处，就是经济犯罪侦察处。"接着直奔我们的卧室。这次抄家与《野草》和书籍无关，主要目标是《房产证》、帐本、存款、各种字据。

第一次没收电脑后，我无奈之中又买了一台，才没用两天他们又要第二次没收！我急了，不禁心疼地叫唤起来："你们要检查，把主板取走就行了嘛！头次的电脑还没还！"他们回答："我们使用一天，后天叫你儿子来取。"于是达成书面协议。而待我们如期领回电脑，一开机，却发现是台报废的死机器。

直到李明达被带走许久，我仍觉得在梦游，刚才是我签的字，我还以为是针对，唉。我们父子俩如热锅蚂蚁，在家熬到半夜，方接到公安方面拘留李明达的通知。

她被关到成都市看守所，这是刚从城里宁夏街迁过去的新监狱，占地几百亩，能羁押几千人。李明达患有心脏病，人也刚强，我担心她一时想不开，出意外，就请了律师，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办"取保候审"。可直到前天，我才接到"不予取保候审"的通知，理由是"不利于侦破；有可能串供。"

老威：听说你爱人已正式逮捕半个月了？

陈墨：是。

老威：罪名呢？

陈墨：职务侵占罪。

老威：余杰和王怡讲，你找过一处处长？

陈墨：余杰回成都探亲，一处处长曾建就借机找他和王怡喝茶。王怡要求他们不要插手此事，曾建答应了，彼此的印象还不错。可我这个小人物找去时，曾建的脸色就变了，他明确答复："这桩经济案是我们在查《野草》之际发现的，我们当然要交办给七处。目前已到检察院了。"

老威：你莫太难过，墨兄。

陈墨：回天无力啊。

老威：请讲一讲这桩案子的始末。

陈墨：我和李明达都是老知青，1970 年在农村结婚，1975 年底从盐源县双河公社双双办病残回城，无资格参加正式工作，为了糊口，于 1976 年入街道生产组。由于在一群婆婆大爷中显得有文化，不久，我当了副组长，她任会计。几年后，形势变化，我退出来搞个体户，她却与生产组共同发展，当上了厂长。

这个厂由估绵组和纸绳组合并而成，其中有四分之一的残疾人，而且年龄偏大。所谓"估绵组"，就是把汽车修理厂擦过机器的废棉纱捡回来，用碱水煮了，再放河里淘洗干净，晒干了卖出去。这种变废为宝的脏活粗活，正常人都不愿干，而尚失其它生计能力的老头老太太们只能走这条路。

而"纸绳组"就是生产中药铺里捆扎药包的纸绳，以废纸作原料，搓了，用胶水固定。这种原始手工活利润太薄，于是李明达绞尽脑汁，率领大伙脱贫致富，她根据市场需要，组建了"成都市武侯区胜利弧型玻璃厂"，生产汽车挡风玻璃。还请来几个玻璃匠，手把手教大伙划玻璃，配窗户框，这活儿简单，又比较赚钱。以后厂里加大投资，开了三个门市部，研究出弧型玻璃，供不应求。

后来由于时代的发展，交通部对汽车玻璃的质量有统一的要求，李明达的厂被迫退出市场，停产了，门市部也承包给老职工了。幸好她有先见之明，在做厂长的次年，投资几万元买下红瓦寺共和村

的一亩地盘，搭建玻璃库房。转眼至 1988 年，这块位于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学院区之间的地盘增值，于是我介入，先找私人贷款 20 来万，搞成都望川校园文化站；后通过四川大学教授珠玛，与市电影家协会签共建合同，他们出资金，我们出地盘，将文化站扩建成娱乐场所。执照主管单位是市文联经济管理处，我是法人代表，利润按四六分成。

联合经营了四年，生意极火暴。稍后，玻璃厂的主管单位————致民路街道办事处与厂长李明达协商，撤消联合经营，把隶属关系转回办事处。

在 2001 年之前，学院周边的录像、台球、旱冰、电子游戏、卡拉 0k 都火爆，我们却是开这些连锁娱乐的先驱，连公用电话也是第一家，那时候，学生为了打长途，在门口排起拐弯的长龙。可 2001 年副总理李岚清视察四川大学，见学生们贪玩，就强令关闭东侧门。一道墙阻断了财源，加上修路，去校园非得绕道，我们的生意就猛地淡了。

亏本三年，文化站终于要拆迁了，2003 年出了告示。根据拆迁政策，那一带营业房的赔偿最低也应为每平方米 500 元，按 1000 米算，玻璃厂该得 550 万元。所以，这是一块令人眼红的肥肉。

老威：从原始的生产组起家，你爱人的创业史真不简单。

陈墨：玻璃厂停产，转型为文化站后，原来的老职工在家休息 16 年，照发工资，照买劳动和医疗保险；而李明达的工资才 227 元，多年没涨。

老威：停产这么多年，名义上还是集体经济吗？

陈墨：97 年改制（股份制）流产，留下了后遗症；以后把隶属关系转回办事处，也算重大失误，因为一旦脱离市文联，文化站就直接面临 8 个主管单位。象一群狼，围着这 550 万的拆迁赔偿打转，只要扳倒厂长李明达，剩下的老弱病残职工就好打发了。

而李明达生性倔，不拐弯，她叫人守住地盘，拆迁费不兑现就不搬。坚持了一年，由于拆迁问题在全国都闹得凶，中央就指令改制，让拆迁公司与政府职能部门分离，以免官商勾结，鱼肉老百姓。

一群狼正愁找不到吃羊的借口，况且这是只迄今不妥协的脾气大的羊。恰好出了《野草》案，借《野草》又牵出经济案，况且又是一处交办的有政治背景的经济案，谁也插不上手！

老威：如果你爱人这只头羊被吃掉，那剩下的老弱病残羊咋办呢？

陈墨：弱肉强食嘛。只要李明达的罪名成立，哪怕罪不大，法人资格也得取消，而这个名义上的集体企业就任人瓜分了。

老威：那么"职务侵占"能成立吗？

陈墨：这话题要追溯到 1997 年，玻璃厂拆迁。李明达为了维护职工利益，与开发商谈判，对方为了勾兑关系，在拆迁合同之外，奉送了三套面积 70 个平方米的住房，位置在玉林小区。当时每套价值 13 万元。

开发商把《产权证》办成了厂长李明达和会计、出纳的名下，因为其它职工有自己的住房，而厂长在任多年，却一直以厂为家，没有自己的房子。这就构成了"职务侵占"，因为这是以"玻璃厂拆迁"为前提的赠与，一旦拆迁办说，这房子是属集体的，我爱人就没希望了。

老威：你家有几套住房？

陈墨：就眼下构成"职务侵占"的这一套。97 年前，我们住了 10 年厂房，还是 1988 年发大水，街道办事处救济安排的。真是心急如焚，因为一旦判下来，我们父子就得搬出去，没有家了。

老威：你家平时没有积蓄？

陈墨：我们这代读书人，受够了传统束缚，生活观念很老。李明达当了 24 年厂长，这次检察机关查帐，却没任何问题，也没小

金库。冤啊，老威，说到底都是我爱文学、办《野草》的结果！我原准备即使喝粥举债，流落街头，也要把李明达保释出来，我曾托了好几个人，我甚至还筹备了几万元，可没人敢接钱，在这个贪官污吏招摇过市的盛世，我却勾兑无门。

李明达有心脏病，个性又强，在家我还得让着她。这次坐牢，真担心她想不开，出啥子事。我曾向公安部门要求，关我，判我，换回李明达，我毕竟是个筋骨较强的男人嘛。

老威：这一招太狠了，抓了老婆，把你逃跑的路也堵死了。不过，纵观古今文人，你毕竟不算最倒霉的。保重吧，墨兄。

附录：2004 年《野草》蒙难记略（陈墨）

2004 年 6 月 9 日，星期三。因每周星期三上午，我与流沙河夫妇等文友都要定点定时喝茶，故上午按约喝茶去了。又因今日乃我岳母冥祭“烧七”之最后烧纸日，故午后赴岳父家。直至傍晚约七时半时，始还我家。

返家后尚不足五分钟，两个警察就上门了。他们一进门，便向我宣布：“我们从印刷厂查获了《野草》第 93 期，现我们要对你进行调查了解，请你们全家配合我们的工作！现在你家中的电脑等东西都不能动！否则后果自负！”这二人就在我家客厅不请自坐了。我也失去了行动自由，叫我在客厅呆着，什么事也别作，哪儿也别去。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一群警察蜂拥而入，约十来个，为首者问明我的身份后，即向我宣读了“搜查令”，然后就开始分房搜查。把我妻叫去，搜查卧室；把我儿叫去搜查安在他室里的电脑（我儿已 24 岁，该电脑属他所有，我也附带用用：主要输入我的文章，下载网文，跟朋友联系。他们查看了我所有的文档与电子邮件。）；我的客厅兼我的书房，是这次搜查重点。在整个搜查过程中，无论

在卧室或在电脑里或在客厅某个书柜里一旦发现了他们认为的“罪证”，均要把我叫去当场指认，并用摄像机录像。搜查共进行了三个小时，然后将所搜查出的东西堆满客厅茶几，逐一登记。最后叫我在搜查令和搜查物件清单上签字按手印。并叫同来的我所居住公寓保安二人（一直在旁静观）作为他们“依法办案”的见证在清单上签字。然后就把我带到火车南站派出所。时已凌晨零点半左右。

当晚从我家中搜去的东西计 28 项，其中重要的有：1.《野草》创刊号~第三期油印本（1979 年所印，已是绝版本，甚为珍贵。）；2.《野草》85~92 期若干本；3.《野草》93 期（甲申 360 年成都大屠杀祭奠专号）打印一校稿；4.《野草》85~92 期诸友之手稿若干（无电脑的朋友来稿均系手稿）；5.我的手稿若干（其中有几篇成文尚未输入电脑）；6.《何必集》、《野草诗选》、《野草之路》几十本；7.《何必集》、《野草之路》软盘各一，《野草》85~92 期软盘 8 张，诸友稿盘及《杜远澍遗作选》等软盘 5 张；8.《野草诗选》出版茶话会录像带一盒；9.王怡接受电台采访 CD 一张，北明《64 配乐诗朗诵》CD 一张；10.电脑一台（中有我的文稿几十篇，我下载的文章资料约 400 多篇，我儿的学习资料、工作资料[考律及律师事务所]及有关个人隐私的资料文本就太多太多了）。

在该所“刑二室”，对我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询问”（非审问，据说尚未立案，我的身份还不属“犯罪嫌疑人”。当他们向我宣读“与本案无关之任何问题可以不予回答”的告之义务时，我反问：“既然未立案，怎可先抄家？此程序是否合法？不弄清‘本案’案标，我无法回答。”辨论结果，“本案”概念特指“地下刊物《野草》案”，而非关《野草》之事，我可以拒绝回答了。比如问及我的经济来源时，我明知他们有“异议分子刑事化”的手段企图，也就据此而不予回答了。询问分三个方面：1.办《野草》的全部经过及参与的主要人员及这些人的详细情况；2.《野草》93 期策划经过及参与的主要人员及这些人的详细情况；3.有关“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的情况，及成都地区会员的个人详细情况。对以上三方面，我皆如实回答。因为他们所搜去的资料中（《野草之路》及电脑），已非常详细；但均系笔名，查无可查。故凡问及他人之实名实情者，我概不作答。并声称："我是主编，理当承担一切责任，跟其它人无关。追查我，你们还有理由，因为我搞的这份地下刊物毕竟有违你们的《出版印刷管制条例》；而追查投稿者，则意味着欲"以言制罪"。你们有兴趣、有本事自个儿查去，休想从我口中突破！须知这是做人的底线。你们充其量判我三年。三年后出来，我还可以毫不羞愧地见朋友。朋友若是我出卖的，我两头都输了，四十多年的社会经验，会让我干如此傻事？"就这样软磨硬抗，直到凌晨 3 点 40 分，他们见再榨不出其它油水，出乎我意料地把我放了。当然留有后手："最近请勿出门，我们随时都要找你！"

十一天过后，6 月 21 日 8 点 30 分，警察打电话给我，叫我到我户口之管辖的芳草街派出所去接受询问。上午，所问同上次一样，我的回答也依旧。中午让我回家吃饭。下午，警方态度大变，所提问题皆为其无从掌握者，即从所搜去的材料和我的供词中从未言及者。比如近期茶会碰头之地址、参与人员及所言内容等，还有跟维才的男友有关的事情等。因此，我估计警方已突破了某友之口，而此人最大可能是参与近期茶会的殷某。经过这十一天的精神准备，我之回答均按"大包大揽"之既定方略，凡问及他人，一律不予回答。对之弯来绕去不厌其烦的提问，我一再强调："你们认为《野草》犯了法，一切责任由我主编承担；若认为某篇文章有问题，文责自负，请你们去问他本人。若欲以'组织罪'想一网打尽，那是徒劳；因为我们事实上是个非常松散的文学爱好者团伙，绝对没有任何组织形式，既无纲领，也无会规，既来去自由，又无权指挥别人和承担听别人指挥的义务。再说，四十年的斗争经验也绝不容许我们搞组织形式，绝不容许有任何把柄留给你们。何况我们现正面临严重的意见分歧——绝大多数朋友都很低调，都趋于'闲适平庸

化’，唯我坚持政治批判，不敛锋芒。这足以证明我等绝无组织，实乃散沙一盘，而且是对贵党绝无伤害力的散沙一盘。”警方见无缝可钻，遂温言相劝，言谈之间，意在凸显其“人性化办案”也。其言论大体如下：

1.时代在进步，人权在改善，政府也在作角色改变，我们也由专政机构变成了服务机构，国家正向好的方便发展；

2.你也老了，家庭幸福，生活也不错，要珍惜，何苦为了出名跟政府对着干？发点牢骚，骂骂共产党，于事无补嘛，你也清楚，我们安心要抓你会找不到点理由？

3.因此，《野草》不能再办！当然，私下里互相交换点看法，文章互相传观，我们是管不到的，但一旦有了刊物的形式，我们肯定要管！若文章在海外有了政治影响，我们不找你的麻烦，上头就要找我们的麻烦。这一点还请你多多理解！然后就把我放了。而且并未“约法三章”、“听候处理”或“下次再来”一类。

但我知道，事情远未了结。

果然，接连几天，消息传来，草友无慧、唯才及雨樵均被“询问”了，邓垦家也来了数次，只是他目前未在成都，暂时末跟警方谋面。但被追查则无疑也。一时当然弄得人心惶惶、满城风雨。因此，各种言论都有，攻击我的言论自然不少，落井下石的行为也有；而那些帮我准备上法庭一搏，又找律师，又找“非法出版物”证据，教我“司法程序”及应对语言要领的朋友也不少。我基本做好了事态发展的准备，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静观其变吧。

第二次被询问后，我知道本案已由市公安局一处接管。或者自始至终，都是一处，派出所及武侯分局出面，仅权宜也。

在两次询问中，我均对他们的搜查行为是否合法表示存疑（因其出示之搜查令无局长之签名），而违宪则是肯定的。

在两次询问中，我均不承认欲加之“非法出版”与“非法结社”

之罪名，并一再表示我之所作所为，并未越出宪法赋予公民之权力所限。我未犯法，更未犯罪。

本案未了。现在四个多月过去了，虽然再无草友被问询、抄家甚至拘留，但警方还在找邓垦。我被抄走的东西一件也未归还。

（因此，蔡楚在海外发文抗议，事前未经商量，此行为与我无关，与本案无关，纯属他个人对此事件之表态。故其后果如何，也在我的希望之外。惟听天由命耳。）

2004-10-19

台胞唐存理

采访缘起

2005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二，我在成都西门的金沙遗址旁访问了从台湾回来不久的唐存理先生。

唐先生高个子，黑风衣，目光阴郁，笑容苦涩，与冷雨连绵的盆地天气挺般配。我们在约定的茶房单间落坐，唐先生取下围巾和大衣，搓着双手说："总算暖和一点了。"

我点头应和的瞬间，却蓦然从这下意识的搓手动作中，看见了若干劳改犯的影子。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从梦里一次一次回到监狱，里面有一位长相同唐先生酷似的国民党特务，他在大陆潜伏了 20 多年，刚一露头，恢复与台湾的组织联系，就被破获了。

经国安部门审讯，此特务的接头暗号为——把沙漠改造成绿洲——于是他在狱中的绰号也叫"绿洲"。我栽进去时，"绿洲"已被劳动改造了十几年，差不多成沙漠了。

我刚要提起这个话头，以活跃一下气氛，却见心直口快的唐先生道："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家庭背景吧。"

我在打开录音机的同时，动笔记录。

唐先生原籍江苏盐城，却于 1940 年 10 月 5 日出生于抗战陪都重庆。其父唐××，1932 年毕业于由蒋介石任校长的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朱家骅、罗家伦、陈果夫等人的学生，因此同中统 cc 派关系密切，也曾参加军统前身"复兴社"。唐父毕业后，即派往黔东南，任过岑巩、黄平的县长，接着升任贵州省烟酒专卖局局长。自此平步青云，担任过庐山军官训练团教官、别动总队中队长、陪都烟酒专卖局局长、湖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直至中央合作金库主任。在国民党政府败退之际，负责将一

部分黄金美钞运往台湾。

唐先生的母亲为四川简阳人氏，毕业于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曾受教于钱玄同，并与刘和珍、许广平同学。曾辗转于山东济南、青岛、烟台及广西梧州等地，教书为生。1948年冬，为躲避战祸，离开丈夫，携儿带女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却不料国军兵败如山倒，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很快陷入动荡之中。唐母惶惶不可终日，就以数封电报催促已准备弃家出境的唐父来川。

其时，唐父身在广州，伸腿即可抵香港，然而亲情难舍，他不顾朋友和同僚们的警告，在大溃败中逆流而上，企图接引老婆和孩子一道逃离。可事与愿违，四川眨眼之间就“解放”了。唐父于1950年初被捕，在次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惨遭枪杀。

话至此，唐先生悲叹道：“生死关头，父母都铸成了大错！”

我疑惑道：“国共交兵，按你父亲的官阶，应该作为战犯的。”

唐先生道：“在战场之外，有多少俘虏被屠杀，至今也没个确切的数字。母亲为此悔恨终生，她认为父亲没有杀人放火，只要缴械，总会放一条生路。哪料到不仅搞得家破人亡，还要殃及后人。”

我心想：“放一条生路又能怎样呢？‘绿洲’潜伏了几十年，仍然被改造成沙漠了。”

唐先生接着发出感慨：“人生跌跌撞撞到如今，虽然还没至‘名利于我如浮云’的境界，但也犯不起错误了。”

“此话怎讲？”

“人在二、三十岁时犯错，哪怕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到了五、六十岁，差不多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时代的更迭，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可已经60多岁的人，如我，就犯不起错，哪怕不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因为没有改正的机会，人们将会为一个小污点而记你一辈子。”

“这么严重吗？”

“你现在才 40 多岁，勉强来得及浪子回头，当然体味不了浪子回不了头的悲观。”

“那就书归正传，”我沮丧道，“人生若梦啊，明早醒来我也 60 多岁了。”

唐存理：父亲被镇压后，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作为“新知识女性”的母亲只能忍辱负重，靠江苏老家亲戚们的微薄资助，艰难度日，拉扯儿女。1951 年，我刚 11 岁，就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历史悠久的名牌学校——石室中学。

老威：黑五类的子女也能进名牌学校？

唐存理：政权交替，为安定人心，共产党提出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口号，不少旧社会过来的公职人员还参与政府的工作呢。我那时小小年纪，就知道要有出路，只能发奋读书，学好本事，为社会作贡献。我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并且还在课外自修高等数学、流体力学等大学课程，我在这方面有些天赋，我的理想是做个工程师。

1957 年夏天，由于毛泽东“引蛇出洞”阳谋的成功施展，大规模的反右开始了。我父母的亲戚，绝大多数成了右派。在如此“黑云压城城欲催”的政治环境下，我高中毕业，并且参加高考，结果尽在意料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高材生全部落榜！——多年以后，我才从一位前中共教育官员口中得之毛泽东在当时的内部指示：“培养他们（指关、管、杀）的子弟，无异于栽林养虎。”

由于落榜的打击，我们那一批因家庭出身而被扫地出门的高材生经常聚在一块，边喝茶边发表对现实不满的言论。由于怀才不遇，心理失衡，有些走极端的同学甚至主张偷越国境。有个叫叶××的，还来动员我一起逃。因为我胆子小，对母亲、妹妹也比较依恋，就拒绝了。后来以叶××为首，酿成一起企图投敌叛国的集团案，我

无端受到连累，几乎死无葬身之地。

老威：我想起《四川文学》曾有个编辑，叫××，57 年做青年学生时被弄成右派，一时冲动，就跑到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个偏僻的小渔村，××选个水草密的地方，四顾无人就下了水，不料才游出 20 多米，就叫兜头一排子弹给打了回来。后来，××获投敌叛国罪，坐了 20 多年牢，平反出狱时已 50 多岁了。

唐存理：可叶××没等到平反释放，就死在狱中了。这起案子判了二十几个人，许多人我都不认识。

老威：你在社会上流落了几年？

唐存理：高考落榜到 1959 年底。由于家境贫寒，我一直打临工，其间也在小学和民办中学代过课。被捕之前我正在成都市交通局平车处，地点是南郊红牌楼。我们当时修土铁路，干得热火朝天。

老威：什么是"土铁路"？

唐存理：这也是 1958 年大跃进中诞生的奇异风景——中间是一条简易铁路，铁轨上趴着三、四节货厢，你猜用什么作动力？

老威：火车头嘛。

唐存理：汽车头。骑在铁轨两边，吭哧吭哧拖货厢，远看像机械马拉车。可铺铁路要耗费大量人力，我们干了几个月，辗转了好几个工地，直到 1959 年 12 月 29 号。

那天上午还在卖苦力，下午我就被暗中看管住了。接着在工地食堂召开几十人大会，领导和积极分子先后发言，把斗争气氛搞热了，才大吼一声："把反革命分子唐存理抓起来！"

我的胳膊被擒住了。此时一辆小轿车驶进工地，那年月，这非常扎眼。从车内钻出一高一矮两位便衣公安人员，他们目不斜视地走进会场，从积极分子手里接过我，转身押入轿车后座。

群众都涌出会场来看戏，轿车发动了。接着绕出工地，经过大

街，驶入成都市中级法院的大门，就停在院坝里。而我下了车，被继续朝前带，直到拐了几个弯，才在挂着“成都市劳动教养办公室”的平房前遵命刹步。

从下午 4 点折腾到傍晚，我已心力交瘁。劳教中转站有许多野兽笼子一般的监房，我被丢进其中一间，面积约 10 来平方米，却羁押了 20 多人，满的像开了锅的汤。起夜蹑手蹑脚靠近旮旯里的尿桶，倍觉艰辛，待尿完折回，却寻不见原来的铺位了，只好支着半边屁股作思索状。

我在这儿关了 6 天，熬得双眼通红，却辗转难眠。我以为自己会同许多人一样，判劳教，去边远苦寒之地，再也回不到成都母亲身边了——窒息般的绝望一阵阵袭上心头。

1960 年 1 月 5 号晚上，我被唤出监房，押解至劳教监所外面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靠里的条桌后，并排坐了两个人，我猜大概是审判员和书记员，而旁边小桌后，坐的就是陪审员了。审讯过场走了约 10 分钟，无非是对照已打印好的《判决书》，——核对姓名、年龄、住址、个人和家庭成分，验明正身。

我双手颤抖地接过《判决书》，见上面的日期为“1959 年 12 月 30 日”。

老威：劳教是公安机关说了算，还需“判决”吗？

唐存理：劳教是不需要法院判决，只要一纸《劳动教养通知书》就搞定了。但我判得是管制。

老威：群众管制也要法院判决？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唐存理：不是象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那样，放在当地管制，而是管制劳教——比劳教的性质更严重。

老威：我还是不明白。

唐存理：劳教在名目上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走法律过场，因此派出所的民警瞧你不顺眼，都有权送你去劳教；而管制劳教是

“敌我矛盾”，有正式起诉和判决，可管制的地点在劳教农场。

老威：算不算正式的劳改犯？

唐存理：程度上稍轻吧？不知道。总之在当时，判管制劳教的不少。也不上正式的法庭，连《起诉书》和《判决书》都是一块儿给我的，辩护就更别提了。在我的印象中，律师这种新鲜事物，也是在改革开发之后才有的。

《判决书》的原文是这样的——

唐存理，男，现年 19 岁，本人出身学生，家庭成分伪官僚。对我党有阶级仇恨。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民主，攻击反右斗争是压制民主。与叶××、周××等纠集成反革命集团，企图从广州偷越到香港（或西藏偷越到印度）等等……判处管制 3 年，送劳动教养。

落款为“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而公诉单位为成都市公安局，局长林佐夫。

老威：你的罪状太不过硬了。

唐存理：也就喝茶的时候发过几句牢骚，或者别人发牢骚时我附和了两句。至于偷渡，纯属无稽之谈。可就因为这个，我劳改了将近 20 年！

老威：你没想到会去这么久？

唐存理：我太年轻了，还随身带着数学教程，想在里面自学成材呢。

老威：1960 年初，全国正发生着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你是怎麼熬过来的？

唐存理：记忆已经很模糊了。

老威：怎么可能呢？当时我才两岁，饿出了水肿病，差点死了。直到如今，做梦都怕挨饿。

唐存理：我不是张紫葛那样的作家，把人吃人的细节对你描述得身临其境。我只是个记忆很糟的普通人，脑子里有就有，没有也编不出来。我先被送到雅安里面的天全硫磺矿。那是大山区，一年四季阴霾密布，气温很低。劳改犯从海拔极高的地方背矿石下来冶炼，毒烟弥漫，经常出事——我曾亲眼见一场大火烧死几十个人。幸而我体质太差，就分在蔬菜队，不久就饿出了水肿病，住进了医院。

老威：当时的粮食定量是多少？

唐存理：27 斤。

老威：干部的定量也是 27 斤？

唐存理：这是小秤，也就是 16 两为 1 斤，金裹银，红苕为主。

老威：金裹银？

唐存理：也就是玉米粒煮饭，金灿灿的一锅。粮食不够吃，有经验的犯人就凭生存嗅觉，四处偷东西，田里、地里，甚至入土三尺，只要能进嘴，都去掏。我算个读书人，无贼心贼胆，只能靠定量干撑着。当然也学着去扯些野菜，迫不及待地填肚子，结果上吐下泻。在医院住了一年，差点就死了。我一米八几的个子，瘦得只有 79 斤，形同枯骨。连呼吸都累，一张皮扯得跟拉风箱一般，滋滋滋的。

老威：你周围有饿死的人吗？

唐存理：我饿得神志不清，不晓得四周进出了多少人。可医院的后面山脚就是野坟地，有时一车拉走几具尸，咚咚往事先挖好的坑里扔，那声音隔墙传进病房，朦胧中就听人议论："扔大炮了！"一会儿，又有人用手电射我的瞳孔，检查是否活着。我怕自己被"扔大炮"，神经下意识地绷紧了。

老威：我早年当卡车司机，经常从那一带翻二朗山进康巴藏区，不知你说的硫磺矿在哪个位置？

唐存理：地名叫脚基坪，有 1 万多犯人，主要是背矿和炼矿。记得吴弘达写过"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书里也有一张劳改营的分布图，但这远不是全貌。中国到底有多少监狱和劳改农场？恐怕连司法局的官员也弄不清楚。区、县、市、地区、省、中央，我估计方圆几百里就有一座监狱，这还不算私设公堂。

老威：你能从大饥荒年代的劳改犯里活出来，真够幸运。

唐存理：但我奄奄一息，许多场景、许多记忆已经被抹去。一人独处时，某个褪色的画面，某个亡友的名字会突然闪一下，搞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可真要追溯，就是抓破头皮也想不起来。就像火山灰烬，还热得烫手，却已看不见、说不出毁灭性的具体细节。

总之，脚基坪毁于山洪暴发与硫磺矿的火灾，死了太多的人，连警察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才不得不转监。62 年往大凉山普格县的荞窝农场迁，一长串的密封囚车由公安部门押送着，经过雅安、荥经、汉源，再沿大渡河向上。

老威：你不能象张紫葛那样讲得再详细一点吗？

唐存理：我真的不是作家，记性太糟。我乘的病号车，挤在身边的都是一具具骷髅，偶而抡一抡胳臂，才发觉是人，不过瘦得不行了。一张皮，几根筋，一把骨头——不单病号，所有从脚基坪幸存下来的犯人都这样。颠簸了 10 天左右，路上能偶尔望见衣衫褴褛的老百姓，那真是个十室九空的年代呵。荥经县委书记姚青你知道吗？他可是全国响当当的人物，因为在他的治下，荥经县的饿殍高居全国之冠，最后连抬尸体也找不到人，就连死人带房屋晾着，恶臭四溢，直到某一天房顶朽了，轰地塌下来。这个鬼见愁的姚青书记被中共当作替罪羊，判了 18 年徒刑。

老威：你见过这位姚书记吗？

唐存理：在荞窝农场，我曾与国共两党的一些将军、官员关在一个队，其中就有这个姚青。当我问起饿死人的事，他还不好意思。

据说他后来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还平了反。

老威：申诉理由呢？

唐存理：他觉得是上面的政策错误，自己只是个执行者，不该负主要责任。现在这段历史成了中共的糊涂帐，而芝麻官姚青或许早死了。1963 年 1 月，我在荞窝农业中队解除管制，继续延长劳教……

老威：你的 3 年管制刑期已满，为啥还要延长劳教？

唐存理：连一纸通知都没有，就口头宣布一句"屡次不服管教"，就继续了。直到 1965 年，我才拿到《解除劳教通知书》，此时，我已从荞窝转到布拖县的乌依铅矿就业。

老威：你愿意"就业"吗？

唐存理：从大城市流放到穷山恶水的苦役犯，谁愿意留下来就业？待遇和犯人一样，只是多了 16 元的工资。但那时的钱还是值钱，我也就得过且过地混下去。

可不久，就业人员中的"四清运动"又开展了，由于"反动本性不改"，我又被揪了出来。罪状主要是：1，攻击三面红旗是胡说八道；2，为彭德怀鸣屈叫冤（我认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完全是罗织罪名，陷害彭德怀）；3，散布江青同志的谣言（我曾对人讲江青是 30 年代的影星蓝萍）。当时文革即将开始，许多人认为我至少要判 20 年，但关押到 1967 年 3 月份，风头弱了些，就正式宣判为 8 年刑期。

老威：经过 1967 年的"二月逆流"，公、检、法已经瘫痪了吧？

唐存理：我是 1966 年 10 月逮捕的，抓进集训队关小间，一个监舍十几个人，除了放风，大小便都在里面。每天打盘腿，腰板挺直，除了读报纸，就是写反省材料。经过四、五次提审，5 个多月后，我从农场的狱政科长手里接过了《起诉书》，还没回过神，又给了《判决书》。上面除了刚才提过的罪状，又戴了"学生出身，

家庭成分伪官僚，与我党有杀父之仇”的帽子，后面还添上“散布一系列反党言论，配合‘三家村’对我党的进攻，企图变天复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结尾。

《判决书》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普格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判时还比较优待，没绑绳子，就把我从小间唤到预审室，直接递来两页纸。连念的过场都省了。

此时，乌依和荞窝两个农场合并，我又回到荞窝，回到农业中队种田和教书。我在里面文化算最高的，为许多农民扫过盲。大凉山有许多彝族，51 年叛乱，组织反共救国军，因此入狱，劳改了许多年。我甚至教过协助杀害丁佑君烈士的凶手，目不识丁的文盲，主犯毙了，他是从犯，判了无期徒刑，后来在里面居然做了卫生员。

1974 年，在继管制、劳教之后，我第三次刑满就业，分到副业队。原以为永远回不到母亲身边了，因为思想犯们对中共劳改政策心知肚明，就是要让你一辈子刑满而不释放，自生自灭。后来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才知道这套“就地处置”的方式是从斯大林那儿学来的。

如果不发生六四大屠杀，我会同绝大多数受尽折磨的读书人一样，永远对邓小平感恩戴德。正因为他力挽狂澜否定了文革，否定了阶级斗争，我才于 1979 年，38 岁时获得平反，回家尽孝。母亲是 1987 年去世的，享年 84 岁，其时我已经商多年，丰衣足食，我想母亲当含笑九泉了。我后来意外的发展也是她在苦难中修持的结果。

老威：据说你平反后还辉煌过一段？

唐存理：我同时平了两个反，第一个是 1966 年在荞窝农场，因反革命言论罪被判 8 年；第二个是成都市西城区法院判的管制 3 年，送劳动教养……

老威：按理，你管制后延长劳教两年，还该平第三个反。

唐存理：这个政权欠的烂帐太多，如果每一笔都要还清，早就破产了。所以我当时觉得不错了。荞窝农场还补发了 8 年的就业工资，3000 多元。

母子团聚那年，我都 38 岁了，一无所有。于是经一位同监难友介绍，到成都郊区一家建筑公司做泥瓦匠，由于早年打下的数理和制图功底，不久就当上了技术员。我不敢懈怠，废寝忘食地扎在工地上，指挥修建过好几栋大楼，终于从经济上打了翻身仗。

我前妻比我小 17 岁，同为石室中学相隔 20 年的校友，我在西郊 132 厂的建筑工地当技术员时，她是会计。1980 年，她去石棉县一个劳改农场探望自己的右派反革命老师茅世禄，恰好我的同学吴康立与茅一个队。经过交谈，原来茅老师竟是我们共同的物理老师！错综复杂的师生、师友情令人意外的惊喜，更令人惊喜的是，吴康立托她带信给我，并且说："唐存理是个好人，你帮他介绍个对象吧。"

我前妻介绍的对象就是她自己，她骑着自行车，好不容易在一条深巷子里找到蜗居的我，竟一见钟情。稍后谈婚论嫁，所谓的婚礼简单得无任何女方的亲属及朋友参加，个中缘由，我想一是因为年龄的悬殊，一是因为人们对已平了反的思想犯还是心存歧视，不愿与我公开地沾边。

老威：近不惑之年才成家，不容易啊，老唐。

唐存理：所以我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较深的危机。1984 年，我有了一个女儿，于是从建筑工地撤出，自己凭 2000 元钱创业，开了一家五金机电商店。由于我的技术能力强和她善于经营，夫妻俩珠联璧合。头一个月，还清借款；一两年后，就发展成有两层办公楼的著名五金交电公司。我被媒体和官方誉为"锦城商界的一杰"。

老威：在拜访你之前，我查阅了一些上世纪 80 年代的商业资料，在政府认可并大力表彰的企业家中，你的位置显著。你在无背

景、无靠山、无人际关系的现状下，全靠夫妻俩打拼，最终竟拥有几十员工，上千万的流动资产。80 年代的上千万相当于目前的几个亿吧？

唐存理：我称得上是共产党统治下，第一批靠原始积累白手起家的资本家，当时的赚钱环境比现在健康，凭能力，没一点水分也能做大。另外，我父亲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有经商的才能，如果他当时从广州只身出逃，如今说不定早就身家数亿了，因为他已被国民政府确定为台湾最大的官营企业——台湾糖业公司的董事长。

老威：这也算一种商业的遗传吗？

唐存理：外表分析是遗传，骨子里却是宿命，因为我毕竟与现政权有杀父之仇。而意识形态的环境令我在经商之余，酷爱读书，关注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我对刘宾雁、苏晓康的报告文学爱不释手，并且还热衷于公益事业……

老威：我知道有不少政府官员到你的公司视察过。

唐存理：我经营五金、机电、建材等数百种名牌商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真有“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的感慨。但 1989 年的学潮因胡耀邦的逝世汹涌而来，我犯了商人的大忌，卷进去了。

老威：你与北京四通公司的总裁万润南一样，有政治诉求？

唐存理：空有一腔爱国热情而已。那个单纯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天安门的枪声把民众对共产党的改良幻想全击碎了。

老威：六四之前，我就一个文学野心膨胀的诗人，不懂任何政治。

唐存理：天府广场人山人海，有我这种人生背景的成功人士，当然与学生和市民站在一边。我给绝食学生捐献了很多钱，还数次与公司员工一道，驾着所辖的大货车送食品和饮料，还公开发表演讲，为学潮鼓劲。我甚至以公司的名义，在广场上扯起巨形横幅：“打倒李鹏，解除戒严！”

老威：商人和政客一样，有时是需要审时度势，见风使舵的，你可太不明智了。

唐存理：也有不少朋友劝我在商言商，没必要卷入政治，但 80 年代的整个社会环境，使人还能保持那么一股正气和热血。六四一开枪，一切都急转而下，原来共产党的土匪无赖本质永远不可能改变！改良的气数已尽，我在公安部门的一位朋友私底下警告："当局要抓捕的黑名单上有你。"于是我只好携妻带女，立即出逃。

老威：你已留好退路了吗？

唐存理：我坐牢 19 年，再也不能栽进去了！况且我已有家室之累。

老威：你从广州偷渡出去的？这也算完成了你父亲未竟的遗愿。

唐存理：在六四之前，我就拿到了《往来港澳通行证》，准备去香港探亲；后来铤而走险，侥幸从香港出了关。

老威：你在香港有亲戚？

唐存理：我在台北有个堂兄，比我大 20 多岁，其早年跟随父亲，情同父子，所以堂兄一直在寻找我这个弟弟的下落。他在台湾的政界有许多关系。

老威：你算是投亲靠友？

唐存理：一言难尽。在风声鹤唳中逃到香港，我立即通过"支联会"向台湾和西德政府提出"政治避难"，我在学潮中拍了大量激动人心的照片，同时也有各方面的资料，包括台湾情报部门自己获得的"情报"，足以被认定为"对大陆民运有贡献的人士。

老威：还比较顺利。

唐存理：当时《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签署了 5 年，中共的势力日益渗透，而港英当局出于自保，也不敢过分得罪北京，所以逃亡到港的异议人士处境维艰，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可能。

老威：可从香港出去的民运精英还是不少，90 年我因《屠杀》《安魂》案准备出逃，朋友们找的渠道仍是从深圳蛇口潜至九龙。

唐存理：具备国际影响的头面人物遇到的麻烦自然少些，可我们的在港签证只有 17 天，超过 17 天，即为非法居留，一旦查获，就立即遣返。所以，虽制度不同，但香港远不是自由世界。我们一直躲藏在沙田附近一位朋友家，足不出户 3 个多月。

老威：自己关自己的禁闭。

唐存理：在"政治庇护"批准之前，不能出一点纰漏，许多人就是在这段时间被警察逮住遣返的，不问任何理由。可尽管如此非人道，移民潮还是一波比一波猛。1989 年 11 月 8 日，我女儿满 5 岁，11 月 9 日，我终身难忘，因为这天我女儿被警察抓走了！当时她正与香港朋友的同龄孩子们一块玩耍得高兴，一伙港警突然闯入，查问唐存理夫妇的下落，可能是他们接到有关线报了。刚好我们不在，他们就挨个盘问孩子，我的女儿被迫开口，语音不是粤语；他们又问出她是唐存理的女儿，就把她带走，羁押在一个关小人蛇的地方。

这一事件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香港时报》及时登载了该报记者蔡××的文章：《警方闯入民宅，带走五岁女童》，我们焦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出面，紧急联络台湾救总，即"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香港办事处……

老威：灾胞？

唐存理：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政府都认为对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灾胞"是台湾对大陆难民的统称，既包括一般的偷渡客，也包括民运或异议人士。其时，蒋介石父子"反攻"和"光复"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国民党改祖，有台湾背景的李登辉当选为主席，稍后又荣登总统宝座，形势大变。

老威：那么"去中国化"在很多年前就露出端倪了？

唐存理：对，由于当局的逐步引导，加上中共采取的遏止台独的舆论高压，“去中国化”的“台湾共和国”之构想在民众中已深入人心。虽然在六四屠杀之际，刽子手政府遭到国际社会一致的谴责，作为与大陆有割不断血缘的台湾，也不得不表态声援民主运动，但落实到接纳政治流亡者，李登辉当局却采取了与二蒋截然相反的冷漠态度，把门坎提得非常高。如此影响深远的民主浪潮，台湾接受的“符合条件”的“政治避难”者却不超过 14 人，而作为全家悉数收留的，却只有我们一户。

老威：你们真够幸运的。

唐存理：也算老天的眷顾，当我们联络救总办事处的张主任时，他答复：台湾入境证已办好，随即会寄来；并且答应马上同港警交涉。晚上，我们的女儿被送了回来。我抱住她亲了又亲，问她哭没哭？她答没哭；我假装不信，五岁孩子就替爸妈坐了两天牢，咋会不哭？她说，警察叔叔没打我，我还问他们：眼镜在哪儿，压坏了妈妈要骂。我还说：想家了，快送我回去。

没过几天，西德也批准了我们的避难申请，但我们还是选择去台湾，当时我已 49 岁，去西方还得学语言，从头开始。还是去与自己同种同根的地方，也算完成了被共产党杀害了的父亲的宿愿。

1989 年 12 月，我们乘坐华航班机抵达台北，可谓历经了沧桑。

老威：看来在 97 回归之前，香港早就不是自由港，即使你们这种符合条件的，在批准之前，也得贼一样躲起来。

唐存理：父亲的亡灵保佑吧。六四之后，政治难民通过各种渠道涌入香港，可一旦被港警逮住，不问青红皂白就遣返，太可怕了，太辛酸了。我身边有不少北京来的学生，哭着喊着挣扎着，没有用，只要“榜上无名”，就关起来，有什么道义可言？

老威：我在看守所遇到一位中学美术教师，叫刘季华，学潮期间卷入街头政治，六四镇压后潜逃香港，结果被遣返收容好几个月，

吃尽了苦头；第二年，他又写了一篇《国殇周年祭》，满重庆散发后，又在潜逃过程中被逮，依律判刑 3 年；出狱后再次越境，终于成功，去了安徒生的故乡丹麦。若干年前他写信给我，称赞丹麦的冬天，说比北京的冬天暖和许多。

唐存理：这位姓刘的也算幸运儿，只要逃到自由世界，并被接纳的都是幸运儿，因为人的寿命有限，同独裁政权耗不起啊。后来我才知道，我堂兄为了救我于水火，动员了所有的政界关系。你知道现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吧？他是国民党的副主席，才 50 多岁，称得上台湾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他也曾做过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我堂兄通过我父亲的同僚周天固、滕杰等人，写信给马英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周天固甚至说，如果台湾不接受唐存理这种我党国先烈的子弟，我就个人出钱，哪怕买假护照，也要把他弄到南美洲去，以逃脱中共的魔爪。

老威：这个周天固是什么人？

唐存理：周天固做过蒋经国的新闻秘书和新闻处长，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与我父亲是中央政大的先后同学。我父亲当县长时，他还在当科长；去台后，由于身居要职，影响很大，人称“周三爷”。由于他和最后一任南京市长滕杰等人的活动，李登辉不得不表态。我现在手里还保存着一份马英九给周天固的亲笔回函：大陆民运人士唐存理及一家三人，我们一定要给予重点的关注。等等。虽然写得比较含糊，但意思是明显的。

老威：我听来听去，觉得这种官场斡旋极微妙，表面上慷慨激昂，内里却潜涌着一阵阵的世态炎凉。

唐存理：李登辉上台后，对蒋家父子的班底进行换血，如陈立夫、周天固等人均已失势，但其声望和影响还在。我这个堂兄是在永和市警察局长任上退休的，关于他，还有一个故事：1949 年上海被解放后，他本来要响应新政权的号召去”自新”，不料来到国民党军政人员登记处一看，心里凉了半截——排队自新的几乎是上

校以上，中校、少校屈指可数，而自己属于国军嫡系部队的中校，弄不好自新不成，还要逮住杀头。于是立即回家，带上老婆，星夜潜出层层岗哨，从小路逃到尚未“解放”的舟山，然后去了台湾。仓惶之中，把自己的女儿也丢在了大陆。

老威：你堂兄也算几十年的流亡者。

唐存理：他是我父亲带大的，对我惺惺相惜，所以我们到台湾也是变相的投亲靠友。我们在“救总”的招待所住了两个月，就凑款开了家小公司自谋生路，我虽然以八九民运的名义“政治避难”，可民运也不是一种糊口的职业啊。

老威：你亡命天涯，那你们在大陆的公司呢？

唐存理：转到我前妻姐姐名下继续，不过早没有当年的风光了。我刚到海外时，对民运还挺关注，也见过不少学生领袖，稍后，我感到深深的失望。那种妄自尊大，那种争权夺利，都离我的做人准则太远。所以，虽然我在台湾一时成了新闻人物，但我不怎么参加政治活动，除了做点小生意，就是读读书。转眼间十几年过去，我的女儿长大了，入读了教会学校；我与前妻也因思想观念的分歧各奔东西。由于我一直低调，只做生意，不管政治，大陆当局也对我往来两岸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风风雨雨几十年，回头一看，人生真如过眼云烟。

老威：你在香港躲避了四个多月，如果那时被逮住，就没有今日的回头一看了。

唐存理：对啊，那四个多月，除了蜗居在朋友房里看书看碟，不敢露面，一有风吹草动，就得准备换地方。我一心想的是，绝不能回去，不能坐第二次牢，宁愿自杀也不能！

老威：你对自己的台胞身份满意吗？

唐存理：这是个尴尬的身份。首先，我对共产专制深恶痛绝，其次我对陈水扁和台独也不以为然。但目前在岛内，百分之八十的

民众都倾向于台独，反感中共的战争讹诈。拿陈水扁的话说："民主的台湾怎么能统一于专制的中国！"我在两边都找不到归属，在那种高唱"亚细亚的孤儿"的群众集会上，甚至有人责问我："为什么不说台湾话？"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说台湾话呢？台湾受中共压迫，难道我就没有？我逃到自由世界，却眼睁睁地盯着国民党的近百年老店风雨飘摇，所谓"同种同根，血浓于水"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大陆这边有我的亲情，有我的朋友，有我的记忆和存在的价值；而在台湾，除了生意，谁和你谈六四？谁和你谈劳改？谁和你谈赵紫阳？你表面上成台胞了，里面的五脏六腑还在专制，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

老威：六四过去已经 15 年，新的一代也不会和你谈赵紫阳了。

唐存理：时间在磨损记忆，就这样吧。

老威：我感觉你已经忘了许多。

唐存理：前不久我读过吴弘达的书，震惊了一下；我今天愿意跟你谈，也与此有关——在没有全忘光之前，还是留一点吧。

间谍教授谷正

采访缘起

谷正教授是黄河象的发现和研究者之一，所以，当友人余杰于2004年4月把有关他的“间谍申诉材料”转来时，我困惑不已。记得多年以前，中央电视台还播过“发现黄河象”的记录片，当时作为一名观众，我还心潮澎湃了一个晚上。

更让我吃惊的是，谷正是被客死日本的国民党元老马晋三拖下水的！刚好我看过马先生的晚年传记片《两小时》并与导演李缨熟悉。“什么间谍？！”李缨在电话里听了我的简述，失声叫道：“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为了弄清真相，我照材料上提供的号码给谷正教授打过去。两个人在电话两端客气了几句，就挂断了；许久，谷正又把电话回过来两次，确定了号码是固定的，然后说，他已经上网通过 Google 搜索了有关廖亦武或者老威的条目，知道了我的情况，并答应我登门拜访。

2004年8月4日中午，日头很毒，我约艺术家胡建一道前往。从北土城西路到谷教授在北京的住处双柳新居，路线比较复杂，虽然这几年有轻轨，方便多了，可我们在途中还是用了近两个小时。

谷教授骑着单车，顶着太阳在轻轨出口等待，凭着在电话里描述过的彼此特征，接上头，然后一起回家。

谷清瘦、机警，已习惯用两眼余光沿路查看，同我和胡建的大大咧咧对照鲜明。只有进了屋，他的神经才松弛下来。“已经像个特务了。”胡建耳语道。

我们在谷家打扰了近6个小时，直到被盛情挽留，与一大家子共进晚餐，才依依不舍地告别。第三天，我联系上在北京拍片的李

缨，让他和谷正在一家四川菜馆见了面。都是马晋三先生的“忘年之交”，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我作为李缨第二部正经电影《飞呀飞》的主角，就倾力举荐谷正教授为李导演第三部作品的主角，我说：“片名都取好了，就叫《特务》。”

老威：我看了您的材料，似乎您的间谍罪名与国民党元老马晋三有关。

谷正：不是“似乎”。我背后的主谋就是马老嘛。

老威：教授您？可真幽默。

谷正：再不自我幽默一点，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做了“间谍”之后，我经常上网搜索马晋三的条目，结果与此关系最密切的，是一部叫《2H》的记录电影，导演李缨，是在日本定居多年的中国人，同马晋三结成忘年之交后，就用摄像机追拍了两年，直到主角某天早晨突然去世。《2H》在柏林电影节上获过最佳亚洲电影奖，和中国的地下电影《小武》是同一个奖。

老威：这电影我看过好几遍，其中最震撼的，是马晋山的尸体从几十层的公寓楼上被抬下来，楼道阴暗，曾被誉为中国工兵之父的世纪老人沿着楼梯，一圈一圈盘旋而下，抵达地狱出口——楼外的人世间，明亮、喧闹而拥挤不堪。但是我却关心地问坐在身边的李缨：马老吹过的那支箫到哪儿去了？因为我也吹箫，知道求得一支几十年的老箫不容易。

谷正：你认识李缨导演？

老威：不仅认识，我是他的第二部电影《飞呀飞》的主角，演一个出监狱不久的讨债杀手，死死地咬住过去的好朋友（朦胧诗元老芒克饰）不放。您看，这脑壳正中，还有痕迹，是我自己在电影里用杯子砸的，我都忘了是在演戏。当时鲜血满头，没法再往下拍了。

谷正：哎呀老威先生！这么巧！

老威：更巧的是我上世纪 80 年代就认识李缨他爸李士非。行啦，越扯越远了。李缨这几天正好从东京来北京了，咱们做完这个谈话，我就介绍您们认识。说不定，您这个“间谍”教授还能成为他第三部电影的主角。

谷正：见笑了见笑了。那就开始吧。

老威：我嘴笨，不晓得该咋问。

谷正：你用录音机吗？

老威：先不用，等到特别重要的细节出来，非用不可，我才用。

谷正：我也准备了录音笔，还有遥控装置。安全厅有的设备我都有。

老威：教授您真厉害呀。

谷正：我早已不是过去的那个书呆子教授了。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我苦钻法律和取证的技术，同搞专业一样，下了很深的工夫。

老威：好，请从头说起吧。

谷正：我 1936 年出生于山东威海，1947 年随父母迁天津。父亲原是天津检修公司的会计，1949 年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激动中，举家迁北京。我的青少年时代在北京度过。1960 年，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随后去了条件较为艰苦的甘肃，在××大学地质系任教。

我的人生阅历就是我的工作阅历，没啥讲头，我就一嘴带过了。直到文革结束，我都没受多大冲击，反而在停课做逍遥派期间，没丢外语和专业。所以在邓小平复出，否定文革，改革开放以后，我顺利地通过政审和国家考试，成为首批受益的出国留学人员。当时出国与现在可不一样，相当于闭关锁国的清朝向西方首派留学生。

老威：对，我看过有关资料，清朝的留日学生首批是几十名，

全部公费。

谷正：我们也算官派吧，先政审，即所谓内查外调、政治表现，海内外关系，完全水落石出了，再一层层上报审批。然后由国家教委统一出题考试，除了常规考核，就是外语，英、法、德、日。

老威：全国有多少人参加出国考试？

谷正：大概有 4000 名吧。经过筛选，通过了 1300 名。这其中又分普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当时的国家教委在北京西单商场附近的大仓胡同，宽 20 米，深 100 多米。一天到晚车水马龙，跟赶集似的，你稍微去晚了点，连巷口都挤不进去。这比考状元还诱人呀，连司局级以上的官员，只要分数没过线，都通过各种门路来争名额。我可是过关斩将，硬考，结果成绩在甘肃省名列第二，在全国前 30 名以内。

老威：不简单呀。

谷正：1980 年 4 月，我们那批 480 人抵达日本，先进行语言培训，按考试成绩优劣分成 16 个班，口语进步很快。

由大使馆安排，我和另外 3 个留学生住进东京目黑区下目黑的一所叫“睦庄”的公寓里，是老式日本房子，很狭窄，只能睡觉和做饭，没办法洗澡。那时国家、个人都穷，出不了更多的钱，就只有住笼子似的便宜房子。不过，我们是来学习的，报国心切，也不在乎。1980 年 7 至 8 日，中日合办“中国猿人展”，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者贾兰坡先生和周明正先生赴日参展，引起较大的国际关注，而我是参展人员中唯一搞古生物研究的。有一次，我和中科院的代表团一道在一个华侨饭店吃饭，认识了在店里打工的台湾人沈玉井，出于客套，我们聊了几句。他听我说住在下目黑，就挺热情地要介绍我认识一位“爱国老先生”，我随口问：“方便吗？”他答：“太方便了，马老就住在你的街对面。”

过了几天，沈玉井抽空来睦庄，领我穿过马路，上一所高级公

寓的 20 楼拜访了马晋三先生。我们随便聊，马老听说我是搞古生物的科研人员，就非常高兴；而一听马老的云南口音，我也倍感亲切，他在外漂泊多年，仍旧乡音未改嘛。于是，就成了忘年交。

睦庄没办法洗澡，此前我只能休息时上公共浴池，极不方便；偏偏日本人很讲整洁，瞧不起不洗澡的人。马老问明我的情况，就主动邀请我上他家洗澡，天长日久，彼此更熟悉了。马老好客，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家里会来许多朋友，日本、台湾、海外的，形形色色。

老威：在 80 年代初，你能适应这种社交场合吗？

谷正：大陆去的人，特老实。刚接触马老，我还请示过大使馆，允许了，才进一步交往。东京是个自由世界，各种势力都有舞台，台湾国民党几乎每天都给留学人员的住处投寄报纸、杂志，以及各种宣传资料，上面甚至有魏京生的报道，刘宾雁等人的文章。开始翻看这些东西，还挺害怕，大使馆也要求一接到反动宣传品，就打包上缴。可后来，一天收一大叠，我们遵命送大使馆，他们也叫苦，说装不下。再往后，他们就拒收了，要我们就地销毁算了。

老威：真是海内外两重天！直到现在，政府也要求人民上缴反动书刊。

谷正：见多不怪。比如我刚在马老家里认识某某名人，真有点“如雷贯耳”，久了，就“雷打不动”。

老威：所谓两岸三地的名流都有？

谷正：对。比如有个台湾画家，张大千的弟子，名字我忘了；书法家启功的亲戚；卖钢琴的商人；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据说是王任重的女婿；赵紫阳的经济顾问后来也拜访过。引荐我们相识的沈玉井，也不简单，在台湾犯过法，就跑日本了。

老威：这个马老，真是不甘寂寞啊。

谷正：马老是与周恩来同时期的黄埔教官。做过国民政府的交

通部长和工兵总司令，在国共两党中都有许多学生。他信仰三民主义，却与周恩来私谊颇深，总理临死前，还派罗青长秘密接他回大陆，见最后一面；在国庆 35 周年，他还作为特殊贵宾上天安门观礼。所以这么个人物，你要说他是那一门那一派，都不太准确。他晚年住日本，当寓公，也算一种两难选择中的自我放逐。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王继贤，他是马家常客，我每次去，他都在。这个老王，曾是国民政府的朝鲜半岛专家，一度派驻韩国大使馆武官，不料朝鲜战争一爆发，他拔腿就逃日本，搞得台湾四处通缉他。

老威：此人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谷正：安全部门也认定他是大特务。1987 年 9 月，我第 3 次赴日学术交流，曾向王继贤介绍××大学开发的甘草甜素产品，由王在他的店里出售，因此，王就成了这桩间谍案的重要环节。记得 85 年的一期《瞭望》上，登了一篇张学良亲戚的回忆录，其中提到王是特务。我却没一点“敌情”意识，在东京时，还追问他：“到底是不是特务？”王气坏了，直骂“胡说八道”。还说：“国民党也邀请过，共产党也拉拢过，现在都不来光顾了。”我问他想不想回大陆看看？他发感叹道：“大使馆来游说过几次了，我敢去吗？我老妈 80 多岁，还在文革中被斗死了，我回去探屁的亲！我说：“文革早否定了，现在国家重用人材。”他笑道：“是吗？抗战时我也是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出生如死，可下场如何？张学良的外孙是个混蛋，有什么脸写回忆录！”

后来，我把老王的话说给马老，马老笑道：“你别管这些，历史烂帐扯不清楚。”

老威：你明白这话的意思吗？

谷正：多年以后，才有点觉悟吧！马老的许多经历，我是回国后才陆续知道的。比如他做过现任日本天皇的家庭教师；刚去日本时，由于与台湾断了往来，还比较潦倒，曾骑摩托车为饭店送外卖。

有一次送到半路，他突然感到耻辱，就把所有的外卖倒掉。他说：“8 年抗战打跑日本人，现在又撵到这儿来伺候日本人，真是上天的惩罚啊。”所以，他后来皈依了基督教。

老威：他靠什么生活呢？台湾政府的养老金吗？

谷正：间接直接帮他的人很多，东京有家四川饭店，经理是四川人陈××，马老在店里也有小投资。总之，马老也没什么积蓄，可闲赋在家，也过得下去。1980 年底，我从睦庄搬到横滨宏明寺的留学生会馆，20 名左右的留学人员住一处，离下目黑还有 1 个半到两个小时的路程。于是我只有每个星期天去看望马老，借一宿，第二天赶电车回去，可马老每次还硬要塞给我一两千日元的路费。

老威：马老对你真是无微不至。

谷正：这个好老头，帮过很多落魄的人，而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乡情重，没有仇恨。他说蒋先生和毛先生都想把中国的事办好，可往往事与愿违。1982 年 4 月 12 日，我结束留学回国，马老送我 3 万日元（相当于 2000 人民币），让我给家人买点礼物带回。我很感动，因为在海外两年，不想家是假的。那时我才 40 多岁，离家时也包了一捧故乡的土带在身边，而马老，已风烛残年了，却还孤身一人在外。

1986 年，我又两渡日本学术交流。一直到 1998 年 2 月，马老去世前，我与他通过一些信。后来我受学校委托，建古生物博物馆，我也去函告之，并请他提写馆名。可老先生热心肠，还通过银行汇款 1000 美元，资助科研。

老威：真所谓拳拳报国之心，可昭日月。

谷正：可这 1000 美元，加上在日期间马老给过我的零钱、车钱、礼物钱，以及王继贤给的介绍费等等，都成了马氏特务机关的间谍经费！

老威：一共多少？

谷正：18 年来，这所有费用折合人民币 17500 元。

老威：您这间谍当得真廉价啊。

谷正：荒唐人世嘛。

老威：您的材料上讲，回来不久安全部门就开始调查了，您怎么察觉的？

谷正：学校里都传开了。连我的学生都提醒说，公安人员找过学校，检查了我的通信。系总支还布置某某老师，专门监视并汇报我出差、出野外的情况。为此，我和老伴都找过学校领导，要求澄清。校长开头吱吱唔唔，后来干脆说："出国人员嘛，被盯上也正常。你就不用管，该干啥还干啥，组织是了解的。"

有了学校这句话，我就释然了，于是全身心投入研究和教学。1986 年我满 50 岁，还实现了学生时代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9 年，我出任地质系主任。我担当的社会职务有：国家教委地学教学指导委员；中国地质学会理事；省地质学会常委理事等等，并享受国务院的专家特殊津贴。可在我事业上步步登高时，安全部门却加紧了对我的监控。1985 年到 89 年，当时隶属公安厅的安全处警察，频频登门与我"交朋友"。他们有时着便装，有时穿警察制服，出入学校很惹眼。

老威：作为公民，您有权拒绝这种"朋友"。

谷正：80 年代过来的人，对公安还是有传统的惧怕心理。况且他们的态度比较客气，逢年过节，经常送些礼物，如烂油画、塑料果盘等。

老威：他们问过马老的情况么？

谷正：只字未提。只转弯抹角地闲聊在日本的生活，与那些人交往，还单独问了王继贤这个人。

老威：您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谷正：无可奈何。共产党员嘛，有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义务，况且我又没干什么。时间一长，我和警察都混熟了。学校离安全处，骑自行车就十来分钟，他们有时脱不开身，就打个电话，约我到处里去谈。1989 年六四后，我还买了几罐麦乳精，去公安处还礼。虽然他们送礼是用公款，我是私人掏腰包，但谁也不欠谁的最好。

记得有次那个处长还盘问我××大学的学潮情况，提到我的学生如何。我暗自生气，这不叫我告密吗？于是就无可奉告。

1994 年的一天，我刚上完课，安全处突然来了辆高级轿车，把我接到甘肃师范大学招待所，设宴款待。除了我，周围都是便衣，作为主宾的安全处杨副处长频频举杯，向我说了许多奉承话，我却心里犯嘀咕，因为“交往”近 10 年，这次是最隆重的，莫非……果然，吃了饭，又招待洗澡，杨处长说：“您彻底放松我们再聊聊。”

正式讯问时，杨处长再没习惯性地兜圈子，而是直截了当：“你与王继贤是什么关系？”我照实回答。警察们都绷着脸，看得出，他们不满意。

接着，又问我内蒙古博物馆李荣的情况。原来李荣私自带化石出国，过海关手续不全，被扣住了。安全部门大概推断王继贤与化石案有关，就来“光顾”我了。

李荣我不了解，而王继贤给我的印象，就是嘻嘻哈哈，玩世不恭，还擅长弄麻婆豆腐。于是，我搜肠刮肚地“配合政府调查”，结果双方都不愉快。

天擦黑时，轿车送我回家，还硬塞给我一袋水果。我遵嘱写了有关李荣的材料，够冤的，啥也不知道啊。

过了一周，安全处的阎云来取材料，安慰说：“谷教授，您别放心上。”我委屈说：“无中生有嘛。”阎云说：“您也太老实，他们再来缠你，就骂出去。”我一听警察这么说，真愣住了。可过了几天，阎云又登门，声称：“不想吃这碗缺德饭，成天当二流子。”他

后来下海了，推销什么产品，还来问我有没有门路替他卖。

这一次，围绕我，周围的人也都被调查了。不过也难怪，我是黄河象的发现和研究者之一，学校博物馆的化石很多，他们就怀疑起来。

老威：也算“误伤”吧。

谷正：我真这么想。还以为趁这次把包袱抖完了，就彻底断绝与安全部门的交往，“配合”也该有个限度呀。

再接下来有点象小说。1998 年，我退休，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桃李满天下。特别是去年，我和儿子及老伴合译了两本古生物名著，一本是英国学者西里尔？沃克/戴维？沃德的《化石》；一本是克里斯？佩兰特的《岩石与矿物》，都由友谊出版公司推出。市场还不错，出版社又和我们签约，要把《自然珍藏图鉴丛书》系列全部翻译出版。

另外，去年也是黄河象化石发现 30 周年，举办了一系列的展览和学术研讨，很有点热闹。去年还是中日建交 25 周年，日本的东京国学院邀请我讲学，整一个月，可带夫人，所有经费由日方提供。我废寝忘食地闭门赶写学术报告，三个不同题目，论证起来一点马虎不得，因为东京国学院是世界顶级学府，我必须要为国争光。

护照、签证、机票早就办好了，也通知了东京方面，我定于 2004 年 9 月 25 日启程并抵达。9 月 17 日上午 10 点左右，我正在窗下看英文资料，而老伴儿在口译，突然电话铃响了。

开始怕受干扰，我们不想接；可电话响得很固执，似乎不接不行。我拿起电话——命运就在这一刹那改变了——对方说：“您是谷教授吗？我是安全厅的。”

我的心一下凉了，因为自 1994 年那次款待后，他们再没登过门，我已完全忘记我在什么国家，在什么机关的掌控之下。

老威：当时您们还住在兰州吗？

谷正：不，已来到北京，住在这儿——我儿子的家里。我强作镇定地问："你们在哪儿？怎么知道这个电话？"对方很蛮横地说："等见了面就清楚了。"

一会儿，一辆黑色轿车进小区，刹在楼下，两个身强力壮的陌生人闯进家门，为首者从上衣口袋掏出甘肃省安全厅的《警官证》，对我亮一下说："对不起，请跟我们出去谈谈。"我老伴儿说："就在这儿谈不行吗？"警察说不行，就着急地动手拽我。当时还有许多资料堆在屋里，我光着脚，只穿了一件衬衣。我呆如木鸡，任凭他们一左一右地挟持住。老伴儿扯住我叫："你们要带人到哪里去？！"他们不回答，其中一人掰开老伴的手，后来我知道这人叫李际群，主管与我的联系。

我光脚蹬上鞋，没带任何日常用品，就木偶一般被弄上车，一口气拉到南苑。事态突变，我的魂儿都吓出窍了。直到进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红门，红门四周都牵着铁丝网，我才下意识地注意到十几米外的高墙——明摆着那是监狱。

下午 1 点，我被带入监狱旁边的招待所，一排红楼。接着，他们口头宣布对我"传唤"，并让我在一张纸条上签字。再下来是搜身，仔仔细细，连一条缝都没放过，手表、零钱、钥匙链、字条全拿走。这些过场走完了，我才被命令坐下。椅背上还挂了一副手铐。

跟电影里演的差不多，三个便衣警察坐在桌后，周围还站了些人，而我这个罪犯坐当中。我不禁问："我有什么权利？"为首的刘处长回答："你可以请律师。"又补充道："不过目前不行。"

老威：跟绑票一样，够恐怖的。

谷正：我一个快 70 岁的老头，哪经得起这种惊吓！这次审讯，主题直奔大特务马晋三，连王继贤也不提了。我只能"配合"，一五一十，从 1980 年出国，怎样认识马老开始，筛了一遍，连蚂蚁爬过的细节也没放过。当然，给王继贤带甘草甜素，王付给我 3

万日元介绍费的事也主动坦白了。我自信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就越交代越感到委屈。他们也问得特细，极有耐心，哪怕措辞有一点含糊，也让重新讲。

如此这般，从下午 1 点审到开晚饭，拨拉了两口又继续，一下子又拉到午夜 12 点，把我这匹老马搞得筋疲力尽。我觉得，他们记录在案的那一厚本马晋三材料，都可以写长篇传记了。当时我还天真地想，马老明明都死了，还要怎样？难道要摸清马老的亲戚？不过，我对马老的爱国之情是深有感触的，他家里挂着不少名人字画，其中一幅就是他自己亲书的《爱国三字经》，著名诗人李士非写了首献给马老的长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1975 年周恩来病重/你决定前往探望/分别半个世纪的老友/双方都不是当年模样……晋三兄，感谢你这个老工兵/在中日之间架设无形的桥梁……"

老威：周恩来的老朋友是大特务？

谷正：我心里也憋着这问题，一直扛到凌晨 1 点，法定的传唤时限 12 个小时到了。一个女警察进屋，替换刘处长继续夜战，看来她的级别比刘处长还高，口气也霸道："谷正，你很不老实！我问你：在境外参加过什么组织？"我顿时懵了，心里回答："除了共产党，我什么组织也没参加。"可嘴上却说不出。女警官步步紧逼："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听说过吗？"我摇头，女警官冷笑道："马晋三就是这个组织的头儿。"紧接着，刘处长一拍桌子："不老实！宣布拘留！"我浑身哆嗦，又被命令在一张三折的纸条上签字，事后知道那是《拘留证》。

老威：按现行法律，传唤和拘留证明应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罪名也要说清楚。

谷正：我啥都顾不上，只有害怕。女警官又继续威胁："谷正，你知道对面是什么地方吗？监狱！一旦把你扔进去，就彻底消失了。你不承认？没事儿，关起来，关到死。"我抗拒说："我家里人会找来的。"女警官双手一摊："找谁？我们到你家去过吗？证据呢？"

这种流氓腔调我可从来没有见识过，一瞬间，我被击垮了，永无出头之日啊，谁不怕？

见我脸色煞白，她就向后仰着身子，放缓了口气："其实啊，你的问题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改革开放嘛，国门刚打开，你们这批早期留学人员中，不少人因政治运动，因家庭出生受过冲击，有骚动，对现实不满，见到国外的花花绿绿，岂有不动心的？内外一对照，就动摇了。敌对势力掌握了人性的弱点，无孔不入，小恩小惠啦，你就一步步上钩了。"

我茫然地望着她，不知所云。

她又说："你年纪大了，一时糊涂不要紧；只要坦白了，悔了过，事后照样做人，照样是党员、领导、教授、专家。对国家做过贡献嘛，功过可以相抵，政府对你这类人的一贯政策，是不管陷多深，只要坦白、改过，一律即予谅解，不公开，不追究，全部包揽。否则的话……中国人多，意外也多，死你一个不算什么。"

"你们要我怎么交待？"我终于汗流浃背地问。

"你是教授，不会写？"周围的警察都发出猫戏老鼠的笑声。女警官同情地盯住我说："问题的大小，处理的方式，结果的好坏都取决于你。最好的结果是，从这儿走出去，过去就与你一刀两断了。别说学校，连妻儿老小都不知道。我们是反间谍的安全机关，处理过太多类似的情况，我保证。你以后照常生活，照常体面，照常出国，一样不会少。"

形势所迫，我只有坦白。马老，不，马晋三，又名马崇六，的确是台湾国民党派驻日本东京的大特务，我一到日本，他的眼线就盯上，百般拉拢，于是我就加入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开始，我还以为是群众团体……

他们问我填表没有，我自然回答："填了。"他们又问表是什么样式？我哪儿知道。于是我就套用中国共产党的《入党申请书》，

及其它学会申请表的格式，一项接一项的交代，只是把内容掉换了。

我说了许多诬蔑马老的话，心里却直骂自己不是东西。凌晨 4 点多钟，我的身体顶不住了，直冒虚汗。宣布收兵时已快天亮，我从一楼审讯室被押往二楼一个套间，约七、八平方米，我住里间，外间由两人一班轮流看押我。

我已睁不开眼睛，没脱衣服，就要关灯睡觉。不料警察不准关灯，我抗议，他们解释说："这样安全些。"从此，在这窗帘紧闭的囚笼里，电灯 24 小时亮着，门敞着，电视也 24 小时开着，噪音轰炸机一般，搞得我这个老头儿再困也无法安眠。

老威：中国监狱都是通宵亮灯，没有夜晚。

谷正：第二天下午又开场，我继续胡编间谍故事，问什么就借题发挥编什么，比如在马老的介绍下宣誓效忠等等。唉，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对不起马老的在天之灵。

老威：这样编下去，您可死定了。

谷正：所以我的弦绷得太紧。放我吃饭时，心里堵得慌，我终于冲着同桌用餐的便衣们大叫："我全是编的！不算数！"把他们一下子搞愣了。

我被架进套房稳定情绪，李际群跟上来，神神秘秘地关上门说："谷教授，您有什么思想包袱就抖出来，我们该尽力就尽力，可怎么能出尔反尔呢？这样您不把自己给套牢，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吗？交待一半又反悔，比不交待的罪更重呀！"

"我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我哭喊起来，"我缺了八辈子的德！还不如死了干净！"

李际群见我哭喊这个，脸色一下子就变了，摔门而出道："你吓得了谁！"

老威：您如果把翻供坚持到底，就赢了。

谷正：我现在当然知道，可当时，唉。到了晚上，女警官又出面了，她板着面孔，二话不说，就开始宣读了一段《国家安全法》，然后才一钉一眼地说："有罪而翻供，也就是妨碍执行公务，给侦察工作造成重大阻碍的，最高判刑可达 15 年。"

我被一棒子打进深渊里，恍惚中听见她问："清楚了吗？"

我回答"清楚了"。审讯又持续到次日天明，我再次"供认不讳"。内容大致包括：1.出国及与马晋三的交往；2.加入特务组织，代号×××，并被任命为大陆地区的负责人；3.发展特务，我三渡日本，直接和间接介绍了一些熟人、同事去见马晋三，这是为了让他最后考察和拍板，看这些家伙是否合适当特务；4.情报工作，我与马老和王继贤的通信；科技，包括考古和甜素的日常情报，报纸上各种信息的汇总、分析、统计；5.经费，是少了点，20 多年加起来共约 25 万日元，折合人民币 17500 元，我就胡诌说："这边物价涨了，农村万元户多了，他们的经费标准还没跟上。"

口头坦白了，他们又拿来笔记本电脑，我按他们列的题目，打成书面自供状。他们办案可谓一丝不苟，根据我交代的间谍经费，他们一点一滴地加，后来竟说，马晋三那次不止汇来 1000 美元。我百口难辩，结果再核对，原来马老汇的是日元，折合 1000 美元，就有零头。

老威：您被审了几天？

谷正：2003 年 9 月 17 日至 23 日，一周时间，我均被看押在那儿，进出房门要喊报告，上厕所也不准关门。我一直想着 25 日出访日本的事，他们先保证事儿完了还可以去，23 日却告知不能去了。

这中间我又翻了一次供，自然受到更严厉的弹压。还说间谍案涉及国家机密，可以不公开审理，神不知鬼不觉，你到时想见我们都困难了。于是我泄气了，他们才放缓口气说，鉴于我不是惯犯，

情绪反常很正常，为了不加重“罪责”，就不做记录了。

老威：后来呢？

谷正：就称“结案”，责令我写《认罪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写这种玩意，小菜一碟。什么“追悔莫及”“感激涕零”“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脱胎换骨”之类，全用上。我以为交差了，因为车轮战术打了三天，将罪名坐实后，他们就让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23 日上午，他们说写好这玩意就可以走人了。可没想到，交卷时，一个老警察还指令我写下这样的抬头——“潜伏间谍谷正认罪书”。

我几乎晕倒，连忙报告“上厕所”。我哭了起来，觉得这辈子完了。

午饭后，还是那辆黑色轿车把我押送回家。上楼进屋，我老伴含泪在《取保候审通知书》上签字，同时没收了我的护照。

在路上，刘处长对我说：“间谍经费 17500 元，得上交国库，你自己回兰州缴钱，并缴出与马晋三的全部通信，争取早日结案。”

（谷正老伴儿插话：我莫名其妙就做了间谍保人。警察一走，老谷还象个木头人，立在那儿，一双眼睛空空的，魂儿还没回来。我心里发怵，就摇他的胳膊：“老谷，怎么啦？说话呀！”他却没话，过了好几分钟，眼珠子才开始动，那脸色，就跟冬天的荒地，灰灰的。终于，两行泪坠下来；终于他哭出声了，双手突然死死拽住我，小孩一般抽搐着说：“桂兰呀，我对不住你！”）

老威：为什么对不住呢？您也是受害者。

（谷正老伴儿继续插话：是啊，我急忙又是倒水又是插嘴。待老谷诉明了原由，我也吃了一惊。晚上儿子下班回家，一合计，这是天大的冤枉，怎么能认！列祖列宗在上呀！

按国家部门的要求，老谷 10 月 1 日必须返回兰州结案。我儿子拍着桌子说：“爸爸，您为了我们，也一定翻供。”）

谷正：我精神和肉体都彻底垮了，儿子托熟人，让我躲进香山

休养。我不断自责，马晋三，一个飘零异乡的爱国老人，死了，连灵魂都得不到安宁，被我这个“忘年之交”泼了盆污水。但是要翻供，就要面对锦衣卫，我这无权无势的老书呆子，怎么能斗得过专政机关！思前想后找不到出路，感觉人就开始恍惚，5 个月，一通宵一通宵睡不着，心跳过速的药，大把大把地吃，体重从 72.3 公斤降到 61 公斤。我被送入北京安宁医院，一检查，得了反应性精神障碍，说白了，就是脑子出了毛病。

（谷正老伴儿：《遗书》都写好了。）

谷正：家里怕我出意外，24 小时都留人，入院了，病房也不离人。我把遗书留在电脑里，可找不到单独呆的机会。有次要在卫生间上吊，可一磨蹭，门就被老伴儿弄开了。老伴儿哭喊：“几十年都过来了，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我说只有一死干净。老伴儿说：“你不翻案，干净不了，变了鬼人家还说你畏罪自杀。你没听见安全厅一天一个电话催咱们吗？老谷啊，你是考古考成蠢蛋了。”

（谷正老伴儿：非骂不可！不骂醒不了！）

老威：对，将近 70 的人了，怕什么呢？送到监狱，也劳改不了，最多守守车间门，甚至连门也守不好，眼花嘛。一生病，还得办保外就医。

谷正：我想不到这一步，我得慢慢从脑子和心脏出毛病的状态缓过来。就如一个煤气中毒的人，必须要抬到通风处，一口一口做人工呼吸。我一旦从濒临死亡里回过头，就感觉被水洗过，从骨头和内脏里都洗过。我振作起来，用研究和教学的那股劲儿，学法律。我买了几十本书，条条框框都熟记了。可说千道万，法律讲究证据。他们吃准我是法盲教授，抓我没《传唤证》，拘留也没《拘留证》，搜查连个条也不留，我告他，凭什么呢？于是，我又买了许多破案小说，通宵达旦学习，我要的是取证方式。慢慢，我迷上了这个东西，成了名副其实的“反间谍”教授。

老威：安全机关还没觉察？

谷正：没有，否则不会在电话里讲话那么放肆，那么赤裸裸。我的录音电话很高级，可以接电脑，电脑识别声音，一则能够直接刻录成 CD 盘，一则整理成文字也方便。我的证据一般要考贝几份，藏几个地方。从去年到今年 4 月，不足半年，我已整理了 24 万字的电话记录，有的段子，那种地痞腔调，很精彩。您感兴趣吗？我送你一本。

老威：我太感兴趣了，24 万字？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

谷正：没啥文学性。

老威：也不见得。说不定还能改编成话剧呢，那种精彩台词，别的地方听不到。哦，教授，这些电话记录只是一问一答两个人？

谷正：有时那边打电话来，开头很勤，畜生似的，不管你疯也好死也好，只一个劲儿催你回去；以后拖了下来，估计他们已经把马晋三调查了个底儿透，才觉得不对劲，这个死去的老头，北京和海外的来头太大，碰不得。总之，那边的电话就不那么勤了。可我要打过去，并且扭住不放，取保候审已经一年多，早超期了，该有个说法。

那边有个人固定负责我的案子，叫李济群，电话记录大部分是他的，但也有处长和其他人的，学校方面也有，国安部、北京市国安局都打过交道。我的《申诉状》递了许多机构，附录材料很充分，除了电话记录，还有日记、翻案的申明、信件、家里及各方面的旁证，甚至还有写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他们想赖帐，没门儿。

老威：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这帐怎么赖？

谷正：从今年 4 月 9 号以后，我打过去，他们不接了，失踪了。堂堂一个上千人的省级安全厅，居然没一个人接电话！我打兰州市查号台，安全厅的门卫、收发、一二三处，电话号码都找到了。我依次打，真找到人了。管我的李际群气急败坏地威胁我："姓谷的，

你不要四处写信，八方打电话，造谣诬蔑！引起了政治后果，你要负法律责任！”

我说：“你不是说要交朋友吗？朋友之间为什么不能打电话？

他警告我：“我们是保密机关，知道什么叫保密机关吗？你查我们的号，到处打，就是泄密！万一通过电话网，传到海外间谍机关，你……”

我笑起来:“作为一个公民,我要向你们咨询一下保密常识呢？什么人可以在公开场合抓，什么人，比如说我，该秘密抓？

老威：他怎么回答？

谷正：他气得挂了电话。我又打过去。他接起来喊：“有本事你就上法庭告我们！拿不出证据，我们就要反告你诬陷！”

老威：除了打电话，他们没上门找过您？

谷正：他们来过两三次，还有北京市国安局的陪着。家里人把我藏起来，不开门，老伴儿通过小窗和他们对话，说还在医院躺着呢，到底谁跟谁要人，走着瞧。今年 4 月 7 号，他们的车进了小区，我就通知我弟弟去跟他们谈。我弟弟身上揣了比较高级的录音设备，双方一开始谈，声波就被传到几公里以外的家里，我戴着耳机就能听见，效果不错。

你看，我手里的录音笔，比你的录音机高档多了，对付他们，设备一定要跟上。我听见那头还做我弟弟的工作，要他说服哥哥，不要翻供呢。

老威：具体怎么说的？

谷正：我弟先说：“赵处长，一级警督，哎，我记一下警号：621002。”然后，对方的三个声音分别是：赵××、刘××和李××。刘说：“20 多年来，一直关注他。”赵说：“什么案子养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有证据呀！”最后临走了，他们想要回我弟弟抄的警号，李说：“这是保密的。”我弟不给，李大吼：“把那

页纸撕下来！那上面有我们的警号！保密的！你要干啥！”

第二天，4 月 8 号，兰州的三个人，加上北京安全局的王某又来了，我弟又去了。我先后听见他们说：“他参加组织。”“判不判刑以法律来。”“我们是保密单位。”“关七天六夜？我们找他谈话。”“你甭管代表谁。”“转变你哥哥。”“那关系到搞错没搞错的问题，由法院定。”“他签过字的！他都签了！该给的都给了！”

老威：看来，教授您真成超级间谍了。

谷正：过奖了，也算大器晚成吧。

附录 1：绝命书

我经受不住安全部门的“锻炼”，只求脱身保命，在逼、诱、指供下，全面“配合”他们，作出了子虚乌有的供词，最后假的成真，如今铸成“铁案”，一半也是咎由自取。我已无力再抗争，只有接受命运带来的一切。

此举是：我出卖了自己的信仰、尊严、一世清明、我为之奋斗一生取得的一切；出卖了我这美好的家庭和所有的亲人；出卖了给过我帮助的朋友，还有同学与朋友……；使所有的人蒙受耻辱。这是我软弱、糊涂的代价，痛苦不堪。

我已无颜面再苟活于这个美好的世界，只有一死表明我的清白无辜，只有一死抗争这强加给我的耻辱。

我无颜面于祖宗和生我养我的父母在天之灵；

我对不起与我共患难，成就了我和这个家的苦命老伴，是我毁掉了这一切，还使你蒙羞受辱；

我对不起我的三个正在起步、蒸蒸日上的儿子，你们和父母有过美好的时光，就让那些作为记忆留下，除此，我带给你们的只有终生的创伤和羞辱，我不配做你们的爸爸，忘掉我；

我对不起好儿媳，公公如此下场，乃是咎由自取；也对不起你们的父母，还有何脸面与他们面对；

我对不起兄弟，他不惜一切，给了我无限的关爱，而哥哥竟如此软弱和不争气。使得一切付诸东流；

我对不起所有的兄弟姐妹和下一代，我还能向他们表白什么？

所有我的朋友、同学和学生，只求你们理解，但不必原谅我这软弱、糊涂，葬送了一切的人；

……如今我“解脱”了，留下的只是笑柄和耻辱，还有给后人的无尽的麻烦。

记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为了摆脱一时的恐惧，保命脱身，早回家，竟不顾后果违心地诬认自己参加了国民党和敌特组织，做了像是真的口供和笔供，出卖了自己，软弱和糊涂葬送了自己和一切。切肤之痛，后悔莫及。

“忠厚、老实是无用的别名”，我一生本着对人对事忠诚无私，与世无争，夹着尾巴做人，挺起腰杆做事，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做的好事做尽，实际是无用和软弱。人应该为维护自己，坚强和战斗。

我处处堂堂正正的做人，勤勤恳恳、一心为公的做事，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党、祖国和人民的事；我爱自己的家，孝顺父母，亲爱自己的兄弟姐妹，友爱同学、同事、朋友、学生及一切接触到的人；我和老伴儿一生为许多人做了许多好事；……最后竟遭此厄运，受此污名，实不知为何老来受此“天遣”？命运啊！为什么如此不公？！

最后，我只能呼叫：终有一天能还我以公道与清白！

就让我悄声的去吧！我们是老百姓，无力去抗争。我是个懦夫，耻辱的懦夫。

沉舟侧畔千帆过，枯木前头万木春，世界还是那样美好，珍惜，切实的维护生命和你拥有的一切，大家都好好生活吧！

春节的初三、四时重病中写。

六四画家武文建

采访缘起

2005 年 5 月 26 日下午，星期四，经艺术家高氏兄弟牵线，我在位于北京大山子的 798 艺术工厂内访问了出身工人阶级的画家武文建。

天气晴朗，我眼前的武某穿火红衬衫，显得神采飞扬。刚闲话了几分钟，高氏兄弟就请客，吃东北菜。不用我的诱导，武某即在一片嘈杂中打开话匣子，似乎早埋下腹稿。我边吃边习惯性地插问，而武某说了个把钟头，只动了几筷子。

餐毕，觅一偏僻去处，让武某继续过嘴巴瘾——1989 年 6 月 4 日前夕，他才 19 岁，酷爱艺术且血气方刚，懵懂卷入爱国风潮，却在北京城头目睹了一幕幕血腥场景，自己也差点叫大棍子打趴下。

稍后，国家勒令人民住嘴，他却没住嘴，所以被逮，判刑 7 年。因既不是学生领袖也不是知识精英，他就只能与动乱暴徒关在一块。“这些人和你老威挖掘过的底层人物一样，没历史，没社会面貌，甚至不知该怎样定位。”他叹息道，“16 年了，没人站出来为他们吆喝一声，罪都白受了。”

我说：“那麻烦你牵个线，弄两个暴徒来我接触一下？”

他说：“坐牢一二十年，老虎也被关成老鼠了，认命吧。你看那个请暴君像吃臭鸡蛋的鲁德成，当年被大学生扭送公安机关，电视一报道，就闻名遐迩。可如今事过境迁，好不容易逃到泰国避难，却要被异国警方遣返——这就是不认命的下场！”

我哑然片刻，就操起巴掌大的摄相机，拍下武某悲愤和自嘲的脸。说实话，连我都差点忘记曾是六四主体的成千上万的暴徒们，更别提如何为他们重新定位了——文章是由精英来做的，我每年都

通过各种渠道读到不少。

直到午夜 12 点过，武某才不得不闭上嘴巴。我和他走至街口，然后分别。我的背包里揣了一组血洗天安门的油画照片——多年来，他已涂抹了若干噩梦似的油画，却一张也没拿出去。“等吧，”他说，“16 年都等了。”

“等吧？”我猛地愣住了。出租车发动了，曾经作为历史舞台的街景纷纷退去。我不禁想起大半年前，丁子霖老师在家里私下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真到了六四有个说法的那一天，北京的地缝想必会突然涌出无数“英雄”；那时，我和你蒋老师倘若活着，就去远处隐居，把脚下的名利场腾出来——因为，我们孩子的灵魂需要真正的安息。

武文建：今儿上午，高氏兄弟突然来一电话，口气与平时不一样：“文建，过来一趟好吗？”我问什么事？他又答：“没事，就吃个饭。”我想，从西边到东边，我要跑大半个城呢，请个饭费这么大劲儿？况且，这老高也不是喜欢吃吃喝喝的人。所以我就猜，要见什么难得碰面的人（高氏兄弟插话：六四前夕的北京，还是提防一点好）。

老威：昨天见着老高，他告诉我，有个很有意思的画家，六四栽进去，被当作暴徒关了几年，出狱后，专画屠杀的题材，与这个健忘的时代搞不好关系。

武文建：我的饭碗是画广告，简单、技术化的没脑子的活儿；但我的激情还停在那儿，时光流逝了，它却凝固成烫手的石头，搁在那儿——16 年前。我老是画坦克压人，血把天安门淹没，民主女神像……画框内的每一笔，都哇啦啦地喊着。这是永远的题材，或许我画得不好，或许应该反思反思再画，但是不行，我管不住我的梦，我的手脚。这些画，我不会卖；将来六四翻过来，我也不想

卖——但愿那时能建一个种族耻辱的博物馆，我就把它们捐出去。

老威：这个想法不错，不过眼下，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武文建：从六四说起？

老威：六四之前。你的家庭，你的职业？

武文建：按共产党的阶级成份，我出生于根正苗红的产业工人家庭。北京地区有两大国企，一是首钢，一是燕化（即燕山石化，直属中国石油，地点在北京房山区，有几十万职工）。父母是燕化工人，我和我哥都是燕化子弟；再往上追，我爷爷毕业于林彪任校长的抗日军政大学，1941 年就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我姥爷也是四几年火线入的党；另外，我爸，我叔，我两个舅舅，全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从小就受革命传统教育：艰苦朴素，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解放全人类，军民鱼水情之类。

老威：穷棒子翻身闹革命吗？

武文建：我家也不穷，我爷爷在旧社会上中专时，就秘密入党。据我姥爷讲，他哭着喊着，死活要上抗大，具体怎样牺牲的，连我爸也不大清楚。我姥爷干地下党，被日本鬼子抓过，严刑拷打，背上还烙了一大块印。由于姥爷口紧没招，日本人也没拿到实在把柄，所以村里乡亲就凑了两头猪去慰劳皇军，把姥爷给换了回来。我妈说，姥爷文化没爷爷高，革命意志也不十分坚定，被皇军一吓，胆就破了，甘愿做纯粹的农民。在战争年代，胆小自然做不了干部。

家族就这种传统，所以，虽然根正苗红，父母也就是做老实工人的命。我也老实，子弟校毕业，分配到燕化后勤，学厨子。年轻人不乐意，但我爸说啦，组织叫干啥就干啥，不准闹情绪。到了 1989 年，我刚 19 岁，在餐厅工作了两年，还没转正。

那时我迷上了油画，专门拜了个老师；我每天疯狂地学习，连炒菜也琢磨着绘画，联想着梵高、高更。我不知道学潮怎么开的头，我对政治气候也不敏感。胡耀邦逝世没多少天，我搭公交车进城，

去中国美术馆看一个画展。出来后逛大街，发现有许多学生在游行，抬着胡耀邦的像。我站在街沿边看了一会儿，还捐了一块钱呢。

老威：此刻你还是一个旁观者。

武文建：许多所谓的暴徒这时都在旁观，也没想到自己日后会卷进去。

老威：你具体投入是什么时候？

武文建：我一个小人物，象一颗芝麻粒掉进汤锅，所以谈不上“投入”。当时天安门还没多少人，热闹都集中在王府井一带。我一小伙子，自从做了画家梦，就不爱上班了，只要没事儿，就喜欢往城里跑，竖起耳朵到处听新鲜呗。

直到 5 月 20 号，李鹏傻屄发布戒严令，部队分儿路准备进城了，北京市民才开始起来，声援学生。燕化也在那天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我们先在火车站集中。当时从长安街到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比国庆典礼还喧闹，我跟在队伍里，很激昂，却没任何政治动机。许多人和我一样头脑单纯：就是爱国，声援学生。

老威：你参加过几次游行？

武文建：大概 4 次吧。天安门热闹起来后，我莫名兴奋，有时进了城，就一宿睡在草坪上。5 月 20 号游完行后，有人说：“我们工人阶级能否帮这些学生做点什么事？”于是大伙就派我去天安门指挥部接受任务。

我是楞头青，一挽袖子就上了。当时设了六、七道卡，可真够严的。我口袋里揣着《工作证》，一被挡住，就掏出来，哇啦哇啦解释。好不容易进到最后一道卡，见到的所谓“指挥部”就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底下，一些学生领袖裹着灰不溜秋的破衣裳，胡子拉碴的。我当时就立在那儿，衣领歪斜，也不认识谁是谁，就大声说：“我们是燕化工人，你们需要帮忙吗？我们有一大帮人。”学生们把我围在中间，上下打量好一阵儿，其中一个说：“让我们

研究一下。”

我等了几分钟，刚要出去，一张纸条还真递过来了，内容是：“请你们去天安门东北角维持秩序。”署名为“高自联常委遥远”。

于是燕化的100多人就去东北角维持了一宿的秩序。当时的广场可真够乱的，因为李鹏的戒严令下达后，各种谣传蜂起，北京的市民们非但没叫吓唬住，反而被激发了，拿老毛的话说：“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老威：广场聚集了多少人呢？

武文建：汪洋大海啊，我哪数得清？我几乎累趴下了，但是被那种人性突然之间的升华所触动。许多老百姓自愿到天安门，送水送东西。有个70多岁的老大爷，由他儿媳妇领着，挤过来，递上两大包。他媳妇嚷着解释：“我们不让老爷子过来，他偏过来给你们送吃的，家里拦不住啊！”我都感动得掉泪了，那种人性的纯粹世界，唉，真是一去不返了。

老威：你就留在天安门了？

武文建：没有，撑了一两天，燕化的人还是回去了。在之后的十几天，我只进过一次城，我呆在家里画画。直到6月3号晚上，我边看电视边画画，突然屏幕换了，并且宣布不许市民上街，不许什么的，要采取行动什么的。我急坏了，一宿没睡，第二天大早就急匆匆地进城去。

老威：你可真够勇敢的。

武文建：我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我打小被共产党洗脑，相信“军民鱼水情”，所以做梦也想不到会开枪杀人！我按捺不住，一定要去天安门看一看，我暗地希望那一切都不是真的。

公交车在天桥停，我下去，沿着大街一直走到天安门，地上全是一滩滩的血。我有一张画，就涂的这些情景，一块血，一个圆圈——我十几年的红色教育就这样全被颠覆了。

老威：还能走得通吗？

武文建：能走得通，就是乱。这一滩血，那一滩破烂，枪声稀稀拉拉的。当靠近前门底下，我突然望见一大片解放军，人人手里都握着齐眉的棍子，就迎着跑过去。

老威：你找死？

武文建：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别看我只有 19 岁，却反感扔砖头，砸瓶子一类的过激行动。我还是愿意相信解放军——只要不被激怒，他们还是不会丧失理性。所以我就迎过去，可这时，有市民蹦出来，从我身后向当兵的扔砖头。我急忙挥手叫道："别打！别打！别激化矛盾！"

老威：你太傻了！

武文建：是傻。甩砖头的转眼跑了，我没甩砖头，就理直气壮地站在原地。可说时迟，那时快，蓦地从斜对面爆出一声吼："就这小子闹的！就这小子嚷嚷得欢！！"我本能的扭头，哎呀！绿油油的一大片，都把棍子举过头顶，直扑过来，我浑身一麻，蹭地就窜开了。

老威：你还能进到广场？

武文建：坦克和部队都扎在里面清场，进不去，只远远望见在冒烟。

老威：当兵的训练有素，你能跑掉吗？

武文建：农村兵普遍腿短，再训练，先天不足，也跑不过我这腿长的。加上这是奔命呀，一大片绿追一个蚂蚱，有一刻腿软了，棍子头估计是铁的，擦着我的背梁骨，嗡地就下去了。我一炸，跨腿就窜了 2 米多远，真疯了。

我是北京人，熟悉地理，拐进了一条胡同，当兵的也害怕，就不追了。可我背上淤了一大块伤，黑紫色，半个多月也没消。

老威：到底有多少人追你？

武文建：魂都飞了，还记得数？估计有好儿百吧。

老威：只追你？

武文建：像赶鸭子，我感觉前后左右都有人在逃。一个小伙子，只比我慢了两三步，就被一棍儿给撂翻了，接着叫绿色盖住，棍子密密匝匝地打下去，卜卜卜，发闷。我估计铁器砸肉体都这种声儿。

老威：你在逃，怎么能看见呢？

武文建：我已窜入老北京火车站旁边的胡同，见当兵的回头，就趴在那豁口看。就 50 米，清清楚楚，把人打死过去了。后来当兵的撤了，我和躲在车站里的几个人，才敢出来救护。我抱起那人的脑袋，与其他人一道穿了一条挺长的胡同，（可能是糖人胡同）直接把他送到治眼的同仁医院。

老威：那人是谁？还活着吗？

武文建：当时还有气儿。可那脑袋已经变形，这出来一大块，那出来一大块。

老威：烂了？

武文建：没烂，也没血，可脑袋已经不是脑袋了，胀大了一倍。像有个外国画家，专画变形脑袋的，叫，叫培根，对，培根的作品。我搂着他，边跑边问："你是哪儿的？"他还应了声："首钢。"后来我们截了辆三轮板车，一路狂奔，进了同仁医院。但见那过道上，一溜，全躺着伤员。我们把人交给两个身上沾满血迹的护士，就退了出来。满腔悲愤，脑子乱极了。

老威：医院里躺着多少人？

武文建：真不知道。在过道的门口，护士就过来接人，不让进。我绕楼一圈，感觉所有的房间都是满的。走在街上，我的眼泪还哗哗地掉，天晚了。六月四号，铭心刻骨，我在街头歇了一宿，想的

都是大问题，国家怎么办？我怎么办？

老威：你睡在哪儿？

武文建：前门附近的 5 路公交车站，寻了辆公汽就上去了。车内有十几个落难者，学生、市民、工人，外地和本地的，大伙聊了整夜。

老威：聊什么呢？

武文建：除了骂大街，没别的。还提到拿枪干他娘的。直到天亮，我才搭班车，回到家已是中午了。由于热血还在胸中荡漾，我就找了件体恤衫，用毛笔写上："还我民主！还我自由！"后背还是国父孙中山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穿着这抗议衫在燕化厂区游走，逢人便说城里的情况。厂区十字路口聚了很多职工，把路都堵断了，公共汽车开不动，连乘客也下了。大伙推举我讲话，根本不由我分说，许多手就又推又举，把我弄上一辆 130 货车；还嫌矮，就把我弄上转盘旁边的架子楼……

老威：你演讲了一番？

武文建：我—19 岁的小伙子，哪有口才？不过呼了一阵儿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罢工！罢市！""反对镇压！"我还推磨一样旋转着，让大家看身上的字——后来这些举动都上了《起诉书》。我成了"暴徒"，可我哪有暴徒的本事，我连石头都扔不远。

老威：我估计混在群众中的便衣不少。

武文建：都是一两代、两三代的燕化职工，从小就在一块混，谁不认识谁呀？谁家的孩子在干啥？谁家的老儿在派出所干警察，都熟悉，所以用不着便衣。人们都疯了，一千多人哪，后来不用我喊，下面也狂呼口号，甚至叫嚷着开车进城干解放军去。可正在这时，我爸赶来了，是派出所报的警："武师傅，你家老二在造反！"我爸一拍大腿就来了，刚撞上我从架子楼下地，就被我爸劈胸一把

揪住："兔崽子你……"

我一把抓定老头扬在半空中的巴掌，像个英雄一般断喝："你别打！"

周围簇拥着不少石油化工学院二分院的学生，不认识我爸，见有人打英雄，不干了，转过去扯住老头就要下拳头。我立即拦住并大喊："大家别打了，他是我爸！"

老威：后来呢？

武文建：大势所趋，群情激愤到天晚也就罢了。我爸的劲儿可真大，死拽着不松手，直到我跌跌撞撞跟他回家。父子俩都感觉落差太大了，一贯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人民政府、解放军一刹那翻了个个儿。我爸是条汉子，在我的印象中，只有我生母去世时熊过一次，可这次，他熊到底了。在屋里，他没再打我，而是说："你六月四号进城，那么乱，连招呼也没打，晚上也不回。我一宿都没睡踏实，外头一刮风，我就惊醒，去你屋里看，折腾了六、七次，天亮都合不了眼。你妈死得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的罪就大了。"老头子话到这儿，泪花儿都出来了，他又说："上午上班，我又从单位回家，进你屋看，见被子抖散了，知道你小子没被乱抢打死——刚松了口气回单位，派出所的就叫来了。"

我爸熊了，我的情绪也落下来，挺心酸。我说："已经这样了，好不了，肯定要抓我。那我还是先躲躲吧。"我又说："这么大的一场运动，不会说完就完了，估计要打内战。"我爸可听不得这个，他说："你不能再闹，再闹我就死去。"

我还能辩什么？他再拥护共产党，他是我亲爹呀。于是我匆匆收拾，连夜逃到河北老家。当时奶奶还没去世，我就住她屋。农村狗多，夜里一有响动，就吠成一片，于是我就跳起来朝外瞅瞅。那十几天，我就没睡过好觉；后来落网了，我反而睡了一踏实觉。

老威：什么时候？

武文建：大概二十几号。

老威：这么快？莫非是你爸漏嘴了？

武文建：也不算漏嘴，人家上门一问，我爸直接就说我回老家了，还把详细地址都给说了。

老威：你爸出卖你？

武文建：相信政府相信党，这就是我爸。他跟燕化分局一位副局长是朋友，去求了情，人家也答应，只要找出你的儿子，一定宽大处理。副局长还向派出所打了招呼。我爸以为，他儿子最多关几天，教育教育就放了。他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判 7 年。

我爸还从单位借了辆车，亲自到奶奶家接我。他还挺高兴，说文建咱们回去吧，北京平息啦，没事儿了。于是父子俩说说笑笑上车，刚开出村口，却见两辆车拦在那儿……

老威：设了个套吧？

武文建：差不多。当时农村好躲人，陌生人一进村口，狗就叫。我还给我的绘画老师打了电话，他催我："你赶紧跑吧，越远越安全，估计你在外头躲个一两年，这事儿就平了。"我边答应边天真地说："行行，我带着画箱子，沿途还能画个素描，讨个饭钱。"我老师一听就急了："带狗屁的画箱子，你赶紧逃吧！身上多带点钱。"

我正在谋划逃离农村老家，却不料我爸已与公安局有口头协议，接我之前，他亲自给副局长老朋友通了电话，口气挺轻松——一个毛孩子，不是大家看着长大的吗？明摆着就那么点事儿，回来说清楚就行了。

就这样，我一见两警车挡道，就意识到糟了。旁边是庄稼地，正麦收季节，一马平川。我下了车，但没跑。这时警察全从车里下来，有人迎头就问："你叫什么？"

我答我叫武文……音儿没落，就闻一声嚎叫："抓的就是你！"

老威：有多少人围剿你？

武文建：抓北京来的暴乱分子，这是大好的立功机会，所以整个县公安局 60 多个人，全出动了。我被捕回县局，叫铐在一棵树上，才听见他们口气兴奋地打电话给北京："武文建落网了。"

我被大致审了一下，接我的人就到了。衡水县局一个处长，领着一帮人，还扛着摄像机，与北京方面相见。那处长像个演员，当众啪地立正，行礼，然后大吼：庆贺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成功！"

尽管我铐在树上，还是笑得差点背过去。我们家乡派出所所长与我很熟，这时也冲着我笑道："嘿，你小子跑得够快的！"我回道："嘿，你们也来得够快的！"可不是吗？500 多华里，感觉转眼到跟前了。

但那个处长大约受过文革洗礼，不懂调侃，竟用他粗大的指头直戳我的面门，咬牙切齿道："你还这么嚣张！"那种气急败坏，似乎我强奸了他家闺女。临走前，县公安局长倒还平和，与我聊天，我说："你别跟我谈这个，咱们 5 年以后再见。5 年，就 5 年，这事儿肯定平反。"

就这样，我被铐回去，在派出所关了两夜，转分局关了两个月的小号，再由市局执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89 年 9 月 7 号，有一批同样罪名的人被集中关进七处，即北京市看守所。从此，我在这儿一蹲大半年。

由于我的事实清楚，只审了 7 次，没费多大的事儿就拍板了，7 年。

老威：一个号子关了多少人？

武文建：我们把号子叫"筒"，大筒关几十人，小筒关 7、8 个人。那是苏联援建的老式监狱，够牢实，一进门，两边都是通铺。当时在里面的还有诗人叶文福，他写过《将军，你不能那样做》，名气很大，学潮期间却宣布退党。我亲耳听见他在楼下吼："我操

你妈！”看守拿他没奈何，就抱怨：“还是诗人呢，真脏！”

还有往天安门老毛像扔鸡蛋的三人——余志坚、鲁德成、余中岳也关在这儿。余志坚曾先后和我关一个筒，我读到过他写在墙上的诗：“仍然要砸，砸不碎的酱缸/仍然要爬，爬不上的山巅……”以前我能背下来，时间一久，就记不全了。

老威：这三人太惨了，谣传两个人疯了，鲁德成冒死逃到泰国，申请政治避难，还被拒绝，几乎要被泰国警方遣返。

武文建：回来就死定了。余志坚判无期，鲁德成 15 年，关楼下，听说他曾与混入天安门的一台湾特务住一筒。北京第一批大概毙了 9 个六四“暴徒”，有一个二审改判，活了，因为检查出神经病。还有一个传奇人物，叫朱中生，他在天安门广场进第一辆坦克时，跳上去撬那铁盖子，结果被拍了下来。这老朱一二审都死刑，已经脚镣手铐，打入死筒等待复核上路了，可那张纸始终没下来。他在死筒囚了两年多，人都变形了，才改判死缓。受的刺激太大了。你知道在看守所，隔三差五就有人上路，开一次门，受一次刺激，如此心惊肉跳几百天，才改判。依法卸铁镣子，你猜怎么着？他不习惯了——瘦成鸡脚的腿发飘，一迈步就腾云驾雾。他告诉我，还不如拖着镣子来得踏实。

劳改时，我和这老朱睡上下铺，经常聊天。知道他爸爸曾是北京市邮局一小干部，在文革中下放改造，自杀了。剩在外头还有两个姐。我曾对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死成吗？你爸在阴间保佑你呢！就一儿子，没了，香火就断了。”他连称“有道理”，否则没法解释自己还能捡一条命。

老威：我先后和 20 多个死刑犯呆过，知道判了死要活，真比登天还难，这人的命也够硬的。

武文建：还有好些身为退伍军人的所谓“暴徒”，想法很纯粹：因为自己当过兵，当然不愿当兵的挨群众的打；可也不愿那些单纯

的学生挨枪子，所以在关键时刻，出头阻挡军车，结果一判就是死缓、无期。

老威：对比之下，你觉得自己挺幸运吧？

武文建：19 岁，判 7 年，当然幸运啦。当时一辆中巴囚车把我拉到中级法院，下到地下室，法警就直接塞我进一铁笼子，演戏就开始了。

说起来真没面子，地下室两边的屋子全满了，法官看样子有些尿急，就在过道上开庭。律师也是指定的，程序快走完了，他才说了一通“年纪尚小，无知，请求从轻”之类。

老威：庭开了多久？

武文建：就 1 个多小时，宣布延期宣判；1 个多月后发给《判决书》。我懵了一下，想想出狱才 26 岁，就适应了。后来下了监狱，比较周围的人，更觉自己划得来，好些人也没干什么事，就在人群中叨唠叨唠，激动了一番，就判了七八年或十来年。

可判决下来我还是上诉了，主要是拖延时间，怕去劳改。二审开庭倒挺正规，好歹在屋子里。我没请律师，就自己辩护说：“赵紫阳不是总书记吗？不听他的听谁的？当时全国都在传，李鹏是非法政府——我还是受害者呢。你们现在审判我，当初为什么不去制止谣言的扩散？”

法官没来得及反驳，旁边的哮喘陪审员却用老妇女的腔调插一杠子：“你看我们当时就能把握好方向，不受影响。”

我说：“你们法院也游行啦，公、检、法系统都游行，你们政策水平高，为什么不上街制止去？现在判我，算什么本事？”

这话一出，陪审员啪啪拍桌子，立马升级为泼妇：“我不跟你这种人辩论！“

我却犟起来了：“你们说我‘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才 19 岁，有这个能力吗？”

老威：的确滑稽，但判不判，也不是法院说了算。

武文建：对，上面已定好了。比我冤的人多啦，比如大兴县有亲哥俩进去了，哥哥无期，弟弟 13 年；还有亲哥俩，哥哥 21 岁判 15 年，弟弟 19 岁判 9 年。张宝生你知道吗？年龄最小的暴徒，没爹没妈，掏羊粪的，15 岁判 15 年，罪状是揍解放军……

老威：15 岁？有力气揍解放军吗？

武文建：被拍下来，就跑不了。还有个哥们，往坦克上扔了个筐，火着了，判个死缓，现在还关着。还有挡坦克的王维林，筒子里盛传他栽进来了，可死活不知。我估计在当时，活着也得扒层皮。连明星陈佩斯都关了一宿，我算什么。

我是 90 年 3 月 9 号离开看守所去北京市第一监狱的，分在直属队。那时代号 01 的大政治犯徐文立还在。他走的时候，我刚好在著名的王八楼中厅画文化衫，他在下面望我一笑，招呼道："我走啦。"挺瘦的一小老头。

老威：你认识徐文立？

武文建：旁边人告诉的，并叮嘱保密。刚进去，我还挨了揍，因为这是规矩，每个新犯都得挨揍。之后就是学习，上面挺重视，不断有官员来视察，大概是看看这些暴徒是否长得青面獠牙吧。

老威：除了秦城，六四暴徒们都关在这儿吗？

武文建：10 年以上在这儿，10 年以下关天津茶甸，劳教在大兴。我送一监是因为戴反字，反革命暴乱、组织、煽动等等，大约有一百五六集中在这儿。而秦城，除了部级就是精英吧。

老威：我听说陈子明曾在一监。

武文建：在二监。一监原在市内，因为要申办奥运会而取缔了，我们就转到二监。我老见陈子明在楼下溜跶，也不穿囚衣，冬天着蓝色羽绒服，夏天一身运动衫，剃一秃瓢。听人说，监狱长找他：陈子明，我们聊聊。他却挥挥手道：去去，你没资格和我聊天，要

聊，就把司法部长叫来。

老威：有脾气。

武文建：他判了 14 年，是监狱里唯一拒绝穿统一囚服的犯人，因为没有罪。后来他得了癌，保外就医，可就是不出国。所以陈子明称得上是六四精英里的一条汉子。

老威：那些六四“暴徒”的劳改状况怎样？

武文建：非常惨，干活，一直干活。入监集训后，就干外加工，锁边缝扣子，一天十几个小时。六四以后，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一致声称暴徒们绝大多数为劳改释放犯，这惹火了当时的国家劳改局长魏孝如（译音），他快退休了，就站出来公开说不。他列出一个统计表，证明这批暴徒身世清白，有劳改劳教前科的比例极小。这事儿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

我觉得，共产党的这个劳改局长比许多海外流亡精英强，他至少敢说实话，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16 年了，谁替这些暴徒说过一句话？都是普通的北京市民，有优点有缺点，激于义愤，就干上了。扔几块砖，几个瓶子，一个筐；还有拦军车、演说、撬坦克盖，可同一个目的：是不让部队进城去屠杀学生。后来学生们撤出天安门，他们就成了“天安门事件”的主体——可在精英们创造的历史中，他们没有地位。

有一个瘸子，判了 10 年以上，我感到奇怪，就要过他的《判决书》看，上面写着：“用皮带猛抽坦克，打完之后，扬长离去……”还有人捡一钢锥，也判了 10 多年；还有扣下给养军车，把食品分给学生和市民充饥—— 一个叫朱某某的，大公无私地分了半天，车空了，自己却没捞着吃。他东寻西找，终于在旮旯里发现有只烧鸡。不料，这烧鸡上了《起诉书》，他判了 13 年，后来他在狱中冲我叫屈：“这鸡贵啊！”

老威：你同“暴徒”们相处得不错。

武文建：都是苦命人，一起干活儿呗。

老威：什么活儿？

武文建：什么活儿都干。我们还检查过橡皮手套，清洁工或者手术台上用的，套嘴上卜卜吹，看是否漏气。累极了，有个大胖子受不了，仗着脂肪厚，往肚子上拍针——因为他手指头粗，缝西服里子别扭。自杀不行，反改造行为，那就拍针自残。我还与《人民日报》的吴学灿是难友，我们缝，他帮着剪虚毛。一年多后，我都练得能背过手去穿针了。

老威：你们替哪家服装厂干？

武文建：北京友谊服装厂。夏天缝冬装，冬天缝夏装，满屋子飞着衣服毛，汗把小裤衩都湿了。太苦，真他妈想把厂子给他砸了。我受不了，绝食 4 天，有人劝我："你丫真不吃啊？做个样子就得啦。"还刷地往我铺里揣一火腿肠。

我是 1995 年释放的，减了几个月的刑。我爸做梦也想不到父子重逢要等这么久，但他的共产信仰没变，不愿说政府一句不是。他依然警告我："你要再折腾，我就去死。"有啥办法，再不开窍，他是我爹呀。

六四暴徒也陆陆续续出狱，无响无臭，得不到一丝关注。当年的激情烟消云散，时过境迁，世态炎凉，他们都极其厌恶政治。我还有个画画的手艺，卖过一段服装后，就能弄个广告，搞个设计。但我的多数难友，以前就普通市民，世道一变，没工作，连谋生都困难。有一哥们，六四前开饭馆，很有钱，学潮时送吃送喝，跟着栽进去十几年，出来后接着开一夜总会。他接济了许多难友，相当于"暴徒"们的民政局，但他一口也不愿提过去，特别是民运那档子事儿。

前不久，我与一难友通电话，他会雕章，我懂画画，本来挺投缘。但我告诉他，画了一批六四屠杀的油画时，他一下子就打断我：

“你弄那玩意儿干啥？牢还没蹲够啊？”我答：“这口气没出哇。”他答：“我的气早瘪了。兄弟，别去碰政治，太残酷，太脏。”

老威：中国有句俗话叫“无娘的孩子天照应”。

武文建：天不照应，就互相之间照应呗。先出来的，有一点家底的，就接济后出来的。目前判 15 年的都在外面了。死缓和无期，大约有十几个人，还在里面，硬着头皮扛呗。海内外的六四精英，这些年来，估计写了几十万篇文章吧——我每年都要看一些，就没一个字，为这些“暴徒”而写，好像这些人根本没存在过；好像六四事件就只有天安门，除了那儿，牢牢吸引住世界的眼球，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儿，一天天全被淡忘了。

这些人到底怎样定位呀？官方叫“暴徒”，而你们这些学历史、文学、新闻和社会学的有发言权的精英们，你们把曾是天安门运动主体的“暴徒”们叫什么呀？你们在广场慷慨激昂，群情激愤，好像为国为民为自由为民主，没一点私心，好像已经豁出去了——北京市民就是受你们的感染去挡军车，不让你们挨枪子，但是你们倒好，跑得比兔子还快……那柴玲，站在纪念碑下，一次一次地煽乎，纯得跟天使似的；后来跑海外，要退出民运了。你靠这个起家的，现在捞够了，要退出了——这当然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要忘了，当初多少人就是受你们——柴玲、王丹、吾尔开希、李录、封从德等等的感召卷进去的……就说我吧，六四那天在城里听信谣传，说柴玲，王丹，吾尔开希都被当兵的枪杀了，悲愤异常，我随后的勇气，就来源于这种悲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人太多了，你们负不起责；可你们在一篇篇回忆文章中，说的就是学生的那一点事儿。你们每个人都发展得顶好，聪明啊，算计得不错。

还有方励之先生，需要他挺身而出，却躲在美国大使馆不出来，被人家给接走了。方先生曾是我最尊敬的人，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当众说：“民主不是靠施舍，而要靠争取。”既然是争取，那你就走出来呀！和千千万万的北京市民站在一起呀！知识分子怎么都是些关

键时刻掉链子的人。

老威：你对知识分子期望太高了，文建。其实在 1989 年胡耀邦逝世后，已是山雨欲来，知识分子们卷入学潮的动机很复杂，不少人以为要改朝换代了，都不愿失去这最后的介入历史的机会，因为一旦失去这机会，就意味着丧失对未来的话语权。

武文建：没说话权就没历史吗？

老威：从古至今的规则就是这样，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挖掘真相，寻求改变这种精英划定的历史定局。

武文建：可我写不了，许多人不仅写不了，连讲也没人听。六四难属中出了个丁子霖，真是幸事；但六四“暴徒”中有谁呢？

王丹的回忆录我也看过，他没提一件事儿，就是在监狱中曾与六四暴徒们狭路相逢。隔了好几米远，他大声问：“你们怎么进来的？”暴徒们答：“我们是为六四进来的。”王丹于是很激动地说：“我是王丹，大家都是一路人，为争民主而坐牢，要挺住啊！”可其中一暴徒回答：“你才 4 年，我可是 15 年！怎么挺得住啊，哥们？”

话音一落，全场哑然。精英和平民擦肩而过，他们之间的墙是无法逾越的。

思想犯李必丰（上）

采访缘起

有关李必丰，我在文学纪实作品《证词》里，曾花费过不算少的笔墨。记得 93 年的某个夏夜，监狱院子里放老掉牙的革命露天电影，众犯看得津津有味，我和李必丰却退在人群外面仰望星星，讨论在宇宙当中，生命到底自不自由等大问题。李必丰突然说，他创作了一首上千行的诗，探问我有没有“指教”的兴趣？我却倒抽一口凉气，摆手答“不了不了”。

在我们那批六四难友中，李必丰的文字才华很醒目，所涉文体包括诗歌、小说、剧本、札记、哲学探讨、政论、呼吁书等等，但我从未把他的作品读完过。因为他的思维和双腿一样，走得太快，有时还是跳跃的，令人费解。例如“二进宫”才几天，在审讯的间隙，他就坐在黑牢里思考：“蚊子是谁发明的兵器呢？”

真有点古希腊哲学家的味儿。

李必丰真正打动我的，是以下这首诗：

“但冬季过早地来临/我们的树木开始干枯/我们再也没有养份去供养/于是我们的黑发被岁月的雪/冻得渐渐斑白/我们的皮肤像龟裂的田野/冬季来了/我们都爱冬眠/心脏累了/血液累了/我们在雪底下冬眠。”

这首诗带给我的回忆，首先是上世纪 80 年代，我读叶赛宁的青春时光。叶诗写到俄罗斯的冬季，阴郁的晴空，用了“打补丁的碎花布”或“肮脏的包头帕”等比喻；接着是政治犯在狱中仰望星空，讨论自由的情景；然后才是作者本人。“我们都爱冬眠”——李必丰说，其实他是个起早贪黑的人，一天睡不了两三个小时的觉；他“心脏累了，血液累了”，梦想“彻底冬眠”——他才 41 岁啊，就先后坐过两次共 12 年的牢，还曾偷越过 3 次国境，畏罪逃窜若

干次！

我还回忆起 26 岁就卧轨自杀的海子；还回忆起自己—— 一个曾经才华横溢的诗人，是什么令我一行诗都写不出来？

于是，在 2005 年 5 月 18 日，我专程赶回成都，在金沙遗址附近重逢了刚刑满释放的如今的诗人。

老威：时间晃得太快，一眨眼，你的 7 年刑期又满了！

李必丰：六四都 6 年了，廖胡子，你算我们这批难友中最幸运的。

老威：你指没有“二进宫”？

李必丰：不错。当年关在三监狱，你和佘万宝是上下铺，都判 4 年，没料到几年后，佘万宝又因中国民主党的案子栽进去，判了 12 年。你我加上许万平、蒲勇，总爱凑一堆，在晚饭后兜圈子，半个操场那么大的院坝，我们要暴走几十圈，还上气不接下气地畅想将来，猜测六四什么时候翻案，共党的寿命还有多长，等等。可如今，关满 10 年的蒲勇，出来 3 年就死了；许万平已经三进三出，累计刑期十几年，这次又栽——他本来只有半条命，重庆警方又那么黑，再判个十年以上，就只有报销在狱中；而我，六四 16 周年，就坐了 12 年牢，人都快疯球了。

老威：听说你在里面写了 200 多万字的作品？

李必丰：被搜去了许多，剩下的还有几十万字。我整理一些出来，你看看有没有市场。

老威：我手里还有你一沓诗和日记，保存了好些年。我晓得，你狗日的命贱，越遭整，想象力越丰富。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什么忘了，被关押了 50 年，写了一本青史留名的著作：《太阳城札记》，北岛曾借用这个书名作一组诗的题目。还有更厉害的一位，被绞死的前一天，完成了《哲学的慰籍》，从容解脱……

李必丰：所以……

老威：所以丰子啊，即使大限将至，也不可绝望。

李必丰：可我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民运家的料，咋办？

老威：那我们就在此地此时，一句话一句话地说。

李必丰：原先我们已经说过很多了。

老威：那是断断续续的闲话，十几年了，大部分都忘了。

李必丰：我想想，你得有点耐性。哦，眼下最早的记忆是 1970 年，我 6 岁时，背着书包上学堂。大群同龄娃娃，放羊似地涌进教室，我个头最矮，所以抢坐了第一排。老师进来了，在黑板前宣布："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同学们，大家都出去，按老师的点名，一个个地进来，照先后秩序坐。"

于是，小朋友们就乖乖听指挥，重新进一遍教室。一会儿，53 人都坐好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外头。老师放下点名簿说："现在开课……"

我急了，以为老师没看见自己，就垫脚探头，叫道："老师，还有我呢！"

不料老师回答："没有你的位子。"

我哭了，可还是鼓起勇气问："为啥？"

老师笑了，并且一字一顿地说："因为你是四类分子的狗崽子。"

我才 6 岁，当然不懂，只能挂着眼泪回家问妈妈："啥叫四类分子？"妈妈不好说，我就死缠，稍后才晓得，我爸爸在解放前加入过袍哥组织，当过保长。那一年，姐姐和三哥都小学毕业，也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剥夺了升初中的资格。妈妈见我懵懂可怜，就托熟人关系，找到小学校长。校长沉吟再三，才在最后一排给我放只独凳，后来见没人检举，又悄悄添了张桌子。

就这样，生命在屈辱和贫穷中萌芽，我从小就穿补疤衣裳，满

山遍野挖野菜，因为父母的收入加起来才 10 多元钱，远远填不了 6 张嘴巴。我不得不学会忍辱偷生，但往往忍辱也偷不了生。比如有一次，几个娃娃到家里玩，比赛着在糊墙的报纸上画圈圈……

老威：糊墙的报纸？

李必丰：70 年代，由于太穷太匮乏，城镇居民普遍用过期的报纸铺天盖地地糊砖墙。刚巧，我碰到了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头版合影，就鬼使神差地用铅笔“包围”了副统帅的头像——这非同小可，没隔几天，不知被谁检举了，我们家突然降临了大帮公差：包括绵阳县公安局、丰谷区革委会、人保组、所辖居委会等，穿制服和不穿制服的十几个人，屋里屋外，反复勘探。还拿相机四处拍，重点钉准被圈的副帅像，啪啪地闪。临走前，干脆把屋里有图片的糊墙报纸小心翼翼地起下来，都揣走，据说要带到县里去作透视化验，检查有没有隐形反标。当时，我一个 8 岁儿童，吓得钻床脚，公差们一出门，却被爸爸拖出来，狠揍一顿。这是我第一次挨父亲的打，也是第一次与政治沾边，很莫名其妙。

老威：后来呢？

李必丰：后来没查出个啥，才不了了之。但从我降生以来，阶级斗争的阴云一直笼罩着。14 岁那年，我爸爸患胃溃疡住院，我们在替他收拾床铺时，突然从凉席底下发现了许多份《申诉状》，还有《思想汇报》一类的东西。原来爸爸对戴“历史反革命”帽子一直不服，已申诉多年，却至死没个结果。当时哥哥姐姐要把这些犯忌的材料销毁，我却把它们捡起来，在心里，我发了个誓愿：将来有一天，把家里经受的这一切写出来。

由于家庭背景，我的小学和初中教育不完整，经常被赶出校门，只好忍辱求情，再转学。我曾经转过六、七次学，还曾失学去河滩拉船、背鹅卵石，备尝生存之艰辛。1985 年高中毕业，本来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却因户籍上的名字错误（把李必丰弄成“李必凤”，连性别也错了）耽搁了。为减轻家庭负担，转而考国家干部，以优

异的成绩进了绵阳税务局。

文学的痴心不改，我在工作之余，创作了许多诗歌和小说，并接触了一些文学青年，大伙一道搞了个“寻梦园”。不料文学青年的聚会也引起公安们的警惕，1987 年的某一天，绵阳市公安局一处传讯了我……

老威：上个世纪 80 年代被称为文学的时代，诗社多如牛毛，咋会独独传讯你？

李必丰：绵阳是四川最左的地方，我在狱中对你提过的《剑南文学》编辑刘德，仅仅讲了一堂课，质疑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就被判刑 7 年。所以，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吓一吓我这种小虾米，不算反常。我进了一处办公室，见桌子上有一份《本地区国民党特务名单》，就溜了一眼，竟瞅见“李 XX”，我爸爸的名字！

震惊之余，急忙后退，一处的便衣出现了，他问：“你就叫李必丰？我还以为有多大岁数呢。”接着他又自我介绍姓罗，并且说：“据调查，你们的诗社是非法组织，国家法律对跨行业、跨市县的结社行为不允许，所以要取缔。”那时我才 23 岁，血气方刚，就反驳：“你是公安，头顶国徽；我是税务，也头顶国徽，难道你说取缔就取缔？”

姓罗的愣了一下：“当然，目前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对你还很客气，可总有一天……”

我没理睬，转身就走。可没想到，诗社很快就被查封，印《寻梦园》的油印机、刊物、纸张全叫没收。公安一处找到我单位，要送我去劳动教养，但我是业务骨干，单位领导替我作了担保。

事后，局长亲自到我家，找我妈妈谈心，还叹息道：“这个李必丰啊，工作、生活都没啥毛病，可以后在政治方面要出问题！”

老威：税务局长有此先见之明，也算难得。

李必丰：80 年代初，绵阳警方取缔过一份叫《自由魂》的地

下杂志，抓了不少人，而《寻梦园》上登了一篇评论，名为《试论西方文明》，其中引用了《自由魂》上的东西。当局捕风捉影，将两者牵扯上，暗地对诗社重要成员进行监控。后来成为我同案犯的唐先全这时也回来了，他曾是新疆《阿勒泰日报》的编辑，思想活跃，在该报上，他甚至搞了“20 世纪影响中国的十大人物”的评选，其中有孙中山、蒋介石，也有魏京生。所以，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全国首先被砍掉的，就是《阿勒泰日报》。唐先全惹了祸，就跑回绵阳，我们一碰面，即臭味相投。对于我，这两年是黄金人生，我创作了大量的诗和小说，也结识了更多的文学同道。

转眼到了 1989 年，胡耀邦逝世之后，学潮兴起，我因不堪公安机关的迫害，就向单位交了辞职报告。5 月份，绵阳大中专师生上街游行，我们看了，心潮澎湃，就亲自跑到城郊的建材学校，企图与学生联络，却被纠察队拦在校门外，骂我们是“社会闲杂”，图谋不轨。把个唐先全气得跳脚大叫：“凭啥子？龟儿子们懂个卵！”我急忙劝住，耐心向对方解释：“人人都有权爱国，我们也可以组织市民游行。”

第二天，我们当真弄了些“声援学生”的标语和横幅，动员了一些市民参加游行。5 月 21 号，太阳热辣辣的，却有两三百个学生娃娃在市政府门口静坐。围观者不少，竟没人给汗流浃背的爱国者递一杯水。于是我的脑子一热，就站上一辆三轮车，开始演讲，号召大家给学生送水、捐款。那天我口若悬河，一讲几个钟头，嗓子嘶哑了也顾不上喝水。于是路人纷纷解囊，学生有了老百姓的支持，也士气大增。而我却因公开煽动，惹火上身，公安局扬言：“要抓税务局的眼镜！”

几个月后，演讲了啥子我自己都忘了，可警察记得，并且还上了《公诉词》。开场白大意是：“我不是学生，也不是工人，而是李鹏所说的‘社会闲杂’，一小撮中的一小撮，而这一小撮，就是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

为了追溯我犯罪的思想根源，《起诉书》里还引了我登在《寻梦园》上的诗句："这天太黑/月亮上的火山今夜看不见。"检察官曾是书生刘德的检察官，法官也曾是刘德案的法官，好像绵阳地区的政治案都是这套审判人马。检察官曾将大学同学写给刘德的毕业戏言——"莽娃子，你要改；若不改，要劳改"当作证词当庭宣读。而这次，这个文盲竟故伎重演，质问我"这天太黑"是啥意思？我答："天黑就是天黑，没任何意思。"他说："你狡辩，这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一团漆黑。"我说："我的眼睛不好，看黑就写黑……"

后来，经过绵阳《剑南文学》主编，你的盐亭老乡谢宗年的"专家鉴定"，"这天太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反动诗，构成铁证。

老威：你当场落网了？

李必丰：我闻风而逃了，径直去成都投靠同学。在爱国运动中心的人民南路广场，我们宣告成立成都市青年自治会，我当选为主席。

老威：具体有什么组织活动呢？

李必丰：与北京大学南下演讲团接触；并去西郊的四川工业学院，动员学生参加 5 月 30 日的全球华人大游行；还开会，想组织敢死队去北京声援。凭着诗人直觉，我发表末日演讲，认为"民主的 5 月将变成黑色的 5 月"，引起部分学生的不满，甚至去派出所告密，说我是"台湾派遣特务"……

老威：你怎么预感到末日的？

李必丰：5 月 28 号晚上，我睡在老毛招手像的脚下，梦见 6 个公安，手持警棍，凶神恶煞地喝问我："干啥的？"一下子把我吓醒了——可没料到，6 月 4 号凌晨，梦境重演了——我在同一地点昏睡至 7 点，朦胧中，先看见两辆救护车钻出若干医护人员，忙碌着；而后有几辆警车哇哇叫着冲到观礼台下，清场开始了，坚持在广场的几十个人都被带走。嘿，果真有 6 个公安沿观礼台阶上来，

用警棍指着我喝问："干啥的？"我出身冷汗，就答："记者。"随即摸出《四川经济文汇报》的《记者证》。公安没查出破绽，我又漏网了。

这期间，有一件事令我至今内疚：我们通过与院长辩论，好不容易从四川工业学院带出了几十名学生，不料在成灌公路上游行时，被仁寿县 XX 酒厂的货车直冲进队伍，当场造成 1 死 6 伤，死者为该校食品工艺系女生沙洁——而交警在处理这桩特大车祸时，却指责学生阻塞公路，拒不拘留肇事者。

话说回来，我漏网后即去四川大学，找地下高自联报信，于是大批学生又去广场声援。我亲自蹬了辆三轮，充作宣传车，直驱广场。车上除了印刷品、喇叭，还有川大二年纪的一位女播音员。学生与警察对峙时，宣传车就插在中间，女播音员举着喇叭，在我肩头上向敌阵喊话。可突然，一片绿森森的钢盔和盾牌冲过来，嘭嘭乱响，催泪瓦斯就弥散开来。我泪水长流地瞎撞，待眼前清晰，宣传车和播音员都失踪了。当时传言播音员死了，多年后才证实，她没死，只是被俘虏了。]

我们都徒劳地扔了些汽水瓶子，但很快抱头鼠窜，差点连鞋都跑掉了。我们又满怀硝烟地去工厂动员工人，无效；再转回广场边缘时，碰到绵阳朋友杨伟，未及寒暄，一颗催泪弹击中我的屁股，我哇地一蹦三丈高，眼睛针扎一般疼。杨伟拽住我瞎跑，远远近近，全是棍子打人的闷响，许多脑袋被敲得鲜血淋漓。

我们目睹人民商场燃起大火。许多警察聚在那儿，有救火车，但没去救火，而是追打扔石头的行人。有个女娃在二楼窗里喊："不准打学生！"一个警察就闻声把催泪瓶甩进去，只见一股腥红色的烟嘭地喷了出来。

四处狼烟，我只好又回到四川大学。高自联的人却警告我：马上逃，部队已占领科技大学，转眼就进入川大！他们提供了三轮车和一顶草帽，我又落荒而逃，回到街头，见到六四这天感人的一幕

——6 个居民老太太，跪在东风路中间，苦劝电讯工程学院的声援队伍别去广场："全部都是兵，你们莫去送死！"

4 号和 5 号，我都在大街小巷晃荡，部队和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在进行拉锯战，许多人受伤，鲜血迸溅，我亲眼见成都五医院里躺着不少伤员，有个女学生正在抢救中。

人民商场的大火燃了很久，直到 5 号下午，我又转回来，还见焦梁断柱在冒烟。有个人从灰烬中捡了瓶高橙，却被围观群众痛打一顿，责骂他"发国难财"。

有人说，人民商场大火是隔壁人民东路派出所警察开枪引发的，他们甚至抵着人的胸脯抠扳机，激起众怒。大伙把固定栏杆的水泥桩子撬起，去封派出所的门，阻挡里头的警车冲出来。

6 月 6 号，成都沦为一座兵营，大势已去，我们七、八条落水狗就结伴逃往云南，其中有工人、学生和记者。我躲在昆明一个同学家里，喘息未定，又遇上 6 月 8 日公安局的大搜捕。于是从上海、北京逃亡至此的各色人等，重新结伙窜向西双版纳，到了景洪，再遭遇搜捕，大部分人被抓。我也落网，在景洪县看守所关了一宿，我坚称自己是记者，在边境一带体验生活，写报道，就蒙混过关。释放后，我重新联络了几个幸存的逃亡者，在缅寺雇了个和尚充向导，开始偷渡。

边防较混乱，我们过国界时还照了集体像，跟着进入原始森林，不久和尚失踪了。我从小腿快，加之逃命心切，所以在林子里猛窜了一会儿，就与其他同伙失去联络。我"哎哎"叫唤了几十声，也不见应，于是牙关一咬，透过枝叶判断过方向，朝南走。我起码奔了三天三夜，人都累虚脱了……

老威：这段历险，我在监狱就听你讲过。

李必丰：印象太深刻了。原来想象密林内有毒蛇猛兽，还买了把砍刀带着，后来也嫌重，就丢了。出密林时我躺在地上，稍远处，

隐隐有缅地村庄在阳光下闪烁。我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就顺着山坡朝下溜，直到屁股接触到一片旱地芦苇，才站起。我拨着一人多高的芦苇，哗啦啦地往前，走了几百米，突然出现了岔路口。

直觉告诉我，向右拐是正确的，而我却鬼使神差地直走。脑袋嗡嗡响，"向右拐！向右拐！"的声音老在回旋，可我还是不回头——这个意识无法支配双腿的情景，我曾经梦见过多次。直到树叶越来越密，迈不动脚，有一枝头还斜插进镜片，啪地扎了眼皮。我一痛一惊，方猛然刹步。我的耳边响起人声，听不懂，待我听懂"不准动"三个字时，已被包围了。

估计有七、八个人端枪指着我，"举起手！"又是三个字。我下意识地刚把双手举过肩头，蓦然看见一团红光冲着我——那是乌黑枪嘴上闪耀的太阳！汪地一声，我双膝一软，灵魂骇出窍了，裤裆也尿湿了一大块。

待灵魂回窍，我已被两个人架着，双腿拖地进了一村庄。你猜怎么着？俘虏我的居然是四川老乡，70 年代跑过去参加缅共人民军的重庆知青！当时，人民军正在中国的支撑下，与政府军打游击战，所以虽是故乡人，他们还得遣送我。

我怎样哀求都没用，这些，我对你讲过，你还写进书里了——他们通过中缅百姓杂居的村子，把我五花大绑，交给边防武警。松绑后，8 个武警列队，叉开腿，命令我从肉胯的通道钻过去。我不干，武警班长一起腿，我被踢飞起来，至少几米开外，才一个狗吃屎跌下来。裆内一阵剧痛——自此，落下了疝气这病根，夏天乘凉，稍不留意就漏出一大砣。

我差点没被打死。而后，哨所雇了辆拖拉机，把我双手捆牢，连一根长绳，在后面拖拉着跑。脸已变形了，衣服成了刷把，他们就这样把奴隶带回景洪，关在看守所。审问我："烧了多少军车？杀了多少解放军？抢没抢东西？"我否认，他们嘲笑我："哪你为什么越境逃跑？"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记者，来边境体验生活，写报道，不慎迷路越境。他们搜出了我的《记者证》，竟意外地释放了我。

兜里揣着他们发放的 1 元钱释放费，我露宿景洪街头，走投无路，却不敢贸然去联络任何人。缅寺更不敢接近，因为和尚向导一旦暴露，问题更严重。我只好走回头路，过了澜沧江大桥，一天一夜步行到思茅，再爬了一个长坡，顺坡一下，又耗了一天，到了普洱。这其间，花 1 元钱买东西充饥，敲老百姓的门讨水喝，却没脸讨吃的。沿途都是芒果和芭蕉树，我爬不来树，偷不来东西，抛石头砸，累瘫了，芒果也不落下。芭蕉涩口，咽几口就头晕目眩，有中毒的感觉，所以不敢多吃。拢普洱，半步也挪不动了，就晃着《记者证》，死皮赖脸拦了一辆车，许愿到昆明再加倍补车费。

如此到了昆明，找到我的同学，他二话不说，就下了一洗脸盆面条，我嗖嗖地吞下，才揉着肚皮，有了说话的气力："报国无门，逃亡无路，我只有回家。"同学当即给了我几十元钱，让我住店一宿，再乘火车——可没料到在当夜 10 点钟，我刚出门，没走远，迎面就来了十几个便衣。

"李必丰？"

我点头。

"你被捕了。"

跟着，我被关进昆明西山派出所。

老威：你被抓抓放放了几次？

李必丰：景洪看守所就进了两次，虽然发现了我随身带的《成都学潮记实》，可还是放过了；昆明看守所关了 7 天，又放了，让我自己回四川。最后是在绵阳老家彻底栽的——审讯时，出示了我这一路的照片，同谁接触了，全记录在案，太悬了，幸好这长线没钓到大鱼。

我的同学受到牵连，关了几天，教育释放；98 年我再度东窗

事发，又去找他，刚从他家出来没几分钟，就被钉上了。我二进宫后，他被命令天天去国安局报到，工作也开除了。

老威：你兜了一大圈，耗了多少时间？

李必丰：我 7 月几号栽的，差点连脑壳也要没了。当时，成都东城公安局连夜提讯，追问人民商场被焚的细节，我吓出一头冷汗，晓得一旦定性为纵火犯，就死硬了。于是，提供了一连串证人名字。幸好天下有良知的人比较多，有两个书面证明商场起火时我不在场——这一定是父亲的亡灵在保佑。

我在收审所关了两个多月，定了性，就转绵阳市看守所。本来警方想以“成都市青年自治会”为题目，做成集团案，无奈证据不足。于是就以“反革命宣传煽动”治罪，我判 5 年，唐先全 3 年，杨伟劳教 3 年，刘家梦、刘应德另案处理。

老威：你在看守所关了多久？

李必丰：加上收审，总共一年多。

老威：里面的状况如何？

李必丰：自从坐牢，你一直在写作，我也是。受你的影响，我也描述了这段经历。有一次，我托跑巷道的贼向外头寄信，却被告密，我被整惨了。

老威：我在看守所挨过整，看守惯常的刑具是土铐、绳子和电警棍。他们怎么整你的？

李必丰：拳打脚踢，还把其他犯人提出来打，让我欣赏；使电棍烙舌头，一股青烟，一个跟斗；还端来一盆水，令我站进去，以电棍戳水，触电的波纹一翻，人就痉挛，向后一个倒栽。反复几次，就鼻青脸肿了。

老威：看来，各地狱警弄人都挺有智慧。

李必丰：我在自己的小说里，用大量篇幅记录了一个叫王 X

的变态女警察，她喜欢提英俊犯人出去，举行专场演唱会；还喜欢提着电棍巡视监房，只要发现门底有洗澡水淌出，就蹑手蹑脚拉开铁门，大吼："狗日的，你不要脸，老娘也不要脸！"举棍直取全裸犯人的命根。入地无门，犯人越惨叫她越狠毒，两眼冒红光，还不由自主地哼哼。还有，每隔一两个月，她要领医生来检查性病，有病就一脚踢回来，没病就提取精液，不知派啥用场。

老威：怎么取法？叫大伙打手虫？

李必丰：自己当众弄不出来，医生就掐敏感部位。总有办法嘛。

老威：继续讲。

李必丰：1991 年夏天，雨水密，涪江暴涨。你的《证词》写过狱中雨季：发霉、挨饿，我们更惨。有个晚上，正迷迷糊糊，却梦见蛇在添我的脚板心，本能地一缩，却溅起一片水花。我惊叫一声跳起来，原来洪水已淹上床铺。众犯睡在水里，逃跑无门，大伙一齐呐喊："开灯！开灯！"可平时通宵通明的灯却没了，大伙漆黑一团地搅着水，没人敢挪半步，因为一跌下铺板，就陷入灭顶之灾。

放风天井的水已三米多深，我们垫起脚，避免水进嘴巴。此时听见门响，一个警察游泳进号，指挥大家手牵手地转移。一直折腾到天亮，我们脱险了，水还没退。

我们被转押至收容遣送站，一间号房约 15 平方米，却塞了 70 多人，肉贴肉。雨过天晴，盛夏的毒日头一出，号内热毒蒸腾，许多人的嘴像缺氧的鱼一般开闭着，太可怕了。

下午，看守所的水抽空了，我们又转回原地，满号的稀泥浆子，没法弄，人都变成赖蛤蟆了——将就着活下去吧！

不久，高院的裁定下来，维持原判，我被送往南充的省一监狱劳教。

思想犯李必丰（下）

插记

李必丰在四川省第一监狱“改造”了 1 年多，由于会写诗，得到一位爱好诗歌的女警察的赏识，被分派卖小百货，日子好过起来。他还结识了民运战友杨伟、倪凯波等人，“杨伟当时不满 20 岁，做仓库保管员，却出其不意地往监狱生产的羊皮手套内塞纸团，提醒这是劳改产品，希望顾客不要购买。结果，一批价值 200 万的货从香港市场被退回。狱方轻而易举就查出内奸杨伟，于是恼羞成怒，倒吊他几天几夜。”

李必丰还见着了六四期间入狱的“打、砸、抢”暴徒，都是普通的成都市民，由于声援学生而对抗军警，下场是死里逃生，却被重判死缓、无期或十几年。“暴徒”中不乏根正苗红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甚至包括川绵一厂的团委书记。

对于我，李必丰提供的极有价值的见证，是他亲眼看见我访谈过的冤死者杨继年，“那是 91 年秋天，我跟政府去监外进货，见一个乞丐跪在大门口，一声高一声矮地吆喝，求人民政府继续关押他：‘坐牢至少还有张床，还有个房顶盖着，一放回家，连块瓦片也没有了。’

“回舍房一打听，才晓得这个杨继年很出名，他 11 岁坐牢，关了 34 年，放回去却无法糊口，所以一门心思要重返监狱贡献余热。”

1992 年 10 月，李必丰、杨伟等煽动类反革命被转往位于川东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不久，我也从重庆郊区的省二监转了去。于是，六四的难友圈急剧扩大，从四川各地陆续转来的 20 余人都集中羁押在 2 大队。

2 大队一楼一底十几个囚室，加上篮球场大的院坝，却装了近

200 犯人。我曾在这儿接触过自中共建国以来的不同时期的反革命犯：会道门、暴动、封建迷信、土皇帝、潜伏特务等等，形形色色，这为我日后完成《证词》及《中国底层访谈录》积累了较丰富的原始材料。

因历史原因，六四犯与其他犯常有龃龉，但至少我在的时候，大环境还比较宽松。狱方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变着法子赚犯人的钱。我与李必丰成了伙食搭档，日日享用高价“大肥肉炖萝卜”，把脸蛋营养得红扑扑的。我还炼成了吹洞箫，还在逢年过节时，以高墙电网为背景，照了不少高价像。

我导演的一张政治犯集体像后来成了海外竞相刊登的抢手货：两排六个人，一律着囚服，大背手，面目深沉，如抗大学员——我没料到此事引发了地震般的连锁反应，1994 年初夏，我开释几个月之后，李必丰说：“狱方突然袭击，将六四这伙人集中控制，然后从身体到铺位，探雷一般仔细搜查，把我们所有的照片、家信、文稿都缴了。此后，照像被禁止，我们被化整为零，分散在各大队的刑事犯中间实行严管，一举一动都不自由了。”

我深感歉意，李必丰却摇头：“谁也没埋怨你。因为露露脸，也算给外头一种提醒，总比付出了代价却无响无臭强嘛。”

然而，1994 年 7 月 4 日，美国的国庆节，李必丰，一个普通的政治犯却无响无臭地刑满释放了。像成千上万同种类型的政治犯一样，他被警车专程押送回老家，移交给当地派出所，接受法律规定的“剥权期管制”——如此种种，海内外至今不见任何报道。

老威：你出狱不久，我去绵阳丰谷镇上看你，还在你家乡的河里游过泳。当时，你似乎在社队企业打工，整天早出晚归……

李必丰：我想躲你，过一段平静的日子。因为家里人像警察一样，把我看管得很严。况且，我女朋友等了 5 年，不能再让她受累

了。

老威：跟我出狱的状况差不多。

李必丰：你出狱就离婚，而我匆匆结婚了，还有了孩子。本来，我规规矩矩，不再想入非非，政府也渐渐放松警惕。可是你来了，并且住了一个多星期，太扎眼，人家又以为我们在策划啥阴谋。特别是，你还爬上丰谷镇背后的小山，观察地形；镇上的天主教堂正在拆，你也天天赶去看，嘴里骂骂咧咧的。

老威：我骂骂咧咧什么了？

李必丰：忘了。总之你前脚离开，警察后脚就登门了，把我弄到派出所，逼我交待。我无名火冒，就吵起来了。此后，我不断地被骚扰，生活全乱了。家里都埋怨我，而我，无法与任何人交流，在父母家里却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为证明我的确贼心已死，我就结婚，搬到永兴，住我老婆的单位宿舍，很小一间屋，身子也转不开，煮饭就在楼道上。也许我天生面相不好，眼珠子贼溜溜的吧，即使见着警察只点头，不说话，人家仍疑虑重重。我被派出所呼来唤去，蹂躏得不像个人了，就产生了逆反心理：都啥时代了，还搞阶级斗争，还监视"四类分子"吗？于是又去成都，钻入大学参加一些社会改革的座谈。

老威：你还到我家，替我用《易经》算命。

李必丰：你，还有汪建辉，除了写字，就对算命感兴趣。

老威：占卦是为了心里有数，有方向感，不至于像你，无头苍蝇乱撞。

李必丰：我的腿虽然野，但没乱撞。1995 年夏天，当我听说绵阳的民运人物佘 XX 从深圳逃跑，就动心了。当时，我的儿子出生不到 100 天，贫穷，加上被"关照"，我太绝望了，就与老婆商量，去搏一搏。她同意了。我立即动身去深圳，拢中英街，像个蹩脚的游客，边走边东张西望。叫武警发现了，命令我过去，查《身

份证》。我强作笑脸，可腿肚子已抽筋了。不足 3 分钟，武警就让我进哨所；他打了个电话，不足 3 分钟，又让我上中队；跟着，我被关进沙头角派出所。此时，绵阳警方已在罗浮区公安局等候，我连资本主义的地皮都没踩着，就又回来了。

老威：你有渠道吗？这么瞎闯？难怪有人封你为“民运圈里的行为艺术家”。

李必丰：圈内朋友让我直接去，有人在沙头角桥头接应。我手里拿了张报纸，作为接应暗号，可我转来转去也不见同志。却迎头碰见我的高中老师，我愣了一下，就招呼：“王老师，你咋在这儿？”

事隔多年，我才听公安局内部的人闲聊，他们是一路旅游，跟踪我去越境。幸好身上没带任何嫌疑物品。这次我只以“偷越国境”的罪名被拘留 15 天，出来后，政府再次重申，外出必须事先汇报。

为了让他们放心，我就去一个朋友公司打工，做过几天部门负责人。这期间，国内民运比较活跃，北京上书请愿频繁，刘贤斌等人也在成都公开活动，经常在四川大学参与讲座。重庆的王明也来串联，要搞《公民自由宣言》，可没露几次面，大家在西南民族学院的窝子就叫警察端了。我算倒霉，偏偏耳根子软，受人邀约去歇脚，刚躺下，警察就敲门。这次抓了好几个，我和王明都进了铁笼子，审了个通宵。天一亮，我们被弄出户外拍照。我心里咯噔一下：“糟了，拍照意味着验明正身，要劳动教养！”

老威：你没把柄吧？

李必丰：当时我兜里揣着一份致香港同胞的人权宣言，谈 97 回归的骗局。我曾瞅空子把这罪证丢出窗外，不料又叫警察给捡了回来。你曾在《证词》里说：“这年头，写作就是制造罪证。”我一次次临阵毁灭罪证，几乎都不成功。

我再次被押回绵阳，很意外，关几天就释放了；而王明被劳教 3 年，他第一次坐牢 5 年，才自由了两年，又二进宫。

这次事故导致随身的若干公司资料被没收，我失去工作，就邀约熟人张姐去成都北门大桥开“泉水鱼”。本来生意还过得去，可一帮吃不起饭的民运朋友天天来，有的干脆以“出谋划策”为名，住在饭馆里了——这一搅，警察就找麻烦。我记得关门大吉的那一天，你和老汪来白吃，顾客点了鱼，我也不卖，因为最后一条鱼要孝敬落难朋友。

老威：在我的印象中，你始终是“来无踪，去无影”。

李必丰：我们这类人都没安全感，做梦都在逃。

老威：你一年有多少时间呆在家？

李必丰：几乎都没在家，如果我在家稍久，老婆孩子反而不习惯。

老威：真他妈不是人。

李必丰：对，不是人，是民主的困兽。

老威：终于又进笼子了。

李必丰：文学创作的同时，我也搞一些民生调查。在绵阳地区，老国营企业处境维艰，你晓得长钢工人几个月没领到工资。绵阳丝厂频临倒闭，可厂长不是东西，居然抱着职工们的住房集资款去成都炒股票，结果亏了，血本无归。这一下激起众怒。闹事那天，有人在长内黑板上公布消息：“冯市长今天要来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可工人们耐心盼到上午 10 点多，连市长的影儿都没有！于是群情激愤，4000 多人吼叫着涌出厂门，将门外的川陕公路扎断了。跟着，事态扩大，绵阳绢纺厂等几家国企职工也呼着口号，前来声援。10000 多人顶着毒日头静坐路中，交通堵塞达几个小时。当然，专制政权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只能是暴力，警察出动了，抓了 200 多人，并且通过绵阳电视台发布在高新区实行宵禁的通告。

有人把这起事件捅了出去，国际社会极为关注，于是当局陆续放人，可仍然有 80 人被扣押。1997 年 7 月 16 日，《绵阳日报》登

载了市公安局长任 XX 答记者问，为“骚乱”定了性。我读罢义愤填膺，就连夜给国际劳工组织写了呼吁书，并要求彻底放人。我将文章传真给美国的“中国人权”，很快，联合国的调查小组就下来了。

老威：后来呢？

李必丰：工人全部释放了，警方气得发疯，就来抓我。

老威：你在外头逃窜了大半年吧？

李必丰：先在重庆的难友家躲了几天，杨伟来了，领我到广州。可等来等去，“人权观察”的 XX 又在电话里说香港吃紧，去不了；无奈折回，再去云南中缅边境晃了一圈，XX 传话，偷渡得自己想法，在泰国清迈才有人接应。他妈的，就这么耗。

老威：我猜各地警察也不是太卖力，否则你早落网了。

李必丰：的确。重庆和成都警方都曾通过第三者传话，要我别在他们眼皮下晃。

老威：你为啥不跑远点？

李必丰：一言难尽。我与中国人权一直有联系，刘青说要资助我一点钱，办“下岗工人培训中心”。思前想后，种种收钱渠道都不安全，于是，我就在 1998 年 3 月 8 日，天麻麻黑的时候潜回家，要找老婆的表哥（当地邮电局长）设法。

刚入税务局大门就被人发现，可我还是硬着头皮上三楼，闪进门。老婆猛吃一惊：“你回来干啥子？”我在她耳边匆匆交待了事情，就转身要出去，可娃娃却突然抱我的腿，哭出声来：“我要爸爸！”

我真是肝肠寸断，因为这是娃娃平生的第一句话！但没办法，我只能狠心扳开他的手，红着眼圈出来了。从进门到出门不足 10 分钟，但我下楼时眼皮剧跳，赶紧出街喊了辆三轮，上公路又换了出租车，没讲价，就叫往成都方向开。

几十米开外就是收费站，十几个武警荷枪实弹候着。出租车还没进站，两辆警车就夹过来。我刚探头，就被拽出来，手铐咔嚓一响，我被捕了。

老威：又是人赃俱获？

李必丰：对，我落网 10 余次，都是人赃俱获。接着，在城郊的 208 招待所过夜，再转到江油市看守所。由于是个案，我自然“供认不讳”。但这次，当局没有以政治定罪，而是四处网罗污点证人，以“经济诈骗罪”判了我 7 年。

老威：当时你老婆找到我，一定要请律师。于是我与正大律师事务所的 XX 商量，分析来分析去，认为这是上面定的铁案，有没有律师，结果都一样。可是你“执迷不悟”，就满足你吧。

李必丰：其实经济罪名根本不成立，因为绵阳九院把一批保险柜寄存在 XX 公司，而我只在里面打了几天工，签了个收条而已。但政治案以非政治手段解决，已逐渐成为他们的策略，比如刘水嫖娼案，许万平白粉案等等。

老威：判刑后送哪儿？

李必丰：老地方。

老威：省三监狱？

李必丰：对，关了几个月。1998 年 1 月 17 日，才将我转到川西的雅安监狱，两地相距近千公里。我被拖垮了，尿血，手指头也滴血，脸色跟死人差不多。有一天，我吃完饭刚起身，就突然昏了过去。我住院几个月，担心活不出去了，才给汪建辉写信。老婆也在这个时候提出离婚，为了孩子，就依她吧。

捱到 2003 年，我在监区碰到一个熟人，摆了 10 分钟龙门阵，却被人打小报告。于是第二天大早，我被转到 20 里外的名山监狱。

老威：里面的情况如何？

李必丰：犯人的状态与三监大同小异，生产机器配件，工种有金工、车工、铸造等等，劳动强度大，很惨。而我大部分时间都病着，临出狱，才通过营养和锻炼恢复了一点。我创作了几百万字的诗歌、小说、戏剧，但大部分被搜走，我想通过回忆重写一遍。

老威：我有体会，重写的难度更大。

李必丰：逃跑，坐牢；坐牢，逃跑，转来转去，我就这个命。我不断在写“命”，可“命”到底是什么东西？目前，我娃娃 9 岁多，正需要钱，需要安稳的父爱，可我一无所有。

公安局安排我去保险公司，他们说：“你不是有宣传煽动的特长吗？那就用在正道上，去挨家挨户推销人寿保险吧！”

老威：我出狱时，公安局还替找铺面，让我去卖服装呢。

李必丰：两三个月过去了，我一份保险也没弄出去。40 多岁了，还白端家里的碗，脸皮厚啊。我目前的出路就是写，争取在海外发表和出书。

老威：你写时评吗？

李必丰：写不出来，也不感兴趣。

老威：我熟悉你的诗歌和小说，要靠它们糊口比较困难。你在诗中骂上帝是：“天上的老地主”，一心只想“用太阳的金币收买人类”，谁懂？

李必丰：你懂。

老威：可我，给不起价钱。

职业讨债人老曾（上）

采访缘起

讨债作为一种职业，古往今来有之——《史记》里，甚至有从追债到追命的生动记载。

而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法制配套滞后的中国蓦然转型，撞入市场经济，刹那间人妖混杂，骗子横行，三角债骤增，于是应时代和人民的呼声，职业讨债死灰复燃，才三五年间，发展态势竟远远超过几千年历史中的任何时期。

如今又去十几年，我在《底层》原始版本里曾涉及的个体追讨、小范围勒索早已嬗变，连变相挂牌或挂靠的“讨债公司”也招摇过市，最终被国家明令禁止，复归于和谐社会的地下。

2008 年春节刚完，我的手机频频收到“免费咨询，替人讨债”的信息，因害怕陷阱，就按捺住好奇心，没理。又过十来天，“讨债”信息更密了，经常一天当中数条，还附带超低价抛售赃车，雅阁、本田，9 成新，8 万左右，还允许继续砍价。

2 月 26 号中午，天气忽阴忽阳，我手痒难耐，就埋头查对号码——大概有 4 条信息出自同一手机，就咬紧牙关打过去。对方是个女的，先吱吱唔唔假装糊涂，随后又说住得远。我问有多远？她答在东边九眼桥。我说事情比较急，可不可以打车过去。她说好啊。谈生意谈朋友都好啊。

我摸门不着，只好偃旗息鼓，去做别的事。黄昏时分，我的电话响，拿起来又不响了，如是者三，所以当再响时，我就骂神经病。没料到对方回敬：啥子神经病？生意做不做嘛？这次是个男的，我说见面谈。他说你龟儿子不是到了九眼桥么？特征呢？

我说光头。现在还站在九眼桥头。他说满街都是光头，很流行

嘛。我强调说戴眼镜的光头。他说很抱歉，我整整等你一下午，现在又回到白果林了。我说你在白果林哪个位置？他说白果林中新路街口，朝里面数，第 5 家发廊。

我差点笑出声来，因为我家就住白果林中新路街口。这么巧，我自然要去赴约。职业讨债人真藏在鸡窝里？让我不仅想起出自一个 14 岁女孩之口的网络流行语：很黄很暴力。

我家围墙外，是城市西面有名的鸡街，站街女郎如一拨拨夜游神，春夏秋冬，通宵达旦，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我调查了一下，消费价位偏低，打飞机 50，吹喇叭 70，打炮 150。

整个白天，一家家发廊被卷帘门紧罩着；等天黑以后，玻璃门才露出本来面目：挺着半截子乳房的小姐们在橱窗里，在橘黄的灯光下，等候交易皮肉。

很遗憾，我不拍纪录片，相貌也不太正经，所以 9 点正进入发廊，就容易被人当作饥不择食的底层嫖客。门边的胖小姐起身吊我的膀子，而她背后较有姿色的瘦小姐矜持地冲我笑。我急忙解释暂时不干。小姐们哄笑，说没人拿枪逼着你干，坐下来聊聊天嘛。我说暂时没功夫，要找一位姓曾的先生呢。

逼仄的空间，连绵不绝的乳峰，我承认是个男人都招架不住。幸好回首之余，隔橱窗与一双眼睛相遇——原来我的寻觅对象就蹲在咫尺之内的暗处。

他显得有气无力，可身体如被刀子剐过一遍，没有多余的肉。我们一声不响地绕到发廊背后，简陋的平房里，我们开始艰难地对话。我们至始至终没喝水。我估计他的年龄应在 45 岁左右，不那么黄，却很暴力。

老威：找你真不容易啊。

老曾：可接下来就柳暗花明了。说嘛，谁欠你的钱？欠了多久？

数目多少？先得申明一下，由于通货膨胀厉害，半年来人民币几乎贬值百分之二三十，所以从 2008 年起，3 万元以内的案子，我们不接了；预计奥运会之后，5 万元以上的案子，才值得考虑。至于佣金嘛，普通的抽取百分之三十，特殊的百分之四十，直至对半，直至倒四六——这要看案子的执行难度及风险。

老威：业务挺熟悉嘛。

老曾：废话，这碗饭吃十几年了。

老威：哦。哦。

老曾：时间就是金钱，快讲你的案子。

老威：我没有案子。

老曾：啥？！龟儿子搞耍嗦？当心屁眼儿流血哦。

老威：慢点动手，老哥！我没搞耍，这把年纪搞啥子耍嘛。我就是好奇，你看这短信，是不是你发的？我一直留在手机上，舍不得删：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法追讨债务，主持公道，化解商业纠纷。附带出售钢珠枪、单管猎枪、电警棍、麻醉枪兼麻醉药，价格面议。

老曾：我的手机被盗。这号码早在 1 年前就作废了。

老威：可我昨天就是用这号码与一女人接上头的，后来拐了几个弯，才最终在这儿见着你。

老曾：记者暗访么？带没带录音笔之类？对不起，我搜搜身。

老威：搜嘛搜嘛，我自己脱衣服。裤裆搜不搜？这让我想起十几年前进监狱，屁眼儿要掏，包皮也要翻开看。

老曾：少开下流玩笑！

老威：得罪得罪。真的，除了这两本书，我啥都没带。老哥你看，《中国底层访谈录》，我就是书的作者老威。

老曾：嘿嘿，你会写书？老子就会搞科研啰。

老威：是是，我哪敢在你跟前卖弄？这书嘛，相当于我们写书人的名片，老哥你翻几页，就摸清楚我的底牌了，不过就是摆摆龙门阵，三教九流、五花八门而已。我们成都，历朝历代都有我这种人，闲得心慌，就要找些虱子在脑壳上爬。

老曾：你倒是闲得心慌，我们可要忙着找饭钱。

老威：交个朋友嘛。

老曾：鸡巴朋友！叫花子打手虫，穷欢喜嘛。

老威：穷欢喜也安逸。

老曾：安逸？那就出点血。如今和谐社会，啥子都要收费的。三陪小姐出台，哪怕你不搞，也要收聊天费的。

老威：正确。那我出 100 元。

老曾：硬是把老子当小姐嗦？妈个戾，晓不晓得我们这行的起价？

老威：没谈生意嘛。

老曾：只要跟前立着两条腿的活物，就是生意。饶你是文人，我打个让手，给 1000 元咋样？我奉陪你黑灯瞎火地乱吹。

老威：1000 元？我的妈！著名教授讲一台课，也就 200 元。

老曾：背书、抄书，就成教授了。算个屌。

老威：恕我告辞。

老曾：打断脚杆！

老威：盗亦有道。当心遭报应哟。

老曾：嘿嘿，我再搜一盘你的包包，才 400 多元，看架势，就一穷酸书生。

老威：把车钱给我留起嘛。

老曾：还敢喊留车钱？有胆。十几年前，川渝高速公路刚开通

那阵，有个联合会的总会长，也是个有胆的。他仗着背后有官府撑腰，猛喊“整顿运输市场”，要把“黄牛党”赶尽杀绝……

老威：恍惚记得，报纸上刊登过的。

老曾：就是提出每 10 分钟 1 辆，滚动发车的那个。

老威：对对。当时成都五桂桥的高速车站，内外都有黄牛党拉客，去重庆，正规窗口售出的票是 1 张 99 元，而黄牛票才 70 元，运气好，可以杀价到 60 元。我经常去重庆，是黄牛党的坚决支持者，虽然费些周折，不能大摇大摆进站；虽然做贼似的，要绕十几二十分钟，才能在某个不固定的路口上车，但便宜就是硬道理。

老曾：我做过黄牛党，我们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1 张票 60 元到 70 元，已经赚欢了，凭啥子还要卖 99 元？我们暗里给每个司机好处，拉帮结伙，轻而易举就将两边车站的生意抢了。政府整顿了若干回，都是假打，直到出来个总会长，召开了几盘川渝两地联席会议，动真格的，把黄牛党干干净净撵出去，还宣称是“为了广大消费者的长远利益”。

老威：后来呢？

老曾：某一天，总会长接到黄牛党的匿名电话，奉劝他“有钱大家赚，不要赶尽杀绝”，否则的话，将“断子绝孙”。总会长不信邪，拿出革命者献身的架势，要“捍卫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跟着向警方报了案。

又过了好多天，风平浪静。总会长以为黄牛党在开玩笑。就放松戒备，把肠肠肚肚落回实处。事情就在松松垮垮中发生了。那是个傍晚，总会长带着五、六个保镖，到羊西线一带吃火锅，进门刚坐稳，十多条好汉就追尾来了。并且当着人山人海，将总会长按翻在地。为首的好汉，戴墨镜，扣礼帽，跟《上海滩》里许文强一样装扮，从腰间扯出尺把长的杀猪刀，朝那厮的胯部连插 7 下。保镖们眼睁睁盯着，却中蛊一般动弹不得。咳呀，多威风的大人物！裤

裆如火锅，咕咕咕喷血泡子。

老威：在闹市区杀人，真吃了老虎胆。

老曾：没杀人，只人工合成一太监，让他下半辈子蹲着屙尿。然后哐当丢下刀，不慌不忙撤出门外，坐车溜之大吉。十几分钟后，巡警赶来，走过场、取口供、做笔录，却没人能抖清楚那些凶手的具体长相。此案至今未破，悬赏再多也未破。

老威：讲得这么冷静？莫非你也是好汉之一？

老曾：嘿嘿，莫乱说。虽然成都发生的多起涉黑血案，最终都警匪串通，抓顶缸的，判顶缸的，雇凶的老大永远在幕后操盘。可行有行规，谋得了财，何必害命？

老威：你顶过缸么？

老曾：十来年前顶过。一帮身家千万的老板在中国会馆赌球，好像是世界杯，赌谁得冠军。一场接一场下注，几十万，百把万，雪球越滚越大，熬到争霸冠军，赌金已累积达 300 万。甲方押阿根廷，乙方押德国。恍惚记得是德国罚点球险胜，乙方赢了，按规矩，就该押乙方的 4 人平分赌金。可有一个姓刘的，仗着拳头大，保镖多，公安方面有背景，竟独自生吞对半，只拿 150 万出来分。都是场面上混的熟脸，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就人人装懵懂，拿过钱，和和气气散伙。

第二天晚上，姓刘的在一个高档茶楼的露台上喝茶看星星，好不逍遥。原想等到夜深了，再约些狐朋狗友，多招几个小姐，彻底腐败一把。不料有一个人上来送礼品。等他打开礼品盒子，却是一双黑寿鞋，就在他发愣之际，一根枪管抵着他脑门响了。据说脑浆子溅了满桌满地。

枪手轻轻松松从二楼跳下地，钻进等在那儿的一辆桑塔纳轿车，跑了。

随后刑警队来查案，一块赌球的嫌疑犯抓了好几个。连夜审讯，

眼看该露馅儿了，黑道上就有人找上门，出价 40 万要我顶缸，还许愿说，家属由他们照看，坐牢 1 年，往我家送 10 万，这样坐牢就相当于存钱。那时我出道不久，正走霉运，就一口答应，然后脚跟脚去派出所投案自首：人是我杀的，他放高利贷，我还不起。我不报销他，迟早被他报销。

这么一搅，刑警队的侦察阵脚就乱了。我被整得死去活来，正跪、倒吊、车轮战、电警棍、五花大绑，外加心理战，统统都端上来。我他妈的绝不改口！我在看守所扛了两年多，死刑犯的大脚镣都砸上了，我也没改口！但是最后却意外改判——经高院复查，我的确向姓刘的借过高利贷，可不知从哪儿钻出好几个新证人，称案发当晚我和他们在同一个地方蒸桑拿。

那晚我的确在蒸桑拿。连浴场老板都可以作证。就这样我仅仅以“妨碍司法”被判罪。我出狱了！至今也不晓得干掉刘某的操盘手是谁，总之，他们利用我顶缸，赢得时间，蒸发了枪手，替警方做成一桩永远的悬案。

老威：高明高明。

老曾：平常平常。

职业讨债人老曾（下）

插记

正聊到兴头上，笃笃门响。老曾警觉地闪至窗边，贴耳辨听约分把钟，才开门放进一风骚女子。大得离奇的眼睛和奶！可她还刻意将眼圈描成核桃，将奶子化作朝外泼的惊涛骇浪。刹那间，我感到满面湿漉漉的，腰以下随之麻痒起来。老曾哈哈笑道：把持不住了？那就搞一盘嘛。我说没钱。老曾说可以赊账。我随口问利息几何？老曾也随口道：当然是高利贷啰。我哼哼道：赊这种账要倒霉的。女子接茬道：哥哥你一脸福相，倒啥子霉哟。就顺势朝大腿上落屁股。骇得我立马弹起来。记得一本写旧社会上海滩的书里，就有类似场景发生，称之为“仙人跳”。

幸好我非文弱之辈，转眼即从这对狗男女之间杀开条血路，拔了门闩，一股醒脑冷风扑面而来。老曾嘀咕道：这么性感的货都放不翻你，莫非太监？当然不是！我愤愤不平道，主要是缺乏预热啰。女子道：我是简阳乡下来的，好几天没做成生意。哥哥，你还是发扬点人道主义精神嘛，搞一盘嘛，就当捐助希望工程嘛。我被逗得噗嗤一笑，立即就坡下驴：今天肾亏，改天好不好？改天我带一个炮团来捐助希望工程。

成都这地面就这样，言语一旦拿顺，很黄很暴力的镜头也会临时拐弯，转化成和谐社会。于是主客双方重新落座，继续交谈。

老威： 你的黑道名头就这样做大啰？

老曾： 人家待我不薄嘛。

老威： 你已经发家致富，为啥还替人讨债呢？

老曾： 几十万，三、四年就花光。经济要周转才灵光嘛。这个

世道，总是你欠我的，我欠他的，扯不清的阎王账，所以我在 99 年的样子，审时度势，成立了讨债公司。

老威：注册过么？

老曾：工商局不批，答复说没这方面的法律；我就托人走后门，人家连钱都不敢接。我陪了多次笑脸：大人们变通一下不行么？若嫌“讨债”二字太刺眼，就改成“排解经济纠纷”嘛。

可这么一来，人家就叫找司法局，申请成立律师事务所。他妈的，绕来绕去，又成三角债了。于是找几个兄弟伙一商量，就弄了个不挂牌的讨债公司，挂靠在某某柔道馆的门下。

老威：相当于地下黑店嘛。

老曾：放屁，柔道馆是公开、合法的，并且生意很好，我们是柔道馆的发展部。兴旺发达时，职员 20 多人，都各有讨债怪招。

老威：我晓得，讨债的市场需求很大，因为现在的债务纠纷多如牛毛，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又解决不了。

老曾：根本没人管。你告到法院，立案费、律师费、交通费、执行费一大堆，你花了钱，还得耗时间。债主的招数，一拖二躲三赖四转移财产，相信法律吧，公了吧，几年的过场走下来，就算判你赢，也执行不了。

老威：找你们就简单了。

老曾：当然，几分钟就立案，接着就是如何分成，纸上谈兵全免，我们给出时间表，你就可以回家等消息了。

老威：这么厉害？

老曾：比如去年底，一个建筑工地的包工头通过关系找到我们，说地产老板拖欠 10 来万工钱，他没法向手下的几十号民工交代，也许连春节都过不安逸。于是我们就直接绑架了老板在郊区别墅里包养的二奶，同时让他带钱到指定地点赎人，否则就抹硫酸破相，

还要网上公布他的床上色情照。

老威：看不出来，你居然会利用网络。

老曾：打死不如吓死嘛。眨眼他就下软蛋了，因为我们同情民工，就只抽取了两万元，算个意思。

老威：两万元不少了。况且你料准他不敢报警，事儿办得轻松。

老曾：前几年，有家国营汽车修理厂被债主拖垮了，都是些工地上的大车，长期、批量的修，随后就签单、签单。如此滚雪球一般累积，结果是材料买不起，工人工资发不起。法院无法解决，找到我们，也只帮助讨回两笔，大约 60 万吧。杯水车薪而已。

老威：为啥不救人救到底呢？

老曾：我们绑架了一个娃娃，一个老头。娃娃 8 岁，读小学 2 年级，我们在家长接人之前，进学校代劳，理由是病重的奶奶想马上看到孙子。而后打电话，自称是汽修厂几百号下岗工人的代表，已经狗急跳墙了，如果你不还钱，还要报警，我们在撕票同时，放火烧死你们全家。我背诵了一句革命先烈的诗句：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骇得对方屁滚尿流，仿佛虚空中，有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向他席卷而去。绑架老头是在街道老年活动中心，派人上去，朝屁股蛋猛锥一针，等老头“哎哟”倒地，立即扑过去学雷锋，嚷着送医院急救。这一去就是几十里，锁在黑屋中，再给老头的儿子打电话，台词和绑架娃娃差不多。嘿嘿，很顺利，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问为啥不救人到底？这个厂还有十几家类似的债主，我们能这么勇往直前地搞下去么？那不成了震惊中外的连环绑架案？中间难保不出纰漏，难保不遇上个耍横的，案子弄大了，找人顶缸都摆不平。

老威：你讨了近 10 年的债，没出过意外么？

老曾：风险过大、估计要伤人的案子，就雇人做。生意场嘛，

经常层层发包，转手三四次，最后接包的都不晓得最初发包的是谁。

老威：比如剁人的手，断人的腿，毁人的容，绝人的男根之类？你发包几十万，或许落到最后接包的杀手门下，就只剩几万。

老曾：或许几千元就搞定，如果撞上个穷途末路、又求财心切的打工仔。黑道也有三十六业七十二行嘛，你说的是另外一行，据点原来在永丰立交桥旁边的老茶馆，人身上的每个部位都明码实价，手脚太大了，耳朵、鼻子、手指头、脚趾头都有价。要报仇雪恨的，就天色擦黑时，去那儿要杯茶，慢慢地候着。我干不了这个，因为迈不过是非曲直、正邪忠奸。

老威：老江湖嘛。

老曾：老江湖也有翻船时候。有一次，我们乘债主父亲 80 大寿，纠集了 20 多人，敲锣打鼓去庆贺。混进宴会大堂，见那拖欠人家 40 多万的孝子，正把满面红光的老爷子搀上太师椅，然后趴下，屁颠屁颠磕头。我们立马偃旗息鼓，团团围过去，使个眼色，大家就一起脱下外衣，露出清一色的汗背心，斗大的字写着：借债还钱！

借债还钱！借债还钱！！我们像学生游行那样，狂喊了几十遍口号。寿宴被搅得一塌糊涂，我们与孝子贤孙们扭打，血肉横飞，锅碗瓢盆满天飞。老爷子当场叫活活气死了。债没讨着，还进了派出所。哎呀，都怪我没掌控好，差点让人把底抖落出来。

老威：挺搞笑的。

老曾：终身难忘的一次搞笑，就是我们曾绑架过老年痴呆症患者。事情比较简单：某个身家数千万的地产老板，突然想挣名了，就出价 50 万，雇某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当枪手，为其树碑立传，耀祖光宗。可等到人家按合同条款，完成书稿，老板又再三挑刺，终于耍赖反悔。秀才遇到兵，有啥子办法呢？只有我们这种江湖中人晓得了，才会拍案而起，主动上门，为秀才排忧解难。

老威：副教授为地产商做枪手，也够掉价的。

老曾：掉价？真他妈文人相轻。卖字、卖画、卖官、卖身、卖地、卖血、卖国，这世道，啥子不能卖？只要摸得着、看得见的，都能卖。风和空气也能卖，压缩成罐头，打个广告，还能卖得很火。只有你这种臭清高卖不起价。

老威：教训得对。我道歉。下文呢？

老曾：秀才正躺在床上唉声叹气，听说有人可以讨回欠款，当然喜出望外。于是立了字据，五五分成。

老威：他没查问你们的来历？

老曾：问了，瞎编嘛，知识分子好骗。

老威：他没觉得这样干不合法？

老曾：人家已经几天几夜睡不着，差点熬成精神病了！

老威：你们成良医啰？

老曾：可以这么说。随后，我们制定计划，伪造了《工作证》，就摇身变成某某老年福利院的职工。我们挨家挨户散发宣传单，把雷声弄大，最后才勾兑好保安，将面包车大模大样地开进那个高尚社区。当我们敲开目标家门，申明来意时，那五短身材的老板让座、泡茶，特别客气。更没料到，不过三言两语，他就答应我们带他的老妈下楼做免费体检！

接下来就轻车熟路。在车上，我们用麻药毛巾将母子俩捂晕过去。然后寻个旮旯，丢下老板，再继续狂奔百把公里，钻进早就租好的农家小院，将老太太抬进屋内。

接着我们给老板家打电话，替秀才愤怒声讨，尽量不骂粗话，还咬文嚼字，啥子为富不仁啦，良心何在啦。可对方回了一句：龟儿子绑架嗦？找错对象了。就啪地把电话挂断。再拨，就是嘟嘟的忙音。我们急出一头汗，接着打通手机，才开腔说：龟儿子不管你

老妈……对方嘿嘿两声，又回一句：我妈就是你妈，你暂时替我孝敬嘛。又断了。

老威：打不通了？

老曾：打几十遍，不通，永远不通。后来才晓得，老板把座机、手机号码全换了。

老威：连老妈也不要？

老曾：不要。

老威：也没报案？

老曾：没有。据说，他在小区门口贴了张《寻母启示》。

老威：这还叫人么？

老曾：我讨债多年，也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与儿子断了联系，还得回头照料他老妈。开头，我们认为老太太正常，就琢磨从她身上找缺口。她刚刚醒来，我就示意助手，晃着光膀子，把杀猪刀拍得哐哐响。那曾想，老太太不仅不怕，还哈哈笑，问是不是要杀年猪？还怂恿多杀几条，免得人多不够吃。我听得头皮发麻，可仍不甘心，就亲自凑拢去，问老太太我是谁？她回答得很干脆：爷爷。这下心凉透底，我一屁股落地上，辟辟叭叭抽自己耳刮子。老太太也学我，抽自己耳刮子，还说：爷爷，好痛哦，为啥子不打猪呐？打死好吃肉嘛。我们自己吃，不给打工仔吃。

老威：老太太多大年纪？

老曾：快 80 啰。

老威：值得绑架么？

老曾：老板 50 多岁，当过知青，吃过苦，我原先认为，至少该有起码的传统道德吧？古话不是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么？

老威：可是古话也说“笑贫不笑娼”。

老曾：我与老太太朝夕相处了 3 天，人都快疯掉啰。她吃喝拉撒全没感觉，甚至边吃边拉，出太阳时，还在院子中央跳文革的忠字舞，“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他妈的咋个搞？历史三两下就倒退好几十年，现在是“敬爱的人民币，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的助手才 30 来岁，哪受得了？气得拿杀猪刀猛砍泥巴，把老太太骇得站起流尿，跟着，扑通一下跪倒，作揖磕头，求观音菩萨慈悲，多收些坏蛋回去。还念了一首不晓得从哪儿捡来的民谣：50 年代嫁贫农；60 年代嫁雷锋；70 年代嫁票证；80 年代嫁文凭；90 年代嫁贪官；新世纪来了傍大款。

老威：老年痴呆症还晓得念这个？

老曾：一旦开了头，就几百遍地念，直到口喷白沫。老太太还四处藏东西，饿得还特别快，饿了就一会儿爷一会儿爸地乱叫，跟着问妈到哪儿去了？偶尔记起她那坏得流脓的老板儿子，可半天说不出名字。

老威：完了完了。

老曾：是完了。只好认栽，把狗日他妈还回狗日住的小区，转身开溜。这场打击，搞得我感冒半个多月，食欲不振半个多月，在江湖上一时传为笑话。

纳西族东巴和君（上）

采访缘起

2003 年深秋，我到云南丽江没多久，即凭着江湖经验，和三五个当地混混打成一片，其中就有本文主角和君的儿子和志，一个从偏远山村走出来的现代青年。当时，和志留一头烫过的长发，抽烟喝酒，偶尔也跟着其他人，泡泡免费酒吧，兴之所至，还扯起喉咙，喊几段香格里拉的伪民歌，也就是都市歌星唱红的“采风之作”。

又过了大半年，我才晓得和志是东巴——纳西族的祭师，吃惊不小。有个下午，我路过“纳西古乐”，不由自主跨入门槛，观摩江泽民主席与纳西族形象代表宣科的合照，老江在拉二胡，宣科在拍手，其他老者都裂着大嘴应和，济济一堂——自觉无趣，就转头向斜对面的东巴宫眺望，见一老者，头戴冠冕，身裹长袍，手持法杖，正巍然挺立在一群海外侨胞中央。相机咔嚓闪了数次，而我的朋友和志不晓得从何处钻了出来，边吆喝“10 元 1 张”，边手忙脚乱地收费。

我立马跑过去打招呼，和志的东巴身份暴露无遗，颇为尴尬。当天晚上，我就得到实惠，免 80 元门票，看了一场以东巴跳神为主要卖点的民族歌舞，大开眼界，称赞“这才是正宗的纳西古乐”。

和志也身裹金灿灿的东巴行头上场，犹如绿叶之一，衬托 70 多岁的红花老东巴。连我这外行都看得出他的敷衍，弹腿、穿花、扭腰都心不在焉。谢幕时，我去后台问他咋个了？他哼哼：跳了几百场，还有啥子感觉嘛。

接着，我通过孙孙认识了爷爷，1943 年出生的香格里拉白地大东巴和君——这是一个化名，因为我们的主角不愿让公众在这样的文字里知道他的真名。

按现代观念，60 出头的和君不算太老，可刀痕一般的脸纹以

及心态，证明他的确老了。出于我的职业私心，我断断续续与这爷孙俩打了近 3 年的交道，直至最近的 2008 年 3 月初，两代人发生激烈冲突，要反目了，我才觉得该完成这个访谈了。

老威：也许你不信，我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晓得《东巴经》了。当时我的朋友马某流浪到丽江，带回一批手写的经文。我俩脑袋抵脑袋，钻研大半夜，觉得每个象形字都在跳神。比如“跳”，直接就画一个人在手舞足蹈，比如东巴主师丁巴什罗的符号，就是一顶皇冠压住一个横躺的人。

和君：不是皇冠，是五佛冠，从古至今都是东巴的标志。

老威：我还选了几个东巴字，放进长诗《死城》里，增添其巫术氛围。

和君：东巴字不仅是巫术，东巴也不仅是巫师，这是需要澄清的，不澄清，东巴就成了搞封建迷信的罪人。我们过去吃过亏，土改，文革，还有其它政治运动，都逼死了不少东巴。

老威：《东巴经》包括哪些内容？

和君：哦，多了，好几万册啰。《祭天经》《祭地经》《祭祖经》《祈寿经》《祈雨经》《祭山神经》《祭家神经》《消灾经》《驱鬼经》《超度经》《喊魂经》《开路经》《息口舌是非经》《夫妻和睦经》《殉情经》……一时半刻背不完。唱经也五花八门的，所谓“九腔十八调”，各有各的风格，就看你拜的啥子师傅了。

老威：你是哪种风格呢？

和君：我是祖传的风格，东巴都是代代相传。我们家有 4 个男娃 1 个女娃，我算最机灵。这不是我自吹的，而是 5 岁时，我爷爷说的。那是 1948 年冬天，一家人围在火塘边，爷爷对爸爸说：咳，也该挑一个东巴继承人了。爸爸立马应声：是啰，你老人家说了算啰。爷爷说：哪就挑羊娃子，他最机灵，嗓门也亮，昨天他在前面

山吆喝，我在后面山都听见了。一家人全笑起来，于是我就成了云南省迪庆州中甸，也就是现在的香格里拉县白地乡阿罗弯村和家的第 9 代东巴。妈妈说：羊娃子成了东巴，就再不能叫他小名了。于是爷爷在熊熊的火光中，唧唧咕咕念了半天经，才给我取了官名。

老威：他念的啥？

和君：我才 5 岁嘛，早忘了。可能是在祈求东巴祖师丁巴什罗和阿明什罗庇护，让我成为一个名扬四境的出色东巴啰。接下来的两年，我既不允许贪玩，也很少像子妹那样，下地干活，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课堂就是火塘，爷爷，有时是爸爸，念一句，我跟一句。《东巴经》的读和写是分家的，所以不少东巴家庭，只会读，不会写，完全靠世世代代口传心记，而读和写都会的家庭，应该算纳西族的学问家庭。

老威：你的其他子妹不懂东巴文字吗？

和君：《东巴经》是单传，只有东巴才会。在解放前，东巴很多，如草原上的星星，你不用担心哪一颗会熄灭。我就是在多如繁星的东巴环境里成长的，爷爷年纪稍大，60 出头，就做专门的东巴，爸爸 40 来岁，正值壮年，要干活，只能做“兼职东巴”。香格里拉高寒，一年四季离不开火，所以我的上课时间极其漫长，有时还从火塘转移到田间地头、山坡草地、陌生宅院，甚至墓穴坟场。

老威：为人民服务嘛。

和君：是啰。娃娃得了病，抽风，东巴们要带上法杖和板铃，赶去驱鬼，有时还要带木刀，边跳舞边左一下右一下地砍，直到将无形的厉鬼撵出房间，让它攀附在事先插于荒坡的纸人。

老威：然后再烧掉纸人。

和君：你咋晓得？

老威：我们汉族乡间也有类似仪式，叫去蛊。

和君：如果魂跑得太远，就没这么简单了。有一次，我们村一

对男女殉情自杀，也就是父母不同意他俩相好，就痛不欲生，双双约定到草甸上，唱了半夜的悲歌，然后灌事先熬好的草乌汤。月亮大，风也大，他们像躺在一面镜子里，嗯，一对蚂蚁躺在一面镜子里，多么小。他们冻得哆嗦，咳嗽声老远都听得见，于是为了取暖，他们将草乌汤当美酒，你一口我一口。不久，他们就哑巴了，连咳嗽声也消灭了，因为草乌这种毒药，有封喉的特点。等人们发现时，他们抱在一块，身体还软软的，只是脖子带青；等到东巴们跑去，他们的手指还互相扣着，身体已发僵，像从草乌汤里捞起来的两段乌木。五、六个东巴，全身披挂，又是念经又是舞，道场做个通天亮，也没把迷途的魂儿劝回来。我一个娃娃在旁边，先还念念有词地学，稍后就如一只公鸡，站着打瞌睡，最后就直接倒下入梦了。

老威：挺有意思。

和君：唉，有意思的童年还没过完，就解放了。土地改革，三坝和白地不少东巴家庭被划为地主和富农，我们家没多少土地和牛羊，也被划为富农。理由是利用搞封建迷信，剥削了贫雇农。爷爷气不过，在诉苦会上与他们争：做道场也要花力气，难道这就叫剥削？于是一顶“抵制土改”的帽子扣下来，爷爷被当场煽了十几耳光。做东巴的最看重脸面，特别是爷爷这种以往人人尊敬的主事大东巴。

老威：斯文扫地嘛。

和君：所以他在当天深夜，就上吊自杀了。没想到，那些翻身的人们，还将他的尸体弄出去，斗争了一上午，口号喊得震天响，啥子“打倒畏罪自杀的反革命东巴”。

老威：不用打，自己就倒。

和君：按理，如爷爷这种规格的东巴去世，方圆几个村的大小东巴都要聚齐，举行有丁巴什罗尊号的教徒亡魂超荐。吟唱时，所有东巴都身穿隆重的法袍，环绕死者，由主事东巴坐在高处，扮天

神，由小东巴扮 360 名护法神，再由一名能歌善舞的东巴在核心，扮始祖丁巴什罗，演义他从出生到升天的传奇故事。

老威：死者和丁巴什罗在仪式中融为一体？

和君：对。每一个东巴都是丁巴什罗祖师在现世的化身。大家要通过主事东巴所扮的天神，对人世间层层设问，对答歌吟，一天一夜，才将死者超荐至天堂，进入神位。

老威：真是一幕了不起的戏剧啊！

和君：可爷爷的超荐葬礼却是斗争会，村子里的大东巴五、六个，还有恶霸地主五、六个，像牲口一样，被绳子死拉硬拽，弄来陪斗，脖根还挂满五佛冠、长刀、法鼓、法杖、扁铃等"封建迷信的罪证"。民兵在周围，随时用枪托子捣他们。而爷爷的尸体被高吊树上，风一吹就晃悠悠的。

老威：你也在现场么？

和君：我躲在黑压压的人群外面，能望见悬在半空的爷爷。那是 1951 年的秋天吧？嗯，反正高原上的天，夏和秋比较混淆，雨多，雷也响，可太阳说出来就出来。我感觉在忽明忽暗的光线中，爷爷变了好几种颜色，有一道彩虹甚至从山坡与草甸之间扫过去，从他老人家的脚板底扫过去，使我暂时忘记了悲痛。

老威：蛮有诗意嘛。

和君：当时我七、八岁，已经能念《丁巴什罗祖师传略》，里面讲道：丁巴什罗不出自阴道，而出自母亲的左腋，并且降生刚刚 3 天，就被魔鬼抓走，披挂上千斤的手铐脚镣，投入有 8 个耳朵的油锅，熬煮 3 天 3 夜。结果呢，丁巴什罗非但没死，还冒着油烟爬起来，镇压了所有在场的妖魔鬼怪。

老威：这个魔法故事能够安慰你，就像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哈里？波特》一样。

和君：对，直到现在我都相信，爷爷的灵魂被永恒的丁巴什罗

接走了。革命群众还烧掉了成套的东巴法器，在我那娃娃的想象中，这些叮叮当当的好玩的家什，随着阵阵烟雾，全被爷爷带上天了。所以当大人们哭灵，爸爸妈妈快昏厥时，我还惦记着天国的门槛够不够高，爷爷见着丁巴什罗祖师磕不磕头等等，所以淌不出眼泪。

老威：后来呢？

和君：日子还得过啰。东巴教是纳西族的本教，比共产主义的历史久远得多，因此不管咋个改造，土改，合作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社教，四清，运动一波接一波，又咋样？适应形势嘛，跟党走嘛，风口浪尖总会过去嘛。运动高潮一过去，东巴道场就死灰复燃，东巴们就走村串乡，群众偷偷请，东巴们悄悄到，何必声张呢？从历史和地理看，纳西族祖祖辈辈都处在夹缝中，藏族自高处压，汉族自低处挤，白族不识相，要抵抗，还建立南诏国，结果被屠杀好多次，著名的两三次，都血流成河，一死就几万人。只有纳西，对谁都俯首称臣，儒家文化也可以，藏传佛教也可以，国民党一个样，共产党差不多。所以嘛，大的动荡没有。

老威：阳奉阴违哦。

和君：生存之道就是阳奉阴违。按理，纳西和泸沽湖的摩梭人一样，是藏族的分支，我们的眼窝都凹，鼻梁都挺。东巴祖师丁巴什罗本为藏人，叫丹巴喜饶，曾创立擅长巫术仪式的西藏苯教。佛教还没兴起，丁巴什罗就率部分弟子，从很高的藏地来到不太高的香格里拉传教，由此蔓延，再到比较低的丽江坝子。

老威：丽江的海拔也有 2416 米，不算低啊。

和君：与我们白地相比，就算低了。不仅海拔，而且宗教、文化、精神的高度，都算低了。纳西族有谚语："不到白地，不识真东巴；不去拉萨，不知真喇嘛"。

纳西族东巴和君（下）

插记

话到此，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两个藏族喇嘛从我们身边经过，跨越石桥，径直走进那一端的布拉格酒吧。喇嘛泡吧已经成为丽江古城的一景，我的音乐搭档阿泰说，他就是在尼雅酒吧认识云南大名鼎鼎的官方活佛仲巴的，还被摸了顶呢。

接着我们来到大石桥，坐在桥边晒太阳。桥下流水潺潺，桥上游人不断，光鲜的脸和时装，将和君衬托得越发土头土脑。我说走吧，另外找个方便的地点说话。不料和君的脸色陡变，原来他的孙儿和志蓦然浮现。这个败家子！和君骂道，就三两步撵过去扯住。祖孙俩纠缠不休，我好不容易才将他们分开，并私下嘀咕道：今天是啥鬼日子，撞上两个祭师反目。

继续访谈已是两个钟头之后。我请老东巴进古城边的哈记牛肉馆，共饮半斤劣质白酒，以平息他经久不息的忿怒。

老威：你的意思，你家乡之外的东巴都是假的？

和君：要成为真正的东巴，都必须在一生中多次去白地学习、修行。白地有丁巴什罗传教台，有阿明什罗闭关修行的山洞，还有许多道行高深的大东巴。

老威：这种传统一直持续么？

和君：断断续续，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然后呢，就啥都搞不成，连阳奉阴违的东巴也做不成。

老威：那么偏远的地方也造反？真是全国河山一片红啊。

和君：连藏区都造反，砸寺庙，斗活佛、喇嘛。东巴教没寺庙，可所有藏在山洞里的法器和经卷都拿走，集中起来焚烧掉。丽江和

中甸的红卫兵到三坝串联，送红宝书，组织贫下中农造反队，于是已经批斗了几百次的地、富、反、坏、封建东巴又叫赶拢一处，戴高帽子游乡，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白地东巴多，被造反司令部圈定为“阴谋复辟的重灾区”。

老威：重灾区？那就要重点治理啰？

和君：如土改一样，每个村都进驻工作组，不过名称换了，叫造反队。高潮期间，天天开会，夜夜攻心，高音喇叭架在村头，唱“牛鬼蛇神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老威：目的呢？

和君：目的就是掘地三尺，将白地，不，将所有纳西族民间私藏的东巴法器、经卷、画像都曝光、销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不少东巴在“政策轰炸”的初级阶段就没法招架，将传了几辈，甚至十几辈的宝贝主动上交。东坝课补村的大东巴墨干突若，手上曾有过两三百本《东巴经》，几乎都是祖传，或自己辛辛苦苦抄写的，全部交出去；还有大量东巴神像、画卷、扁铃、小鼓、法杖、法帽、法螺、法袍等等，也交出去，被造反队当场付之一炬。墨干突若成了典型，身体没吃亏。而大量不老实的东巴，被罚跪、学狗爬，还命令他们踩钢刀，舔烧红的犁铧。

老威：真是独出心裁！

和君：不算独出心裁。许多东巴做法事，渐渐进入状态，就能脚踩钢刀，舌舔烧红的犁铧，而不损自己一根毫毛。

老威：你可以么？

和君：我的功力不够。我的爸爸可以。

老威：你亲眼看见？

和君：当然。许多次。

老威：类似于民间杂技吧，傣族艺人在节日里表演上钢刀云梯

之类。

和君：上刀梯可以练，东巴的状态练不出来，得靠悟性。比如做道场，程序都大同小异，再笨的人，天天学也会了。可东巴舞一跳起来，你得去感觉，去呼唤，渐渐脱掉人形，成为呼风唤雨的天神，这样，你才有能力与魔鬼征战，才能在另一个肉眼看不见的世界明察秋毫，将针尖小的鬼，云团大的鬼，冤魂，风一样飘忽的魂，绳子一样缠人的魂，统统捉拿。这如此神附身的状态，有人将火塘里烧红的犁铧挑出来，甩地上，你围着它跳两圈，就不由自主要埋腰，哧哧地舔，红彤彤的铁，在嘴边哧哧冒青烟，旁边人瞅得肉都麻了，你却和舔骨头没啥差别。这是驱鬼嘛，去蛊嘛，不敢舔红铁，你就认输了，天神咋能对魔鬼认输呢？踩钢刀也一样，不会受伤——我是说我爸爸那种大东巴，不会受伤的。

老威：受逼迫也不会受伤？

和君：那就另当别论。没入状态，一舔红铁人就废。我爸爸被几杆枪指着，不准穿法袍，不准动法器，更不准跳热身的东巴舞，就直接叫舔。那可是刚从火塘挑出的红铁啊！我爸爸浑身抖，不愿舔，几个红袖章就扑上来按脖子。我爸爸只得心一横，猛啄一口，只听得哇地一声惨叫，就昏死过去。红袖章连泼几桶水，我爸爸才醒转。于是又叫舔，这一来，那张嘴转眼就变成了焦糊的洞，足有拳头大。大半年后，烫伤才结疤，可我爸爸的舌头短了半截，说不出话。咿咿呀呀，婴儿一般练习好久，也不行。他的意思，加上连比带划，只有家里人能够懂。

老威：凭啥对你爸爸这样？

和君：不老实嘛，不愿交《东巴经》嘛。

老威：唉，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和君：有啊，我们家的经书没受损失。一家人由爸爸指点，连夜在火塘下面挖了个地窖，将从远祖一代代传至今日的三四百卷手

抄经书，全部埋藏。再封上石板，填好土，把几十年的老灰铺还原……

老威：你们的地下图书馆。

和君：这些象形文字，内容五花八门，在整个纳西族民间，估计有数万卷。可现在还剩下多少，就很难说——当时很悬啰，我们在“《东巴经》图书馆”的上面，重新烧起火塘，一家十来口，横七竖八躺成一圈，可谁都睡不着。心在跳，牙齿也在跳。不晓得这种做贼的日子熬了几天，造反队才上门搜，房上的瓦揭了，墙捅出大窟窿，院子内外的地下，包括牲口棚，都工兵探雷似地寻遍，还横竖掘出几条大半人深的“战壕”。

老威：没有人怀疑火塘？

和君：天很冷，才 9 月底，就在飘雪了。造反队将我们从自家的火塘边撵到外面，然后提起两根拨火棍，噼里啪啦打火，搞得烟雾腾腾。我们紧张得很，以为这下完蛋啰，他们要翻火塘啰。可是没有。我们连冷都忘记了，直到他们叫完爸爸的名字，又叫我，命令在两天之内，上缴所有“封建主义的精神鸦片”，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老威：接下来呢？

和君：我爸爸就被红铁烧成哑巴了。

老威：你爸爸现在咋样？

和君：七十年代就去世了，跟爷爷差不多，只活到 60 出头。

老威：为延续你们家的东巴香火，他们都付出了血的代价。

和君：是啰。

老威：如今你也 60 出头，境遇应该比他们好，至少可以不受限制地传授《东巴经》和东巴舞。

和君：可是没人学，连我的孙儿都不愿意学。

老威：咋会呢？东巴文字不是被联合国定为“人类文化遗产”么？在丽江古城，东巴宫每天晚上 8 点准时开演，名气仅次于宣科搞的纳西古乐。

和君：我 40 多岁的儿子在东巴宫跳了 1 年，受不了，收拾回家；我 20 多岁的孙子又出来接着跳。唉，把我给气死啰。

老威：觉得在大庭广众跳神丢脸？老人家，开化一点，舞台上跳神、也就是合法跳神，总比偷偷摸摸跳神、也就是非法跳神好嘛。

和君：晓得。这东巴宫是一个外省大老板投的资，从各地招徕东巴，老的，少的；还配上山歌、野调、打跳、走婚，拼凑成一台“风情野味”。本想一炮而火，再到世界各地巡演挣大钱，没料到，还是被斜对面的纳西古乐抢了风头。

老威：世道眨眼就变了。

和君：我气的不是世道变，而是我的孙子学坏了。

老威：吃喝嫖赌么？

和君：吃喝嫖赌算个啥。

老威：吸毒贩毒？

和君：性质差不多。这娃娃想钱想疯了，居然背着我，将家里的东巴经卷偷运出来，喊价 10 万元，卖给一个德国人。

老威：这可是你们两三代人用性命换下来的无价宝啊。

和君：对啰，好几百年的东西，饿死、打死、病死都不会卖的！树有根子，人也有根子，卖《东巴经》就等于砍树，再过一些年，下面的人连纳西族的祖宗是谁都不晓得。

老威：可年轻人不这么想啊，有没有祖宗不重要，活得好不好才重要。

和君：我孙子就这么讲。丽江消费高，丽江国际化，做东巴挣不了钱，在东巴宫表演 1 个月，才拿千多元的工资，只能卖《东巴

经》啰。

老威：卖掉没？

和君：德国人付了钱，还没把东西运走。不行，不能让他拿走！

老威：10 万元算一笔大买卖啰。

和君：我孙子不想做东巴了，他要改行，用这笔钱做生意，万一发达了，就在丽江买房子，再也不回香格里拉了。他说，白地了不起，跟他没关系！

老威：据说从中甸县城骑马走山路，要 1 天多才能抵达你们村子。

和君：对啰，不通公路，只能骑马。可这有啥关系？

老威：你孙子要过现代生活。

和君：他早就现代了，他们两口子一道出来，在花花世界混了不到 1 年，就离婚。丢下两岁娃娃，没人带。

老威：你连重孙都有了？

和君：气死人啰。我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将可怜的重孙和经卷都带回去，东巴香火不能断！哪怕找政府，捅破天，我也要毁掉他的发财美梦，然后，彻底断绝与他的祖孙关系。

洞洞舞女戴凤凰

采访缘起

在 20 世纪末的一张小报上，我曾读到过洞洞舞厅的暗访报道，不禁拍案惊奇。正考虑过两天去亲身体验一把，不料接踵而至的消息是，洞洞已被扫黄警察封死，令人扼腕。

然而在中国，这种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地下声色场所，注定死灰复燃。尽管当政者用心良苦，一贯反腐倡廉，甚至抬出被新文化运动打倒过数次的“孔孟之道”，来教化大众笃信共产清教，但邓小平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而生存比发展的道理更硬更黄，也更直接和无奈。

所以在 2009 年 6 月 14 日傍晚，得到确切信息的我，马不停蹄，由西向东，直趋猛追湾外围的老国企遗址。出租车在高楼大厦间钻来钻去，终于拐入一条背巷，接着突围，抵拢两排斑斑驳驳的老厂宿舍楼。

快 9 点了，黯淡路灯下，不明不白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向稍远处汇聚。那儿即是毛时代的防空洞、如今的洞洞舞厅入口。不用问路，只需随大流，我就达到目的。

执勤人员佩戴红袖套，望上去如临大敌，其实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我掏 10 块钱，购票入场。没坐位没服务，我只得百无聊赖，欣赏了一会儿劣质音响。舞池渐渐满溢了，接着舞池和观众席的边界模糊了，再接着人头沸沸扬扬，我的前后左右，全是蠕动的人形虫子。进退维谷，不入乡随俗者，要么是奸细，要么是白痴。刚巧有个圆滚滚的肩膀擦刮我一下，就顺势搂着，跳上了。

说实话，开头几分钟，我认不清她的脸；感觉算大龄美女，却没料到人家生于 1966，与文革同龄。太意外了。

老威：邓丽君翻唱的《夜上海》，真不错。我能请你跳一曲么？

戴凤凰：想跳就跳，不必文绉绉的。

老威：谢谢。

戴凤凰：我说了不必文绉绉的。伸手过来，这是腰，这是肩，抱紧点。钻这洞洞的牛鬼蛇神，至少五六百，你不抱紧，就如歌里唱的：眨眼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老威：对对。绿莹莹鬼火一片。所有的脸是同一张脸。

戴凤凰：音乐声太大，听不清楚。

老威：我说蛮有意思。

戴凤凰：那就先付 10 元。陪舞的通价。

老威：好好。

戴凤凰：今晚不热嘛，你的手咋个汗津津的？是不是来感觉了？

老威：没这么快吧。

戴凤凰：那就再兜两圈儿。脸贴脸嘛，便于交流嘛，随便摸随便摸。咋样，需不需要其它服务？

老威：太直接了。

戴凤凰：不图个直接，你会到这儿来？

老威：我、我、我……

戴凤凰：打飞机 30，打站炮 50，都是出浆付费。

老威：这是 100 元，拿着。

戴凤凰：你，干啥嘛？

老威：我憋得头晕。我们出洞去透口气嘛。

戴凤凰：哦哟，理解、理解。我碰到过你这样的怪癖男人，不预热硬不起来。

老威：是、是。

戴凤凰：可我不想走远。

老威：附近有个广东夜宵店。

戴凤凰：太贵，灯也太亮，浪费电。我们还是在街边吃麻辣烫吧，但不能超过 1 小时。生存压力大，没办法。

老威：我们长尾巴了！是不是便衣警察？

戴凤凰：在哪儿？

老威：电线杆子背后，推着一辆自行车，我们走他走，我们停他停。

戴凤凰：哦，那是我男人。

老威：你男人？！他晓得你干这个？

戴凤凰：跟 20 年前谈恋爱一样，他每晚都骑自行车，接送我上下班，多浪漫啊。

老威：叫他一块聚聚？

戴凤凰：客户和老公？这算啥子？放心嘛，他不会过来的，除非我出事。

老威：看样子，他挺疼爱你的。

戴凤凰：是不错。你也不错呀。

老威：可是……

戴凤凰：好端端的人家，谁愿意这样？穷啊。我儿子今年考大学，需要钱。可钱这东西，天上不掉地下不生，还得靠自己挣。

老威：挣钱路子很多。

戴凤凰：麻烦你指一条。

老威：这个……

戴凤凰：咱工人阶级的现实写照是，偷抢缺胆子；诈骗缺心眼；

做生意缺本钱；找工作又文化偏低年龄偏大。

老威：工人阶级？国企职工？

戴凤凰：我在砂轮厂，我男人在柴油汽车修理厂。

老威：柴油汽车修理厂？晓得晓得，猛追湾游泳池斜对面，1980年代非常红火。

戴凤凰：老黄历了。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所以我男人当知青，为了招工回城，送了多少礼啊。终于进厂，做汽车修理工，又有多少人羡慕啊。文革结束，改革开始，邓小平上台，百废待兴，我们也算从激动人心的年头过来的。生产标兵、革新能手、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等等等等，锦旗满墙，奖状满箱，动不动就敲锣打鼓……

老威：当时有篇小说叫《乔厂长上任记》，写大刀阔斧改革，天天在中央电台播放，每个青工都人手一份。

戴凤凰：随后就一阵风，吹过去，我们的青春也吹过去。1990年代，朱镕基当总理，搞国企转型，减负割肉，就是所谓“二次改革”。一部分人先下岗，接着两三个月不发工资，再接着厂子瘫痪。东郊这边，几十家建国以来的国营企业，眨眼就没了。我男人那个厂，地皮早早就批发给房地产商，修20几层的住宅楼。

老威：成都老国企的地皮，都搞房地产开发了。黄金地段春熙路周边，属于原成都百货公司，地价炒到1亩1千万，可普通职工得到的一次性遣散费平均不足两万。

戴凤凰：贪官奸商勾结，层层盘剥，发了横财。作为卖方的签字代表，国企领导个个腰缠万贯，不少投资移民去西方养老。可怜的风光一时的工人阶级！劳累大半生，两三万块就打发掉了。

老威：这应验了马克思《资本论》里的名言：原始资本的每个毛孔都冒着泪和血。

戴凤凰：下岗快10年了，当时我们两人的遣散费加起来，不

足 7 万块，这就是所谓“再就业基金”了。自行车修理、水果摊、小吃摊、服装店都搞过，我们没其它本事，就晓得起早贪黑。苦熬到上前年，所谓家庭资产也积攒到十五六万，在下岗职工中算百里挑一了，可是我妈妈又得了肺癌！

老威：哎呀，这可是吞钱的无底洞。

戴凤凰：撑了近 1 年，转院几次，我们兄妹 3 人，加上我男人弟兄两人，都耗得油尽灯枯。

老威：花了多少钱？

戴凤凰：40 多万。我们这个家族，两代纯种的工人阶级，曾经让多少眼睛嫉妒！可如今一人绝症，全军覆没。仅癌症化疗的费用，每天好几百；最后喂不下东西，人体营养全靠输液，一瓶脂肪乳就 300 多；止痛的杜冷丁，一针几十，还说优惠我们……

老威：起不了任何作用，现在的医院，就是昂贵的屠宰场。

戴凤凰：可一旦上套，就退不下来。主治医师、主任时刻在打算盘，建议病人家属要用啥子啥子特效新药。我妈妈全天候输液，浑身爬满针眼，手臂血管堵了，插不进，就改插大腿根；大腿根不行，就插脚背。有一次脚背也肿了，护士硬来，把针头撇弯了。转眼间，血开始回流，大半截橡皮管变红。气得我晕掉，一把拔掉针头，破口大骂。主任闻声赶来，看了看，取下架子上的脂肪乳，对护士嘀咕：太浓稠了，拿去稀释一下，继续。

老威：恐怖。

戴凤凰：我妈妈临终，扣着氧气面罩，几十分钟就 1 针杜冷丁。我慎重通知院方，不再用药，不再做任何抢救，顺其自然吧。可那猪头主任，乘她老人家神志稍微清醒，竟当众大声问：“都这样了，您老还想活么？”妈妈一愣，两行泪水夺眶而出，尽管喘着，尽管说不出话，却还是一个劲儿点头。蚂蚁都不想死，何况人。但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了。三兄妹加两弟兄，在医学院 11 层的癌症楼过道

商量不出对策，就抱头痛哭。没钱了，啥都白搞。二哥说：只有卖我家的房子了。大哥说：卖掉房你又住哪儿？总不能让死人拖垮活人。二哥说：妈妈还没死，恐怕十天半月也死不了。大哥说：那我死。跟着就要翻窗户跳楼。大家急忙扯住。

可哪想到，当晚大哥真跳楼了。半夜 3 点过，整座楼相对安静，只有一两个人还在哎哟哎哟，可声音压得低，值班护士就躲着，假装没听见。妈妈病房的另一个人，中年人，傍晚才抬走。大哥抱妈妈起床，上厕所，她已经几个月没离床，瘦成一块肉干。大哥轻易就把妈妈从厕所窗口扔出去，跟着自己也跳出去。吧嗒吧嗒，梦游似的，就摔为肉饼。

老威：总算解脱了。

戴凤凰：夜深人静，虽然围墙外是闹市，也没激起丝毫波澜，直到天朦朦亮，才被门卫发觉。顿时成大新闻，上了当天报纸。怪谁？大哥么？说句不孝的活，还得感激他。丢下我们这些不敢死的，苟延残喘，该干啥干啥。

2006 年，我 40，残花败柳，可收拾打扮一番，马马虎虎。最先跟下岗姐妹一道，进家政公司，替人搞清洁，累几小时，才分 20 块钱。没办法，就听天由命，走上岔道。

最开始是个离休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76 了，住水碾河。有次去他家搞清洁，他儿子把我叫到阳台，谈得挺好。也没直接提身体服务，只希望我隔天过来，陪陪老头，送点温暖嘛。我说你们这样高级的人家，还缺温暖？他说女人的温暖，做儿子的送不了。

老威：原来是丧偶多年的老鳏夫啊。

戴凤凰：中央大客厅，环绕六七个房间，像迷宫，如果有贼藏进来，绝对找不着。平时就老革命一人住，儿孙们只是偶尔来聚会。

老威：你干啥？

戴凤凰：洗衣、做饭、拖地板，更多时间是傻坐，陪同样傻坐

的老革命。他看报我看报，他看风景我看风景，他嘟嘟嘴我就问干啥子？然后挨拢去，按按这儿揉揉那儿。有需要了，拿手帮忙搓搓。这把年纪了，上床也就拽着迷糊，有心做，也不成，那劳动强度，和爬一匹大山差不多。老革命真可怜！老伴儿死早了。

老威：你还可怜别人。谁可怜你啊？

戴凤凰：人家为党为国为民作出过巨大贡献，我这小百姓不能比。

老威：他没个朋友么？

戴凤凰：我也奇怪。别的老同志嘛，打太极拳，练毛笔字，吹闲牛，下象棋，像叶剑英的诗：“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很豁达嘛。可他呢，一闷葫芦。听他儿子讲，老革命当人事局长时，风度翩翩，雷厉风行……

老威：该不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

戴凤凰：后来我才晓得，老革命犯错误了。

老威：贪污腐败，被降级处分了？

戴凤凰：跟我一样，他早就下岗，错过捞好处的最佳时机。有次我上街买菜，迎面碰着同院子的邻居，一戴眼镜的官太太。平时她挺高傲，不爱搭理我这类底层群众，那天却主动套近乎，递给我一支雪糕，还明知故问：某某局长的贴身保姆？人挺老实嘛。我的脸顿时热辣辣的，也明知故问：保姆就是保姆，啥子贴身嘛？她忙解释，没别的意思，只觉得我的胆子大。我说打工挣钱，胆大胆小无所谓。老革命又不是老虎。不料她咯咯笑：他是只花花老虎嘛，登过报的，你不晓得？当心被吃肉尕尕。

老威：我听得云里雾里。

戴凤凰：唉，我也没料到。

老威：咋个？

戴凤凰：老革命找鸡，被联防抓过。

老威：哇噻！太前卫了！

戴凤凰：可能空虚吧。可能和儿女有代沟吧。总之那个傍晚，寂寞难耐的老革命出门闲逛，不知不觉走远了些。在尿巷子内的茶铺，歇了一会儿，又慢慢往回转。恐怕是鬼引路，他拐进一边边街，正嘀咕“还没来过”，两面街沿的卷帘门就稀里哗啦开了，亮出一二十家隐身发廊，像超级金鱼缸，里头款摆的全是昼伏夜出的发廊妹。接着是鬼上身了，他稀里糊涂就叫拖进去，灯红酒绿，刺得他眼睛都睁不开。

老威：这么无辜？

戴凤凰：我看了那张报纸，写得太龌龊。受过共产党多年教育，都德高望众了，咋个会不顾老脸，主动钻鸡窝？不合常理嘛。肯定是小姐们连拖带拽，绑架去的。呸，想钱想疯逑。

老威：白果林的著名鸡街，发廊妹和流动野鸡屡屡哄抢过往客人，互相之间还打架呢。

戴凤凰：所以老革命跳府南河也洗不清。抓嫖抓赌都是肥差使，联防和警察十天半月就要定点拉网，发威风财。老革命倒邪霉，光溜着下身，遭逮个现行。进派出所，罚款 5000 元，兜里不够掏，就通知家属交钱取人。缺德家伙们，立马把消息捅给记者。见报一炒作，老革命就中倒头彩，成为本市乃至全国，史上最高龄嫖娼犯。

老威：哇噻，太风光了！

戴凤凰：人家落到这地步，你还幸灾乐祸？没心没肺嘛。

老威：对不起，对不起。

戴凤凰：我继续帮了他两年，包 3 餐，每月净得两千。老革命相当自尊，轮不上我去提醒他“那儿跌倒那儿爬起”之类。

老威：后来呢？

戴凤凰：门前冷落车马稀。官场绝了往还，亲戚邻居也疏远，就剩我这不沾亲不带故的，日日守望。有时老革命翻箱倒柜，拿抗美援朝的老照片给我看，他得过 3 枚战斗勋章呢，真厉害。他叹息说：革命一生，经不起错误一次呀。唉，如果不是隔了两代，如果没有老公娃娃，我就嫁他。不悔。咯咯咯，胡说了。

去年春季，老革命静久思动，刚出门，就在楼梯口中风。脑溢血，没抢救过来。丧事办得冷冷清清，老干处和人事局派人送了花圈，居委会连花圈也没送。他的儿女租下能装 200 人的大丧伙棚，设灵堂，摆了 20 儿桌麻将，可东请西求，才凑够两三桌。那些吊唁的，匆匆鞠个躬，就昂首拂袖而去，根本不落屁股。伪君子！势利眼！我心里骂，你们没乱搞过？这个死人可比你们这些假惺惺的活人干净得多！

老威：你也善始善终了。

戴凤凰：还得生活，还得挣钱。大地震以后，下岗的更是铺天盖地，连大学文凭都求不着食，我们这种等而下下之的，咋办？

老威：你与老革命的特殊关系，你男人可晓得？

戴凤凰：他只晓得借酒浇愁，坐以待毙。

老威：你们还有爱么？

戴凤凰：有嘛，贫富死活都绑扎一团，不叫爱？但爱填不饱肚子嘛。儿子眼看考大学，只能豁出去了。

老威：作为男人……

戴凤凰：作为男人咋个？他快 1 年没工作了，我得养着他们父子俩。换别的女人，早离家出走了。我死撑着，证明还有良心，还有责任感。两口子，心里都憋屈，平常就别交流，免得哭啊闹啊，浪费感情，又丝毫解决不了问题。有那么一回，我从洞洞舞厅下班，都两三点了，却不见他的自行车。我急了，与几个姐妹分头找，才发现他跟俩哥儿们喝酒，已经瘫地上。我只好反过来骑车带他，快

拢家门还摔一跤，气得我坐在街沿上呜呜哭。他到底清醒了些，就噼里啪啦捶自己脑壳，连吼几声“没用啊没用啊”。哪个男人愿意这样？

老威：你来这儿多久了？

戴凤凰：我打小就在这儿。两三岁，父母挖防空洞，我就蹲在土坎上看。当时，中苏珍宝岛之战刚打完，有关原子弹和氢弹的宣传画铺天盖地，似乎洞挖得越深，防弹性能就越好。毛主席号召我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老威：毛主席可没想到三四十年后，防空洞演变成洞洞舞厅。

戴凤凰：中国人喜欢挖洞，你看老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北方农民靠挖洞，打败了日本鬼子。革命圣地延安，全体住窑洞。直到解放后，直到我们这代，对挖洞也情有独钟。世界大战没打，可全城性的警报经常呜呜响。记得林彪副主席叛逃苏联，飞机坠毁在外蒙温都尔汗前后，我们动不动就跟着大人钻防空洞，密密匝匝的人群，像蚂蚁搬家。战争疏散演习嘛，警报有时响 3 分钟，有时响 5 分钟，大家煞有介事，挤成一团，放屁也得夹着，死等那“空袭解除汽笛”。

老威：全国人民都在玩游戏。如果将各地的防空洞连为一体，相当于七八个万里长城嘛。

戴凤凰：所以最先有人提到洞洞舞厅，说里面如何如何闹热，如何如何见不得光，我一点儿不吃惊。由于大地震，由于和“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形象不符，洞洞被封了半年，重新开放时，据说比原来还火爆两倍。于是原单位姐妹一邀约，我就来了。哎哟，真是天上地下，啥子牛鬼蛇神都出笼了！

老威：打退堂鼓了？

戴凤凰：40 多的婆娘，到哪儿都有进无退。况且，这是我们的儿童乐园，当年我们在这儿跑警报、藏猫猫、抓特务、打游击时，

一半舞客还没在妈妈肚子内发芽芽。

老威：可在风月场，这不占优势。

戴凤凰：时过境迁，从前“领导一切”的工农兵，眼下都属“弱势群体”。就认帐嘛，知足常乐嘛。就如现在，与你胡扯一通，还挣钱，运气不赖。如果每月凭嘴巴，赚个三四千，我就成电视节目主持人啰。

老威：作为洞洞舞女，你算祖母级吧？

戴凤凰：啥子祖母级？外国电影里，我这年龄段的女人最有魅力。

老威：误会误会。

戴凤凰：客气客气。

老威：干杯干杯。

戴凤凰：我只喝饮料，沾点儿酒，浑身通红。做舞女，头脑清楚比较好。与我类似的下岗女工，每晚几十个，或多或少都能赚点。即使不搞其它的，正常陪舞，一曲 10 块，就算跳 10 曲，也有 100 块。

老威：能接到 10 个舞客邀请么？

戴凤凰：太文绉绉了。舞池里像煮饺子，只要你进入，就浑沌一片，辨不清你我他。男的随便搂随便抱，女的也一样，不过古今中外的规则都是男的付费嘛。

老威：没选择余地？

戴凤凰：有，但反应要快。舞曲渐起，你马上说算了就算了；等到兜一圈，你才说算了，肯定给钱才能算了。

老威：不给呢？

戴凤凰：轻者罚款，重者挨黑打，还要被执勤人员撵出去。

老威：这样谁敢来嘛？

戴凤凰：洞洞舞厅搞了十几年，风风雨雨，开开关关，没听说缺过人。

老威：洞洞外面停了大片自行车，都类似你们家情况？

戴凤凰：你指男人骑车接送？我熟悉的姐妹中，有五六对，大家碰面还打招呼呢，家庭感情不错，才能做到这点。一般情况嘛，与过去上班似的，自己骑车来，或者吃完饭散步来。男人们心知肚明，不闻不问。

老威：这是一种人生？

戴凤凰：这是一种活法。也许防空洞时期，就注定我们多年后，会在里面赚钱。幸好毛主席仁慈，死得早，还为我们剩了点点青春的尾巴，我们死拽着，脸上多抹些化妆品，进洞洞还可以“让时光倒流”。近视加想入非非的各种男人，还可以在灯光的作用下，把我们当成 30 岁，过分一点，二十八九。男人也一样，明明五六十了，甚至奔七了，还自以为三四十，从不过五。你见过 60 岁大爷染红毛没？我见过，他说只有 28，我就装作天真少女样，夸他年少老成。结果他一兴奋，啥都没干，白给我 100 块。骗嘛，空欢喜嘛，白天真实残酷，夜晚何必那么真实残酷呢？本来两三代的青春，都叫共产党给耽误了，如果连青春尾巴也要斩干净，大家就同归于尽嘛。

老威：这儿算工人阶级最后的怀旧阵地了，挺悲凉的。咋样，叫你男人过来喝一杯？

戴凤凰：他吹着夏夜凉风，看着星星，挺好嘛。

老威：城里只有路灯，哪来星星啊？

戴凤凰：你过意不去么？就再给 50 块。我代表他谢谢。

天安门市民纠察队队长刘仪

采访缘起

这篇谈话放了两年多，直到今天，六四惨案发生快 20 年了，才翻出来整理。真有点对不住人。不晓得这期间又有多少六四暴徒出狱还乡？他们如何在生存线上挣扎？大约前年底去年初，我还在云南丽江遇一暴徒，据说在北京呆不下去，衹得跟着一哥们，背井离乡至此，替人看场子糊口。我问看什么场子？对方却吱吱唔唔，还叹气道：死容易，活着难哪。

2005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二，寒风刺骨的傍晚，武文建带领我和班忠义，从南三环的沙子口，辗转到牛街下车，然后在附近的菜市场，找到正在办公室值班的本文主角，石塔一般敦实的前天安门纠察队队长刘仪。武氏作了介绍，51 岁的老刘就伸开钳子般的大手，猛夹住我。隔着条桌，操摄像机的班忠义拍下了这一隆冬里的火烈场面。

6 点，天黑尽，拖着嘘嘘口哨的风，围绕幽魂一般的路灯打旋儿。我们出菜市场，才几步，就感觉腿僵硬了。老刘说，这鬼天，地面餐馆架不住吹，我们钻地下吧。于是，4 个壮丁就通过一类似矿井的入口，下两层楼梯，降至地下。密密匝匝的门洞，出没着打麻将的赌客，唱卡拉 OK 的骚客，以及三三两两不明身份的年轻女子。我们在小小过厅间迟疑片刻，便进了门洞套门洞的开放式餐厅，祇比包间稍微宽敞些。

幽暗的矿井灯，油腻腻的桌椅，4 人落座，犹如 4 个刚领完薪水的理直气壮的东北民工，点了一大锅炖骨头。底火啪嗒一开，油泡泡就全面泛滥。老刘捞起一根棒骨，才吱地长吸一口骨髓，我就迫不急待地掏出笔记本和录音机。武氏哀求道：老廖啊，让我们吃个十几分钟，再讲那些悲伤事儿行不？老刘也应和道：对对，否则

再好的东西也没胃口了。

刘仪：我先声明一点个人看法。我对这个社会有意见，可并不想颠覆它，恰恰相反，我是个爱国主义者。

老威：是不是自认为在皇城根下长大？有一种说法，爱北京就是爱中国。比如中央电视台所有主持人的口头禅都是“我们国家”，大家也就跟着叫“我们国家”。

刘仪：没这意思。不过我们家的确世代老北京，爸爸是铁道部门的老共产党，亲历过所有的政治运动。家里六子妹，我排行老五，除了妹妹，其他都挺坎坷。商业部门的大哥，下放到延庆；航天部的二哥，下放到宝鸡；老三和四姐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东北与河南。我也插了一年半的队，在京郊大兴。如今那地儿成经济开发区了。

老威：相当于从京城流放。

刘仪：几亿人的命运，就老毛一人说了算呗。

老威：然后？

刘仪：1976 年老毛死，我末代知青也当完了。回城，进航天部工作。干够 4 年，烦了，不想再做国营体制和派性的牺牲品，就自个放牛出来。

老威：留职停薪吗？

刘仪：80 年代初，没这一说。你要自在，就什么也甭想。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最早我卖口香糖，每天起早贪黑，挎着个书包，跑王府井和西单。那时口香糖刚时兴，好卖。嘿嘿，我在航天部，每月工资 30 多块，我家革命资历最高的老爷子，也就每月 70 多块，可我赚得还要多。

老威：改革开放的先驱？

刘仪：差远了差远了。那会儿的个体，在大众眼里相当于地痞流氓，或者剥削阶级出身。后来社会开放些了，我才由流动卖口香糖发展为固定摊位卖水果。赚钱，成了万元户，就长期补贴其他子妹。

老威：你在商业上智勇双全，咋会对政治感兴趣呢？况且，运动啦，游行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啦，某某上台某某下台啦，你在北京见多了。

刘仪：没办法，赶上"好时代"，是中国人就无法逃避

老威：武文建说，你 33 岁那年卷入六四。

刘仪：脑子简单呗。1989 年 4 月的穆斯林大游行，我也参加了。

老威：什么原因？

刘仪：民族歧视政策。

老威：学潮呢？

刘仪：撞上的。胡耀邦死不久，我经常路过天安门城楼，那时大游行还没开始。大学生游行、下跪、递请愿书、知识分子声援、当局不搭理什么的，是后来了。我们这些普通市民，被书生给感动了，人家为国为民，反腐败反官倒，也没得什么好处啊，市内小偷还罢偷 3 天呐。于是，热血上头，素不相识的人们就组成队伍，选出几个代表，来维持广场秩序。最早 3、50 人，后来扩大到两百多。

老威：叫广场纠察队吗？听说你是队长。

刘仪：我把卖水果积攒下的 2000 多块钱，都捐了，所以被推选为负责人。

老威：捐钱多就能当队长吗？80 年代末的 2000，相当于现在的好几万呐。

刘仪：还得有激情和头脑。我们纠察队比高自联和工自联成立

得早，最先在广场搭帐篷的，也是我们。

老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据说侯德健在六四前夜还在唱：丑陋的中国人，从来没有今天这么漂亮。

刘仪：六四，六三，六二，六一，那种记忆……我先抽根烟，这会儿心情太乱……廖先生，我可以问几个问题吗？

老威：好的。

刘仪：谁第一个下令？谁第一个开枪？第一辆军车是谁烧的？群众毁掉的枪支是不是政府故意送上门的报废武器？

老威：不晓得。

刘仪：是呵！你没在现场，你体会不了。六四当晚，戒严部队的两路坦克从广场两侧冲来，时速绝对超过 60 迈，疯了疯了。当时广场上剩几万人没撤。我最后一批离开广场，之前还碰着侯德健，他说要去跟部队谈判，我说没用。那子弹射的，比筛子眼还密，令人趴下就抬不起头。他妈的，八国联军、日本鬼子、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入侵北京，也没随便对平民动枪炮。而号称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却明目张胆，大开杀戒！

不清楚多少人逃，多少人冒着弹雨上，将中弹的拖回来。逃命没什么错，舍命上的就错了？后来在文化宫那边，第一辆坦克被点着，里面坐的是位师长。下半夜 4 点 45 分，广场准时熄灯，天亮前，穿着迷彩服的军队就开进来。我一看这阵势无法阻挡，当即把所有名单，包括我们纠察队和高自联的会议记录，统统浇上汽油烧了。这大约是那夜天安门的第一把火。

老威：你的叙述很有意思。

刘仪：不少人在英雄纪念碑东侧，手拉手唱国际歌。高音喇叭在喊：同学们，不要撤！我们没有错。学生万岁！市民万岁！打倒官僚，反对腐败！后来喇叭被打哑，有个人受连累，叫射倒在纪念碑底，流了好多血！黑压压一片的军队，开始摧毁帐篷，像赶俘虏

似的，将我们圈一处。纪念碑四周一片狼藉，我们纠察队的这些弟兄，最后被两排枪口指着，含泪离开。当我走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几个学生突然从侧面狂奔而来，追兵们喊：站住！别跑！话音未落，嗖的一梭子弹就扫过地面，惊得我也蹦了两尺高！傻了吧？人民军队就这样干手无寸铁的人民，他妈的……混蛋……

老威：你看见几个倒下？

刘仪：5 个。其中有个女学生，捂着肚子，肠子哗啦流出一滩。血啊呻吟啊喊叫啊。谁料到爱国会爱成这样？

老威：你们这帮人当即就撤了？

刘仪：撤了没有散。

老威：剩多少呢？

刘仪：就 10 多个。

老威：躲哪儿呢？

刘仪：先在一朋友家，谁都不敢露面，不敢打电话。那朋友很仗义，10 多号人在他家挤着，同吃同睡，却毫无怨言。7 号左右，我发现周围有可疑分子游弋，就立即率众转移，到丰台一农家大院熬了 10 来天。没钱，一伙人去不了远地儿，衹得又兜回来。结果暴露了。

没什么可说，朋友家转眼被围得跟铁桶一般。警察敲门，进门，喊话，点名，点一个铐一个。轮到我，叫了 3 遍没应，一派出所民警就上前煽我一耳光：还不吱声呢，抓的就是你！

接着栽进 7 处的看守所。一够 10 多人住的号子，却密密匝匝挤了 51 人，除开 7、8 个刑事犯，都是六四暴徒，其中 47 人戴着脚镣子。肉贴肉，没法躺下睡。还要挨打，还要应付审讯，我在 7 处将近 1 年，没报废算奇迹了。稍后又转到炮局和秦城监狱，每天吃熬茄子。

老威：我在狱中吃了几年熬南瓜，搞得我至今南瓜过敏。

刘仪：进去才半年，壮如牛的我，饿掉 20 多斤肉，剩一骷髅架子。更可怕的，是人肉仓库内没处洗澡。疥疮满屋子窜，半夜三更，几十双手挠痒，刨得轰轰轰，闷雷一般。你见过鸡蛋大的疥疮没？脓包穿了，指头捅进去搅，疼得呲牙咧嘴，还止不了痒。记得炮局时期，上茅坑得班长审批，然后两个人成对，屁股抵屁股下蹲。有时候正撒尿呢，突然喊“起立”，动作稍慢，一根大皮管子就射过来，弄得你变落汤鸡。夏天还好点，冬天就惨了。

老威：你什么时候接的《起诉书》？

刘仪：入狱 4 年后。不认罪没用啊，他们往死里揍了你，还要判你。

老威：什么罪名？

刘仪：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罪。其中包括：一，成立非法组织；二，纵火（虽然不是本人亲手点的）；三，拦截军车。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8 年。

老威：接着就劳改。

刘仪：一监和二监都呆过。主要缝大衣、裙子、挎包。记得有段时间，我们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生产出口美国的橡胶手套，一个星期下来，指头就变畸形。你看看，我这手指直到现在还没恢复。当然，有钱暗中贿赂管教，就不用干活儿。

直到熬满刑期，哥哥和妹妹来接我出狱。在大门口抱头痛哭一阵，3 个人就默不作声地走向二监大墙外的公交车站。

老威：当年的革命激情就此烟消云散了吧。

刘仪：在里面时，以为六四会很快平反，可一两年、三四年、五六七八年过去，没响动。唉，没响动也就罢了，谁也不指望鲜花、掌声来迎接。可气的是，回归社会还遭歧视。那天我刚上车门，售票员就狠推我一把。我说你干嘛？他说这不是你这种人该站的地儿。

我内心的火苗子嗖的窜老高，想不通这些年怎么啦，人不长记性了？变成呲牙咧嘴的鬼了？哪怕我就是曾杀人放火的劳改释放犯，也不能随便欺负啊。幸好家人劝阻，我才松开紧捏的拳头说：老弟，我今儿刚出来，本是喜庆日子，但我不怕再进去。我奉劝你不要因为一点出口伤人的小事，挂个大彩。

老威：然后呢？

刘仪：售票员不吭声了，而乘客向我投来的异样目光，跟刚才得到的自由一般陌生。车子摇摇晃晃，继续转弯抹角。我念叨着：整 8 年了，公交车路线还照旧吗？9 路过前门，我们坐 10 路，应该过天安门，抵长安街站，就到家了。可突然间车拐弯了，还没沾广场边儿就拐弯了！我急得大叫：走错了走错了，你们要把我带哪儿去？我哥回答：没错，老太太搬五棵松住了。我嘀咕：她怎么住哪儿？却猛地明白过来，原来哥哥和妹妹刻意让我避开天安门广场，那地儿留下的痛苦记忆实在太深了。

绕到公主坟才下车，再回倒一趟，挺费事儿，可终于回家了。上 3 楼，妹妹敲门，我妈隔着问谁呀？那从小听到老的细若丝线的声音！我梦见过多少次的声音啊。我想答应，喉咙却塞了块大石头。

老威：8 年没回家，相当于打完两场世界大战。

刘仪：所以母子重逢那瞬间，我的耳门过火车一般。在轰轰乱响中，我吼了声妈，卜咚就跪在门口。唉，8 年，一把时间的尺子，那端的母亲青丝缠头，身子骨硬朗；这端的母亲却飞雪满头，颤颤巍巍了。她扶我进屋，母子手牵手，相对垂泪。妈也说不出什么，只一个劲儿叫：儿子哦儿子哦，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说：妈哦妈哦，这些年你等苦了，儿子以后一定多多补偿，好好孝敬，再也不热血冲动，去白操心这个破国家了。

家里人哭成一团。我哥说：老五起来说话吧。接着，我妈就跟我嫂子一道进厨房，做饺子。我靠在床头听她唠叨：老五最爱吃我

做的饺子，今儿个我要亲手给他包，亲手给他煮。看看这些年，他瘦成什么样了，唉，可能连饺子啥味儿都忘了。

我一大男人，泪水又牵成线。直到饺子端上桌，大家围坐一块儿，我心里依旧堵得慌。半口也吃不下。妈紧挨我坐，不停往我盘里夹饺子，可手抖饺子滑，折腾好久才撮起一个，就举到我嘴边说："老五哦，你好歹吃一个，让妈高兴高兴。人生就这样，看开些，啊？"我强作笑颜，咬住饺子，想来个囫囵吞枣，却呛住了。

我蹲在地下咳嗽。这团圆饭吃的，饺子都凉了，家人们还没怎么动。天黑了，窗外十里长街的灯火闪闪烁烁。我哥见我稍微平静了，才说：老五，有件事我们一直瞒着你，咱爸没了。走的时候，他还直叫你名字。说不见你就不走。

五雷轰顶！我又跪倒了。透过窗玻璃遥望苍空，我对远行的父亲磕了 3 个响头。心里却说：爸呀，虽然你牵挂我，可最丢不下的，还是妈。我懂你一直叫我的意思，你放心吧。

老威：你爸哪一年去世的？

刘仪：呃，我出狱前 1 年。肺癌晚期，送医院没几天就不行了。

老威：现在是 2005 年，时间一晃，又是 8 年。而六四已经过去 16 年。

刘仪：16 年！有人死，有人活，有人还在坐牢。而社会却在经济腾飞。被关傻了，刚出狱，我连马路都不敢过。在人流里，慌慌张张，没作贼心还虚。有一回，我鬼使神差上了一立交桥（记得六四之前北京还没有大型的高架立交桥），东拐西拐，却不知该怎么下。身边的车，开得嗖嗖的，带起的风也要把人铲出去。正懵懂呢，却猛听一顿吆喝：傻比！走哪儿呢？原来是两个交警，老远跑上来。他们把我当成乡下人了。可再是乡下人，也不能骂傻比啊。于是我冲着他们，问你们骂谁？警察一听我地道的北京腔，就改口反问我们骂你了吗？你怎么奔桥去的？知不知道那上面不能走？

我说我没见过立交桥，怎么啦？大盖帽了不起啊？

老威：我出狱时，也跟你一样，起码大半年，还是自己家里的乡下人。

刘仪：一两年，我才勉强适应了社会变化。首先是交通，其次是跟人接触。有一次参加老同学聚会，某位同窗被我吓一大跳，他上下左右，瞅来瞅去，才把住我问：你真是刘仪？没冒充？弄得我哭笑不得，心里嘀咕：老得这么快？连同班同学都认不出。岂料他却说：你没有被戒严部队枪毙啊？都以为你死掉好多年了。我说：我是鬼，你掐掐啊。他还真掐了。是活的。于是大家挺复杂、挺遗憾地笑。

老威：遗憾什么？

刘仪：在人们记忆里，你已经死了多年，结果你还活着，还公开出现，这不是添乱吗？

老威：你后来靠什么为生？

刘仪：老房子被拆，我在附近搭塑料棚，地下砌砖，垫高 1 米多，弄了个小卖部。春夏秋冬、吃喝拉撒全在里面。

老威：感觉跟盲流差不多。

刘仪：对对。城管动不动就查，我也动不动就向城管队长下跪，管他叫爸。衹要能给点生存空间，叫什么都行。

老威：你也曾是广场纠察队长嘛。

刘仪：谁知道呐。后来经街道派出所研究，让我换地儿，重新搭棚开店。起早贪黑又一年，生意慢慢有了起色。

老威：你也像绝大多数中国人，被生活洗脑了？

刘仪：苦闷啊，当年的事儿，没人耐烦听，衹得一个人去天安门遛弯儿。鬼使神差，走到旗杆底下，六四那阵儿，我们纠察队的帐篷就扎那儿。如今呢，群众里三层外三层，看升旗降旗。不少人

从外地赶来瞻仰，听国歌，看大兵呱呱操正步，还热泪盈眶。我却站远远的，一根接一根，每次都抽完整包烟。

老威：想什么？

刘仪：想这中国人都是他妈的阿 Q，唤不醒了。六四也算白忙活了。

老威：白忙活吗？不好说。

刘仪：我将我的种种感受写成小文章，可找不到投稿的门路。稍后，警察开始特别关照了，有时一天来几趟，晚上还咚咚敲门。

老威：你写啥东西？

刘仪：都搜走了。我还记得一个片段：问心无愧回归社会，苦苦煎熬是我的命。可我看到的，是变色的人！闻到的，是浑浊的空气！遇到的，是一串接一串贪官！我要像昨天那样，站起来呼吁明天：任人宰割的同胞们，醒醒吧，认清我们活在怎样一个猪狗不如的麻木今天。

老威：接下来呢？

刘仪：警察设个套，趁我上西郊菜市场讨要 2000 元欠款，不由分说把我铐了。草草过堂，就栽赃一入室盗窃罪，又判我 4 年。原来，他们抵着我小卖部，安装了全天候监控器。

老威：你值得他们这样吗？再说，讨债怎么成了入室盗窃？

刘仪：约好在某某人家里见面，进屋却静悄悄的。我刚喊两声，就中套了。我操！我操！

老威：二进宫，相当于林冲误入白虎堂。许多六四暴徒还没出狱呢。

刘仪：这是 2000 年的事儿。我在二监呆 1 年，又转到茶店农场，与小偷小摸为伍。那个苦那个憋屈啊，不愿再提了。二监缝皮球，茶店种棉花。哦，由于我有手艺，是管教干部们随叫随到的按

摩师，所以减了半年刑。

老威：两进两出，你的感受如何？

刘仪：这次出狱，祇得自个儿回去。他妈的，盗窃罪，没脸让任何人来接我。身无分文，连身上衣服也是一队长送的。我领了监狱 40 块路费，搭公交车回北京城。除开家人，我对谁都生疏了，所以一时想不起来该去哪儿。我又来到天安门，坐在纪念碑底抽烟，一包抽完，天就黑尽了。唉唉，长吁短叹一番，居然还老泪横流，真像一条恋旧的丧家犬，多年前在这儿留泡尿，就永远记得那泡尿味儿了。

我在街头走走停停，整一宿。第二天才回西郊。忐忑不安地上楼敲门。半晌，门开了。我妈见我，直楞楞的，第一句话却是：老五！回来啦！这次你就是要饭，妈也跟着。

老威：家里人不知道你要出狱？

刘仪：应该知道。估计正关着门吵架，哥嫂的脸色比乌云还阴。我挤出笑脸，主动招呼他们，问家里一切还顺吧。我哥说行啦行啦，吃饭吧。于是大家围上桌，吃得气鼓鼓的。忘了为什么，好像是我哥嘀咕我回来得不是时侯，我们就接上火了。拍桌子打板凳。妈说走了干净。在厨房的嫂子听见了，就摔锅打碗，高声嚷嚷：要走？马上就走哇！谁也不想硬留你们。我说嫂子，这像人话吗？我明白你们的意思，我两进两出监狱，身无分文，还一把年纪。你们是怕我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赖在这屋，混吃混住，当作街坊邻里，也扫了你们的面儿。苍天可鉴，我来此祇为看一眼妈，她老人家安稳，我哪怕时运不济，路死路埋，心里也安稳。嫂子嘿嘿两声，说既然母子这么连心，就成全你们。

老威：你哥说什么？

刘仪：躲一边。接着我进屋，帮妈收拾日常用品，卷成一包。母子俩出门时，已是深夜 11 点多钟。店铺都关门，公交车都收班，

热闹的街道变得空落落的。

老威：你妈多大岁数？

刘仪：今年 83，那年 78.

老威：可怜啊。

刘仪：习惯了。世态炎凉，朋友反目，骨肉反目，从六四到现在十几年，我已经习惯了。妈比我经历得更多，想必更没有翻不过的坎。当时我兜里祇剩 27 块钱，我妈还边走边喘。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该去哪儿。

老威：总不能拖一老人，在街头再露一宿吧。

刘仪：我四处寻公用电话，到了五棵松，才瞅见一小卖部有。这时已过了 12 点。我想起一老哥们，从六四前直到第二次坐牢前，20 几年，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我满有信心，给他打电话，通了。他正开出租车呢。我说我是刘仪，正没地儿去。你在哪儿呢？他说在路上，拉着活儿呢。又问：老哥你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不通知一声，兄弟我好歹也该接个风啊。我胸中一阵暖，就答刚出来，还把家里才发生的事儿跟他讲了，让他过来接我们一趟，祇要安排暂住一宿就行。

他答应了。我就搁下电话等。20 多分钟过去，我见妈靠在墙边，站不住了，就赶紧放下包袱，让她坐。我又给老哥们打，通了。他说你再等着，这趟活儿特远，至少还得十几分钟才到地儿。折回五棵松接你，疯跑也还得 40 分钟。

老威：这年头，笑贫不笑娼，你哥们也不容易。

刘仪：我也这么想。可人不沦落到这份儿上，谁愿意开这种口。我甚至在琢磨，我一堂堂男子汉，往后得暂且放下平反六四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顺应经济大潮，打拼一番。如果掘到第一桶金，宁愿自己不花，也要回报这夜半送温暖的大恩。

老威：后来呢？

刘仪：过一个钟头，我再给他打。他在电话里，连连抱歉，说回转时，又载了个短途客人。一女的，拦不着车，出于职业道德，他就拉了。我说我没关系，世界末日都扛得住，衹是我老娘困啦。他说是吗，太对不住你老娘。再等 10 分钟！最后 10 分钟！我一准到！

老威：他不会来了。

刘仪：20 分钟后，我打最后一个电话，他关机了。连小卖部老板都忍不住对我苦笑：老哥你太背了。好好照顾自己的老娘吧，我也该关门了。

老威：关机又关门，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刘仪：我心凉啦，我心真凉啦！那会儿夜里两点多了！万万没想到！古人说虎落平阳遭犬欺，却没说虎娘也捎带着遭犬欺！我还得做出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样子，一把挽起妈，大声说：我们走！

又来回折腾了不知多久，大街上彻底空了，没别人，10 来分钟才过 1 辆车。路灯一个劲儿眨眼，妈走着走着，就面条一般滑地下，我急忙背起她，跑了两站地儿，一头撞进公主坟附近一家小旅馆。

墙上挂钟，差 10 分就 4 点。这家旅馆开十几年了，曾经与我混得非常熟。我见一老头在值夜班，就堆满笑脸套近乎：刘总在吗？答不在。我说那小瞿呢？答也不在。我说：老熟人都不在，那我跟您商量个事儿，我跟我妈夜里没地儿住，您看天都快亮了，能不能让我妈在里面坐一小会儿。他问：有派出所的证明吗？我说家里出了点儿矛盾，还来不及找派出所。他说不行。没证明，我知道你是谁呀？我说借用一下你的电话可以吧。他说万一你用电话作案怎么办？我被呛住，忍了半晌，才说：我可以遭罪，但不能让我妈遭罪啊！他说关我什么事儿。我说你也有老娘啊。他说骗子有老娘，不也是骗子吗？

老威：没见过这么嘴狠心毒的。

刘仪：可我已没力气和他计较。就自打退堂鼓：好好，天亮后，我们继续理论骗不骗的事儿。我把妈搀到旅馆的花架子底坐下，灵机一动，就以她老人家作抵押，硬着头皮借了辆旅馆的破自行车。我说：妈，你暂且在这儿呆着，等儿子回来。儿子没来，您哪儿都不要去。

老威：什么季节啊？别把你妈冻着。

刘仪：快秋天了。所以我着急啊。我骑上车，恍恍惚惚地跑到右安门外。天刚濛濛亮，两天连夜没合眼，我的眼珠子又红又辣，可还是瞥见一墙壁间写着“此房出租”。我立马刹车，凑过去打听。房东正好蹲在那儿，袖着个手，还没睡醒的邋遢样子。我也不管了，直接就说想租房。他说行，你先进来瞅瞅，合意不。那门衹一小人儿高，我埋头进去，在暗中适应了一会儿，才瞄清楚：几平米的空间，木板子加凳子搭的床，但是被褥都齐。得，顾不上了，总算是个避风的窝。

我问 1 个月多少钱？他说 400.我说 400 就 400，我先把人接过来，等中午再给钱。他稍稍犹豫，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老天啊，你还嫌折腾得不够吗？

老威：真如旧戏里唱的，半个铜板憋死英雄汉。

刘仪：可房东答应了。随后，我火速回转，将快散架的妈接来安顿。奔 80 的老人，平生第一次遭此大罪。不孝子刘仪啊。

老威：然后呢？

刘仪：兜里揣着 26 块钱，去我妹家。你猜妹妹、妹夫见我第一句话是什么？

老威：什么也不用说，端一碗热汤面上来最实惠。

刘仪：我进门，没坐，3 个人就那么站着。妹妹、妹夫说：哦。你回来了。我也说：哦，我回来了。接着就把妈流落街头的事儿讲

了，并没有埋怨哥嫂的意思。可妹夫大约误会了，或者故意误会了，就说：像你这种不识时务的人，谁沾上谁倒霉。我说：我还供妹读过书呢，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今天要不是为了妈，我死也不会进这道门。妹夫说：可你还没死，就进了这道门。我说：你打住。这次跟以前不一样。我刘仪冲着天安门，冲着那些死去的哥们儿发誓，不在这个王八蛋世道混出个人样来，就自己了断。

老威：血缘相系，何至于发此毒誓！

刘仪：走在街上，眼泪憋不住哗哗流。那天我饿着肚子，在租房附近借辆三轮，用 26 块本钱，跑早市批发蔬菜，然后弄到热闹地儿，卖个差价。我心想，如果老天灭我，今儿还撞上城管收摊儿，就他妈的拼了。还好，挺顺，我跑了 3 趟，中午时赚够 100 多块，就先交部分房租。母子俩在街边吃了一顿面。

老威：幸亏你的身板结实。

刘仪：当了几天菜贩，我就自己找到工作，在一家公司做全天候看守。也就是说，别人干 8 小时，我干 24 小时。

老威：吃得消吗？

刘仪：没选择，别人拿 800，我拿 1300 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他们雇我一人，能抵两个半人，多划算。所以一个多月，我就用上手机；3 个多月，我就骑上摩托。也算小出一口恶气。

老威：蹉跎了许多年，你终于融入社会了。

刘仪：干满 3 个月，我辞去看守，改卖水果。街道派出所发善心，借我一辆三轮车。每天夜里三、四点，就是《半夜鸡叫》里，地主周扒皮让长工们起床的时辰，我就出发去进货，因为去得早便宜呵。而晚上 10 点多钟才回家。那个忙碌啊，有时尿急都撒不成。

老威：水果利润还可以？

刘仪：得分季节。总之，每天至少卖两车，早晨 7 点前必须卖掉 1 车，才稍微有点赚头。奔完生存，接着奔户口，不能老租房子

呀。户口没处上，我就找区里，区里把我支到房管所，房管所又把我支回区里。求他们办点事儿那个难呢！那段时间我急得上火，眼睛红得要吃人。有几个月，我几乎每天 8、9 点，准时到房管所，弄得进出的员工都跟我开玩笑：你这人干嘛，天天准时报到，与我们一块上下班！死赖着，能解决什么问题。后来区里的人烦了，索性通知保安，不让我进门。没辙呀！祇好咬咬牙，做个拦车的滚刀肉。有一天我在区政府门外 100 多米，截下一辆车，辨辨车牌，挺有来头的，就扒住车门问：请问您是不是区长？当时副驾座上是位年轻的眼镜，文质彬彬；而开车的年纪大些，壮实一些。戴眼镜的说：你有什么事吗？我又问一遍：您说您是不是区长吧？不料话音未落，那开车的就猛踩一脚油门，车子火箭一般射出，冷不防把我拖挂了七、八米远，两只鞋都掉了。若不是我手劲儿大，抓得紧，肯定就甩碰到前方的门柱子，不死也得残废。随后，他们拐入一个地下停车场，连喊我滚下去。

老威：跟演匪警片似的。

刘仪：他们在车库打了几个旋儿，我一时把不住门，摔下地，遍体鳞伤。他们跑了，我瘸着个腿，在后面追了几百米。就这样，出名了。房管所终于批给我一个房，10 多平米。从前是一举目无亲的五保户住，后来被送进养老院了。那房呀，看上去起码 100 多年历史。

老威：文物吗？

刘仪：夏热冬凉的牛毛毡平房，墙体全用碎砖砌成，还漏。可是我当时高兴得！总算、总算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窝了！廖老师，等一会儿你可以看看我的户口本，去年才落上的。

老威：哎呀，太不容易！总算安定下来。娶老婆了吧？我们谈话缝隙，你接了两个电话。

刘仪：提起我老婆，说句心里话，真不简单。相识两年多，我

无论做什么，她都清清楚楚；我干任何干事儿，她都支持。最难那会儿，我俩还抱头痛哭呢。她总是说：别着急，别泄气，有我呢！昨天我去她家了，我听见她跟她妹讲：刘哥太不容易了，你们谁要是怠慢他，我绝对不依。

老威：你母亲还住最初的租房吗？

刘仪：还住右安门，不过是另租一条件稍好的房。她今年已83了。

老威：你放心吗？

刘仪：我这边挤不下，有什么办法？我们祇能管房费生活费，腿跑勤点。

老威：你的其他姊妹都有房啊。

刘仪：指望不上。我也不怨。谁叫咱中国人赶上了改革开放、见利忘义、人人向往腐败的新时代？我等蕓蕓众生，天天忙忙禄禄，累折了腰，干嘛呀？奔吃！一大早撅着屁股出门，上班，中午回来，扒拉几口饭菜，哦，又得出门了。到晚上接着，还是锅碗瓢盆、油盐柴米。这样周而复始大半生，终点站到，真对不起，该你下岗了。

老威：多数人就这么过。

刘仪：我亲眼见，如今不少下岗的，才三四十岁呢，天天在菜市场捡烂菜叶子。虽然我目前状况，还马马虎虎，但那10多平米的五保房，就简单维修了一下，就花去一两万。目前为止，我还欠外债一万多块。日子总得过呵。

老威：按邓小平当年的说法，你曾经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就因为卷进六四，才成了暴徒，才遭遇了后面一系列坎坷。你后悔吗？

刘仪：六四是我人生中最光彩的一段，超越了“奔吃”，超越了“发家致富”，我不后悔。虽然我已50出头，但身体零件都还齐全。我坚信能熬到六四平反、告慰冤魂的那一天。

【后记】

深夜 11 点过，谈话结束。锅里的骨头剩了许多。我们恋恋不舍地起身，升至北风呼号的地面，匆匆握别。

我和武氏打的到地铁口，居然赶上最后一班地铁！整节车厢，除我们之外，就一伸腿打瞌睡的青年。我估计武氏犯案时，岁数与他差不多。

回塔院住处，已 12 点半。我的老哥们忠忠开了两重门，让进我。他说我身上的寒气，一下子把正做春梦的他激清醒了。还问我一天功夫，为啥就老掉 10 几岁？连胡子眉毛都是白的。

是的是的，脸结冰了。当晚我就重感冒。天见亮起床，连下两剂蒙汗药，再睡。再度醒来，天又是黑的。

身子面条一般软，可还得耗下去。

光棍刘长五

采访缘起

光棍刘长五与共和国同龄，打小习水墨，在本城国画界颇有些资历，据说每挥毫一次，能赚银两数千。只可怜我这等眼拙者，望穿秋水也品不出其中真味。

但弥漫在他生活里的腐朽气息，我却在十几年前，就深深地感受了。那时他与喝胎儿滋补汤的养生专家迟福形影不离，两人财力和志趣相当，均为世袭“成都土著”，一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好歹不分，歪打正着——此等货色，在中国其它地方很难见着。

而今迟福西归，遗下长五，犹如城隍庙的一对鼓槌，只剩一只敲得响，不禁令我暗自叹息。于是悄悄启动录音行头，将种种不堪入耳之低级趣味，收入记忆之囊，也为以后的读者，增添一点市井谈资。

时间：2009 年 5 月 18 日下午；地点：成都西面仿古旅游景点宽巷子龙堂茶座。天色晦暗，过客如织，犹如胡乱篡改的历史，看不出头尾。

刘长五：好多年没在一块混了。

老威：是么。

刘长五：真有些感伤。

老威：是么。

刘长五：还是迟福引见你我认识的。

老威：是么。

刘长五：可他已经见阎王了。

老威：是么？！我写过的那个食客迟福？死了？！

刘长五：肝癌，5·12 大地震没几日，就拖到头了。我跑去送葬，殡仪馆兵荒马乱。他老兄整整排了 4 天班，都有些变味儿了。一进焚尸炉，大家都松口气。

老威：哎呀，他最会养生了！喝胎儿滋补汤上瘾，起码就耗掉 10 来万，我以为他要长命百岁呢！

刘长五：也算划得来，皇帝没尝过的鲜，他尝了。

老威：是么。

刘长五：死而无憾。

老威：你呢？

刘长五：光棍一条，活而无憾。

老威：长五啊，你 60 了吧？

刘长五：关你屁事。

老威：还是找个女人。太年轻的搞不定，40 以上的总可以嘛。再混下去，哪天走不稳路，比迟福还惨。

刘长五：谢谢你的猫哭耗子。嘿嘿，这年头最不缺的，就是女人。

老威：真豪迈。你该不会把伟哥当饭吃哦。

刘长五：我是把饭当伟哥吃。和你差不多，我离婚两次，不想再结，又不想寻花问柳，更不想放荡不羁、步迟福哥哥的后尘。咋个整？

老威：咋个整？

刘长五：找保姆嘛。

老威：聪明。几年前我看过一篇报道。讲某某大学的退休教授，不幸丧偶，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终于导致悲观厌世，就差没主动上

吊或跳楼了。儿女们心急如焚，无奈之下，就为教授父亲安排一刚进城的乡村小保姆，打理家务，暗中监视主人的异常之举。不料七拐八拐，阴差阳错，19 岁的保姆竟爱上了 69 岁的教授，还不顾其儿女和社会舆论的反对，结婚了。

刘长五：这有啥子稀奇。

老威：对对。后续报道说，这桩年龄差距整 50 的婚姻，相当和谐。在家政之余，保姆跟教授刻苦学文化，天长日久，知识水平超过普通大学生，直追研究生；而教授呢，也感染保姆的青春朝气，挣脱了孤独的暮年漩涡。

刘长五：《周易》大壮卦里有解释，这叫“枯杨生花，老夫娶少妻”，老当益壮而壮不了，就难免不戴绿帽子。

老威：你的心理咋这么阴暗？

刘长五：还有财产纠纷，若干莫名其妙的纠纷。照岁数，教授的儿女都能做保姆的爹妈了，倘若他们这后妈再生娃娃，名分就更乱。我听说过这位标新立异的教授，还是个古文学者，当然晓得孔夫子强调“名正言顺”，否则天下就“礼崩乐坏”。

老威：我看你是“杞人忧天”。

刘长五：不是忧天，是忧己。所以如我这类传统的道德楷模，注定了打光棍。不过今非昔比，光棍的性问题要引起广泛重视，不能自己把自己压抑成变态狂。

老威：我晓得好多光棍都嫖妓。市场价一百至两三百不等，请几个哥儿们撮一顿，开销还大些。

刘长五：乱世的怪病太多，嫖妓相当于探险。所以这么些年，我一直坚持走保姆路线。

老威：跟教授学的？

刘长五：老子是教授他师傅，1990 年代就无师自通了。当时

邓小平刚刚发表南巡讲话，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被彻底搅活了。我离婚跑深圳，正好领上风气之先。与港商接触，卖画，淘到第一桶金。记得我那幅在箱底压了十几年的《贵妃醉酒》，就是在一个美容院成交的，4000 港币，我的妈呀，厚厚一沓，真给咱中华民族争光了！

老威：干啥跑美容院卖画？

刘长五：人家就约在那儿，换你去不去？门脸挺正规，内里却藏污纳垢。港商提前点了两个小姐，统统脱得一丝不挂，在包间恭候。如此待客之道，我从前只在写魏晋时代、狂狷之士的古书上见过，可在现实中，嘿嘿，真他妈丢人。

老威：咋个？

刘长五：我居然骇得冷汗直冒，只剩喘粗气的份儿。那港商是个生产旅游鞋的，哈哈一笑，就招呼小姐来剐我衣裤：刘先生啦，玩艺术啦，大家赤诚相见啦。搞得我很不好意思，就提醒季度拉网式扫黄特厉害，抓住一律拘留重罚。不料港商是个懂政治行情的老油子，竟随身揣着一刚出版的 VCD，放出来一听：《春天的故事》！我的思想包袱马上就卸掉了。真是其肉融融啊，我们洗完澡打完炮，还学大牌明星，肩并肩，互相搂着，围绕着电视齐唱：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划了一个圈……

老威：干脆把《春天的故事》改成《春药的故事》算了。

刘长五：对对。那年的深圳，满大街放这歌，这就意味着扫黄过去，暗娼和嫖客可以大摇大摆过来，房地产、生产线、加工厂、走私货、冒牌货也可以跟着过来，只要民运分子不趁浑水摸鱼，过来搞颠覆，就天下太平啦。我这画传统画的，也抛弃了千年伪装，光着屁股，怀中还掖着一颗美眉肉弹，与殖民地奸商侃价，真所谓“饮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

老威：你就这样解构汪精卫的千古名句？

刘长五：我在阴暗角落怀抱金钱美女，与他在满清大牢怀抱革命豪情，性质一样嘛。哪知乐极生悲，我不慎染上菜花……

老威：尖锐湿疣？

刘长五：肉米米如蚂蚁军团，爬满下身，不出两个月，鸡巴就沦为破铜烂铁。他妈的，卖画 4000 港币，大半变成医疗费。

老威：然后呢？

刘长五：灰眉土眼，打道回府，永远绝了找鸡的念想儿。

老威：然后呢？

刘长五：就找了第一个保姆。

老威：在哪儿？

刘长五：九眼桥。

老威：那儿原来不是成都最大的劳务市场么？

刘长五：我不晓得有专门的保姆市场。那天从望江公园出來，一路闲逛，不知不觉，人与人就亲密无间起来。密密麻麻的脑壳，追着撵着，大呼小叫：要人不？干啥子都可以。或者拉拉扯扯：要哪样？女的男的？开个口嘛。嘿嘿，氛围太热烈了，搞得人想入非非。

老威：有点像逛菜市场。

刘长五：对对。既然逛了，茄子、萝卜、青辣椒，总得拎点啥子回来。

老威：人和蔬菜不一样吧。

刘长五：开头就这么简单，找个人料理家务嘛。没拆迁时，我家在长顺街，带院坝的老平房，打扫起来特麻烦；自己弄顿饭吃，钻进钻出，憋得满头大汗。所以我也就随便雇个农村大嫂级别的，没挑模样。

老威：通过市场管委会么？

刘长五：当时比较混乱。看看《身份证》，问问情况，就算过关。不想交冤枉钱，就没找管委会办手续，按现在的说法，叫雇黑工。那大嫂姓李，30 来岁，住什邡县红白镇……哎呀，就是 5？12 地震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个地方！死掉了好几千，不晓得她逃脱没有？

老威：你至今还记挂，感受挺深嘛。

刘长五：她手脚麻利，善于烹调，而且才 400 块 1 个月。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享了 10 多天的清福，正暗自庆幸捡了大大的便宜呢，李嫂的老公就上门了，还抱着 1 岁的奶娃子，惹起我一脸秋风。可没用，可怜兮兮的乡巴佬，我又狠不下心肠逐客，只得连续摔门，表达表达情绪。李嫂两口子面面相觑，只得鞍前马后，加倍服侍，才顺了本王爷的气。

老威：李嫂是背着家里出來打工？

刘长五：两口子串通好，出來躲计划生育。他们已生下 3 个女娃儿，被罚款上万了，还是铁下心要养个“接香火”的。李嫂说不怕拆房子，几匹烂瓦嘛；就怕被村镇干部们拿住，按翻了节育，肚子里硬生生塞一圈圈，抠不出来。

我说你们永远这么躲猫猫？李嫂说原地务农还不如四处乱跑，又见世面又挣钱，运气好，还能遇上刘老师您这样的画家，档次云里雾里就提高了。我想让这奶娃儿拜您老做干爷爷，也沾点艺术气气。

老威：这么早就当爷爷？

刘长五：自然不能做这赔本买卖。但李嫂却就坡下驴，接过了奶娃子。唉，只要不耽搁做事，我也就认了。乡巴佬带娃娃，没城里人那么金贵，就偶尔背背抱抱，平常则丢在地上，任其乱爬，跟养只乌龟差不多。

我家伙食不错，没多久，都吃胖了。男人胖了，至多松松腰带，

带拖斗的女人胖了，奶奶就膨胀，娃娃吃不赢，李嫂的胸前经常湿一大片。有个晌午，我正在画画，她喂完娃娃，背过身子，挤了小半碗，红着脸问我喝不喝？我有些惊诧，她就说这东西很补脑，画画费脑筋，她想支持刘老师的事业。

老威：在旧社会，奶水是要卖钱的。

刘长五：新社会也一样。李嫂太纯朴了，所以我当即给她奖金 100 元。

老威：你喝奶没？

刘长五：尝第一口，觉得腥味大，捏鼻子灌下肚。李嫂高兴坏了，从此天天挤奶给我喝。哎呀，比鸦片烟的劲道强！搞得成天神清气爽，甩手散步，脚干飘起的。不晓得姓啥了，长五刘变为泽东毛了：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老威：人奶含致幻剂么？

刘长五：反正我喝了半年，状态特好，搞女人特行。可李嫂突然外出一趟，耽搁几天回来，就断奶了。我的情绪顿时一落千丈。大人又不可能像娃娃，饿了，哇哇叫一阵，喂点糊糊就对付过去。这管不住的眼睛，要瞟人家的胸，不是色，而是那失去的奶味儿勾魂嘛。

老威：后来呢？

刘长五：我一次性付了两千元，将李嫂打发走了。

老威：也太不厚道。你雇的保姆，又不是奶妈。

刘长五：我控制不住心猿意马，只好另起炉灶。

老威：保姆兼奶妈，到哪儿去找？

刘长五：保姆市场乱碰嘛，黄瓦街、骡马市、人民公园背后，只要撞见农村妇女打堆堆，就使劲钻研。保姆太多了，只要有钱，

请一个团回来都没问题，但奶妈难找。如果时光倒退几十年，奶妈成群，跟鸦片烟、妓女一样，随意选购。

老威：没那么夸张。

刘长五：你懂个屁，你又没被国民党统治过。

老威：你也没……

刘长五：老子生于 1949 年，胎教是在中华民国完成的；稍后呱呱坠地，又目睹了国共两党决战，如果当时逮住蒋家王朝的尾巴逃到台湾，如今就是台胞了。

老威：瞎扯蛋。

刘长五：所以我打上了旧时代的阶级烙印，彷徨、怀旧、腐朽甚至糜烂，总之，张恨水、张爱玲小说里写的上海滩公子哥儿秉性，我全有。而你，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娘胎里就六亲不认，只认革命。

老威：奶妈和革命有关系么？

刘长五：有啊。共产党一来，奶妈、鸦片烟、妓女，这些历朝历代都有的、相当于在超市随意挑捡的跨时空的"毒瘤"，就统统革掉罗，人民就新生、也就是没下半身罗。再把上半身交给党，交给毛泽东思想，人民就抽象了、没有了。

老威：中国人民有十几亿。

刘长五：不敢乱想乱搞的人民能叫人民么？整天听毛主席的话，可毛主席并没有把他老人家糟蹋了多少良家妇女告诉你，说不定无数奶妈围着转，边跳忠字舞，边时刻准备给"红太阳"喂奶。哪像我长五，想吃口奶跟做贼似的。

老威：打住打住。

刘长五：所以我们父辈的日子，比我们红火，吃喝玩乐比我们讲究。那时的成都府，穿城才九里三，可东西南北都有人市，红庙

子、御河、后子门、骡马市、南门瘟祖庙、北门岳府街……数不过来，要啥有啥。据说某某医生养的洋狗，也没事儿就逛街，饿了，就自己进大饭馆，将前爪搭凳子上，汪汪叫菜，直到堂倌喂它一块熟牛肉；堂倌把帐单插在项圈内，改日由主人结算。

老威：从皮肉享受的角度，这些年发展得不错了。只要不公开反党，不强烈同情穷人，干啥子都可以。

刘长五：还得再发展几年，几十年的风水才彻底转回来，奶奶敞开供应，比民国还民国。

老威：呵呵，原来你在等待大展鸿图。

刘长五：我早就响应邓小平号召，黑猫白猫逮住耗子才是好猫了。开头羞羞答答扯谎，为婴儿请奶妈。大家都摸不着头脑。脚跟脚，鞋子跑大几码，才带回来一个断奶半年、据说可以重新催回来的。于是一天三顿，都给她喂花生米炖猪蹄子，外加虾仁汤，唯恐照顾不周，将她搞得牛一般频频反刍。终于终于，奶头湿润了。我赶紧拿碗，可她翻来覆去挤，就只出來半颗，花椒一般，粘在那儿。她用指姆刮下来，递给我。说实话，我没尝出期待已久的浓香奶味儿，汗酸味儿倒是有，还有麻辣味儿。人家也急，把奶奶拽得跟弹弓似的，想自己吮几口引奶，可脖子弯下去，就差那么点儿，两头够不着。

老威：憋到这份儿，就直接扑上去帮忙嘛。

刘长五：你咋晓得？

老威：当我是白痴啊。

刘长五：我就应邀返老还童，门牙把奶头都刮出血了。但婴儿是啥劲道，成年人是啥劲道，随便一吮，她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不由自主地呻吟，好歹忍住没叫出声。唉，尝着奶了，一时冲动，连胯也尝了。

老威：她多大年纪？长得漂亮么？

刘长五：三十七八，三个娃娃的妈。

老威：哼。

刘长五：你哼个鸡巴！至今我都后悔。日晒雨淋的农村妇女，三十七八的模样，比我 50 几的模样还老。而一旦发生那种关系，单纯奶也吃不成了。

老威：不愧源自民国的艺术家，太感性了。

刘长五：打发走人时，她还哭闹一阵。莫办法，加钱加钱。

老威：经过这番折腾，你还有奶瘾么？

刘长五：毕竟不是毒品，沾上就甩不脱。有就吃，莫得就算逑。佛经里反复强调，人不可执着。可保姆还是要嘛。

老威：光棍汉，要不要无所谓。

刘长五：错错。思想上光着，叫特立独行，添点光环，就叫“独立知识分子”，而生活上光着……是不是有病哦。

老威：做你家保姆，就必须上床？

刘长五：名义是雇保姆，哪能太直接太低级？教训越多，挑拣就得越小心。不光年龄和奶奶大小，模样还要过得去，最关键的是面善，天天瞅着舒服，上不上床也就其次了。

老威：你还会相面啊？

刘长五：我搞国画，人脸是研究重点嘛。降低到选保姆，眉眼宽朗者，气血贯通者，天然带笑者，都不错。

老威：观音菩萨的眉眼最宽朗了。

刘长五：对嘛，观音也算芸芸众生的精神保姆嘛，所以大家不论碰到啥子事，都冲她磕头祈愿。有一回，我约两位朋友在抚琴路烫火锅，就遇着个长得像观音的服务员，上完菜，就双手背着，笑眯眯地站在包间旮旯，感觉很安逸。于是我乘着酒意，没头没脑，与她摆龙门阵。初步摸底有几分了，就问她愿不愿意改行，替我搞

搞家政，工资也许翻倍。小丫头的眼珠子陡然亮了，接着就叽叽喳喳地诉苦，说在火锅店打杂，每天十几个钟头，使烧碱搓洗鹅肠鸭肠，大半年下来，手板皮已经蜕掉几十层，才熬到包间服务员的等级。

我瞅了瞅她伸出来的手，毛毛糙糙的老树皮啊，就叹息一声，给了 50 元小费，叫她去买护手霜。临走时，留下一张名片：想换工作，就电话联系。

老威：怜香惜玉哦。

刘长五：莫想歪了。小丫头 19 岁，又稳重又机灵，个把星期后，来电话，约在文化公园茶馆。讲妥了条件，又是个把星期，才辞工来我家。

老威：东北话，胆儿够肥的。

刘长五：生活所迫。况且画家给人的印象，与腐败分子不一样。说实话，这么个丫头，如果不是她主动投怀送抱，我还真下不了手。我心灵最为干净的，也就这段莫名其妙的岁月，连憋不住打炮，也舍近求远，跟朋友去某某砂轮厂附近的洞洞舞厅，尽量不把风尘女子裹回来。

老威：啥子洞洞舞厅？

刘长五：1970 年代挖的防空洞，全国各地都有，用来对付苏联的原子弹。随后斗转星移，冷战假想敌消失了，可防空洞也不能白挖，有的改成地下商场，有的改成地下夜总会，洞洞舞厅嘛，最捡懒最省钱的搞法之一，墙壁粉刷几把，隔个门，装两个破音响，就是中国底层的最佳娱乐场所。门票 10 元，场场爆棚，舞客全是下岗的、打工的、失意的、混一天算一天的。

老威：你好歹也不算下流人士，何苦如此？

刘长五：寻刺激嘛。鬼影子灯光，慢慢扫来扫去；黑咕隆咚中，大片大片发绿的女人脸，闭起眼睛，随便搂随便抱，个个都是“见

光死”的大龄美女，所谓跳舞，不过进进退退而已。进退之间，乱摸出感觉了，掏个二三十，至多四五十，就可以梭边边，在咔嚓咔嚓的音乐声中顶入。

老威：当众搞？

刘长五：各陶醉各的，没人理睬。不巧被戴红袖套的执勤人员撞见，也就是拿电筒晃晃，再拍拍你的肩膀提醒：喂喂，文明点文明点。曾经有一次，新来的执勤人员没搞懂行情，大惊小怪，硬要将连裆裤男女掰开，结果被暗中一闷棍敲昏了。

老威：有点像旧社会的黑帮电影。

刘长五：我还在这种场合，弄了个保姆回来，结果是个吸毒妹。一进门，家政没安排，就迫不急待喊上床；上完床，就喊给钱；拿了钱，就冲去找药。前几分钟还好端端，转眼就撕衣服、抱腿、翻滚在地，差点把老子骇出心脏病。

老威：你那个像观音菩萨的保姆呢？

刘长五：她在我家干了 1 年多，包吃包住，月工资 1200，没上过床。可以了吧？

老威：想法也没有？

刘长五：每次都硬生生压下去。

老威：为啥？

刘长五：这丫头自称简阳人，高中没读完，就家贫失学，外出打工。我觉得这社会够残酷，够毁人，我是良心画家么，没能耐培养她，也不能再毁她。

老威：这是否算另一种爱情呢？纳博科夫名著《洛丽塔》，就写了你这样一个复杂的老鳏夫。

刘长五：狗屁。这种西洋镜里的想入非非，差点将我搭进去。某月某日，趁我夜不归宿，她撬开我的内室保险柜，盗走 5 万现金。

幸好没拿其它东西。

老威：你报警没？

刘长五：自认倒霉。人家蓄谋已久，恐怕早就远走高飞。哎呀，当今乱世，类似“仙人跳”多了，都怪自己被那菩萨脸蛋迷惑，还以为雇保姆是修行呢。

老威：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刘长五：这次算个重大转折。同情就是犯罪，必须将自己和保姆的关系，简单明白化。社会发展了，家政公司多如牛毛，通过网络就可以查询、比较、联系。弄饭菜和搞卫生，钟点工搞定，上床也一样嘛。

老威：上床和搞卫生一样？

刘长五：体内卫生，体内钟点工搞定。上门服务，按质论价，如此而已。

老威：又回到找鸡的老套路。

刘长五：没丝毫找鸡的感觉。人家平时也不做鸡的营生，而是在公司上班。多数有老公或男友，做这个，无非是神鬼不晓地捞点外快。我有个随叫随到的老相好，相处快 3 年了，彼此很关爱，交配很有耐性。开始她自称大学文化，单身白领，久了熟了，我才晓得她高中没毕业，老公娃儿却齐全。莫得关系，哈哈一笑就拉倒。有次过儿童节，我为她那读 4 年级的娃娃买了一套高级文具，感动得她泪汪汪的，上完床，硬不收钱。这不行，两回事儿。

老威：曾经沧海难为水。真高尚。

川菜厨子周半岛

采访缘起

见识过若干川菜厨子，却极少见识周半岛这种头脑特别的厨子。

2009 年 7 月 22 号，举国看日食；在日食前两天，受我家妹妹邀约，在半夜两点多钟，跑到人民公园附近吃鬼饮食，也就是著名的“老妈蹄花”。这个标准的苍蝇馆子，据说有 20 多年历史，几经搬迁，依旧一烂摊子，却深受广大夜游神群众，特别是出租车司机的拥戴。真是超级火爆，大马路旁，折叠桌子从堂内延伸至堂外，终于挤满街沿，可还有不少夜不归宿者，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桌凳，就将清炖猪蹄及其蘸水搁地上，蹲着吃，一口蹄花一口酒，还不忘啧啧赞美：骨头都是酥的！太安逸罗！

妹妹在吃喝间偶尔抬眼，见对面有张熟脸，就打招呼：“哦哟，老周，好久不见！自己有馆子，还在外头来混嗦？”

我也抬眼陪笑。成都人的习惯，言语几番往还，对头了，大家就借势拼凑一处。经介绍，此深度近视的瘦猴居然是个厨子，虽半路出家，但在川菜江湖上，也算一人物。

“我的馆子早关门了。上不去下不来，就认输认命，莫跟遍地大馆子竞争。”

“你还可以开个这种猪蹄店嘛。”我说。

“最早，这儿一根猪蹄卖一元钱，现在，翻了 10 倍。人家也是几经沧桑，起码经手了数百万根猪蹄，才撑到今天。钱挣不完，我熬不起，就泡菜下酒嘛。中国人十几亿，也不缺我一个混日子的。你说呢？”

老威：听我家好吃嘴妹妹讲，老兄的厨艺了得？

周半岛：已经好多年没下厨了。

老威：为啥子？

周半岛：不为啥子，就是骨头懒。

老威：看你的状态，挺滋润嘛。

周半岛：油爆了大半辈子，就在寡淡中度过余生算了。

老威：有点高深哦。

周半岛：舌头伸缩大半个世纪了，都木了，无鲜可尝了。

老威：高深到极致，厌世情绪又涌上心头。

周半岛：莫嬉皮笑脸嘛。

老威：活跃气氛嘛。就像《红楼梦》里描写的，大户人家开饭，都先上一碗开胃汤。传闻中的川式开胃汤，叫"青龙过江"，即一海碗热气腾腾的老醋汤面上，横两根肥葱，你一尝，就歪瓜裂枣，饥焰升腾……

周半岛：醋能开胃，亦能解毒，可我没听说过"青龙过江"。

老威：嘿嘿，这个掌故，据说出自四川第一美食家、96 岁的超级吃神车辐。他坐轮椅十几年了，大肚皮大脑壳，俨然弥勒佛再世。老人家为民国时期的名记者，曾经爱国家爱乡土，志气比天高，国中名流及川中名厨结识了多半，终成正果。而今，熬死所有同代英雄和狗熊、故交和仇敌，也差点熬死国共两党的车老化石，就剩一件事：吃。

周半岛：哦哟，我 6 年没见这祖宗！前几天，还买了他一本书。

老威：我模糊记得他的吃神座右铭：思想被改造，精神被整垮，只有吃吃吃，一身肥尕尕。

周半岛：我觉得这首诗，可与《红楼梦》的主题诗媲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世人笑我痴，谁解其中味？

老威：这个味，放在川菜里，就是酸甜苦辣麻咸。

周半岛：就是麻婆豆腐。

老威：你的拿手。

周半岛：这个豆腐相当奇妙，上等黄豆，用磨子推了滤了，还得以苦涩交织的疸水（石膏）来点。豆腐本身，口感寡淡之极，却能做出几十、几百种佳肴。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是老子，而老子在《道德经》中，推崇的最高境界是水，任何人，想叫水变啥形状，水就变啥形状，而水一旦铺天盖地，就能淹没任何人。就如豆腐，老一点是豆腐干，嫩一点是豆花，对于厨子，你想叫豆腐变啥，它就变啥，可说不定某次，你不把豆腐放心上，就砸在豆腐手里。

老威：太悬了。只要四川人，谁不会做几样豆腐菜？比如我，也会红烧豆腐、蘸水豆腐、青菜豆腐汤。麻婆豆腐嘛，虽然不咋个敢碰，但书中菜谱已烂熟于心：豆腐 400 克，牛肉 75 克，青蒜苗 15 克，郫县豆瓣 10 克，辣椒面 5 克，花椒面 2 克，酱油 10 克，精盐 4 克，味精 1 克，豆豉 5 克，淀粉 15 克，肉汤 120 毫升，熟菜油 100 克。

操作步骤如是：将豆腐切成两厘米见方的块，入沸水中，另加精盐约 2 克，浸泡 5 分钟后沥干水，牛肉剁成末，青蒜苗切成段，郫县豆瓣剁细、豆豉制成茸备用。沙锅置中火上，加熟菜油烧至六成热，入牛肉末炒至酥香，继之下细豆瓣，再放入豆豉茸炒匀，加红亮油色；掺肉汤烧沸，下豆腐烧约 5 分钟，校正盐味，放酱油、味精；湿淀粉分两次勾芡，下青蒜苗至断生，起锅装盘，撒上花椒粉即成。

周半岛：有点像抓中药哦。

老威：对对。

周半岛：口感也像中药吧？

老威：对对。我边翻书边搞，手忙脚乱，这也炒焦了，那也搅烂了。特别是这多少多少克，太可笑。最后起锅，就一盆怪味糊糊。

周半岛：据考证，这麻婆豆腐始于 1862 年，清朝同治皇帝时；原址成都北门外万福桥头，原名“陈兴盛饭铺”。比如今为民工服务的路边鸡毛店更差劲，它甚至连桌子板凳都没配齐，而锅灶就设在千疮百孔的茅草棚下。

老威：肯定没有政府颁发的《卫生许可证》。

周半岛：川菜中的主要名菜都出自社会底层，俗话说：吃得脏，不生疮；吃得臭，不长痘。所以这麻婆豆腐发明者——陈兴盛的老婆，蓬头垢面，虎背熊腰，更兼满脸麻坑，活脱脱就是《水浒传》中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而顾客呢，又是清一色的贩夫走卒。那时，上百家榨油坊集中在苏坡桥，众油贩推着鸡公车，嘎吱嘎吱运油篓子进城，必经万福桥，就歇脚打尖，顺便光顾丑得远近闻名的陈麻婆。酒饭之余，拿丑妇开开玩笑，也算苦中作乐。

老威：电还没发明前，苏坡桥榨油坊就是成都府万家灯火的源头。

周半岛：可“光明使者们”累折了腰。某个大热天，某个脚夫饿痨病犯了，就赤膊上阵，从油篓子舀一瓢新鲜菜籽油，估计有 1 斤半，进饭铺连声吆喝。麻婆笑脸迎客，脚夫却吩咐：老子人穷胃大，也给老子整一份味大的！麻婆问：味要整好大？脚夫答：凭感觉嘛，油大，麻辣，过瘾。太阳猛，老子偏要以毒攻毒，流汗流个爽快。麻婆叫声“要得”，立马奔隔壁，割来一砣牛杂碎，甩在砧板上，然后操起两把一尺二寸的片刀，乒乒乓乓一顿狂砍。哦哟，地动山摇，肉渣子横飞，顿时惹得 20 多个光膀子围观，并惊呼：快来看哦，麻婆子鬼上身了！

老威：这么夸张？

周半岛：厨子来感觉，就如诗人来灵感，锅碗瓢盆都在一种氛围当中。所以麻婆的确中邪了。但见她披头散发，口中念念有词，丢下片刀，又转身倒栽进半米深的锅底，稀里哗啦涮锅 3 遍。众人

哗然，脏乱差的麻婆居然讲究了！日头西方出嘛。

然后烧火倒油，然后展开巴掌，将油瓢的剩余一滴不漏刮净。那种逐渐加热后阳春菜籽油的阵阵飘香，估计在一里外也能将人醉倒。然后才是炒料，郫县豆瓣，汉源花椒，还嫌不够狠，又加大捧辣子。油与调料的混合香缭绕，下烂肉；火候到了，下豆腐，勾芡。起锅时，一把蒜苗。最后是哐当一下，麻婆以锅铲击灶台，吆喝“端起走”。于是 3 大海碗川菜绝唱就上了油腻腻的桌面。

那号称“人穷胃大”的脚夫，凑近一闻，毛毛汗就出来了；再捞筷子一尝，竟半晌合不拢嘴，众脚夫死盯住他：咋个？中毒了？还是下巴掉了？却见那厮嗨哟嗨哟，到底叫出声来：陈麻婆豆腐！鲜死人罗！

接着就如冲锋陷阵，他就着豆腐，连整 3 斗碗糙米干饭，才抬起脑壳。人湿透了，不不，人就像从河里捞起来。再接着，20 多个脚夫都尝了几筷子，纷纷吆喝“照着做”。陈麻婆甩一把汗：累死老娘不偿命么？

于是铜板哐当哐当朝桌上丢。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陈麻婆豆腐的威名刮风一般，直入成都府。最终街头巷尾，妇孺皆知。成都土著，个个都是好吃嘴，一时间，万福桥奔吃的，比在近旁乾隆御赐的万佛寺烧香的还多。

老威：与佛同光了？

周半岛：至少是薪火相传。我这种曾经的川菜厨子，都算广义的陈麻婆传人。

老威：听你一番绘声绘色，我吞了不少清口水。可是，当今陈麻婆豆腐在西玉龙街的总店，两三层楼，搞得富丽堂皇，我却没在里头吃出多少味道。

周半岛：陈麻婆豆腐风雨百年，终于从城外到城里，从底层到高层，成为精品川菜的金字招牌。不容易嘛。

老威：可它的灵魂还是在那个路边鸡毛店。你觉得呢？

周半岛：我老家就在万福桥一带，我是吃着麻婆豆腐长大的。文革爆发前，我们几个还去西玉龙街吃过一回，一溜平房，上铺板的那种，店内 10 来张桌子。隔壁是卖山东烤馍的。排山倒海的人，卷进卷出，我们在门口掏钱扯了票，里面却坐不下。于是随大流，凭票在柜台端豆腐，然后一双手接一双手，从人脑壳顶朝外传。当时物资紧俏，只卖麻婆豆腐和白油豆腐，而且用土巴碗装。我们将来之不易的豆腐，搁在车水马龙的街沿上，每人端碗饭，就那么围成一圈，短跑运动员一般奔吃，香得要命。

老威：慢点嘛。品味道嘛。

周半岛：人家只卖中午，并只卖两个钟头，慢了就没了。接着是文革，所有的老字号，都当作封资修砸碎。陈麻婆豆腐的招牌，还是我们这派的红卫兵摘下来、当柴火烧掉的。再接着上山下乡，我高中没毕业，就去几百里外的剑门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山沟底的知青，除了偷鸡摸狗，能做啥子？

老威：我的印象中，做过知青的，都会弄菜。

周半岛：对，我的所谓厨艺就这么练成的。当地的豆腐比较有名，豆子的收获季节，家家都是石磨推豆腐。直至今日，"剑门豆腐"也是连锁品牌。

老威：你就练上豆腐了？

周半岛：没肉哇。城里人凭票，才 1 人 1 月半斤肉，农民更是 10 天半月不见荤腥了。豆腐带碱性，越吃越痨，因此剑门关的人，都格外瘦，在坡地慢悠悠耕作，远看如飘起的竹竿。估计我们生产队几百人的平均体重，还不足 50 公斤。

老威：飘飘欲仙嘛。

周半岛：可我这个饿神仙，挖空心思搞吃。有一次，我意外在茅坑周围逮住一只大耗子，足足半斤。就不管它是不是粪鼠，立即

剥皮，剁碎，再顺手卷了条麻袋，直奔队里的榨油坊。其时正收油菜籽，坊内几个正围着榨机忙碌。我心不在焉，没话找话，磨蹭两个多小时，终于获准，用自己带来的干麻袋替换榨油坊的油麻袋。接下来回家关门，呲牙咧嘴地拧麻袋，双臂酸疼，可滴进锅的，加反复摩擦热锅逼出来的油，竟然达 3 两！

我照陈麻婆豆腐的搞法，隆重出炉了鼠肉麻婆豆腐，超级麻辣烫口味。我先狼吞虎咽，后细嚼慢咽，末了沦为一只猫，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我近乎虚脱地躺倒时，竟泪流满面了。

老威：这么感动？

周半岛：不晓得。当时就这么想：这顿吃了，死而无憾了。

老威：理解理解。陈麻婆在天之灵也意料不到，有人用鼠肉做麻婆豆腐。

周半岛：此窍一开，我就有点走火入魔。好长一段，我都攥紧锋利的镰刀，死盯牛屁股，两眼冒火。

老威：干啥子？

周半岛：想斩断活牛尾巴，熬汤或者红烧。

老威：疯了疯了。

周半岛：是有点疯。幸好生产队摔死了一头老黄牛，才惊醒梦中人。

老威：分牛肉了。

周半岛：一人才几两，够塞牙缝。可队长让我去供销社卖牛皮，我却在半路，寻个隐秘树丛，切割牛耳、牛头皮、牛蹄、牛尾巴。搞得牛皮差点卖不出去。回家关门，猛火狂煮一夜，连牛胶都炖出来了。

老威：这玩意儿能吃？

周半岛：满满一洗脸盆。细细刮毛，细细切片，折腾至太阳再

次偏西。加捣碎的香料（应该是五味老卤，手边没有，只好将就）、特制熟油辣子、花椒面、姜葱蒜、酱油醋、芹菜杆、大把芝麻花生沫沫，码 10 分钟，入味就开吃。太爽太飞太共产主义了。哎哟，我他妈的连嚼 10 来天“成都皇城坝夫妻肺片”，太奢侈太腐败太资本主义了。

老威：夫妻肺片是川菜中又一金字招牌哦。

周半岛：是回民菜。据考证，它的原创情景与我蹂躏牛皮的情景相似，也是在回民宰牛后，剥下的牛皮被蜂拥而上的乞丐二度肢解，变废为宝。弄夫妻肺片的关键是刀功，顶级厨子能够将牛头皮旋成巴掌大，张张薄如纸，筷子挑起看，可透出对面人影；放回盘子内，前后如飞檐一般翘起。所以夫妻肺片最早的浑名，叫“两头望”或“盆盆肉”。

老威：盆盆肉？

周半岛：大约晚清时候，成都府皇城坝的小贩从乞丐那儿得到灵感，用烘笼一般的土盆竹篮，装满浸透麻辣红油的牛头皮，沿街叫卖，却不料转眼风行，成为改朝换代、人心惶惶中大伙追捧的时尚小吃。

老威：一份多少钱？

周半岛：应该是一片多少钱，用竹签子穿着，或夹着买。

老威：不是肺片，为啥又叫“肺片”呢？

周半岛：估计是“废片”，废肺同音，小贩们喊着喊着，久而久之，“废片”就成“肺片”了。

老威：对对，本来是回民不要的东西。

周半岛：也许是某个读书人改的，一字之变，就掩耳盗铃，大嚼“废片”。

老威：夫妻肺片又是谁改的？

周半岛：从“两头望”演化而来。牛郎织女是远古夫妻，隔着条银河，两头遥望，却只有在阴历七月七才能通过鹊桥相会。“肺片”弹性强，除非人为，两头碰不到一块，这和牛郎织女的处境差不多。

老威：嘿嘿，四川人真能“望菜生义”。

周半岛：成都府皇城坝的原址，在如今的市中心天府广场。明清两朝是贡院，也就是录取举人的考场。因为外观类似北京天安门，有门楼和门洞，所以被老百姓叫做“皇城坝”。民国时期，这儿沦为贫民窟和著名的底层集贸市场，各色人等齐全，各种买卖都做。不过流传至今的，还是这儿的成都小吃，赖汤圆、龙抄手、糖油果子、三大炮、小笼牛肉、川北凉粉、担担面……应有尽有，根本数不过来。解放后，政府取缔了这个旧中国的缩影，若干传统名小吃，包括皇城坝肺片，在革命建设中，几乎绝迹。再度恢复时，夫妻肺片就混杂了其它牛内脏，由街头走进饭铺，成为川菜的又一领军人物。

老威：皇城坝在文革中炸毁，铲平原址，建立“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那尊老毛塑像还在，据说至今都算全国最高的毛像。

周半岛：我却在毛像建成后 5 年，招工回城，在厂子里当炊事员。80 年代，我手痒痒，就在大慈寺背后，撑开一家苍蝇馆子。我拿手的陈麻婆豆腐、夫妻肺片、蒜苗回锅肉，很快卖出了品牌。

老威：1980 年代我在《星星诗刊》工作过。印象中满城平房，背街背巷太多，树影太密，夏蝉太聒噪。五楼以上算老成都的高层建筑。所以那时的馆子，门脸窄窄，却烧卤蒸炖炒，荤素半荤素，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周半岛：对对。那是川菜的黄金岁月。普通人，花不了几个钱，可以吃得很满足。我也懒洋洋的，很满足。我的苍蝇馆子，虽然被

屋前的大树遮挡，里面比较阴暗，下雨天还常常进水，但打扫得非常干净。七八张旧桌子，桌底全是 3 尺高的大肚皮酒缸。馆子的器皿都是泥巴烧，面子涂一层土釉，郊区万年场的农民，家家都用这种。

老威：兄台好雅致哦。

周半岛：某一天，你们文联那边过来一个锅巴老汉，点了回锅肉、萝卜汤和干饭，吃到中途，却突然停下，反复端详盘子和碗。嘀咕说：老板，你也太不讲究了，这么好吃的回锅肉，却用这种不伦不类的盘子装，影响食欲嘛。我连忙陪笑请教。老汉又说：建议你看看李劼人的书《大波》和《死水微澜》，里面写饮食，甚为精妙，包括喝酒该用啥子，装菜该用啥子。你弄的地道川菜，不配套咋行呢？我恍然大悟，所谓"地道"就是个土嘛。于是专门跑了一趟万年场。

老威：极土极雅。高人高人。

周半岛：你晓得来客为谁？1930 年代就出名的作家艾芜！他的《南行记》，我起码读过十几遍，堪称茫茫人生旅途中的灯塔。

老威：他也是我的灯塔。可惜 90 年代去世了，活够 90 岁。

周半岛：冷不防就碰见做梦都碰不见的文化名流，人家影响了几辈百姓，却缩在旮旯，不显山露水，跟川菜的本色一样。那时，馆子里许多小碟小盏，装卤牛肉、卤花生、卤豆干、酥蚕蛹、酥黄豆、酥胡豆、各色泡菜，随便呷点小酒，摆点龙门阵，褒贬点时弊，真有点壮志未酬就算逑的末代感觉。

老威：接下来？

周半岛：接下来应和川戏围鼓，吼两句高腔。大慈寺茶馆里，有几拨退休铁杆票友，喝完茶，肠子洗白了，就到我的馆子吃喝。酒饭整兴奋了，就继续亮出锣鼓响板，叮哐叮哐叮哐，把场子扯到半夜。街坊邻里都嘻嘻哈哈围观、帮腔、评论。啥子"天上乌云撵

白云，地下婆娘撵男人”；啥子“只怪我婆娘性情犟，有事不和我商量，隔壁杀鸡又炖膀，我两口这边唱《卧龙岗》……”

老威：川菜川戏水乳交融，市民乌托邦嘛。

周半岛：可惜啊，1990 年代以后，城市拆迁改造，老街老巷，和好多历史老人一起，从地球上消失，如雁过不留痕。楼越来越高，川菜馆子越来越大，川菜越来越精，越来越玄。电视里的厨子吹起龙门阵，比科学家口气还狂。有一次，我请老友吃“精品川菜”，礼仪小姐引我们通过红地毯，在金壁辉煌的大堂落座。我想都不想，就点了陈麻婆豆腐、夫妻肺片和回锅肉。居然一样没有！我气炸了！

老威：这可是 3 张名头最响的川菜招牌啊。

周半岛：大堂经理说，他们不卖低档东西，川菜的品质早就提升了，下一步还要走出国门，在美国、日本和澳洲开分店。

老威：不得了嘛。

周半岛：我们跑了七八家馆子，都吃不着正宗的川菜招牌，累惨了。

老威：要吃回锅肉，还不如我给你炒，何必费这劲儿？从小到大，我妈至少为我炒过上千份回锅肉，再配萝卜汤，安逸得很。

周半岛：你指教我么？

老威：不敢不敢。

周半岛：况且如今的饲料猪这么难吃，能炒回锅肉么？

老威：是哦是哦。

周半岛：川菜和贪官一样，“与时俱进”堕落。啥子“公馆菜”、“私房菜”、“精品菜”、“宫廷菜”、“祖传秘方菜”，统统“公款菜”、“勾兑菜”、“腐败菜”。他妈的饮食文化就是腐败文化。

老威：川菜被连根拔起了。成都在唱《空城计》。成都没得川菜。

周半岛：是么？

老威：我顺竿子往下骂。

周半岛：嘿嘿，你脑壳缺水嗦？叫陈麻婆豆腐给烫瓜了？

广场行为艺术家余志坚

采访缘起

中共建政以来行为艺术的巅峰之作

1989年5月23日下午，我在千里之外的四川家中，通过电视直播，见识了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也就是请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毛像吃臭鸡蛋的湖南3壮士，官方亦称湖南3歹徒。

这一震惊中外的突发事件，距离同年2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才3个多月。后者是有史以来中国行为艺术最集中的展示，其中有枪击电话亭，人孵鸡蛋，裹白布吊丧，分发避孕套，等等。艺术家们不断与警察——现行制度的代表者——发生剧烈冲突，不断被殴打、带离现场、关押，个别的展区还被取缔。可行为艺术以及对抗性的副产品，也因此大面积传播，受到前卫青年们的狂热追捧。在当时的长篇随笔《诸神的堕落》里，我写道：行动艺术在今天，是一个搅拌器，掺和了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民族素质、集体和个人潜意识的压抑与释放等等，有时还涉及到警察和法律。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空前的行动艺术。江青是其中的重要角色，在她身上，处处显示出雄性化的革命激情。她搞8亿人民8个戏，让姑娘和老太太都变成浓眉大眼，切齿咬牙，怀着阶级仇民族恨；她用钢琴伴奏京戏，又把京戏改编成交响曲。与她关系暧昧的男人都不长胡子，例如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李玉和、洪常青，因此她特别憎恨络腮胡子周恩来。毛泽东一生中无法无天，就怕这个女扮男装的江青。毛、江、周的这种私下的男女三角关系，决定了国家、民族、政党。那时，8亿群众是3人行动艺术的道具。接着，我这样评论89学潮：那些游行、示威、罢课、请愿、静坐、对话、口号、绝食、晕倒、救护车、市民和警察，构成了一次极其

精彩的悲壮的行动艺术。

依此类推，湖南3壮士砸毛像案，应该是中共建政以来，行为艺术的巅峰之作。其多重内涵，以及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无论过去了多少年，都值得艺术史编纂者们挖掘，值得逃避政治或热衷政治的人们反思。

2005 年底，我接到一个海外朋友的电子邮件，询问是否有兴趣采访上述行为艺术的主谋余志坚？朋友叹息道：姓喻的疯掉，姓鲁的跑掉，就剩这个姓余的还呆在原地，如果你有兴趣，还得抓紧哦。

我连连称是。转弯抹角，电话联系。终于通过余的姐姐，找到余本人。他老弟在话筒另一端给我的印象，是爽朗而谨慎，幸好他读过我的书，沟通没任何问题。可接着的问题冒出来，余因为在网络上发表“反动文章”，又被监视居住！动不了，他说，我要去探望我的疯子同党喻东岳，他们也不让。

拖延至6月。由于臭味相投，我和扎根在广西漓江的韩晓光交往密切。老韩是独立制片人，其眼光，其技术，令我击节称赞。所以这次出访，我邀他加盟，记录全过程。

老韩慨然应诺，并积极筹备。临行前4天，他还特地设一生日家宴，请我和女友小金。席间，有他可爱的妻子和孩子作陪。那一刻，自由天堂的阳光贯穿着人间陋室，令浪荡子老威唏嘘。

非比寻常。我提前数天，就和余志坚敲定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在某地接头。万一临时有变，就临时通知。跟着，我换了新电话卡，密嘱老韩。再从广西漓江回成都，探望了一眼老母。6月9日傍晚，我在成都双流机场接老韩电话——也是新号码——这意味着彼此间神不知鬼不觉的联络方式诞生了。

19 点 20 分的班机，抵长沙机场已是满天繁星。月牙如一朵鬼火。我坐长途大巴去市区，一路拨老韩的新号码，却一直关机。开

始还以为他在空中，或误点了。可后来，我心跳如鼓，有些沉不住气了。

老友老张，开车接我吃夜宵，并入住他家。匆匆洗漱毕，进房间，像个不及格的特务，钻被窝，憋满头大汗，仍坚持不懈拨老韩电话。关机！永远关机！他妈的，难道落网了？

熬至夜半 3 点多，我开窗透气，探头探脑若干回，如一只关在囚笼内的秃头鹅。冲动，压抑；压抑，冲动。我都开门站到客厅了，又梦游一般退缩。这个自由世界的“海龟老韩”，勇敢有余，谋略不足，如果被逮，是在长沙机场，还是在我们事先约定的银河宾馆？我要不要去一趟？

思绪如雷电里的风筝，起落不定。我迷糊了大约两小时，天就亮了。起床出门，横下心，赴刑场一般赴约，在途中又拨老韩手机十几次。关机！关机！我懵了！难道前方是看不见的陷阱？出租车路过银河宾馆，我直楞楞瞪着，老韩有没有事，都与这个他曾经下榻的小宾馆有瓜葛，但鬼使神差，我没有叫停。

7 点 20 分，我在长沙火车站附近的国美电器超市下车。反身漫无目的暴走。约一站路，我经过民航大酒店，来到银河宾馆外面的马路，刹步两分钟。进去？不，我浑身一激灵，似乎已提前看见一廖姓傻瓜被四起的国保便衣按翻在地。

我甚至透过重重屋瓦，看见遭受一夜突击审讯的老韩，在铁窗背面，弓腰驼背——此时手机却突然响了，是余志坚。劈头就问：还是在某某地点么？我答是。随后又改口，不，在另一地点。

两个反革命分子在一站路之间，晃荡了 10 来分钟，到底接上头。老余高出我半个脑袋，发型光亮，像混迹旧上海的落魄公子。我们不及握手，就钻入同一辆出租车，沿笔挺的五一大道，向市中心疾驰，直逼湘江大桥，桔子洲头晃眼而过。

老余递烟，我婉拒；搭话，我心不在焉。老余说，没料到大名

鼎鼎的老威还害羞呢。我干笑两声。老韩始终如一块顽石，压在心头。

过桥停车。我们在桥左的枫林宾馆背后，寻了家臭烘烘的下等茶楼，大呼小叫半晌，披头散发的打工妹才露面。80 块 1 间屋，带 1 壶茶。她故意敲竹杠。我立马答应。她吩咐稍等，就拉开一黑窟窿的窗帘，叫醒另外 3 个打工妹，收拾临时床铺，排开椅子和茶几，沏水开张。

我们重新关死房门，不留任何出气孔。由于睡眠太少，两人都脸色铁青，老余开玩笑说，演歹徒的话，就差两把刀。我则忙着检查录音机，还抽空将巴掌大的摄像机架在茶几上，框住被访者的脸部——这本来是老韩的工作，唉。

老余一支接一支抽烟，小眼睛乜斜，笑纹很粗。我抓拍了那玩世不恭的模样。开始提问。老余嘿嘿。

出身：劳动人民的后代

老威：咱俩见个面可真不容易！像地下党接头似的，嘿嘿。

余志坚：监视居住好几个月了，警察轮班，24 小时盯着我。可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今早 5 点多，天还没亮，我就钻个空子，直奔火车站，再从浏阳直奔长沙。下了车，我还兜几圈，确认没长尾巴，才松了口气。

老威：看你这满不在乎的模样。艺术家嘛。

余志坚：谢谢抬举。可与警察捉迷藏是自由主义者的本能，与艺术无关。

老威：那咱们开始工作？

余志坚：别，别，别搞得跟审讯似的。先胡乱扯几句。我读过你的《证词》，还有《中国冤案录》。你写六四画家武文建那篇，曾

提到我在筒子楼墙上写的诗：仍然要砸，砸不碎的酱缸；仍然要爬，爬不上的山巅。老长的诗，我现在也衹记得这两句。还有王丹与六四暴徒们擦肩而过时的那段“要挺住”的对话，传神之极。可没想我面前的老廖，舌头短，嘿嘿，有点滑稽。

老威：我没武文建那家伙有才，还弄一笔好画。

余志坚：你在独立中文笔会里面干么子？

老威：干过理事。不称职，就算了。我适合单干。

余志坚：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老威：考过 4 次大学，统统落榜，搞得特级教师的我爸脸面无光，见了其他同事就绕道走。后来受湖北女作家方方推荐，免试上武汉大学，又被开除掉。

余志坚：自学成才？

老威：别总掏我的底啦。问答双方，不能本末倒置。按照老套路，姓名、年龄、家庭？从头说起。

余志坚：好好。我生于 1963 年农历 8 月 12，属兔。我爸小时候，就死了爹，我祖母没办法，改嫁求生，我爸大约就成了个累赘性质的“孤儿”，几岁就四处给地主打短工糊口。

老威：苦大仇深。共产党的依靠对象。

余志坚：胡扯。1948 年，我爸 26 岁左右，跟人赌钱，输光了，衹得自己卖自己的壮丁，还了几十块大洋的赌债。1949 年解放前夕，我爸所在的国军顺应革命潮流，和平起义，又统统变为共军。稍后抗美援朝，我爸又随部队到朝鲜，混够 4 年，班师回国。我爸觉得年纪不小了，该娶老婆了，就坚决复员，回浏阳老家。

老威：你爸的经历是一部小说嘛。他在部队干啥呢？

余志坚：我爸的湘菜烧得地道，先后为国军和共军弄吃。在战地朝鲜，还当过炊事班长。回国后，就专门给他们师长开小灶。

老威：这可是投机钻营、升官发财的机会。

余志坚：那时的人，没这么高的境界。所以我爸复员，师长还舍不得。总之么，我爸回乡娶了我妈，按阶级划分，两边都是劳动人民出身。接着呢，生下我姐、我、我弟，3 个劳动人民的后代。

老威：你父母识字么？

余志坚：我妈那边生育率高，存活率低。家里也穷，她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得。我爸在部队揭掉了文盲帽子，会读简单的课本。

老威：你儿时淘气不？

余志坚：我爸生我时，已 40 出头了。特别普通，我没么子过人之处。文革前期我太小，等到广播里宣布毛主席的亲密接班人，伟大的副统帅林彪叛国投敌，爆炸了，我已经在上小学 2 年级。莫名其妙地跟大人们一样，紧张，兴奋，逢小朋友便咬耳朵，嘁嘁喳喳半天，末了还不忘叮嘱：莫给其他人乱讲啊。莫泄露国家机密啊。

老威：小孩子也这么政治化？

余志坚：恐怖气氛么。我们学校外的厕所隔板，就有粉笔写的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我亲眼见，脱裤子一蹲坑，头也没转，就见了。吓得我浑身哆嗦，连屎都拉不出。我赶紧擦掉反标，万一有人跟踪追击，抓我的现行咋办？

老威：是大人写的？

余志坚：看那幼稚体，估计就是我的同龄小孩写的。1976 年毛泽东死，万里河山一片悲痛，中小学生也戴孝、献花圈、开追悼会。我们在毒花花的日头底傻站着，比赛号啕，比赛谁的哭声大，不料还真昏倒好几个。估计是脱水，要不就是爆晒时间太长，小孩扛不住。

老威：你哭声大不？

余志坚：当然不甘示弱罗。人小，不知道悲痛为何物，大家都

哭，我也得了嚎丧传染病。不过上一辈不同，真动感情啊。记得那天我放学，一进家门，就见我爸挥泪如雨，稀里哗啦的，还边哭边倾诉：毛主席啊，你老人家去了，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呢？

老威：你不能讽刺你爸。

余志坚：没讽刺。事实就这样。

老威：你上学时成绩咋样？

余志坚：还可以。不过我从来不做家庭作业，但每次考试都能应付。家里人知道我懒，都不相信我能考上大学。直到《录取通知书》下来，我爸说：不知道我们家的祖坟是不是冒烟了，居然出了个大学生。你还不想上么？于是我衹好去了湘潭师专，读化学专业。由于我是个文学青年，对化学没兴趣，就留级，将 3 年制的专科读成 4 年。在校的多半时间，我都呆在图书馆看书，深受海涅、拜伦那种古典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

老威：80 年代，人人都写诗。

余志坚：我也写。我还在自己床铺上头，贴了几张女性裸体素描。这可不得了，学校开大会批判我，上纲上线，什么黄色下流、道德败坏、精神污染，就差没骂强奸犯了。我被泼满身污水，连躲闪的机会也不给，最后，我遭严重警告。

老威：我读中学也遭严重警告过，晓得离开除衹有一步之遥。

余志坚：唉，也许“犯罪”的思想根源在那时就埋下了。

老威：警察也这么认为？

余志坚：没有。1984 年毕业，被分配到某某乡村中学教书，更加格格不入。我留长头发，穿时尚的白色休闲鞋，在城里都属另类，就别提乡下了。于是我受到排挤，转到乡村小学。哎呀，凑合着混日子，教书之外，读读书，钓钓鱼，慢慢也就适应了。

老威：后来呢？

余志坚：5 年转了 5 所村小。像《早春二月》那部电影，小知识分子最终逃离死水一潭的封建。1988 年我辞职回城，无所事事，整日就与中小学的同窗加邻居鲁德成，还有湘潭师专的校友喻东岳泡一块。

老威：他们都有工作吧。

追怀耀邦北京声援

余志坚：鲁德成开公交车，喻东岳在《浏阳日报》做记者。3 个家伙臭味相投，每日每夜侃文学。我喜欢西方的古典、浪漫，喻东岳比我超前，推崇现代派，艾略特、庞德，还有当时流行的朦胧诗。嘿，有差不多两个月时间，他们都懒得回去，在我家挤着睡。投缘，开心，如今想起，也十分美好！一直到 1989 年的 4 月 22 号，胡耀邦去世，我们的一腔文学热情转眼升华，熊熊燃烧，所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一堆朋友聚拢来商量：胡耀邦也是浏阳么，我们当然要给这个伟大的同乡搞追悼会。

于是我跑商店买了纸笔墨砚，本想让喻东岳写些标语。他有些犹豫，我就亲自操刀上阵，一口气写了很多，主要是"追怀耀邦，修改宪法，改革中国政体，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反官倒"之类。几乎将这辈子对政治的诉求全概括进去了。

次日半夜三更，我们像赶早起来打家劫舍的梁山好汉，用革命或者反革命标语覆盖了几条街。天亮时分，哦哟，浏阳市民密密匝匝站那儿看啦，还嘁嘁喳喳议论，有点像鲁迅写故乡的小说，满清要灭亡的小道消息在封闭地儿传得沸沸扬扬。而我们这些楞头青，躲一边观察，兴奋莫名，悲壮莫名。

接下来，我们像上足了发条的社会革命家，天天关注，天天讨论北京的情况。饭吃得少，可精神特别抖擞。我们还发动浏阳师范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可浏阳那地方太小，人也保守，我们几个孙

猴子拼命折腾，也没搞出多大响动。

老威：于是就决定上京了。

余志坚：后来天安门广场绝食了。还有几个学生在人大台阶下跪，递交请愿书。我们不太懂得政治博弈，需要做些举动，我们就是凭直觉，不舒服。既然不愿做封建皇帝的臣民，为什么要低头下跪？而专制政权根本不会理睬的。

大约 5 月 16 号，我、鲁德成、喻东岳，及其他两个朋友，就种种国事辩论了一个通宵。然后决定一块上京。可都是穷光蛋，又都是第一次去北方，干么子革命哦，把工资全掏出来数，觉得不够，出发前夜我跑去敲一个体户同学的门，他做电器生意，为了革命他就慷慨解囊，借给 1000 块。当时 1000 块，现在翻了 20 多倍吧？一张长沙至北京的火车票才几十块。

老威：真大方呀。

余志坚：中国人做了一场民主大梦么。从浏阳到长沙，司机一听我们去北京声援，马上就免掉我们的车票。一早拢长沙，先跑五一大道和省政府去了解情况，嗨哟！本省的学潮规模已如火如荼，横七竖八的街道，充满学生和市民的游行队伍，由不得我们热血不沸腾！我腿长，就再次跑商场采购笔墨和布匹，喻东岳当即奋笔，写成挥师北上的巨型横幅：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落款是湖南请愿团。我们占据长沙火车站广场，插好招贴般的横幅，立即轮番演讲。其内容基本就是运动中最为流行的反腐败，反官倒，改政体，修宪法，反一党专制等等。喻东岳负责拍照记录，因为他的相机好，日本牌子，《浏阳日报》社采访专用，稀罕货啊。我还陪他买了数不清的柯达胶卷。却不料他辛辛苦苦留下的摄影杰作最后上了法庭，统统变成自个儿反革命宣传煽动的铁证。

老威：我的情况差不多，自己为自己制造了不少“无可辩驳”的文学罪证。

余志坚：人潮涌来涌去，我这个衹在乡村课堂上面对过小学生的不称职的老师，头一回在大庭广众从事“反革命煽动”，蛮高亢蛮流畅，蛮有效果。搞得群情激昂，纷纷朝我们的临时募捐箱里扔钱。一毛两毛，一块两块，还有 10 块的。太感人了。当时还没有 100 元整票。我至今记得有一个人，双手捏着票子往箱子里塞，才煽动几小时，捐款箱就装不下了。

老威：唉，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去不再了。

余志坚：我们募捐到 3000 多块，有些湖南学生当即就加入我们的请愿团，要一同上京声援学潮。

老威：多少人？

余志坚：四五十，浩浩荡荡的队伍么。我们登上刚刚运行的特快 2 次，晚上 9 点过开车。

老威：光火车票就得花大把银子。

余志坚：没办法。我们买了一沓站台票，咋咋呼呼进站，嘿嘿，车上车下全挤满了爱国群众，我们衹得肉贴肉，挤在过道中，乘务员过来查票，一听几十号人都自称“上京声援的湖南请愿团”，就把列车长叫来了。人家挺客气地问：你们中谁负责呀？我回答我负责；他说好，我完全理解、完全支持你们！然后就专门将我们安排进乘务员的休息室，里面放了 2、30 张小凳子，让我们这帮爱国者轮流坐着休息。第二天抵达北京火车站，一下来我们就将半个车厢那么长的横幅扯起，吸人的眼球哦。4、50 人同心协力，边狂喊口号，边朝天安门方向挺进。才一会儿，我偷眼回看，哦哟，屁股后竟拖出几百人的队伍，多半都是各地上京声援学潮、一时却找不到组织的学生。于是我们更来劲了。“还我胡耀邦！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中国人要重新站起来”之类的口号，叫得比傩戏锣鼓更密更响，引得路人纷纷追逐围观。大概 4、50 分钟，望见了在书本上看见过的天安门，我们正要直接投身

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一个学生领袖模样的人，自称是高自联纠察队的，过来问我们从哪儿来？我们齐声回答“湖南请愿团”，专程来声援学潮。他连连说很好很好，可你们的口号有点欠妥，也就是过激，广场上还没人这么瞎喊。我们开头不服气，但转弯一想，要顾全大局。于是就自觉把那反动的超长横幅暂时收藏。

随后两天，跟我们出来的湖南大学生们，都三三两两找到各自的群体或组织，如鸟儿归巢。所谓的“湖南请愿团”就自动解体，衹剩了我、喻东岳、鲁德成，3 个无法归类的核心成员，暴露了孤零零的社会闲杂本质。

老威：这么容易被瓦解？

余志坚：5 月 18 号到北京，23 号出事儿，我们总共就凑了 5、6 天热闹么。参加了一些学生、市民的游行，也演讲。演讲主要内容是取消一党独裁啦、全盘西化之类，激动人心的草稿全塞在喻东岳装相机的帆布包里，后来也理所当然成了我们的反革命罪证。那几天没怎么睡觉，夜里实在扛不住，就在地下通道或某处街沿铺上塑料布，裹着军大衣打个盹儿。记得某天清晨，一睁开眼睛，竟发现一女学生躺我身上。哈哈！多浪漫的场景。

接下来的 3 件事我印象很深：一是人民大会堂挂起“非常人大常委会”的超大横幅，令人想入非非，觉得民主乌托邦就在眼前；2 是天安门广场上空，盘旋着不少军用直升机，有时飞得极低，似乎要磨擦城楼了。还不断散下大量致被蒙蔽群众的劝降传单。嘿嘿，这一招叫“四面楚歌”，楚霸王项羽被刘邦大军围困在垓下，张良用箫吹出那个时代的“劝降歌”，最后搞得大家都没意思。当时，几十万戒严部队从几个方向抵达北京郊区，将首都围得铁桶一般，却被自发聚集的北京市民堵在外头。各种是似而非的小道消息在广场流传，人心浮动哦。我在湖南老家时，傻激进，还写过弹劾赵紫阳的文章，认为他跟邓小平、李鹏一丘之貉，将人民群众当作宫廷斗争的工具。替罪羊。可我这种“无端指责”遭到许多学生的反驳：

赵紫阳大好人，是整个学潮的支柱，你怎么连他的坏话也说？

最后一件事我们印象最深：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学生领袖讲话，前后口径都不一致。什么“尽量维持好广场秩序”，废话；什么“市民、工人赶快返回，正常上班”，废话。还学娱乐明星样呢，一再称“感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支持”等等。似乎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才享有正宗的爱国权利，其他社会力量，就属于瞎掺和瞎捣乱。他妈的，没有大家的声援，单凭学生，能扛这么久？共产党早收拾你们了。当时啊，我对他们几个的讲话反感之极，戒严部队抵拢郊区了，内讧、对话、慌张、僵持、强作镇定有屁用？全副武装的军人难道是吃素的？万一真开枪怎么办？，声势如此浩大的民主运动，几千万人卷入，凭你们几个小子，能顺当收场？流血迫在眉睫，还在空谈误国，幼稚啊。

老威：你们的直觉挺敏锐的。

余志坚：可是，我们这样的外省草根，插不上话。我们一再试图越过警戒线，与学运高层谈谈，但学生纠察队一见我这副张牙舞爪的样子，就死活不允许进入他们的广场指挥部，更别提面见高自联头头了。事态不妙，怎么办呢？于是我们递交了一份书面《建议书》，好说歹说，让学生纠察队转交，至少是“仅供参考”吧。

老威：还记得《建议书》的内容么？

余志坚：一，高自联应该以全国人民的名义，宣布中共政府为非法伪政府；二，号召北京乃至全国，工人全部罢工，市民全部罢市；三，学生纠察队，工人纠察队，这个，哎呀，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

老威：够直接的。学生方面有回应么？

余志坚：渺无音讯。当时太乱了。也许压根就没转交。

老威：够郁闷。也许你们过于标新立异了。

余志坚：所以蛮无奈的。

取缔毛泽东标准像请暴君吃臭鸡蛋

老威：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可以拍屁股走人嘛。

余志坚：不行，千里迢迢来北京，岂能不负责任？喻东岳悲愤难抑，提议集体自焚。我们设计了多种自焚方案，比如在金水桥上，淋上汽油，突然点燃，效果肯定不错。但自焚要达到么子目的？是不是在自焚前发表《自焚宣言》，或者自焚后由谁谁谁通告全国：我们以身殉民主，殉自由，抗议暴政，唤醒大众？可形势逼人，搞不妥，大家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自焚，说不定，当局还会利用我们的死，抹黑民运。

唉，没有意义。我就提出替补方案，取缔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标准像，象征性为共产暴政划个句号。喻东岳和鲁德成立马赞成。5 月 22 号午夜至天亮，3 个人都在讨论方案。爬上城楼取毛像，看过去的距离好像短些，但在当时戒备森严的状况，爬城楼比登天还难。次日上午，双眼熬得红红的我们，如高烧病人，绞尽脑汁弄来把梯子。跑到毛像底下的门洞，一仰脑袋，顿时傻眼——狗日的暴君，生前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死掉多年，我们搭几人高的梯子还够不着！

我们轮流在下，细细考察。目光擦着门墙，死瞅半天，终于看清楚，挂毛像的钉子足有手臂粗。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搭了足够高的梯子，舍一身剐，也不一定能将皇上拉下马。

老威：没人注意你们？

余志坚：谁也不会注意谁。在暴风骤雨的运动中心，很多时候，人是很涣散、很边缘、很孤独的。当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又另当别论。

老威：于是你们就想起请暴君吃臭鸡蛋？当时我还在山城涪陵的家中，从电视直播，目睹了你们的史无前例的壮举。惊呆了。记得现场播音员是中央台的陈铎，头发花白，嗓音气得发抖。

余志坚：实在拿老毛没办法，才出此下策。我们逛王府井百货大楼，购买了 20 个鸡蛋。本想目测好距离，用鸡蛋直接砸毛像，可稍一推敲，就觉得鸡蛋颜色太淡，涂上去效果不明显。多亏喻东岳喜欢画几笔，他说买几种绘画油彩，搅成深灰色，填入鸡蛋壳内就行了。

准备工作蛮长，煞有介事。买来宣纸、墨水、油画颜料、毛笔、稀释剂和胶水，接着跑邮局给家人寄遗书。我自己写的什么，居然忘了，好像引用了不少拜伦的诗句；鲁德成边写边沉思，挺费劲的，百感交集啊，他是独子，听说后来，他父母看了电视直播，当场就晕倒；喻东岳写的内容，我还依稀记得一点，他在浏阳城有 5 个结拜兄弟，他就一直趴那儿写啊写，完了一封又一封。什么要学唐吉珂德大战风车呀，什么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呀，等等。很是文采飞扬。

老威：据说喻东岳很有诗才。

余志坚：有一首他口占的打油诗，我还记得：有一千种理由，你走在街道的这一边；有一千零一种理由，你越过马路，走到街道的另一边！

老威：越界的冲动。果然你们走出另一头了。

余志坚：写完遗书，我们肚子饿了，就把 20 个鸡蛋拿到北面金水桥旁的小吃摊加工，也就是一平底锅，涂上稀面浆，打鸡蛋，撒葱花。那天我们塞了太多这种北方特色的煎饼果子，先还黄灿灿、香喷喷，很对胃口，因为我们在湖南没吃过，可后来填不下了，差点吐。

接着我们把剩下的蛋壳收好，来到天安门城楼左侧的中山公园门槛，地上铺张塑料布，席地而坐，造砸毛蛋。即把两瓣蛋壳填满调成深灰的油彩，然后一个个封闭。

再接着，就将长 1 米 2、宽 80 公分的宣纸平摊在地，琢磨配

套的对联，这可是 1949 年以来的天字第一号对联。我出句，喻东岳心潮澎湃，一挥而就：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横批：自由伟大。

箭在弦上，喻东岳还掏出相机，将对联拍下来“永远保存”，我和鲁德成也趁机在公园门口“合影留念”。唉，如今这些东西全部封存在公安机关的罪犯档案里了！

老威：你们没将“革命遗物”留给一个可靠的人？

余志坚：茫茫人海，想不起谁可靠。之后，3 人作了简单分工：我手长个高，就负责阻挡门楼下川流不息的群众，宣布砸毛行动开始；而喻东岳和鲁德成负责贴对联和扔鸡蛋。于是各就各位。我首先出场，跑到城楼正中门洞，张开双臂拦截过往行人：对不起对不起！请大家暂时留步！我喊了几遍，更多群众反而被吸引过来，都不明白么子意思。幸亏几个学生冲过来帮忙，才堵住了人潮。

老威：学生为啥帮你？

余志坚：当时我和鲁德成才 25、6，喻东岳才 22 岁（他 18 岁就大学毕业），所以看青春外表，大学生将我们当作自己同类了。却不料这边刚消停，那边就在门洞左右，呼啦啦把对联给张贴了。由于慌张，对联有点斜。紧接着就是奔跑着后退，估摸最佳仰角距离，投掷鸡蛋。原先我们认为，20 个颜色蛋，污染透那么大副的毛像，足够了。没想到两个傻子，很没出息，砸出去的蛋，要么高要么矮，要么偏要么斜，要么劲儿太小，蛋飞到半路就落地。我眼巴巴望着，气得想骂人：他妈的搞么子？还好没太丢人，20 蛋砸中了 3，暴君下巴一带起了不少麻子。

老威：你们耗了多长时间？

余志坚：全部行为 5、6 分钟，砸鸡蛋就 2、3 分钟。恍若梦里，在场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麻木，惊愕，也有盲目鼓掌欢呼的，等到梦醒了，事件已发生了。人墙哗啦一下将“罪犯”围在当中，有

声音责问：你们在干什么？你们从哪儿来的？谁指使你们这么干？高自联纠察队也赶过来，排开众人。我当时恰恰在外围，祇能望见他俩的脑袋。我隐隐约约听见众人在七嘴八舌声讨：你们是存心不良，要毁掉大家，毁掉这场爱国运动啊。而被蛋搞得五颜六色的鲁德成却极力争辩：取缔毛泽东是正义的，合法的，我们没干坏事！我也远距离声援：说得对！

我身边的学生蛮厉害，指着我鼻子说：没你的事儿就不要插嘴！我说：当然有我的事儿，我们是一起的！嘿嘿，这一来，我也落网，都被大学生们扭送到广场指挥部。

老威：从天安门到广场指挥部？

余志坚：对，就是英雄纪念碑下面。

老威：你们挨打了吗？

余志坚：拉拉扯扯的，推推攘攘，正反两方都瞎起哄。学生纠察队还是在保护我们。

老威：然后呢？

余志坚：总算顺利到达纪念碑底座，也就是之前绞尽脑汁想进来，却怎么也进不来的核心地儿。虽然这样闯入有些不太体面。

3 个人垂头丧气坐在纪念碑下，等候发落。学生领袖们在旁边展开讨论，耗了好长时间。终于，便衣警察出现了，在四周转来转去，然后进指挥部要人。学生们婉言回绝。这时旁边有个女士偷偷凑过来，在我耳边提醒说：事情的发展对你们极不利，你还是瞅个空子，赶紧溜掉吧。我立即摇头：3 个人死活一起，我不能自个儿溜。于是她沉吟片刻才说：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如果有什么变化，如果你有事儿需要帮忙，就打这个电话找我。我答应了。那时候年青，她念一遍我就记住了。

老威：你没问她是什么人？

余志坚：没问。估计她也不会说。但看那神情，她是要真心帮

我。所以在这儿，我要特别提一下。

老威：后来？

余志坚：后来变化大了。那个人与号码全淡忘了。估计现在就是面对面，彼此也认不出来。

老威：再后来？

余志坚：学生领袖们经过研究，才将我们带到右侧的历史博物馆前面，也算个非正式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不少记者及群众等在那儿呢。没想到时间短促，3、5 分钟就拉倒。他们的问话主要冲鲁德成去。其间还有个高自联头头，代表全体大学生“澄清事实”，声明这次事件与他们没任何瓜葛，他们的目的是推进民主改革，压根不会有这类敌意，也不可能干出攻击共产党，损毁毛主席形象的举动。等等，等等。我脑袋都快炸了。

之后又在一辆公交车内，又是鲁德成，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天开始下雨了，从车窗看外面，帐篷和油布乱七八糟，像打满补丁的灾区。嗨，没料到一向慢吞吞的官方媒体这次动作蛮快，采访时间也蛮长，提问包括哪里人？什么职业？筹划了多久？最初的动机？想没想过后果？等等。鲁德成也不紧不慢作答，还申明我们的行为与学生无关。据说当日的《新闻联播》就作为反面教材放了，长达5、6 分钟。电视画面里，还有天安门现场找来的目击证人，几个大学生、市民，让他们叙述事件，并表达各自的看法。有个学生还说：他们有勇气这么做，我蛮欣赏的。嘿嘿。

老威：我最初也是在《新闻联播》里认识你们的。节目的基调大约是“愤怒谴责”。不过在谴责的下面，隐含着记者善意的焦虑，担心这一事件给运动带来大家都难以承受的负面后果。

余志坚：负面后果早就注定了，衹要毛的阴魂不散，衹要邓的铁腕不除，衹要是共产党的统治，反抗的结局就是流血。我们衹是其中一段插曲而已。

老威：也有人说，早知道流血，就不反抗了。

余志坚：我们是被指挥部交出去，学生纠察队的头头叫郭海峰，他亲口告之他的姓名，还算坦率。他说指挥部内的高自联常委们表决，多数主张将我们送东城区公安分局所属的天安门保卫处，可他坚决反对。据理力争好半天，无效，押解工作反而由他负责执行，因为他是高自联秘书长。我连说没什么，还从兜里掏出剩下的两千多块钱，交他保管。他当场写了张收条。他还要求警察写了张接人的收条。我们是在瓢泼大雨中上的警车。警察给我们戴了手铐，郭海峰却在雨中站了好久。

老威：你们有乘乱逃脱的机会吗？

余志坚：从下午两点半作案到傍晚落入警察手中，我肯定有机会溜。那两人就不知道了。不过我们为什么要溜？我们早就有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

老威：接着？

余志坚：我们在南池子派出所关押一晚，次日上午转移至北京市东城看守所对面的收容所。刚进去那阵，整个收容所空荡荡的，监房内除我，就一个北京市里的惯偷。那家伙可悠闲啦，能不起来就尽量躺着，抽烟、睡觉；睡觉、抽烟。连喝水也让我帮忙递。没办法，寂寞难耐，两个南辕北辙的人，也被迫凑一块瞎聊。当时我很想继续关注运动的进展，可与世隔绝呀。可以说，北京的公检法体系，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连所里的看守也极少打照面，估计全在观望，等待党中央内部，权力倾轧的天平秤倒向哪边。

老威：你们是天字第一号的钦犯，居然没连夜提审？

余志坚：六四前后，半个多月，没人来提审，甚至没人来过问。每天除了吃喝拉撒，就是躺着。哎呀，骨头都睡疼了。幸好我生性懒散，早就练就死睡基本功，遇事儿不多琢磨，如果天肯定要塌，你一厢情愿想不塌，就算白操心么。

老威：有点庄子的境界了。

六四枪响被判无期徒刑

余志坚：直到 6 月 3 号半夜，收容所墙外突然枪声大作，炒豆子一般，将我从梦中惊醒。他妈的！终于开枪啦！我的预感、喻东岳的预感应验了。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就这么起家的，学生和文人怎能玩得过杀人不眨眼的老政客呢？那一夜我失眠了，在监房内走来走去，直到天麻麻亮。焦虑啊，浑身肌肉都不由自主抽搐。那惯偷还好心劝我，国家乱掉，你急也解决不了问题。又不是尿急，撒掉就完事儿。

6 月 4 号大早，第一批进来了，清一色的热血青年和大学生，平均年龄估计就 20 岁左右。捱到 5 号，进来的人越来越多，空荡荡的监房眨眼就人满为患，最后，塞不下了，还硬朝里面塞，好在人是肉长的，有伸缩性。

老威：一间房关多少？

余志坚：按常规，14、15 个，猛然就塞 30 多个。没地儿站了。我正式逮捕我们是 6 月 15 号，一度瘫痪掉的公检法体系跟我一样，从梦中醒来，刹那间恢复了高速运转的残酷本性。四处通缉布告，四处关卡和抓人。那种红色恐怖，就像 2003 年中国遭遇非典，大街小巷几乎不见什么行人。思想消毒和身体消毒，性质差不多么。

非常时期，北京警察也不被信任，东城分局的看守所和收容所统统军管。经过封闭洗脑的大兵，像野兽一般，张牙舞爪，没任何章法。不管学生还是市民，都往死里揍。我们逮捕移交看守所时，有个大兵拎着我，活像拎小鸡，隔着一丈远就朝军用吉普那边扔。这还不解恨，他又抬起自动步枪，使枪托猛击我的脸颊。顿时，我满口鲜血直喷出去。老威你看，嘴里的这颗假牙，就是被揍飞的真牙换的。

老威：你呆的看守所，就是人们常说的“王八楼”吧？

余志坚：对，里面关过不少六四暴徒。

老威：你也算暴徒？

余志坚：没来得及放火、堵军车，就祇能划为强暴了老毛的歹徒。我们在七处王八楼熬了 5 个多月，7 月 10 号秘密开庭，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地下室。

老威：开庭也不见天日。

余志坚：他妈的，例行公事，罪行明摆着，没怎么辩护，即使辩护也没听众。大概两小时不到，就完事儿了。延期宣判，等了一星期，接《判决书》。

老威：如此草率？

余志坚：我和鲁德成法庭呈供了什么，已经忘了。最有趣是喻东岳，他辩护说，我们没任何政治目的，祇是在完成一幅作品。

老威：行为艺术么？

余志坚：对对。喻东岳就说是行为艺术。并且是本世纪以来最杰出的行为艺术。它所涵盖的意义，要若干年之后，人们才能真正理解。

老威：我觉得，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政治波普，它肯定会进入当代艺术史。

余志坚：哈哈哈！那些公诉人和法官怎么能搞懂这个？听得云里雾里，终于恼羞成怒。还认为喻东岳故意愚弄他们。连指定律师都不装样子了，一再打断。

老威：太有意思啦。法庭内的气氛也应该是行为艺术的延伸部分。

余志坚：老威：此前你们预料过结果么？

余志坚：在牢里无聊，人们经常给我们分析案情，掐算生死。

什么“明知故犯，顶风作案”啊，“罪行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啊，“手段极其什么，后果极其什么”啊。熟悉《刑法》的人都知道，祇要《起诉书》上写明“两特两级”，脑袋就悬在空中了。唉，等死的滋味不好受！我连《遗书》都写了好几封，有给姐姐、弟弟的，也有给父母的。如今回想，真有点婆婆妈妈。伤害啦，歉意啦，愿他们彻底忘掉自己这不孝子啦，相信后代会理解我们、没丢脸啦。

老威：有些自相矛盾。

余志坚：今天一念头，明天一想法。毕竟面临生死大关，空空荡荡，睁眼闭眼都很可怕。泪也流过了。但是我不后悔。

老威：《判决书》下来，还是松一口气？

余志坚：简直就虚脱了。哪本小说里写的？我已经提前听见独裁的丧钟！自由在跟前飘荡，伸手就抓得着。

老威：也许喻东岳说的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行为艺术算完成了。

余志坚：我判无期徒刑，坐牢 11 年零 6 个月；鲁德成判 16 年，他实际蹲了 8 年零 8 个月；喻东岳判 20 年，蹲了 16 年零 9 个月，反而是最后释放。

老威：你们没上诉？

余志坚：我们可不愿找死。1989 年底，我们被送回湖南。关在衡阳监狱。

老威：你们在里面挨打没？关小号没？

余志坚：喻东岳受了很多折磨。有次被管教打坏了，我们几个难友还搞了抗议活动，绝食 3 天。但狱方拒绝道歉。小号我没关过，但 92 年之前，有多半时间我关在严管队。很恐怖。

老威：你在里面犯事儿？

余志坚：刚进去，还摸不着底。逢人便说六四死了多少人，共产党如何专制、恶毒。几乎一刻不停地讲。还不干活，热衷跟政治

犯们探讨时局变化。所以受到管教的屡次警告。我置若罔闻，就被宣布“实行严管”。我挨了 5、6 次打。有一次，两个警察揪住我，两根电棍同时在身上擂，我反抗了一小下，就瘫了。接着，拳头和大头皮靴，电闪雷鸣一般，整得我遍地翻滚。我一身好衣服，挨打之后，全没啦。我一丝不挂躺在地下。骨头没断，还算手下留情，湖南监狱普遍野蛮么。

后来学了点乖，不他妈的硬抗。但我坚持一点，我是政治犯，不需要劳动改造。后来他们也安排有经验的犯人来带我，所谓建立师徒关系。我最多站在一边看，然后独自缩角落里，拉别的犯人聊天。

老威：你们一直呆衡阳监狱吗？

余志坚：后来转到湖南第三监狱，也就是永州监狱。喻东岳转去一监，那儿集中关押政治犯，是湖南最著名的野蛮监狱。

1992 年前后，我从报纸上读到老邓的“南巡讲话”，仔细一分析，觉得中国的政局大概是进入了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灰暗而漫长。我自己的心情也随之灰暗而漫长。

既如此，先要活下来啊。于是我就跟狱方提出，我受不了汽车配件车间里切割金属的噪音，让人烦躁不安。我的特长是教书么。还好，他们把我从车间转到教育科，定期给狱中犯人上文化课，直至减刑出狱。

老威：也算不幸中之万幸。

喻东岳变疯——一个永远的谜

余志坚：我们 3 个，鲁德成最幸运，从云南边境偷渡到泰国，虽然险些被遣送回来。而喻东岳太惨了，他出狱那天，我叫了几个民运道上的好友去接，没想到，像一段烂糟糟的木头，跟我熟悉的那个灵光四溢的喻东岳判若两人。我一再叫“东子东子，你搞么子，

连我都不认”，他却没反应。等到他有反应，又吓你一跳——扑通跪倒，抱住你双腿，大叫“饶命啊饶命啊”。我心如刀绞啊，六四事件太大了，全面评价是历史和政治学家的活儿，而我内心解不开的疙瘩，祇剩喻东岳，我老觉得是我毁了他。唉。

老威：我在网上看过一些报道，海内外都在为他募捐医疗费用。他如今到底如何？连你也不认得！不可思议！

余志坚：他连自己都不晓得。如果你问“谁是喻东岳”，他两眼茫然，想不起来。

老威：失忆症？

余志坚：不知道在监狱里受了多大折磨、多大刺激！保不准被下了药。因为如今中国，老毛还被许多人崇拜，不少出租车上都挂毛像，当作保护神么。

老威：喻东岳变疯，会是个永远的谜吗？

余志坚：难说。可永州监狱关那么多犯人，凶手应该不难追查。前一段，我在网上发表了十几篇反动文章，当地国保就以煽动颠覆的罪名，刑事拘留我 32 天。我出来，稍微休息调整两三天，就坐车去离浏阳县城 70 多公里的喻东岳家探望。嘿，出狱久了，他的情绪稳定些，不见人就跪了；可眼神还是痴呆，你不能大声说话，否则他浑身一激灵，又跪倒。他家人随时在帮助他恢复记忆，从前的谁谁谁，左邻右舍的谁谁谁。猛一刹那，他似乎醒悟自己是喻东岳了，可转眼又忘掉。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面的人物，都活在自我的莫须有的空间。喻东岳曾经很推崇这小说，没料到他自己也进去了。

有时候，民运人士聚会，我也带他去。老廖你看，这张照片，中间这个，就是他，连拍照时，他都嘀嘀咕咕，而面前一派空洞，谁都不在他眼中。

老威：这照片挺喜庆。这些人是谁呀？

余志坚：我的结婚现场，好些民运人士都来祝贺。

老威：我也祝贺你！那你们婚后靠什么为生呢？

余志坚：不知道。总之么，要房没房，要车没车，养老保险一类的，全没有。靠运气熬呗。目前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做家教。学生时多时少，极不固定。我们每月的平均收入，1000 元不到。

老威：想过出国吗？

余志坚：出去干什么？

老威：自由啊。这么个强盗国家。

余志坚：可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真要离开，还是割舍不下。

老威：你的心态保持得不错。

余志坚：谁能拿去我内心的自由呢？至于家庭内部，有些小磨擦难免么。但爱情亲情友情这些，永恒的主题。对社会，也在慢慢学着适应。我们都是逆来顺受的小人物。但同一般的小人物相比，我们有抹不去的六四和艺术的双重情结。这情结，让我面对政治恐惧，还有挑战的冲动。

老威：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余志坚：是未来。我看不出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未来。我们付出的代价，我们的一腔热血，是不是会变得很轻，很可笑。我们努力让后人记住，是不是有些一厢情愿。最终我们的存在，是不是会让体面的人，成功的人，什么时代都通吃的人，觉得不自在。唉，算了，先凑合着过。事情想多了头疼。

老威：你们打算要孩子吗？

余志坚：难养啊。暂时不考虑。

【补记】

正午时分，采访结束，我们也汗水淋漓。长沙真不愧火炉啊，

我叹道，随即开门敞气。我就近招待余志坚吃了顿街头快餐，然后拥抱，然后目送他深入毒日头，消逝在穿梭不息的车流和人流中。

我来到公用电话亭，拨老韩的老电话，居然通了！气急败坏的老韩在那端破口大骂，并连呼“绝交”。我张口结舌。幸好老韩没有马上挂电话。原来他受骗了，所谓新电话卡，一出广西就没任何信号，也不显示任何号码。

我连连致歉，并强烈要求马上见面。但老韩这头在美国训练了 20 多年的倔驴，严辞拒绝。我不可原谅的罪行有二：没有按约定到银河宾馆；新电话不通，没有试探着打老电话。

我认罪。检讨自己本质上胆小如鼠，不配搞民运；并且一根筋，不知变通。回漓江后，我又再三向老韩示爱，终于得到这条与我同岁的老狗的接见。为了弥补他的损失，我将此次谈话的录像带悉数献上。老韩嗤之以鼻。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献礼质量低劣，基本不能用。

老韩宣布，要恢复到从前那么铁的关系，起码要 1 年。如今已 3 年了，他也远在美国了，我还像惦记某个亲戚一样，惦记着他。

而毁掉我俩关系的余志坚，我也惦记着他。

六四死刑犯张茂盛

采访缘起

这个谈话来之不易。

此前，我的铁杆领路人武文建跑折了腿。横飞了多少回唾沫，动员在北京，乃至在全国各地的六四暴徒从阴暗角落里钻出來讲话：学习天安门母亲，学习丁子霖，抱团才有好处啊，哥们儿！见收效甚微，他又拿出当年反革命煽动的劲儿，公然威协大家：不然累死病死郁闷死，还不如一个屁。屁还有味儿呢，臭臭这个不长记性的世道。

武氏还使了什么拿不上桌面的招数，我不晓得，可这些年刑满释放的暴徒估计有好几千，我却只掌握了不足 10 个相关录音，可见该同志的工作多么缓慢而艰辛。

还好，距离上次暴徒采访整一年时，我终于接到武氏电子邮件，称“有情况”。于是我立马暂停霉味穿鼻的老地主的采写，自云南的崇山峻岭，辗转出头，星夜北上，于 2006 年 12 月 21 日晚抵京，歇脚海淀区塔院附近。

旋即约会武氏。旋即敲定如此这般地“领人过来”。中间费了些周折。

2006 年 12 月 27 日下午，我裹着我们这一行的老师傅刘宾雁临终前托人从美国带回的大衣，匆匆出门搭车，然后换乘地铁，直奔大前门西站口。路途耗了一个半小时。爬出站阶梯时，我看了一眼手机，正好是约定的 5 点半，就伸长脖子，东张西望。不料天色阴郁得贼快，起先抹上的一层淡墨，眨眼就浓了。路灯也过早亮了。我不禁大呼武氏，而比我性子更急的他，正弓着背给我打手机呢。

两糙爷们碰头，都不约而同地乜斜：嗨，这人。武氏接着引见

本文的主角张茂盛，比较年轻，比较单薄；还有下文的主角董盛坤，岁数大些，也壮实些。我们热情握手，然后在武氏的率领下，顶着牛耳尖刀一般的阵阵冷风，横过两个街口，走入左侧的观音堂街。

迎头撞上名叫“白洋淀”的东北餐馆，红彤彤的店面，加之红彤彤的招贴，“本店隆重推出什么什么”，一下子就把我们吸了进去。搓手，落座，点菜，点 56 度的红星二锅头。由于吃喝，由于在座的都坐过牢，更由于武氏此前数次登门沟通，打下伏笔，所以彼此的感情升温得快。

张茂盛和董盛坤，是中国政府释放最早的两名六四死缓犯人。这是我在访谈之际，才偶然晓得的。据他俩说，在 2006 年 6 月出狱时，曾有外电报道过，也曾有逃亡至加拿大的鲁德成（就是在 89 学潮期间，向天安门城楼的毛像扔臭鸡蛋的那个）打电话联系过，却遭到他俩亲属的阻拦，“隔千山万水，能解决什么困难？反而添麻烦”。

我把录音机摆上桌子，他俩对视了两秒钟。董盛坤努努嘴：张茂盛，你先讲。后者憨笑着，抓耳抠腮，像个大孩子：哎呀，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接受采访。

老威：兄弟，恕我直言。看你年纪挺轻的，六四烧军车那事儿真是你干的？

张茂盛：对，当年给我判的死刑，缓期 2 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老威：这段话，自 1949 年以来就没变过。我小时候，喜欢挤在人堆里看墙上的布告，某某死刑，立即执行的，名字打红叉；某某死刑，缓期 2 年执行的，名字下面划红杠。

张茂盛：所以，今天能坐到这儿跟你们聊天，算不错啦！我这人内向，不善言辞，有什么说得不妥当，廖老师您尽管提醒。

老威：随便聊，没那么多规矩。你是哪一年人？六四之前干什么？

张茂盛：我生于 1968 年 6 月 23 日，属猴。六四之前是普通工人，在丰台永定路的一家机械公司上班。89 年 6 月我还不到 21 岁。

老威：和许多北京市民一样，你是爱国爱过了头，卷入六四的？

张茂盛：之前没卷入。我家原先住茶店，离天安门不远，每天下班后，我习惯在自家附近遛弯儿。4 月份开始，学生游行就非常普遍，后来声势越闹越大，学生不上课，工人也不上班了。那会儿没事儿干，就每天上街凑热闹。当时年纪轻，文化浅，不懂什么叫政治。还觉得党和政府不容易，一大帮子人整天整天游行示威，驻扎在天安门，搞什么演讲啦，合唱啦，传单啦，绝食啦，等等，把祖国的心脏搞得乱七八糟，真是的。唉，引发我烧军车的直接原因，是 6 月 3 号晚上发生的一件事儿，对我的刺激实在太大了。

老威：什么事儿？

张茂盛：那天晚饭后，我照例出家门，四处溜跶。刚走到阜城路，就看见一大堆人围在马路边儿议论。我好奇地挤进人堆一看，一个悲痛欲绝的妇女拉着一小货车，靠在那儿哭，小货车里躺着一血肉模糊的小孩。周围群众七嘴八舌，比比划划地诉说，表情很愤怒。听他们讲，这小孩才 8 岁，部队过来时，他正在街边草坪上玩。你说一个 8 岁小孩懂什么呀？当兵的一梭子弹过去，愣是把他打死了。操他妈！我当时脑门子轰隆一下，就热了，这叫人吗？连畜生都不如。当时真恨不得，自个儿手中有杆枪，如果碰上当兵的，当场将他们全扫啦！也不知过了多久，人群散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家的，只记得满脑子晕，满胸口堵，气愤、难受得糊涂了。

第二天，也就是六四那天下午，我又上街溜达。走到离北大医院不远的地儿，看见很多市民用担架抬着伤员，往医院门口跑，沿途嘀嘀嗒嗒淌血。当时还有北京师大的学生站那儿演讲，说什么子

弹射倒多少多少人，根本救不过来；说什么他们疯了，连红十字、连救人的人都打，军人的枪口怎么可以对准人民之类。把我听得眼泪哗哗流，联想到昨晚上死孩子的事儿，更是心如刀绞，继而热血沸腾，想找当兵的拼了。廖老师，你说说看，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遇到当时那种情况，是不是都会产生与我类似的想法与感受？我抹着泪水，继续往前走，到了马甸桥那儿，一串儿军用卡车由北向南开过来，被学生们给拦下了。那场面啊，现在只有拍电影才能看到，壮观，混乱，像大街中间摆放着无形的火药桶。所有市民都在漫骂，唾沫满天飞，开始我还不停地擦脸，后来就顾不上了。有的人还跳着脚，朝当兵的那边扔东西。学生们手挽手，挡在马路中间，也挡在市民和军人们中间。就这样僵持了好久。当兵的都下车，好话没喊几句，互相就推搡、拉扯、动拳头。我看不下去啦！心中那股压了太久的怒火，腾的冒上顶。我大喊：绝不能、绝不能让这些拿着枪的王八羔子再去滥杀无辜！同胞们，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阻止他们继续行凶！接着，我就三步并作两步，扑向离自己最近的一辆卡车。刚好油箱表面蒙了一块布，我一把扯下来，拿出随身带的火柴一划。布点燃了，我又飞速拧开油箱盖儿，将烧得欢的布朝里一塞。轰隆一下，那火蛇几秒钟就窜开，不到一分钟，整辆卡车就火光冲天。

老威：你的手脚够麻利的。

张茂盛：思想不成熟，手脚就麻利呗。然后我转身回家了。

老威：你没躲起来呀？

张茂盛：躲什么呀！那会儿年龄小，没觉得自个儿做错了，更没觉得这事儿有多严重。六四过了没几天，我们又上班了。就在我去天津出差时，他们抓我了。

老威：几个人来抓的你？

张茂盛：有 7 个人吧！当时天津工地上那个队长说，你帮我去

那那搬点东西。我就去了。到地儿一看，嘿，几个穿警服的在那儿早候着。开头第一句就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我说我知道。他们说那好，你跟我们走吧！就这样，当天就被警察押回北京，弄进离家门口不远的一个派出所接受审讯。

老威：哪个派出所？他们打没打你？具体是哪一天抓的你？

张茂盛：后来那个派出所没了，莫名其妙。叫什么名儿来着？记不住，只记得曾经离我家不远。武文建你知道吗？老董知道吗？也不记得了？真是真是。我在里面关了 17 年，脑子进水，把记忆力搞得模模糊糊，反应也迟钝，动作也慢，跟岁数大了似的，几天前的事儿，有时感觉像几年前的事儿一样。唉，得老年痴呆症还早吧。

至于具体哪一天抓我，也记不清。20 多号吧？刚进派出所他们就问：你干了什么呀？扔石头啦？还是打了当兵的？我说这些都没干，我只是把军车给点着了。他们顿时很吃惊，又问具体是怎么点着的。我就从头至尾说一遍，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完了他们还问：你没受伤啊？我说我干嘛要受伤？他们就突然瞪眼睛：他妈的暴徒！流氓！给你点颜色看看。接着我被拽进一间小屋，两个警察左右开弓，拿压门的弹簧狠抽我一顿，痛得我满地打滚，忍不住叫了出來。警察说：算你小子运气好，没落在戒严部队手里，要不这双爪子早被剁了。

折腾完了，他们说：爬起来，我们送你回家！我有些懵头懵脑，就问真的吗？警察笑了，说就这智商，瞎闹什么呀。结果一会儿，我被送拘留所了。

在拘留所呆了 10 多天，又转到北京东城分局，也就是七处。进过局子的，都知道王八楼，据说从 50 年代到如今，那楼的形状就没变过，远远望去，像一只巨大的王八。从王八头下面进去，就等于我的案子升级了。在审讯室，警察指着鼻子，骂我负隅顽抗。我说我敢吗？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借我一百个胆儿也不敢。可是

该说的我全说了，没干的事儿，我也不能瞎编吧？我这种脑子，你让我瞎编也编不出来呀！

老威：你真够直率的。

张茂盛：我又被揍了一顿。警察说：张茂盛，你知道多少六四暴徒在我们手里过堂？他们是什么反应？个个追悔莫及，痛哭流涕，甚至蜷在地下，一下接一下抽自己的嘴巴。谁不爱惜生命？谁又甘心拿鸡蛋脑袋碰石头？你不停地狡辩什么？我说我没狡辩，当时那种情况，我没觉得做错了。出发点和动机，就是爱国，就是不让更多的军人进入天安门，以免造成更大的冲突和伤害。也许点军车是有些过激，但是开枪射杀学生和市民就不过激吗？警察说：臭暴徒，还占理了。又把我踢地上。我双手护着脑袋，还在说：我没顽抗，点车是为了避免滥杀无辜呀！

老威：唉，张茂盛，我们这些苟且偷生，还习惯自我悲壮的文人，在你跟前应该感到羞愧啊。

张茂盛：那会儿脑子简单，问什么说什么呗。实在没什么好隐瞒，更不懂随机应变，装出一副深刻悔过的样子，让他们从轻发落。

老威：你提讯了几回？法庭开庭的情况？紧不紧张？以什么罪名判的？

张茂盛：特简单。提讯了几回吧。总之，他们问什么，我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开庭前，我跟我的辩护律师见了一面，总共就 10 来分钟。我问律师，你认为我会判多少年？他回答不好说。开庭的时候，我记得就三、五个人儿，法官、公诉人、陪审员、书记员，还有律师和我。

老威：那就是秘密审判了。

张茂盛：没观众，也没我的家人，估计根本没通知。在把我从看守所铐往法庭的路上，法警还一再安慰我：年青人，不用害怕，还像一般提讯那样，该说什么说什么。我押过好几批六四暴徒受审，

都是些不懂事的愣头青。像你这种案子，撑破天，也就关个三、五年，教育一下，记个教训，放了。

老威：你信吗？

张茂盛：如果一个不懂法律的人跟我讲，我可能不信，或者半信半疑，但人家是法警，语气又那么肯定，当然就信了。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你问我过堂紧不紧张？一点不紧张。因为是延期宣判。

后来在牢里等来《判决书》，反革命纵火罪，判了个死缓。嘿嘿，就那么一张纸，就那么几个人，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他们向我宣读完，我也签了字，一声没吭。

老威：上诉没？

张茂盛：没。9 月判刑，11 月就送一监了。

老威：为什么？

张茂盛：在看守所，同一个号里的人对我说：像你这种情况，打你几枪都不冤。你好歹捡了一命，到了监狱里好好表现，说不定还能减刑，提早放你出去。我问可不可以上诉，他们说脑袋都轮着长了，还上什么诉啊？搞不好明儿一早，就把你拉出去毙了。后来看守所管教还问呢：怎么不上诉？你不是觉得冤吗？你不是觉得判得重吗？我低头没吱声，心想：你们这些杂碎，巴不得我浑身多穿几个眼儿。其实，我怎么不冤啊？判得他妈的太重了！烧一破军车才值几个钱，我又没拿枪杀人。我跟刑事犯不一样，没偷没抢没强奸，只是书读少了，道理没有知识分子懂得多。

老威：好歹你活下来了。还有许多人没活下来。

张茂盛：是啊。活下来就可以熬时间。邓小平那么威风，还不是被我们给熬死掉，江泽民也差不多了，谁谁谁也有出气儿没进气儿了。我呢，还不到 40 岁，能熬到六四翻过来。廖老师你说，有没有轮到我说话的那一天？

老威：肯定有。现在你就在说话啊。不过你的性格，你的确是，我采访到的六四暴徒里心地最简单的一个。

张茂盛：可不是吗。案子完得也快。

老威：接着就是漫长的劳改。

张茂盛：嗯，那滋味可不好受。以前在社会上，在单位里，我最烦别人成天管我，可在监狱，不仅要服管，而且要服打，连畜生都不如。我进监狱这么些年，一共就哭过两回。头一次印象特深，因为才入监，犯人头就找个借口整治我，关我小号。小号里面特别窄、特别低，只放进一张一尺多宽的用木板搭的床，人站直了就碰顶，连转身都费劲儿。鼻子前有巴掌大的窗户，窗玻璃全碎了，几根枯藤子里里外外地缠绕。当时天气冷了，也快过节了。我没日没夜，囚在那狗洞一般的小号内，别提看，闻都闻不到外面的任何气息。有一天，突然听见远远飘来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唱段，“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什么的，原来人家在排练文娱节目，准备过节了。唉，我心里倍儿孤独，倍儿凄凉，也不知道何时能出小号，出了小号还会有什么样的惩罚。我爸妈的身体也一直不好，我将来出狱，还见得着他们吗？还能为他们娶个媳妇回家吗？说不定，连传宗接代的能力都没有了。想着想着嗓子堵，泪流满面了。

老威：小号关了多久？

张茂盛：10 来天。感觉是 10 来年。完了，人就成熟许多，仿佛有垫底儿了，小号都坐了，大号还有什么过不去？说冤，大家伙儿谁不冤？号里人多半是因为六四进来的，清一色的 20 郎当岁儿，就像一片刚刚抽完身条的小树林。大家在一起聊聊天，互相解解闷。年轻什么都行，包括坐牢、犯事儿，也要趁年轻，再苦也苦不死啊。监狱里大家老说：今冬明春，某某某，你一准出去啦！明冬后春，赵紫阳一准复出，六四要平反啦！有人还偷偷揣着个收音机，蒙被窝里，听敌台。空高兴瞎掰活一阵。我是个没多少脑子的人，大家怎么想我就怎么想，可是一年一年又一年，无数个今冬明春，胡子

青黄了，眼睛花了，十七年也晃没了。我出來了，今年都 38 了。还是他妈的那帮人赖着坐天下，要腐败要官倒，小老百姓敢说半个不？我只怨自己脸皮厚，这把岁数还跟老爸老妈挤一块儿住，真够窝囊。

老威：你父母多大年纪？

张茂盛：我爸 80 多了，家里几个子妹都成家了，他们也都活得不容易。我们就是北京一普通人家，没任何背景，也没什么钱。95 年 8 月拆迁老旧房子，当时我还落户在监狱，政府按户口重新分房，我自然就无房可分。父母的房子总共 45.78 平米，留给我住的那间屋，只有 9 平米。按我目前的年龄，正常的话，早该结婚生子，让他们老人家享上清福了。可如今，他们算白养我近二十年，风烛残年了，还给自己添负担。你说我能活得安心吗？有什么办法？我也不想这样。

老威：你别太过分自责，你还不到四十，路长着呢。

张茂盛：我妈患面瘫，本来要做手术，听说我快回来了，吓得不敢做，因为住院要花不少钱。刚回归社会，有人介绍我去街道扫地，干半天活儿，一个月一百多块。哎呀，现在北京这消费水平，一百多块，连条狗都喂不饱，甭提一个人了。因此我思前想后，就没去。在监狱里呆太久了，消耗生命，什么生活技能都没学。大老爷们，天天搁家里呆着，不敢出门。出门得花钱，没吃没穿还能忍着，你说北京这么大地儿，搭车不花钱啊？路走长了口渴怎么办？我爸妈身体差，我又不会做饭，顶多帮他们刷刷碗，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他们想省几个钱，请个农村保姆来照顾自己，可人家来没地儿住。爸妈还为我的个人问题操心，动不动就哭，就烧香求佛。可真要谈女朋友，个人形象还行，不缺耳朵鼻子，就是缺房子缺工作，哪个傻女人会干？

老威：你还是应该跨入社会，勇敢地尝试。

张茂盛：是是，老这样下去不行。家里子妹给我介绍一看车活儿，我性急，当天就去。人家问，我就把自个儿的情况坦白了。他们半信半疑，说真的因为六四啊？这么长时间才出来？似乎对坐牢这事儿挺排斥。几个人躲一边叽叽咕咕半天，末了，才打发我说：咳，你这身强力壮的，我们这儿暂时不需要。停车场收费低，工资很少，还是找个岁数大的，混时间，顺便挣两钱儿，双方都比较合算。这样吧，你先回家，需要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这事儿就这么黄了。

唉，苦恼，烦，都成累赘了，干嘛还活着？监狱毁人啊，除了大帮子坐牢的，偶尔碰一块发发牢骚，在外面就没朋友，没社会关系。就连从前的街坊邻居也生疏得很。有一次乘公交车，一块车钱，我拿不出来。售票员白我一眼，说怎么搞的？这么大一人还混车坐。我说一块钱也是钱，我找不到工作，钱会从天上掉下来啊？要不，你给我介绍一份活儿？

老威：到这地步，真难为情。

张茂盛：我被大家轰下车，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家。你说谁不想要脸呢？谁不想有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呢？现在，都见鬼吧，我不要这些，甚至不要听六四，不要听一开枪就跑到国外去的那些人的民主大话，我只要一个最普通的人的最普通的生活！可社会就不给机会！暴徒永远是暴徒，已经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也不给机会！有人让我申请低保，政府说：你不是跟父母住一块儿吗？年纪这么轻，吃低保不够格。

老威：吃低保？还不如进职业培训班。

张茂盛：又得说钱了。家里为了省两个钱，有时天黑尽也不开灯，屋里屋外地瞎摸。自打我出狱，一直洗冷水澡。就怕节约惯了的爸妈说：洗热水多花钱呢。

老威：我也洗了多年冷水澡。

张茂盛：春夏秋还行，冬天就直哆嗦。以后我老了怎么办呢？前一段天热了，没凉鞋穿，我碰巧在家门口撞上有摆摊儿卖皮凉鞋的，就花 50 块买了一双。心想这老板实诚，皮的才卖 50 块，还真不贵。结果才穿两天，鞋底就脱胶啦！这真是便宜无好货。

之前在里面，也听说外面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却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唉，如今的北京，灯红酒绿，满街的有钱人，却不适合我这种几辈儿的老北京呆了。嗨！不说这个啦！今晚大家伙儿约一块儿，抽烟喝酒吃饭，还接受采访，开心。让廖老师您破费，对不住啊。明儿起床，我又得琢磨琢磨，不能让父母老养着啦！

老威：喝酒喝酒，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我们老祖宗就这么活的。

张茂盛：不行啊廖老师，待会儿我得早点走，要不赶不上公交车啦！

老威：那就搭出租，我和武文建送你一程。

张茂盛：算了算了。坐出租，拢家门口，说不定还吓着爸妈：儿子你干嘛，抢银行回来啦？开个玩笑。好了，敬大家一杯，为了我们共同的遭遇，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淡忘的遭遇。然后，自个儿蹉跎，自个儿早点回家，洗洗睡。

六四死刑犯董盛坤

采访缘起

眼下是 2006 年 12 月 27 日晚上 8 点 50 分，我在前门附近一家东北餐馆，访谈两位已经出狱的“六四”死缓犯。张茂盛刚完，我换了盘磁带，转向 46 岁的董盛坤。武文建在旁边咋呼道：“抓得这么紧？让人不敢出大气。”我立即会意道：“歇会儿歇会儿，吃菜吃菜。”武文建叹道：“我们这些暴徒，虽在同一北京城，平常却各奔各的生存，难得相见。今天沾老廖的光，咱哥们儿聚了，就要多贪几杯。”于是大伙儿全站起来，碰了一杯二锅头。武文建又满上，单独敬张和董，还大呼一声：“二位遭罪啦！”小武子先干为净。张茂盛跟着也干了，董盛坤却迟疑道：“我还得骑车呀，我老妈在家里候着。”武文建埋怨道：“今天好日子，你怎么不乘公交车？醉了也不怕。”董盛坤道：“我平时烟酒不沾，也沾不起。你想想，在外面 20 来块一条的‘都宝’烟，拿到里面就翻 5 倍，卖 100 多，没关系还不一定能搞到。可烟瘾一上，人就难受。我不想难受。”张茂盛一团和气地笑道：“酒瘾比烟瘾好些吧。在里面不准喝酒。”武文建道：“他妈的说到底，不是上不上瘾的问题，而是烟酒都得花钱。咱哥们儿穷、背、命硬，不招人喜，不像海内外某些精英，油头粉面、花天酒地，光环还都落他们头顶。”眼见三人的悲情借酒往上爬，我急忙打岔道：“老董不太喝酒，就以茶代酒吧。多吃点饭菜，平常多注意身体。不论高低贵贱，大家都是‘六四’人，要想有未来，就得寿命长。”

一席话得到大伙认同，于是重新落座。武文建率先为两位哥们儿掏腰包，还嘀咕：“惭愧惭愧，没多少没多少。”我也不甘落后。接着抓紧时间，大伙儿吭哧吭哧猛吃一阵。终于，董盛坤放下筷子：“差不多了，咱得对得起这餐饭。”

董盛坤：刚才张茂盛讲的“今冬明春”，我深有同感啊！我跟他相似的放火罪、相同的死缓，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出狱了，外面社会的巨变，城市的巨变，尤其是人心的巨变，让我们这些与世隔绝太久的傻瓜，茫然失措、束手无策。我们是废物！我们被遗忘！我们活该！

老威：老兄不必如此。喝酒喝酒。

董盛坤：嗨，说来话长。1989 年胡耀邦去世引发学潮，几百万人上街游行：打倒官倒、铲除腐败、推动政改、要民主自由，真可谓民心所向。1949 年老毛站天安门城楼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结果是他一个人站起来，中国人民全趴下；而 1989 年，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虽然只站了几十天，又被揍趴下。

我至今为当时的北京人自豪！你想想，三伏天儿的北京，敞地儿暴晒着，七老八十的居民老太太，为支援学生，天天骑小三轮往广场送绿豆粥，清热解毒啊。我们家也一样，我妈几乎每天一盒鸡蛋，还有黄瓜、西红柿，免费送，还唠叨着，这鬼热天，可别让孩子们中暑了。1989 年的物价，持续暴涨，但普通老百姓的工资却没涨。我当时每月才 80 块，还拿出 40 块捐给学生呢。

我们不懂什么叫政治，更不想“颠覆政权”，只是觉得广场学生们的一言一行，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心声，谁不希望自己国家更健康？当然共产党也这么说，就像一个癌症患者，宣称癌症是心声，自己很健康一样。

老威：对对。我们就是在制度的癌细胞下活着，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被扩散掉。

董盛坤：为国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应该是“八九”学潮期间每个北京市民的共识。我家离天安门很近，几乎每天下班，我都顺道去广场陪陪学生，说说话，鼓鼓劲，别的帮不上。几十万戒严部队将市区围住了，有一段儿传言说，李鹏已经搞定邓小平，下

命令了，大兵分分秒秒要开进来了，要动真格了，要杀人了。那个人心浮动哟！学生那一双双眼神，惊慌得像遭圈住的绵羊。听说广场指挥部的学生头头们，还熬不住，打架呢。

老威：听说你曾经当过兵？

董盛坤：在陕西，3 年陆军。退伍后在一家印刷厂的制版中心工作。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在部队，受的可是正面教育，爱党爱国爱人民，战争年代，堵枪眼的黄继光是榜样，和平年代，做好事的雷锋是榜样。可“六四”一开枪，全颠倒啦，明目张胆杀人，谁受得了。

老威：你在哪儿看到杀人的？

董盛坤：6 月 3 号晚上，我骑自行车去看住在北京体育馆附近的父母，我好几天上不成班，他们不放心呢。那时候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大兵往里开，老百姓上街堵，混乱至极。在六部口家门前，我平生第一次看见被开枪打死的人，横躺桥底下，血肉模糊，令人毛骨悚然。我寻思着，不能再往前走啦，再往前走就到天安门啦。枪声炒豆子一般，乱响一阵，停一阵，又乱响一阵。子弹可没长眼睛。

我犹犹豫豫，正路过长安街民族宫那儿，老远就望见坦克、装甲车轰隆轰隆开过来，一长溜，后面还有更长的、几乎没有尽头的运兵车队。部队推进的速度非常慢，队形、车距保持得非常好，一点一点往前蹭。车队两侧，实枪荷弹的步兵紧张护卫着。

老威：像玩阅兵式。

董盛坤：我自个当过兵，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儿，血肉之躯拦不住钢铁啊。很多市民围观，渐渐，情绪冲动起来，不知谁喊了几嗓子，人们就朝街中间涌。不少人破口大骂，我把自行车停放了，劝大家不要骂，因为军人也没办法，不想进城开枪，也不敢违抗命令啊。

老威：你知道阻挡坦克的王维林吗？

董盛坤：我没那个胆儿，可也不能让他们长驱直入、进广场滥杀无辜，于是就鼓起勇气，与大家一起拦军车，还凑拢着一辆卡车，瓦解士气。那驾驶室里，坐了个斯斯文文的陆军少校，我高声劝说，让他们别把枪口对准人民，别让子孙后代唾骂。他竟连连叹气，一个劲儿冲我摆手，那意思是说：你别傻了，我们比谁都清楚。仔细瞅瞅，好些当兵的，眼眶通红，好像还哭过。

我豁出去了，声音更高。我的口才从来没这么好过。我说："我也当过兵，大家曾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你们奉命乱开枪，也许没开枪，就走火，死伤的可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们在国难当头，挺身而出，为的不是自己，是为了你们，怕你们成为千古罪人。掉头回吧，或者丢下枪走人吧，别受不了骂，就开枪。老百姓骂你们几句，只是情绪激动，但他们为什么激动呢？与你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冲你们呢？因为见不着李鹏，见不着罪魁祸首啊。一两句话把儿，冲撞你们了，就开枪，这可是杀人啊，老百姓的死活，就决定于你们扣扳机的指头！中国人之间就这么不共戴天吗？"

老威：不错不错。

董盛坤：所以，那军官受了触动，当即就作调整，将车上的兵里外对调。我猜想，戒严部队，并不是每支枪都配备子弹，开头，荷枪实弹的兵围车厢站一圈，时刻警戒，街面稍有异常，就先下手为强，可经我一劝说，无弹兵就站外圈了。

接着，我又转身劝说围观谩骂的群众："大家要理性！要克制！一时冲动只会激化矛盾！当兵的也是没办法，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哪怕这命令是个浑蛋下的，他们也只能听从摆布。你们骂，保不准他们也一时冲动，开枪伤大家，何必呢？"

老威：你如此有理有节，真跟烧军车联系不起来。

董盛坤：直至敌对双方都松弛下来，我才骑车离开。一进父母

家，老两口就大放悲声。原来他们担心我呢。看见我浑身溅了些血点子，我妈紧张极了："哎哟，你伤到哪儿啦？你到底伤到哪儿啦？"我说："没，别人的血迹呢。"我也纳闷，怎么弄上身的？那一夜，不仅我们一家，估计全北京城，每个家庭都无人入睡，除非没肝没肺的东西。

6 月 4 号白天，父母轮番看守，不准我出门，但我体内猫抓一般，总想溜号。嘿嘿，直到终于傍晚 6 点，我才瞅个空子，跑掉。我妈追着喊了十几声，我装耳背。哪知我骑车出去不一会儿，猛回头，竟发觉我爸跟密探似的，偷偷摸摸跟踪我。我顿时就急了，冲他嚷嚷："你老跟着我干嘛呀？我又不是小孩！"我爸听我这种口气，脸面下不来，就拐个弯儿，骑车反转了。我继续往前，骑车到崇文门路口，打老远就望见火光冲天。抵拢一瞅：嗬！烧军车呢！打头两辆已经点着，火焰灼人，我就绕到第三辆车尾巴。堵车群众特别多，街面满当当的人脑袋，群情愤怒，比比划划，骂骂咧咧。置身其中，我的怒火一下子上来，浑身哆嗦，想找什么东西发泄，却听耳边有声音：把狗娘养的车轱辘给它点了！

鬼使神差，我就凑近那辆车的后座，寻着两块擦车布。不知是谁，反正油箱盖已被人拧开了，挺顺手的，我将布塞进油箱，蘸湿了，拖出来借地上的火苗子点着，哗啦扔向那车轱辘……

老威：特别紧张吧？

董盛坤：甚至有点手脚无措。有块布还掉地上了。另外一块粘着车轱辘，燃了一会儿，烧成灰，竟然灭了。总之在我等候之际，那辆车没点着。我还以为没事儿呢。

老威：怎么会没事儿？

董盛坤：不过烧了两块擦车布啊。事后回家，真没把这无后果的纵火行为当回事儿。照常上班才几天，就落网了。

老威：几号？

董盛坤：6 月 10 号。

老威：够快的。

董盛坤：那天单位保卫科的人跑到车间，通知说新来的刘厂长找我有事。我应声去了，一进办公室，却看见两个陌生的小伙子坐在厂长的位置。打个照面，他们就自我介绍："我们是公安局的，你大概知道我们找你有什么事吧？"不知为什么，我点点头，竟回答说:"心里有点数。"他们说:"有点数吗？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吧。"我说："凭什么我要跟你们走一趟？"他们说："咱们都是年轻人，你识相点，找个僻静地方聊聊去。"于是我随他俩走到门口，一辆天津产的老式面的停靠在那儿。

一上车，身子就紧了，左右两个便衣，我顿时被夹得无法动弹。接着车子发动，前排副驾驶"喂喂"地打电话，报告说姓董的已被带上车，如此这般。我心想："原来这几位还不是直接抓我的人，只是探底的，瞅我在不在。"正猜测着，面的就抵拢一胡同口，吱地刹住。一辆 212 标志的警车逼过来，车屁股门轰隆打开，六七个戴钢盔的特警跳出来，V 字形排开，黑洞洞的枪口全冲我。我一下子懵掉，魂飞魄散，所以根本没看清楚他们的标识，来自哪儿。这时领头的军官说："董盛坤，你被刑事拘留了。"接着戴手铐，并用衣服蒙头，非常专业。

黑暗中我被架上闷罐警车，猛摔个狗吃屎，几双脚同时踩扁我，哎哟，那一阵毒打！暴风骤雨似的！只知道疼，却不知道哪块肉更疼。有个瞬间，肋骨啪嗒一下，我晕死，一秒钟之间，又醒过来。

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凭感觉，揣摸车往哪个方向开，可过了没多久，我的感觉就不准了。后来车子停下来，有人拽住我脖子，推搡着上楼，转弯再拐弯，好像是进了房间。没站稳，几只铁掌摁住我脑袋，砰砰砰朝门框上撞。真疯了！我晕头转向，身子不由自主软下去，还没到地，又被提起来，砰砰砰猛撞。我的脑门当即起一大包。我呀，也顾不得人格尊严了，龇牙咧嘴，一个劲儿求饶。

下马威整完，头套揭开，我的双眼已肿得像桃子，血糊糊的，看什么都重影。两个警察开始审问了，问得很详尽，到了这地步，我也一五一十答得很详尽。三下五除二，犯罪过程问答完了，不料他们又一拍桌子，大喝两声："董盛坤，你他妈态度不老实！还有重大隐瞒！"我当时已掉进冤窟窿，比旧戏《六月雪》里被无辜砍头的窦娥还冤呢。我说："我敢不老实吗？装肚里的全吐了，没装肚里的，再打也吐不出。你们举个例子，要怎样才叫老实交待？"

他们继续吹胡子瞪眼，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首都警察用烂了的恐骇手段。他们还冲到跟前，拉出要打的架势，却又突然停住，说："我们懒得修理你，你再顽抗，就干脆送戒严部队。到了那地儿，你想交待都没机会啦，乱枪崩了，就地掩埋，还算痛快；最厉害的，是枪托子捣你几钟头，等骨头跟肉一样稀软了，再左一枪右一枪，专捡不致命的地方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家里人不会知道，说不定还四处贴《寻人启事》呢。"

我也就一上班拿工资的，哪经得住这样折腾。我真被吓住了。唉，要搁"六四"以前吧，我可能不相信，随你怎么着。可"六四"当天，我亲眼目睹过戒严部队开枪，那个穷凶极恶！所以我相信，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干什么都不过分。妈的，为了忍辱偷生，不被送戒严部队弄死，我就只好瞎编啦。

老威：生死关头，你怎么能瞎编？

董盛坤：不瞎编，我就没机会坐这儿接受你的采访。我说军车油箱是我点的。他们说："你不抽烟，哪儿来的火？不是你干的，就不要往自个儿身上揽。"过了好久，我才反应过来，他们恐骇我的目的，是想逼我揭发他人，因为北京市烧了那么多车，要把成百上千的放火犯统统抓住，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老威：你有同案犯吗？

董盛坤：没有哇！就算毙了我，也交代不出。于是我一再坚持：

那车是我自个儿点的，是蘸地上的流火点的，但当时没燃起来，至于我走之后燃了，烧掉了，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想烧军车，当时群情激愤，乱糟糟的市民，把街全拦断了，恐怕每个在场的，都想烧军车。

老威：警察也许是好意？你多交代几个同伙，就多几个人承担罪责。

董盛坤：搞成反革命集团案，多少脑袋都没了。王连禧的那个案子，枪决了五六个，王连禧脑子有毛病，才幸免一死。我是个案，烧了两块擦车布，就判了死缓。可当时，大伙还觉得我命大。

老威：接下来呢？

董盛坤：这一轮审讯中，我冤家路窄，还真撞着一位戒严部队的参谋长，躲闪不及，他冲过来，当胸给我一拳，还拔出手枪，哗啦顶住我脑门，暴吼："暴徒！你妈个屄！认清楚了，老子是戒严部队！你哼个'不'啊，你哼啊，老子马上崩了你！"

老威：野兽进城了。

董盛坤：熬到 6 月 14 号，我被送七处看守所，深监重地，据说判十几年都不会到这儿。可我当时，还傻不哩叽，认为是过过堂，关几天，等社会上稍微稳定了，就会放我。

老威：这么幼稚？

董盛坤：以前没进去呀。在号子里终于弄明白，本人目前是死刑、死缓、无期徒刑中间的一员，才连叫几声"完啦完啦"。吃不下睡不着，瞪着双眼，竖着双耳，脑袋控制不住，成天胡乱转。老婆呀，刚出生的孩子呀，父母啊，在临死前，我能做点什么？告诉他们自己不是暴徒、是一腔爱国热血才点了两块擦车布？

老威：进入看守所，就进入正规司法程序。你请了律师吗？

董盛坤：家里替我请了。开庭之前，我的律师来提我出去，随便聊天。我揪着他反复问："我会判死吗？"他答应尽力保命，还

说有一线希望，接着问我给亲属代不代话儿。我眼泪差点下来，还以为是那个意思，就说既然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律师唉了一声，说："你别理解偏了。"我说："家里的婆媳关系一直不太和睦，你就给我妈我老婆都说说，家里出了这么大事儿，危难时刻一定要团结。"

律师临走特意叮嘱：开庭时态度要诚恳，说话要客观。我一宿没合眼，反反复复琢磨要怎样才能诚恳、客观，让法官受感动，留我一条生路。6 月 28 号上午，我黑着个眼圈，被带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开庭就一个来小时。我没说什么。律师的辩护大概是说，被告烧军车那会儿，社会处于混乱，包括被告的一些群众，没看电视，的确不知道陈希同市长已颁布戒严令。接着又说，被告以前也当过兵，在部队里表现相当不错。希望法庭量刑时，酌情考虑这些情节。

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审判长叫李国强，当他起立宣判"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时，我的后颈窝起了一溜鸡皮疙瘩。而后他问："被告还有什么要表达？"我语气生硬地说："已经判死刑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审判长就解释说：死缓不等于死刑，如果被告悔过自新，积极改造，表现不错的话，两年后，死缓可以降为无期；如果靠拢政府，一直表现好，几年后，无期也就减刑为有期，"你还年轻，人生道路还长，跌倒了爬起来，终有回归社会的那一天。"

说实话，当时那根保命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同时又觉得莫名冤屈。我忍不住当庭嚎啕大哭，一边泪如雨下，一边还徒劳地申辩："我不反共产党，也不反社会主义。我只希望你们能理解，我是个有良知的北京市民，当时亲眼见当兵的开枪打人，怒火中烧，情绪失控，才做出了过激行动。其实我也在部队呆了多年，受了多年爱党爱国爱民的教育，可谁也没遇到过'六四'事件呀，它实在超出了我的认识范围。"接着我又绕回老套路，恳求他们把我当作

犯了错的孩子，给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唉！不说了，屈辱啊。

8 月 4 号，我接到正式判决；8 月 30 号转到北京市第一监狱。过了很久我才知道，能捡回这条命不容易呵！我父母奔波找人，疏通了一层层关系；我原单位的领导也专门跑到公安局说情，竭力让他们相信我是好人犯罪。当时的气氛多恐怖！真是路遥知马力，患难见人心。

入监劳改期间，我父母也费了不少心，花了很多钱，替我申诉，直到有人提醒：别白白折腾了，像这种案子，只有等大形势好转了，也许两三年，也许四五年。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时我想，没有他们老两口，我能撑得了这么久？

老威：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董盛坤：我父亲退休前是单位里的小干部。2002 年头查出胃癌，5 月份做手术。家里人却瞒着我。那段时间，我在监狱里出了点事儿。老廖，你认识江棋生吗？他是要求当局平反“六四”被关进来的。

老威：我知道。很不错的异见学者，现在是中文独立笔会的副会长。

董盛坤：没错。2000 年我转到二监，就跟他凑一块儿。我一直很敬重他。当时我在值班室当杂务员，比车间轻松些。记得江老师有一篇论文，他夫人来探监时，悄悄给带出去发表了。我不清楚他的文章在何种情形下写，何种情形下出去。只因为我是值班员，负责监听他们的接见电话，就受了牵连，当即被降到车间干活去了。我父亲胆儿小，知道了这事儿，焦虑不安，生怕我再出纰漏，影响减刑。他刚做完胃癌切除手术，才 1 个月，就赶来探监，叮嘱个没完。

他是 2003 年 5 月 13 号去世的。那个主刀医生非常吃惊：手术很成功呀！类似的状况，基本可存活 5 年以上，怎么会才 1 年就……？

唉，家里人全清楚，我爸为了我操心太过，一风烛残年的八旬老人，我没能尽孝道，反而，我算什么东西啊。

老威：你现在跟你妈住一块？老婆小孩呢？

董盛坤：早离了。进去头几年，还抱希望，以为关个三五年"六四"就平反啦。后来改判无期，外面的变化也大，大家不爱国爱钱啦，她就死心如灰，提出离婚。我当然理解，单身女人带小孩难。我进去时女儿才 3 岁半，现在都 21 了。

老威：我进去时，女儿还在妈肚子里。

董盛坤：你判几年？

老威：与你没法比。

董盛坤：每个"六四"家庭都差不多吧，除非神经特别坚韧，像徐文立、江棋生家那种，老婆心甘情愿在外守多年活寡。

你记得鲁德成——学潮时请老毛像吃臭鸡蛋的那个？嘿嘿，他出狱后先偷渡到泰国，然后去了加拿大。我出狱不久，他就在网上弄到我的电话，打过来叙旧。听我说当年跟他在七处关一个号的朱宇也出来了，就也想跟老朱叙叙，看有什么困难，需要海外出力。我把人家的好意转达了，老朱也同意接电话。可没料到，老朱老婆出面阻拦，明明白白表示，不准自己的老公再跟这帮"六四"难友掺和，否则她的精神立即崩溃。

谁能说什么？她等了老朱这么多年，没离婚，简直称得上圣女了。我只得如此这般给鲁德成回话。他说能够理解，他也有类似经历。其实通个电话算什么？警察还抓你？人家鲁德成没别的意思，可能在国外感觉寂寞，关心关心共患难的哥们儿而已。嗨，话题扯远了，大家都不容易，"理解万岁"。

老威：你在狱中干过什么活儿？

董盛坤：什么都干过。缝衣服、做挎包、包装筷子、加工出口美国的乳胶手套，甚至还干过农活。张艺谋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

甲》里的那些古代盔甲，都是我们的手艺，监狱为赚钱，道具厂的活儿也接。1995 年以前挺苦，特别是加工乳胶手套，朝里面吹气，久而久之舌头都木了，有毒啊。还有一段时间，规定每天每人必须织 5 件毛衣，大老爷们干老娘们的活儿，返工特别多。从早晨 6 点开始，直到夜里两三点，还干不完。回监舍刚躺下，迷糊一小会儿，又得上工啦！

老威：这样累死累活，有钱吗？

董盛坤：有。年终总结，会象征性得到 10 块左右奖金。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减刑。为了自由，扒层皮也干。我总共服刑 17 年 2 个月零 21 天，就是玩命干活儿，挣劳改积分的结果。

老威：出狱后能适应社会吗？

董盛坤：正发愁。今年我 46，眨眼奔五的人，眼下还吃住我妈，窝心呢。

老威：我出来时，也跟我父母厮混了两年。

董盛坤：我妈每月 1000 多的退休金，暂时能维持娘儿俩的温饱。目前我正申请低保，如果能批下来，家里开销又增加 300 块，就算锦上添花。不过，不能生病，上次我妈得了场不大的病，就花掉 1800 元。没辙。

老威：想不想找工作？

董盛坤：跟张茂盛一样，我找过很多次工作，可人家一听劳改过的，就死活不要。也有人建议我在家门口摆个小摊维持生计，可我坐牢之前是印刷厂职工，没做过小买卖，再说城管太凶了，经常把小摊小贩撵得鸡飞狗跳，我这把岁数，丢不起这脸。我们家在北京本不算穷，可父亲治病，我坐牢 17 年，早把家底耗空了，幸好我不抽烟喝酒。知道吗，外头 20 多块一条的“都宝”烟，在监狱里至少卖 100 多块？

这些年人心不古。比我早出来的哥们儿，能请你吃一顿就不错

了。我得到的最大一笔外援，是江棋生老师，他硬塞给我 5000 块，我不要，因为他靠写文章赚钱，呕心沥血的。可他说："你快拿着！我还能写来几个钱，你们就更加不易了。而整个'六四'，代价最惨重的就是你们这些所谓的'暴徒'。"

我的泪顿时就牵线了，止都止不住啊！老廖，我说这些，你不会怪我吧？有脚有手，谁愿意接受施舍？我们那批人，一腔热血声援学潮，可事隔多年，却被中国人忘了，连海内外的"六四"精英们，也很少提这档子事，或者是故意装傻。

老威：还是有些文章在提吧。

董盛坤：我没看到。鲁德成还不错，知道来个电话问候，这心里也好受一些。唉，说个笑话给老廖您听，前几天有个老朋友带我去花鸟市场，遇到一帮遛鸟儿的，他就咋咋呼呼给人介绍："这是老董，'六四'堵军车的抗暴英雄，刚出来。"不料人们马上起哄："你开啥玩笑，'六四'过去这么多年，当年那批人早放了！"于是我的朋友费尽口舌解释："不是这样，还有好多人关里面呢！"人们顿时很吃惊："哦哟，这老董真坐了这些年的牢！我们还以为你编个故事逗乐呢！"

老威：喝酒啊，老董，高兴一点。

董盛坤：不敢喝，我该回家了。

老威：家远吗？

董盛坤：今晚小武子约的地儿，骑自行车就几十分钟，合适。嘿嘿，我女儿告诉我，眼下网络的流行语是：人生最好不要错过最后一班车、最后一个爱你的人。

老威：是的是的。你妈就是最后一个爱你的人。

董盛坤：对，我得走了。我妈每晚不见我，就坐着不睡。

【补记】

11 点多钟，我们从餐馆出来。北风呼啸，仿佛要将地皮铲去一层。董盛坤棉衣棉裤加口罩，包裹得只剩下眼睛，才骑车离去。我们缩着脖子，匆匆赶往地铁口。半道上，以前门为背景，合影一张。在此前，董张二位都婉拒拍照。我理解他们的处境，只好冲着满桌狼藉，咔嚓数次，最后留下一个二锅头的空瓶，在镜头内顶天立地。

跺脚闲聊中，张茂盛对基督教家庭聚会感兴趣，觉得可以多接触人。我竭力支持，说试试吧，也许上帝比民运靠得住。武文建却道：我们这些人要抱团，要靠自己啊。

内心有一股暖流涌动，但是我们男人，不能像娘们儿那样随便拉手表达彼此的亲密。在下地铁前，我拍拍张茂盛的肩，没话；而武文建忙着开低级玩笑："哥们儿，你那话儿还行不？"张茂盛憨厚地笑："没机会试啊。"武文建又道："我出来那会儿，那话儿软了大半年。长期不用，想得发疯，可临阵就退缩。"张茂盛道："牢坐久了都一样。去去。这话题扯个通宵，估计也不会完。"

空荡荡的甬道。我不禁回头仰望，张茂盛还在上面，还在呼啸的风中。可眨眼之间，他就消逝了，独自走着，回家了。

我耳边突然响起台湾人侯德健的《归去来兮》：归去来兮，青春已荒芜，离家的时侯他才二十五……再见一面要等多少年？多少年？

最后一班地铁轰隆隆进站。就我们两个乘客了。其他人呢？董盛坤、张茂盛或参加过 1989 年天安门绝食的侯德健呢？这辈子能否再见着他？

盲艺人文华春

我是个瞎子，罪名只是热爱音乐。一直到毛主席死，我为了生存，上街卖艺，将进派出所和收容所当作家常便饭。

采访缘起

大约在 2000 年秋天，我就在成都青羊宫附近看过文华春先生的演唱。当时我挤在人堆中，对着那台集各种打击乐于一身的机器研究了半天，却忽略了机器的制造者。没多久，画家曾循为我提供《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图片，其中一张脚踏机器手拉二胡的盲人街头卖艺照突然映入眼帘，“怎么是他？”我嘀咕了一声。曾循反问：“不好么？”“不错，就是模糊了一点。”“这是我拍摄的瞎子卖艺系列中的一张，如果你想访谈，我陪你去找。”

那时太累，缺乏采访冲动，就只把文先生的照片放进了书里。以后几年，我又两次与其邂逅，听观众议论他是个有名的瞎子，我却麻木不仁。

2006 年 3 月中旬，我从云南回成都，顺便回归都市生活，兼拜访旧友。先在“草堂读书会”上与王怡、冉云飞、杨远宏等匆匆晤面，天晚时又尾随谈性未尽的一群去烫火锅。没料到，我的前访谈物件，上访诗人老陆也挤在一伙知识分子里，就趋前打招呼。老陆依然长发遮肩，打狗棍在手，豪迈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已在王怡那里得到一本《中国冤案录》的黑皮书，自己还没看完，就叫别的上访者夺去了。接着他评价道：“写我那一篇，基本属实，文笔也耐读，就是没有将我对法律的正面认识反映出来。”我恭维道：“老兄通过参加读书会，理论水平肯定大有长进，远非那个告地状的打油诗人可比了。”

老陆急忙点头，与我继续探讨法律的士气顿时下降了一截。我

们邀他共烫火锅，老陆自然从命，他坐在桌头，一边吃，一边很注意地倾听知识分子们的高谈阔论，插了几次嘴，没引起任何反应，情急之中，他在我的点拨下，朗声背诵近作一首，叫《虱子、蚊子、跳蚤的对话》，激起满堂喝彩——

虱子：弓背黑壳壳，做事太可恶，非要把我捉。

跳蚤：嘴尖屁股拖，吃得又太多，逃不脱了你怪我？

蚊子：你两个都是吸血虫，大哥不要说二哥，确实一贯作恶太多。

你们请看我，高高在上，谁能奈何？

喝彩之余，我让老陆作个简单解释，老陆不满道："都是才高八斗的文人，还要我献丑哦。你们评价一下这三个害虫，谁在社会上占优势？"

大伙没兴趣评价，继续吃喝，跟着散场。我与诗人蒋骥同路回家，这个面黄肌瘦的诗人突然说："我认识一个瞎子，性格和老陆差不多，不晓得你愿不愿意采访？"

我说我已不搞底层访谈了。而蒋骥认为，我的冤案系列不过是底层访谈的一个分支。他还说："当今的中国谁没有冤屈？你去见了，弄不准又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

我点头称是。跟着在 2006 年 3 月 25 号下午，我由底层情结深厚的诗人蒋骥领路，搭车去成都南郊的中央花园，在某一栋简陋楼房的 2 层，拜访了在此租房的盲艺人文华春先生。

文先生的妻子很热情地在楼梯口迎住我们。她是一位秀气的农村妇女，眉宇和嘴角却透出坚毅，她比文先生小 20 多岁，可由衷佩服他的才艺和骨气，自愿终身与其同甘共苦。所以，每一次街头演出，都是她蹬一辆三轮车，满载行头和人出发。"我是他的老婆、车夫、保姆、保镖兼眼睛，"她微笑道。接着，文先生从门里探头，我一眼就认出那张久违了的熟面孔，不禁与蒋骥相视一笑。

屋里除了桌子、凳子、旧电视和文先生自制的乐器，就是徒然四壁了。醒目的是，迎窗的墙上，还有一张披头士乐队的彩色招贴图片。我与文先生互相客气着落座，我咂了口劣质的茶水说：“请吧。”

老威：多年前，我朋友曾循曾拍过一张你在街头卖艺的照片，非常传神，我就把它用在《中国底层访谈录》里了……

文华春：我是四川境内最有名的街头艺人嘛，许多记者都拍过我的照片。你们算来得巧，我巡回卖艺一圈，刚刚拢屋，气还没喘均匀呢。我去汉中，当地一家报纸立马出动，现场采访；去了自贡，电视台和报纸我都亮了相；到了重庆，更是老地盘上的老风光，晚报、晨报、电视台全找来了；而眼下，成都的媒体也闻风出动，卫视台，还有 6 频道的《今日生活》栏目都来催着我上，哎哟哟！

老威：我在白果林小区看过你的演出，当时你唱的是《走进新时代》，还拉二胡，踩你自己发明的这套交响机器，搞得颇为热闹，吸引了一大圈人。我还往你的盒子里扔了两块钱呢。不过，我有点不明白，为啥全国各地的瞎子都喜欢唱《走进新时代》？前一阵子，我去北京和乌鲁木齐，在两地的闹市，竟不约而同地看见瞎子们拉二胡、背音箱，唱着“继往开来的领导人，率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文华春：你在讽刺我么？

老威：岂敢岂敢。当时我正在出神呢，警车就嘟嘟嘟地到了，十几个警察排开观众，要将你老人家连人带马搬上车。你不去，当街大吼大叫：“无论新旧社会，卖艺都不犯法！”警察也大吼大叫：“瞎子你妨碍交通，影响市容！”群众看不过，也一道起哄，为你助威；我也混在其中喊：“瞎子你到警察家端碗吃饭去！”结果呢，地头蛇不敌强龙，警察警棍乱挥，你挨了一棍头，就与行头一块被弄走了。

文华春：你这文人，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街头卖艺嘛，行头被砸呀，人进了局子呀，都是家常便饭，呆一呆就出来了嘛。吃点小苦头，更能锻炼意志，丰富人生阅历。瞎子我抖一抖筋骨，又是一个艳阳天。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屁眼要朝天，精神要乐观。所以，你我对共产党这头老虎，只能抹顺毛，不能抹反毛，不管瞎与不瞎，永远都要《走进新时代》！

老威：理解，理解。

文华春：所以呀，文人要看透，透了，才能写出好文章。好文章发表不了，就埋起来，发霉发酵，给子孙后代留起，这叫名垂千古。所谓文章千古事，人生值个逑。

老威：高论，高论。

文华春：你又在讽刺我了。

老威：我是社会大学毕业的，简称"射大"，意思就是被社会的利箭射大的。但是老前辈你，早已万箭穿心了，因此在你的跟前，我不值个逑，也不值个屁。今天，我不想用场面上的话来套你，我只要听真话。

文华春：啥子真话？

老威：你没有对任何媒体讲过，他们也公开不了的真话。

文华春：你有神通公开？

老威：我的文章能在海外自由发表，你就把肠肠肚肚都掏出来，留一段历史吧。

文华春：我是重庆南岸区黄角桠街上的人，1944 年 12 月 8 号生。黄角桠你晓得不？蒋介石居住过，很出名。我父母也很出名，因为整条街上，就数他们炸的糍粑块儿好吃，简直供不应求，所以街坊邻居就把我爸爸叫"文糍粑"。当然，除了这手绝活，我家还做白糕、油钱儿、醪糟鸡蛋、藕粉之类。我家的小铺面一天到晚都吃客盈门，所以父母起早贪黑做生意，没空闲的时间来管儿女。我

从小就由奶妈带，包括喂奶……

老威：那你也过了几天少爷日子？

文华春：我家不是地主、资本家，而是靠勤劳致富的小商小贩，况且我奶奶太累，没奶水，就把我送到乡下奶妈家养，好吃奶嘛——我要说明一下，我们那儿把妈妈叫作奶奶。

老威：那奶奶又叫啥子？

文华春：叫婆婆或外婆。不过我没叫过，因为家里没有更上一辈的的人。

老威：念中学时，共青团组织我们去大邑县地主庄园接受阶级斗争教育，辅导老师曾指着庄园内的某一组泥塑解说道——地主刘文彩天天都要喝贫下中农妇女的奶水，简直就是个吸血鬼。

文华春：我也晓得刘文彩，可人奶腥味儿重，成年人喝那玩意儿干啥？

老威：你是先天失明吗？

文华春：我呱呱落地时，眼睛非常明亮，大家都说长得乖。我至今记得，乡下办婚丧大事，奶妈都抱着我去吃流水席，几十桌，周围人也把我当作菜盘子，传过来传过去，还咂咂弹着舌头，往我的衣兜里揣糖果。我还记得屋檐下的鸡娃跑来跑去，我扑到地上去抓。还有街道、铺面、厨房、冒着烟的油锅、我奶奶将我背在肩头推磨、点豆花的情景，都一清二楚。1947 年 9 月份，我差 3 个月满 3 岁时，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接着就害了“鸡蒙眼”。

老威：哦？

文华春：所谓“鸡蒙眼”，就是天亮看得见，天黑就看不见了。这跟鸡差不多，好像每时每刻，眼球表面都蒙了一层撩不开的帘子。鸡看东西都习惯偏着脑袋，快瞎的时候，我看东西不仅要偏脑袋，而且脖子往前冲，真是不如鸡。

老威：老先生挺幽默的。

文华春：幽默个逑，除开睡着了，我从早到晚都在揉眼睛，哭，乱抓。

老威：你是中毒了？

文华春：也算慢性中毒吧。过去乡下人带娃儿，不像现在城里这么金贵，奶妈自己有好几个子女，除了耕田种地，做家务活，还要腾出奶水喂我，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她碰见我花脸花屁股在灰里爬，就一把拎起来；碰不见，我就成了泥巴里钻的虫虫，啥都朝脸上抹。灶灰迷了眼，大哭起来，奶妈顶多"心肝乖乖"地哄一阵，扒开眼皮呼呼吹一阵，就了事。还有重庆人习惯麻辣，大热天，太阳明晃晃的，晒在背壳上如刀子在戳，还要光着脊梁烫火锅；都脱得只剩一条内裤了，还要呲牙咧嘴嚼辣椒。我嘛，更是重庆人中的麻辣鬼，可以说，还没有断奶，我就开始沾辣了。路都走不稳，双手就捧个大海碗，里头红鲜鲜的，辣椒一半饭一半，吃一口，汗水、泪水、鼻涕一起出来，我不管不顾地抹一把，又埋头吃。旁边人看得直摇头，以为我受了多大的刑罚，却不晓得这有多爽，从嘴巴通过肠子畅快到了屁股——如此发展，体内的热毒就一步步被煽起来了，刚回黄角椏那阵，腋窝、嘴角都长满小疮，而脑门左右，一边冒出一个大疮，足足有酒杯那么粗，乌红乌红的，麻痒得不行，一抠就出脓。父母见了，也没大惊小怪，就从厨房里拿了一把切糕的刀，迎着那疮一割一挑，脓血卜的就喷成两条线，顺着耳根子往颈窝淌。

老威：够狠啊。

文华春：狠的还在后头。父母按住我，一下一下地挤脓，我像一头小猪崽，在他们的手里乱打乱踢，一抽一抽地嚎。那个痛啊，犹如钉子敲进脑髓。终于将脓包挤瘪了，他们又在上面敷了两大砣膏药。凉丝丝的。奶奶说，娃呀，以后少整点辣椒。可我的舌头已养成那个味儿了，还是无辣不吃饭，无辣就摔碗，在地上打滚撒泼。

终于有一天，奶妈到城里来看我，听见她与奶奶在外头说话，我就吼着要出去。可两眼抹黑，左一抓右一抓，撞破了脑壳。奶奶赶进来，把我抱到亮处一瞅，就说糟了，这娃儿得了“鸡蒙眼”；还说我的八字拿给一个远近闻名的神仙算过，料定我的命中必带残疾。

老威：如果你从小不那么热爱麻辣，命中还带残疾吗？

文华春：那个神仙将我的八字反复推了三遍，拍案大惊，对我奶奶说，你这个娃儿了不得，以后要掌印把，至少做到知县。不过，在 3 岁以前，你们一定不能把他接回家，否则必带残疾——不在脸上，就在脚上。

老威：你继续留在乡下也会出问题。

文华春：我七、八岁时，已解放了，那个神仙还从我家门前路过。奶奶急忙将我藏起来，然后请他进屋，又拿出我的八字。神仙算的与几年前一模一样。并且劝告：如果这娃儿已带残疾，就让他学一门既可以糊口，又可以扬名的手艺。

老威：按道理，你的眼病是可以治愈的。

文华春：我们家本来有姐弟两个，可比我大几个月的姐姐在 1946 年出天花死了，剩我一根独苗。所以神仙的话，父母爱儿心切，就没听进去；等到应验了，又急得火上房，四处求医，花了不少冤枉钱。家境就这样败了，连他们视为宝贝的进口自鸣钟也拿去当了 17 个大洋。

老威：看的中医还是西医？

文华春：都看过了。诊断结果是湿热毒交加，烧坏了视神经。啥子药都弄遍了，吃的、敷的、熏的、泡的。一年多，我大概看了几十个医生，父母都灰心丧气了，有亲戚又推荐了南岸区名望非常高的张瘸子。这个张瘸子是个儿科医生，尤其以治眼出名，于是我奶奶一大早就背上我，从黄角椏到上清街去求医。我至今还记得，那一路的鸟叫、蝉鸣，还有蟋蟀的唧唧声。奶奶给我唱儿歌，数顺

口溜，我感觉她很高兴，好像这一趟绝不会白跑；我也很高兴，以为马上就将摆脱黑暗。奶奶说，哪怕就是倾家荡产，沿街要饭，也要治好我的病。

真是希望之路啊，我变成了一个天使，闭着眼睛，插上翅膀，飞到了张瘸子的医院。我看不见，却能感应到微弱的光。听张瘸子说，莫得关系，吃我的药包好。张瘸子不收纸币，我奶奶就从兜里掏出所有的银元，哗拉拉地倒在桌子上。张瘸子边往抽屉赶银元边嘎嘎嘎地笑，手都抖了，好像没见过钱似的。

可没想到啊，真没想到啊！这个虎狼名医的药才一帖下肚，我的两只眼球卜地顶了出来！

一阵钻心的疼之后，那一直都有的微弱的光感也熄灭了。这一来，不仅我整夜号哭，父母也差点疯了，他们还打架，生意也没心思做了。

老威：你们没找张瘸子算账？

文华春：就是把他打死，我眼睛也复不了明，况且人家有钱有势。自认晦气吧。正走投无路，有人又来推荐外国医生。

老威：洋骗子？

文华春：奶奶说，管他啥子土骗子洋骗子，反正都瞎了，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况且人家还信仰上帝。

老威：那人与你们家熟悉？

文华春：不熟悉，但听说我的遭遇，就上门来介绍，说汪山上面有一个教会医院，那儿的神父医术很高明。我爸爸有些疑惑，说我们家不信洋教，他们肯为娃儿治病？那人划了个十字——阿门，我主垂怜每个受苦的人。

老威：这人是个天主教徒。当时信洋教的人多吗？

文华春：整个重庆我不晓得，可在我们黄角椏周围，信洋教已

相当普遍。因为重庆是抗战陪都，驻扎过不少美国人，加上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基督教徒，所以抗战前后，进来了很多外国传教士，他们建教堂，建医院，建救济所，做了太多实际的善事，而不像中国本土的佛教道教那样，只讲究烧香磕头，求神拜佛。所以我父母一听汪山上有教会医院，二话不说，就急匆匆地赶去了。

老威：汪山在重庆的哪个位置？

文华春：离黄角桠不远，紧挨着黄山，是蒋介石住过的地方，因此非常有名，现在还有黄山公园嘛。父母跟着那人去了大半天，在太阳落坡前带回了一管眼药水。我当时正坐在门坎上玩耍，听见了他们咚咚咚的脚步，奶奶老远就喊："乖儿坐稳当啰，你爸爸马上给你洗眼睛了！"

我连声答应。因为年纪虽小，我也被黑暗折腾得够烦。天生瞎子，没尝过光明是啥滋味就好得多，偏偏我又尝过，有那种永远难忘的记忆。我乖乖地坐在门坎上，把脸仰起来，让奶奶擦洗。我在地上爬了几个钟头，肯定很脏，奶奶从脚到背，再到胳膊到脸，替我洗了七、八盆热水，还翻出一块细细的绒布，一点点掏我的鼻孔，一点点抹我眼眶周围。最后，才拿出从神父那儿带回的消毒棉球和眼药水……

老威：真是一个细心的慈母啊。

文华春：我奶奶是个手脚麻利，风风火火的人，这是长期起早贪黑做生意养成的。可能这次是洋大夫专门叮嘱，奶奶小心翼翼用棉球将眼皮内外都粘干净了，才拿出宝贝眼药水，一边眼睛点了一滴，然后叫我转动眼珠子，过一分钟再睁眼。唉，没想到啊，没想到啊。

老威：又怎么了？

文华春：我突然之间感觉到了光线！不对，不是感觉，是真正看到了光线！那一会儿太阳要落坡了，那光线哗地一下，从街对面

房顶泼了过来，像被迎面浇了一盆热水！我打了个寒战，猛地就站起来了。我奶奶急忙抓住我，连问啷个了？我就呜呜地指街上——模模糊糊的人影子，晃来晃去。父母都明白了，也大呼小叫起来，街坊邻居全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议论："这娃儿才福大命大哟！""莫非真是上帝显灵了？"他们还将脸一张接一张地凑拢来，让我认；我呢，只能辩出个大概，摸得准鼻子眼睛嘴巴。

父母受了鼓舞，就照神父说的，天天给我点眼睛，早晚两次，情况真是越来越好。这样持续了一个来月，视力渐渐在恢复，盯人盯物，那种虚着的边儿慢慢凝固了，生人不敢说能认，但熟人站在一尺外，我是一认一个准。奶奶说，等下次去领药，得好好谢谢人家洋大夫。

老威：什么药水，这么灵验？

文华春：不晓得。

老威：好好回忆一下，你父母没说过吗？

文华春：那是一种西洋药水，即使人家告诉了，我父母也云里雾里。

老威：这么神秘的东西，你家里花了多少钱？

文华春：别人是替上帝做慈善，所以没花钱。

老威：哦。

文华春：那年我 5 岁，快解放了。最激烈的那一晌，天天都能听到枪炮声。在黄角椏上面的内儿井，国民党驻扎有重兵，解放军攻了好久，才突破了防线。我奶奶将我按倒在桌子下，子弹如蝗虫，飕飕地在房顶上钻，崩碎了很多瓦片。到后来，街面没有一个行人，奶奶说，有两条死狗躺在路当中，一公一母，大概在交配，就挨了炮弹，肠子都飞到屋檐上挂起了。

可就这么乱，父母还冒着炮火去给我领药。他们走了大半天，我在家里担惊受怕，不过也满怀希望。天都黑了一阵，他们才回家，

累得如两麻袋土豆，轰地就塌了下来。我摸上去揪住奶奶，嚷着要眼药水，奶奶却像个木头人，任我拽来拽去。终于，她呜呜呜地哭起来，那尾音拖得长长的，那是乡村嚎丧的调子，再配上屋外劈哩叭啦的枪炮声，显得格外凄惨。爸爸也跟着哭，脑壳还把墙撞得咚咚响。

我再小再不懂事，也明白了。我也哭了起来，一家三口嚎了一夜，喉咙全哑了。天蒙蒙亮时，枪炮声突然停了，接着，人民解放军的脚步声自远而近，如排山倒海一般过来了，其间还响了几阵子“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的口令。再接着，群众也欢呼起来，放鞭炮，扭秧歌，呼口号，重庆解放了。

老威：那个洋大夫的下落呢？

文华春：临近解放，所有在重庆的外国人都提前撤退，包括领事馆人员与传教士。当我父母赶去时，汪山上已经人去楼空。他们还四处打听，附近的居民说：“帝国主义走狗嘛，他自己不跑，共产党来了，也要把他撵跑。”这就是命啊，如果重庆晚解放半年，我的眼睛肯定就复明了。

老威：这叫天有不测风云。

文华春：莫办法，又不敢公开讲，是新社会剥夺了我的光明。一直到七、八岁以前，我眼前都有模糊的亮点，家里两道门，有客人刚进第一道门，我就能“发现”。当然，不是明眼人很清楚的发现，而是一种歪来歪去的影子。后来，就渐渐没感觉了，连光感也没有了。

父母从来没停止过求医。可都说太晚。人在一天天长大成熟，可眼球没长，不仅没长，还往里面萎缩，所以我的眼眶进化得像外国人，很凹。

莫得办法，父母就合计，要送我学个手艺。将来不愁饭吃。我从小就聪明，无论看相算八字的，还是老君洞的道人，一见之下，

都想收我为徒。

老威：在新社会，这叫封建职业。

文华春：50 年代开头，党的政策还比较宽松，所以瞎子拉过街胡琴算命啦，道士敲道琴测字啦，很普遍。只是我的天性适合搞音乐，黄角椏那条街又是“艺人街”，上上下下都有拉小提琴、拉二胡、吹笛子、吹口琴的，还有唱歌、跳舞的。我天天耳濡目染，习惯了，就闹着要学。我家背后住了一个袁伯伯，笛子吹得好惨了，我就拜他为师；稍后又跟隔壁的刘瞎子学拉二胡、吹口琴，很快也会了。我所说的会，就是演奏歌曲，而不是一上手就有多高的水平。50 年代有许多歌，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防火防盗防特务，中苏友好，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等等，可谓五花八门，我几乎是一首歌滚一遍就能唱。比如：“小淘气来真淘气，一天到晚光打屁，大人的招呼他不听，还跳到马路上做游戏。汽车来了他不怕，专门跟司机唱对台戏。喇叭响了他不管，还伸伸舌头做鬼脸……”

老威：这是啥玩意儿？

文华春：宣传交通规则的快板书。还有防特务的：“天黑了，要闩门，如果有人来敲门，一定要问是何人，谨防遇到是坏人。多盘问，多思考，看他是不是偷情报……”还有“镇压反革命，大家一条心”，还有“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反不了”……

老威：还有呢？

文华春：太多了，记不过来了。况且我十几岁就被弄进街道宣传队，为登台演出者拉二胡伴奏，所以调子记得多（说不定有一万首），词反而忘了，我拿过许多演出奖。三年大饥荒，人都饿落气了，政府还组织我们去巡回演出，我那时虽小，也挣了一些“代金卷”，当粮票用。我吃过不少代食品，比如松毛粑粑，苞谷芯子粑粑，麦麸子粑粑，树皮，红苕皮，芭蕉头，各种野菜。那胀死人的观音土我也吃过，但是不敢吃太多。

老威：啥子味道？

文华春：糯唧唧的，我爸爸挖了一大砣，将它和灰面、米粉子揉作一堆，然后放盐、五香粉，团成粑粑蒸。我吃了两个，还要，就叫奶奶制止了。果然，我一天一夜屙不出屎。政府又叫去演出，奶奶一着急，就用竹签子为我掏，搞得我大呼小叫。唉，那阵的黄角椏，天天有人倒在街面上，还有人走一步吼一声："饿死逑了！饿死逑了！"

老威：三年大饥荒时期你们演出啥？

文华春：吹拉弹唱照旧嘛，都是形势一派大好，由于我工作踏实，还得过先进。那三年没啥新歌唱，就继续五七、五八年的歌，比如"苏联卫星高飞，中国红旗飘扬"之类。

老威：那时得先进，有啥子奖励？

文华春：开先进残疾人会嘛，会后一个人奖励一张奖状一碗红苕。一直到 1964 年，开会才兴吃席，散会还有酒水招待。拢了 1966 年，文革开始，我们的街道宣传队就解散了，因为造反时兴，各种群众组织的宣传队多了，残疾人自然就面临失业。

老威：文革没受冲击吧？

文华春：起头没有，没事干就回家呆着。到了文革后期，八个样板戏也看烦了，许多在社会上闲逛着的年轻人就找到我，要跟我学乐器。这样几来几往，家里由冷清到热闹，地下床上都坐的是人。大家在一块唱文革前的老歌，甚至三四十年代在上海滩流行的靡靡之音，我用自己做的二胡或扬琴伴奏。不过瘾时，还将藏在阁楼上的老式留声机和唱片翻出来，鼓捣一下，放出的歌声怪怪的，却把一大帮文艺青年兴奋坏了。此外，还有人用收音机搜索港澳台的文娱节目，那时，这叫"收听敌台"，被民兵抓住了，要判刑的。

所以没弄多久，街道的居民委员会就检举我"搞黑俱乐部"，派出所经常半夜三更查夜，最后，我成了派出所的常客，三番五次

被抓进去关黑屋子。我是个瞎子，罪名只是热爱音乐，所以也判不了刑。一直到毛主席死，文革结束，我为了生存，尝试上街卖艺，才将进派出所和收容所当作家常便饭，我的嘴硬，城管人员除了没收乐器，拿不出更高的招数。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虽然还在街头混，却称得上民间文艺界的老前辈，一面被媒体追踪报导，一面被城管追踪罚款。自从收容遣返制度取消，警察也不会轻易抓我，或没收我的乐器——拿毛主席的话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老威：你这墙头还贴着披头士乐队的图片，似乎有什么想法？

文华春：虽然风格不同，他们也是我的同行嘛。说不定有一天，我将漂洋过海，去美国街头演出。还顺便打听一下当年给我治眼睛的神父的下落，还有那种神奇眼药水的名称，也算了却一桩早年的心愿。

盲艺人文华春（续）

——读书人流沙河的相关旁证

在旧社会，成都来过不少美国人，外交官，军人，传教士，他们建机场，建医院，建慈善机构，做了太多的好事。

花 3 个半钟头讲完自己的人生，已是下午 5 点多了。文先生的盲目里透出笑意，他说快上班了，得准备一下。我们起身告辞，而文夫人早已下楼，将那台宝贝机器装上三轮车了。

我们走出住宅区，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打了一辆出租，赶往市中心的大慈寺。进了街对面的作家协会宿舍，爬上某一单元的四楼；按罢门铃，师母吴梦华开门，而上个世纪 80 年代在《星星诗刊》教过我编辑业务的老师流沙河就坐在客厅里。

沙河老师 70 多岁，面目苍白，身子骨细长，如风中竹竿，却在老一辈文化人中显得极有气节。他早年因发表散文组诗《草木篇》，被文霸毛泽东点名批判而出名，成了大右派，坠入底层炼狱多年；平反重见天日后，又以诗名和学问名，风光了好一段时间。六四大屠杀，枪声惊破残梦，阅世极深的沙河老师痛定思痛，觉得历史与现状总是在重复，但是付出血腥代价的总是一代又一代的老百姓。于是他走上了古代先贤在乱世里独善其身的老路，与所有来自官方的荣誉或变相施舍划出了一道鸿沟。他甚至不认为自己是诗人和学者，而愿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不识时务的读书人。

由于多年养成的自我保护的习惯，我拜访沙河老师从来都是突然而至，没有预约电话。这次，他也照旧蜷在木椅中，冲我宽容地微笑。我一落座，就迫不及待地复述自己刚才的工作，并就文华春心中的疑团——那种几乎使瞎子复明的眼药水的名称——请教渊博的沙河老师。不料他马上回答道：“鱼肝油嘛。”

我惊讶道：“鱼肝油？很普通么。”

老师道：“当时就稀罕了。鱼肝油配制的眼球营养液，可救过不少瞎子。”

我还没反应过来，老师就回忆开了。我本能地掏出录音机，摆在茶几上，留下这段相关旁证：

眼睛与人的其它器官一样，也是需要营养的，你采访过的盲人，如今已 60 多岁，却只有 3 岁以下的眼球，因为吸收不了营养嘛，当然要“眼球夭折”——许多中国人不懂这个，从古至今，谁见过眼睛吃东西？可是西方人懂，他们提炼了鱼肝油，直到现在，我们的眼睛累了，酸疼或模糊了，点两滴鱼肝油就有明显缓解。

在旧社会，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成都来过不少美国人，外交官，军人，传教士，他们建机场，建医院，建慈善机构，做了太多的好事。给缺医少药的穷人分发药品只是一个方面，在当时，用鱼肝油治眼睛已不算啥子秘密，我周围好多人就有亲身经历，可改朝换代以后，这些都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

我晓得一个美国人，叫满修士。因为她的英文姓氏，起头字母与中国的“满”字谐音，再加上她是修女，所以大家都喊她满修士。她很早就来到成都，一年又一年，办了很多期免费培训班。专门培训接生婆。因为在旧社会，有钱人家的女子不愿干这种活儿，而穷人家愿干，却没钱去接受专业培训，所以婴儿的死亡率比较高。当然，国民政府的卫生学校也起作用，但是，贡献最大的是满修士，她属于华西协会，一个慈善性的医疗机构。为了培训中国接生婆这件事，她一辈子没结婚。

我告诉你，满修士还是个作家，那时就出版了好几部文学作品。与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有密切关系的韩素音也当过接生婆，她之所以能成为作家，都是这个独身老太太教的，韩从小就在她的英文打字机上练习写作。到了新社会，满修士还继续留在成都，继续办她

的培训班，她把这儿当作自己永远的家，本不打算回美国了。可是，按照人民政府的要求，每间培训班的教室都得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满修士信上帝，当然不答应。政府领导三番五次与她交涉，均无法沟通，最后，只好趁她不在场，将毛主席像高挂在黑板上方。满修士来上课，一抬头发现了，勃然大怒，就找来一架梯子，爬上去撕了毛像。这下可不得了，满修士被当场宣布为“帝国主义间谍”，驱逐出境了。

满修士回到美国，闭门写作，60 年代就已出版了十几部小说。韩素音后来告诉我，她去看望她，通过交谈，才发觉这个天真老太太对政治无任何兴趣，十几年来，也没在西方说过中国共产党半句坏话。她撕毛像的动机非常单纯，就是任何世俗政府的权威不能高于自己的信仰。

讲罢满修士的故事，沙河老师意犹未尽，又接着讲述了 1945 年的春天，成都发生霍乱，满街浮尸的情景。他说——全城的棺材都卖光了，所有的医院人满为患。我亲眼目睹，在平安桥街的法国医院，门全敞开了，病人如洪水一般被抬进去，床位满了，病室满了，过道也满了，还从过道满出来，排在屋檐和门口，只要靠墙，都是奄奄一息的人。法国医生和护士，全力以赴，几天几夜不合眼，药用完了，只能打盐水针，输生理盐水瓶……但那些信上帝的洋人，明晓得无法挽回了，还在抢救，还在尽他们的职责……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有多少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建了多少医院、教堂、慈善机构，做了多少实际的善事，可都叫后来的共产党一笔抹杀，都成了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罪行。

沙河老师的回忆也勾起了我的回忆，我说——小时候，我就听大人讲“育婴堂”，讲洋人办的儿童医院，我曾经从某一条街上的铁栅栏前路过，觉得那是个非常恐怖的去处。我的小学老师说，里面的修女简直是魔鬼，他们把穷人家的小孩收去，放在大坛子里养，等到几十年后，才砸了坛子放出来。修女们把如此制造的侏儒放在

高桌子上，教他们拜上帝，学英文，耍把戏，不会就下不了地。还说，侏儒与侏儒结婚，就能一代一代生出小侏儒了。

沙河老师摇头叹息道，这种神话的根子可以追到 1900 年的义和团，并且一直流毒至今，我小时候也听过洋人喝中国小孩的血，抠出中国小孩的眼珠子，叠在盘子里玩。据史料记载，1896 年，现在的成都市二医院，当时的教会医院就被成都市民围攻过。原因是有人亲眼看见，医院里的洋人用糖把许多小孩骗进去，然后杀了，用瓶子腌起来，慢慢吃肉。于是几百狂怒的市民也要去以牙还牙，砸医院杀洋人，吓得所有的医生和护士翻墙逃跑，到陕西街的教堂躲藏。市民们又去围攻教堂，还放火烧，酿成很大的事件。可真正原因却是，有人看见了医院用福尔马林液体浸泡着的用于解剖的死婴标本，就添盐加醋地传开了。

【一则老新闻】

从沙河老师家里出来，天已黑了。我们在满目都市繁华中，乘公共汽车回家。在经过盐市口的拐弯处，蒋骥把被两栋高楼夹在中间的基督教堂指给我看，我点头道，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曾经跟女诗人刘涛来过，还领了一本圣歌册子，混在教徒里面感受了一会儿气氛。

回到家中，边放采访录音，边习惯性地在书堆里乱翻，竟然搜出一本天津人民出版社编的《老新闻》，里面有一篇官方报道，刚好与盲艺人文华春，以及流沙河老师的讲述形成另一对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到底是什么？还是由各位读者去辨别吧。

《新华日报》1964 年 6 月 5 日版，作者：钟雨文

最近，特别是在六一儿童节期间，好些小学校师生到南京儿童医院来参观访问，要求介绍儿童医院的“院史”。他们听过后都说：

“儿童医院不仅是一所医院，还是一所学校，在这里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我们在访问了这所医院以后，也同样有这种印象。

一九三七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和疯狂的发动反人民内战，弄得民不聊生，家破人亡，多少无辜儿童沦为孤儿弃婴。就在这时候，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披着“宗教”外衣为反动派效劳的一群外国籍修女，为了笼络人心，伪装出一副“慈善”的面孔，在广州路修建了一幢房屋，办起了“圣心儿童院”。收容孤儿弃婴。她们对孩子任意加以残害，把圣心儿童院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儿童死亡营。她们残忍的克扣孩子们的饮食，婴儿每天只给半磅掺了米汤和豌豆粉的所谓清牛奶，一岁以上的匍匐儿，每天只喂四次米糊，三四岁的幼儿，就只有三顿稀饭了。因此，孩子们普遍营养不良，一个个骨瘦如柴，害软骨病的很多，三岁的孩子不能直腰，四岁的孩子不能走路，有些孩子三岁了，体重才不过十一二斤。她们对孩子根本不加护理，许多孩子一人身上就有营养不良、湿疹、黄水疮等几种病；哭是婴儿的本能，可是有些婴儿不会哭了，奄奄待毙，孩子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孩子死了，这些“慈善家”却幸灾乐祸地说：“我们应该为他们的死亡高兴，因为他们的灵魂已经到了快乐的天堂了。”

除了对孩子进行身体摧残以外，还毒害孩子们的心灵。大一点的孩子每天清晨要被迫跪在教堂冰冷的水泥地上做“弥撒”，求天主饶恕他们的罪过。动不动就要孩子“求求”上帝，使孩子整天处在一种恐惧、自卑的状态。她们还给孩子们都取上外国名字，如什么“小玛俐”、“安德勒”、“菲力普”、“马利蒂亚”等等，施行奴化教育，让他们不知道有祖国、有父母，将来好永远受帝国主义奴役。

解放了，儿童得救了！不久，人民政府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依法惩办了帝国主义分子，接管了圣心儿童院，替孩子们治好了疾病，他们在党的关怀下，像一株株久旱逢甘雨的幼苗，茁壮成长起

来了。并在一九五三年，就在这块曾经被帝国主义分子残害中国儿童的地方，办起了儿童医院。在这里，先后盖起了漂亮的病房大楼和门诊部，设置了内科、外科、x 光室、检验等部门，我院现有床位数就相当于解放前的全国儿科床位数的一点五倍。医院的房屋设计、服用药品和医疗技术，无不从儿童特点和需要出发，如医院大楼病房与病房之间都装有一扇大玻璃，医护人员坐在办公室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好几个病室儿童的情况，便于主动做好护理工作：推行头皮静脉注射，减轻儿童痛苦；使内服药具有色香味的特点，不使儿童感到难于进口。有时为了挽救垂危的病孩，他们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血输送到孩子身上，为了观察孩子病情发展，他们通宵达旦地守候在床边……。同时，他们在党的支持和鼓励下，刻苦钻研，近几年来，医疗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他们曾经使昏迷七昼夜的病孩得到复活；他们为一个刚生下的新生儿成功地完成了食道闭锁的修补手术，挽救了垂危的生命。他们在为保护儿童健康的事业上，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谁值得他们如此重视？

第一部分

2007 年 10 月，网上传来消息，我获得独立中文笔会第五届自由写作奖，相对于中国官方的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这可谓汉语文学界的最高荣誉。它令我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一个书名：异端的权利。

自由写作奖的前四届得主次第为——以写《黄祸》《天葬》而著称的作家王力雄；以写《往事并不如烟》而著称的作家章诒和；以写《潜规则》和《血酬定律》而著称的学者吴思；以追寻和写作《寻访六四死难者》而著称的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和他们比起来，我的人生及文字信念远远不够坚定，在公共领域的影响更是望尘莫及。可能是嗅出笔会有可能奖掖后进的兆头，在今年夏天，我们几个海内外的反动文人，包括郑义、一平、陈迈平、胡平等等还合计着，准备要联手推举成都作家汪建辉，因为老汪的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写得实在好。先是评论家胡平慧眼识珠，撰写长文，令它最终得以在美国的明镜出版社出版，始而在反体制的读书界激起阵阵反响。我连《推荐辞》都准备妥了，就用《文学特务汪建辉》的最后两段，结尾是：

老汪通过小说，终于道出自我多年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由此在眼花缭乱的转型期历史中成为一道界线，一个不可忽略的作家。但愿有更多的作家读了《中国地图》之后，天良发现，向党和人民自首，交代从 1949 年以来，或者从 1952，1955，1957，1958，1959，1962，1964，1966，1967，1976，1978，1984，1987，1989 年以来的可耻行径———部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文学史才有望在百年后构成。

但是这个阴谋迅速破产，原因是老汪身为某报的资深划版编辑，

如果得了这个比“茅盾”、“鲁迅”和“巴金”更权威的异端文学奖，那饭碗肯定就没了。个人倒好说，裤带勒一勒就过，可老婆孩子咋办？才攻到小半截的楼咋办？所以老汪在谢绝之余，还冲我苦笑道：既然是这个命，就让我继续当文学特务吧。

于是，后来，我就得了这个奖。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领奖都是文人的体面风光事，银子虽然不多，奖牌上也不可能镀金或镶嵌珠宝，但这不是慷纳税人之慨的五个一工程，抑或某个企业家赞助的龌龊玩意。所以，理应挺直腰板，高调进京，恭候上台领取那由当今中国最有眼力最有肩膀的知识分子群体所颁发的荣誉。可是我却做贼一般，提前数日潜入北京。不敢通电话，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看多了；不敢坐飞机，怕一验《身份证》，人就叫扣住。众所周知，我的行踪诡秘有道理，包遵信，别人眼中的伟大启蒙者，我眼中的可爱酒徒前不久弃世，京城内外、全国各地的众多吊客就分别被专政机器卡在原地，动弹不得。我当然也动弹不得。我之所以没像别人那样，公开粗着喉咙给警方叫板，其实出于私心，何必提前亮相招惹？

与若干次单线接头的采访一样，我这个浑身流氓习气的底层混混终于在京城露面了。一出火车站，我长长吐口气，跟上岸的潜水员差不多。次日继续鬼鬼祟祟，埋头钻入刘晓波同志的家，转眼天黑，又随刘氏夫妇转移到楼下的金山城火锅馆子，会见笔会新任副会长江棋生同志。四周灯火辉煌，人头跟麻辣锅里的泡沫一般，热血沸腾，我们也谈笑风生，放胆开吃。刘晓波也破戒，连抿几口小酒。我和马少方在灌二锅头的间隙，还抢刘霞的红酒喝。江棋生慢悠悠地讲他天天游泳的掌故。真是和谐啊，我还乘着酒意，提前摸了一把沉甸甸的透明奖牌——我检讨，这不太符合规则，因此受到酒疯马少方的声讨，但是刘和江，两位懂规则的学院派充满怜悯，只冲我笑。

接下来，江棋生骑车返回，剩下诸位意犹未尽，就再次转移到

刘霞的女友家喝。差不多从 20 几岁开头，我还不太沾酒的时侯，刘霞就是我的酒师傅，没料到她的女友酒量也深不可测。她们俩边喝边嘲笑男人们，指使不喝酒的刘晓波给三个酒徒开酒。

那晚我自然吹了箫，还放开喉咙吼了一阵。刘霞坚持认为，我是个天生的戏子，如果有登台的机会，能把许多不着调的明星给盖下去。所以，颁奖会那天，一定要拿出吃奶的力气，表演一把。我点头称是：能用吹箫代替致受奖辞就最好了。

接下来，记忆有些恍惚，似乎乘醉欣赏了刘霞直接画在墙上的作品。那是天才之作，真的，只有一个熬夜的敏感女人才能抓住如此的幻象，人头如植物一般长出来，眼神又如植物一般稚嫩，饱含忧伤。

折腾到凌晨 4 点多，刘晓波严辞拒绝再开酒，于是我和刘霞只得跟着他下楼。冷空气一激，我也清醒地摸了摸兜里的钱包，感觉北京真大，北京真荒芜，像在月球上。出租车一路狂奔，刘晓波后来说，我一直回头冲他唱歌，不记得了，我不会这么幼稚吧？

接下来，依旧颠三倒四地过。乡巴佬好不容易进城一趟，没别的，就图个频频吃喝，与久违的友人们碰面找快乐。虽然你我他或许坐过牢，或许冤魂缠身、持续热血，但人生无常，今日过了有没有明日？难说。所以用不着谁对谁"铁面无私"。话不投机就翻脸，就如专制政权对待群众，话不投机不仅翻脸，而且要开杀戒。为了信念抑或任务，而恨不得把你的朋友砍几刀，是斯大林、毛泽东、原教旨的共产党，而不是你我他这种吃五谷害百病的习惯睡懒觉的流窜主义者。

说得有点过了，我的许多朋友其实没有流窜，他们长期蜗居在京城。如刘晓波同志这类，经历过血案，又不愿意被洗脑的蠢家伙，是被迫的；其他人，如我 20 多年的朋友唐晓渡，未必没经历过血案，未必记忆力就不如刘晓波，可老唐先认栽，后认命。老李、老张、老王也认栽认命，生存永远是第一位，唐吉珂德大战风车虽然

能够成为世界名著，但是谁又能坚持在六四至今的这些年，天天早晨冲着窗外日新月异的肮脏空气挥舞老拳？所以，我爱我的一切朋友，认命和不认命的都爱，行内行外、相干和八杆子打不着的都爱。只要没有彻底世故下去，当老婊子立新牌坊，都千疮百孔，卖不动了，还要倚仗自己被操多年所积累的聪明才智煽乎；只要别人还能浪费时间，来参观你这种无用的怪物，还冒着糖尿病、痛风、高血压甚至突然偏瘫的危险，陪吃陪喝陪怀旧，陪手舞足蹈。

借此，我向政府公开交待，我在京短暂几日，会友众多，不完全统计有：高氏兄弟、唐晓渡、曾来德、野夫、王天成、武文建、王宏伟、文贤、李致文、党真、岳建一、王家柱等等。女士若干，就不用披露姓名了。本来约定在 22 号的颁奖会后，还有十几二十人以上的吃喝娱乐盛会数场，算命幽会一场，可惜全打断了。

还有一件不愉快，就是编排过《非常道》的余世存那厮，曾号称京师文化界第一酒徒，以前久别重逢，总要大醉一台，不料这次居然以血脂高、痛风复发等托辞，只舔了点点白酒和红酒。更不叫话的是，他竟约我去参加纪念陈独秀、胡适某某周年的法学界研讨会。老余啊老余，这笔帐先挂着。

12 月 20 号夜间，我在 20 层以上的高楼登陆互联网，猛然读到上海警方拘留李剑虹女士的消息，不由吃惊。李女士为今年独立中文笔会“林昭奖”得主，按常理，她也该抵达了北京，准备着与我一道出席颁奖仪式，然而。我拉开窗帘，冲着北京的广袤夜空发呆，我不是蜘蛛侠，能够在无形的巨网里穿梭，可马上换一个住处肯定行。于是，三五分钟就收拾完行囊，临出门的刹那，我又颓然止步。干吗呢？除非我这个自由写作奖得主放弃领奖，人间蒸发，否则，他们总会在半路抑或颁奖的地点守候，不把重新露面的我逮个正着，是不会罢休的。多年的革命实践证明，人民政府要决心干自以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事，都如赌徒扛枪上赌桌，不惜血本。

问题很严重，值得思索，可遗憾的是，我早早就熟睡如猪，连

晚归的老哥们忠忠敲门都没听见。次日中午醒来，下楼在饭馆吃东西。忠忠一脸严肃地坐在对面，说预感到有点不妙。我懵懂道：有啥子不妙？要不妙早不妙了。要不妙我只能呆在成都，连门都出不了。话音未落，穿制服的女片警就领着几个便衣进门，我的心脏狂蹦几下，不得不佩服残疾人的第六感官超常。

他们先与忠忠客气两句，就牛皮糖一般粘上我了。3 个人不离左右，挟持我进了包间，坐下来没交谈几句，他们又称环境不好。我说很好啊，门一关，除了你我就没别人。他们敷衍道：是啊是啊，但是太闷了。我说不闷啊，很舒服啊。他们心不在焉道：舒服？不不，太闷了，我们到派出所吧，那儿要好些。我说我不去派出所，大凡正常人都不愿平白无故地进派出所。如果你们硬要让我去，就按正规的法律程序走，请出示《警官证》和《传唤证》吧。他们连忙陪笑道：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你是著名作家，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怎么敢有这个意思。不过，协助政府工作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我们相信你会跟我们走。我说如果我不呢？他们的陪笑立马变成狞笑：嘿嘿，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执行公务。何必大家不痛快。接着斜过肩膀，要搜我的身，还问有手机吗？我煽开他们的手腕，说没手机，你们不晓得世界上有一类人不用手机吗？

于是我们站起来。临出包间之际，我说要小便。接着就不由分说地紧赶两步，钻进对门的厕所。我蹲下来大便，真遗憾，很顺畅。一个警察进了隔壁，另一个警察做出尿急的样子，呱呱拍门。我吼一声“屎不让人拉完”，就立即掏手机发短信，几百元的东西，低档，速度慢。我好不容易按完“警察来了，要强迫带我走”，连发两遍，中途还有个该死的无关痛痒的酒电话打进来。

我不断地冲水，以便掩耳盗铃。

我一遍遍地擦屁股。这一生中，我第一次这么看重我的屁股。

我向厕所鞠躬致敬。然后人模狗样地重现。几进宫的贼头习性，促使我将钱包和手机拿出来，交给吧台，叮嘱代为保管。警察插话：

有这个必要吗？我答：当然嘛。赤条条地耗去，光脚不怕穿鞋的。警察哼哼道：真他妈的逗，你们四川人都这样？

第二部分

走笔至此，恍惚记起法国思想家福柯说过：人是权力之网上的一只蜘蛛。那么我多年来的处境竟是蜘蛛的处境，风雨飘摇，起起落落，却依旧顽强地捕食求生？可蜘蛛一生都在织网，我在织网吗？写作本身就是织网吗？写作本身既是个人的权力，也是招惹企图控制个人的社会权力的陷阱吗？

我一简单的文人，我不愿意招惹谁，可这些年多次掉入陷阱。像这次，耗钱耗力，几千里路上京，难道就为了被抓起来？一只玉米粒大小的蜘蛛，花几个月时间，织了一面数丈宽的超级巨网，它好不容易从这一端爬到那一端，难道就为了懵头懵脑地坠入水中？真是一幕荒诞剧啊，然而中国警察不是法国福柯，黑色轿车就停在饭馆外头，我被硬生生地塞进去，如大腿间的某个器官，被 4 个警察夹在当中。

20 多分钟后，他们把我带到大屯派出所。先是在靠街面的屋内，风很硬，进进出出的人骆绎不绝，两三张破椅子蒙着薄灰。连他们都嫌脏，不愿落屁股，却一再吩咐我坐。接着，他们口袋里的手机依次响起，一帮子如风似的，刮出去接听，就留一满脸颓废的“艺术家”陪我。他掏出烟，递来一支，我摆手谢绝，他就顾自叼烟，狠吸一口道：别紧张，没事儿。

我翘了翘嘴角。

他又道：我认识余世存，在一起喝酒来着。他写过一本《非常道》，卖得还可以。看这个样子，你和他差不多吧？不算太寒碜，也不算太富有；不算反政府，也不算不反政府，就是牢骚多。从古至今，文人全部牢骚多。张三李四，包括我这做过片警的，也牢骚多。可是有个屁用啊。只有人家文人的牢骚能挣钱，能留名。

我笑了。承认自己和余世存是朋友。

他继续道：余世存是湖北人，你是四川人，你们肯定在北京认识的。写文章就是好，天南海北都能认识。不像做小百姓，一辈子出不了几个胡同，认识不了几个人。你们成都我去过，天气阴，可饭好吃，姑娘漂亮。有名的文人不比北京少。像你，像那个、那个流沙河……

你知道我些什么呀？我不禁笑道。

才疏学浅，才疏学浅。他换了一支烟，接着道：我只读过余世存的，余杰的，市面上都能买到。刘晓波的买不到，只有在网上读，他几乎天天在与政府叫板，厉害。你老廖的，肯定是读过，但一时想不起来。你是北大毕业吗？你提醒我一下，这段时间公事多，跑来跑去，脑子给跑坏了，你提醒一下。

我写过一本《中国底层访谈录》。

中国底层？有印象有印象。他在烟雾里眯缝着眼睛，由于一阵冷风进来，他跟着又提提羽绒服领子。我做过近 10 年片警，可以给你提供好多素材。老百姓的油盐酱醋、酸甜苦辣，还是只有我懂啊。还有外来人口，到北京上访的，打工的，我都能和他们聊到一处。片警也算底层么。

你们手中有权力，就不算底层了。

有啥权力？还是老毛的时代？做雷锋叔叔光荣？警察在群众中吃得开？除了这身警服，我们与小百姓没啥区别。我们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找谁呀？群众还可以投诉我们，轻则挨批评、扣奖金，重则下岗。我们的委屈找谁投诉？找你们文人投诉？

写成电视剧嘛。关于警察的电视剧够多了。

那个当老板的，海岩，电视里经常都在播，靠咱警察行当发大财，牛屄。你眼红没用。你说编得不像，也没用，钱照样入人家口袋……

我心里正在想，这人，真是个话唠子，随便什么都能顺着往下侃。新一帮便衣就到了。为首的个子很高，很英俊，长得像香港电影明星梁家辉，而另外两个，年轻得胎毛未褪，显然是充数的马仔。

你是廖亦武？著名作家，久仰大名啊。算开场白。

派出所所长引路，我们上了屋后的 2 楼，沿楼道拐一弯，进了会议室。中央会议桌占了三分之一的空间，四周全是椅子，靠墙还有两三排超大屏幕，破案功能显得十分齐全。我懒散惯了，本来要随便拖把椅子过来，不料“梁家辉”却甩动长臂，指定我落座窗前位置。跟车里差不多，我又如大腿间的某个器官，被夹在 4 个警察当中。屋内自然比车内宽敞，可刹那紧张起来的气氛，令人觉得被罩在暗无天日的裤裆下。

梁家辉仰起身子，眼皮朝下地打量我。左边的话唠子默不作声地抽烟。另外两个马仔，白面书生，却抱着双臂，做出一副地痞样。众所周知，我虽属政治惯犯，却不是沉得住气的政治家，我强笑道：你们弄我到这儿，总该作个自我介绍吧？请问？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我姓江。梁家辉道。训练有素的眼神依旧一眨不眨。

我连连称谢。却没有回应。只好尴尬地噤声。

梁家辉这才一字一顿道：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

我也一字一顿地道：不知道。

真他妈像演戏。

接下来的台词节奏就快了许多。

梁家辉：真不知道？

廖亦武：真不知道。

梁家辉：咱们还是直来直去。

廖亦武：我也想直来直去。你们到底有什么事，问吧。

梁家辉：你是高级知识分子，还用我提醒你？

廖亦武：你比我更像高级知识分子，还得你提醒我。

梁家辉：你到北京干什么来了？

廖亦武：晃悠来了。

梁家辉：你他妈的！站起来！！

对白中断。梁家辉掀翻椅子，直扑过来。两马仔紧随左右，转瞬间，三警察泰山压顶，而话唠子反应贼快，立马将门反扣。梁家辉反复几遍“靠你妈的”，还抓住我的肩向上提。我只得跳起来，大叫一声：妈个屄，警察打人怎么的！

你敢骂，我就敢打。

你先骂的。我不是罪犯！你动手就是违法。

我动了你。靠，我就是要动你。你嚷嚷啊，谁看见啦？他妈的，你个四川土鳖，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北京，全国人民的首都，懂不懂？晃悠来了，这是你晃悠的地方吗？把我们当 3 岁小孩啊？

我的胳膊被狂怒的梁家辉拽来拽去，稍不留神，领子也叫扭住。我一下子毛了，血涌脑顶盖：玩黑社会是吧？执法犯法是吧？你这墙上写着“执法为民”，不认识字？好好。你他妈的敢打人，你他妈仗着没目击证人，老子就跳楼！！

说时迟那时快，我猛地甩开梁家辉，反身就扑过去开窗。刚出一条缝，冷风如强盗一般尖啸。三个警察顿时手忙脚乱，与我扭成一团。原先装着看报的话唠子此刻也过来，隔在我们与窗户之间，并迅速关窗，放下卷帘。我肯定以失败告终——被警察们反剪双臂，按在桌面的当口，还作垂死挣扎。但是他们也累得够呛，毕竟不是刑警。

真他妈无法无天！我还在叫骂。

谁无法无天啦？梁家辉喘嘘嘘道，我们打了你吗？没打；我们骂了你吗？没骂。你平白无故要跳楼，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救人嘛，当然急，动作也大。

你们平常就这么执行公务吗？你们到底逼死了多少人？到底有多少人在你们的眼皮下跳楼？我不是罪犯，有种的就将手铐拿出来，老子把命交给天！死不了，我就要跳楼，我就有病，你们把我送精神病院嘛，检查嘛。狗日的继续整，在“执法为民”的招牌前继续整。国家呀，法律呀，就是被你们弄黑的。这种素质还当警察，不要脸。你们去朝鲜当警察可能更合适。

好啦好啦。梁家辉终于泄气了。坐下来谈行不行？

于是撒手。大家站着僵持了两分钟。梁家辉道：还是个牛脾气呢。怕了你，老廖。我先坐。

双方这才禽兽一般，重振衣冠，摆出谈判架势。不过我和梁家辉的位置正巧互换，他靠窗，我靠墙。我的左右依旧两马仔，后来我弄清楚了，他们都属公安大学刑侦专科毕业，入行不久，自然要凶神恶煞挣表现。可笑的是右边这位，白净面皮，镜片度数也不低，却双臂环抱，从斜刺里怒视敌人达半个钟头，终于疲软，方取下眼镜做起眼保健操。

话唠子还是旁观者，打个哈欠，继续看报。

重新拼接的台词节奏趋于平缓。

梁家辉：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廖亦武：那你承认打了。

梁家辉：没关系。事情完了随你怎么写。网上类似文章多了去，警察如何如何凶残野蛮，维权人士如何如何英勇抗暴，文人的天职就是给我们抹黑嘛。老廖啊，你也没少给我们这个行当打交道，谁不明白谁呀？看你刚才跳楼的架势，就知道是老手，懂得制造新闻爆料。如果是 10 层 20 层以上，你还敢吗？不要怕我们交不了差，

不要希望谁谁谁会站出来，为你伸张正义，我大不了脱掉这身警服，转行到地方，说不定挣钱还多多。

廖亦武：你真够无耻的。

梁家辉：你又骂我？没关系，只要能消气。这世道谁不无耻？知识分子，小百姓，都无耻。可老廖啊，做事要有底线，底线之上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交流沟通。像你的铁哥们余世存、刘晓波，还有那个维权律师高智晟，都清楚底线，都和我们是朋友。只有傻屄才相信，这世上还存在撞南墙不回头的献身者，按照丛林法则，都他妈琢磨着让别人献身，自己活下来……

廖亦武：行啦行啦，你们找我干什么，直说吧。

梁家辉：真不知道？

廖亦武：你们不挑明，我就不知道。

梁家辉：好。你是不是得了一个独立笔会的奖？

廖亦武：对。我得的是国际笔会下属的独立中文笔会第五届自由写作奖。

梁家辉：怎么回事儿？

廖亦武：很简单，我的创作有成绩，笔会就奖励。

梁家辉：具体是谁发给你的？刘晓波？

廖亦武：与刘晓波无关。按程序，这是自由写作委员会的评选结果。

梁家辉：这个委员会都是谁？

廖亦武：我哪清楚？又不是我伸手要的奖。

梁家辉：你这次就是专程领奖来了？

廖亦武：当然。

梁家辉：知道在哪儿领吗？

廖亦武：还没接到通知。看来你先接到通知，就直截了当吧。

梁家辉：明天是冬至，好好过节吧。

廖亦武：我是要去参加颁奖会，好好过节。

梁家辉：我给你一个建议，仅仅一个建议。

廖亦武：洗耳恭听。

梁家辉：明天的奖就别去领了。

廖亦武：为什么？

梁家辉：真逗，还问我为什么。你的名声已经够大，何必还去出这个风头？

廖亦武：我是不能缺席的。

梁家辉：我还是建议你别去。

廖亦武：如果我一定要去呢？

梁家辉：那就只有留在这儿，或者另换一个地方。我们也辛苦，得陪着你。

廖亦武：这个意思是，我想去也去不了？我被拘留了？

梁家辉：你没被拘留。只是建议你别去。

廖亦武：你建议？！好好，我不去了。

梁家辉：这算不算你的正式表态？

廖亦武：我知道我插翅难飞。即使今天飞了，明天，也会在半路，也会在颁奖地点，被你们带走。

梁家辉：你太有想像力了。

廖亦武：我一个文人，搞不过一台国家机器，我不去了。

梁家辉：谢谢，谢谢。这样，你我就不用死耗下去。

廖亦武：那么，我可以走了？

梁家辉：我得向领导汇报。耐心一点，我们都陪着你，等待结果。喝水吗？

气氛顿时很缓和。话唠子外出几分钟，抱了一捆矿泉水归来；换梁家辉外出打手机。接着就是乱七八糟的聊天，4 个警察的烟瘾都大，一会儿就薰得我眼睛疼。我咕咚咕咚灌了一瓶水，话唠子又递过一瓶，还陪笑道：算见识你这样的四川人了，看起来挺温和，一上火就跳楼。

梁家辉也检讨道：这位老兄呢，做过多年片警，有和基层群众打交道的经验。我嘛，老家山东，出梁山好汉的地方，性子急，不太懂得幽默。所以你一说“晃悠”，我就以为是消遣我们做警察的。

廖亦武：晃悠不是四川话。我觉得嘛，你不仅懂幽默，而且懂火力侦察。你当过兵吧？你的形象这么好，不当演员真可惜。

警察们都笑起来。

梁家辉：真让你猜着了，我当过兵，而且是坦克兵，成天捂在一堆钢铁里面，人都快训练熟了。加上新兵蛋子那阵，总受老兵欺负，所以性格就一天天火爆。可火爆有什么用？遇上敢跳楼的四川人，全傻眼。

天色晦暗起来。我问时间，答 5 点多。

话唠子道：你是光棍儿怕什么？我和老江的孩子都才几岁，我们还巴不得早点完事儿回家。梁家辉也道：快了快了，已通知你的同乡，正往这边赶呢。

我吐一口长气道：还是我自己回去吧，你们送我也行，何必麻烦我的朋友。

警察们交换了一下眼色，沉吟道：等着。等着。

6 点钟，夜幕齐刷刷降临。不断有警察进进出出。我靠在椅子上，无精打采。虚妄的烟雾弥漫，但见其中漂浮着若干张嘴，叭嗒叭嗒，在反复念叨我几天前读过一段对白——

你为什么来到耶路撒冷？

为了遗忘。

遗忘什么？

我忘掉了。

这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开的一个玩笑。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一样，历史悠久，多灾多难。我在此时此刻记起这个玩笑，却没兴趣自问“为什么来到北京”——这是警察们的讯问，是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不断重复的讯问，作为犯罪嫌疑人，绝不允许回答“遗忘”。

尽管他们最终会把助纣为虐的罪恶忘得干干净净。

第三部分

傍晚 7 点钟，我没有等来我的朋友，却等来了自称是我朋友的成都市国保大队。带队的是年轻有为的副处长黄胜。管理了我 7 年的李航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进门就冲我嚷嚷：廖亦武，咋个搞的，你不是答应不参加任何组织活动吗？我应道：我当然不参加任何组织活动，但获奖是一个作家的荣耀，我非来不可。

北京的众警察顿时松了口气，立即退到角落里，坐山观虎斗。梁家辉还打趣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瞪眼干吗？人家大老远赶来，饭来不及吃，水来不及喝，老廖你就给个面子，乖乖地跟着回家吧。

李航道：莫要在北京呆了，卖一个面子，跟我们连夜回成都。

不可能。

为啥子？安心与我为难嗦？

话说反了，是你们与我为难。况且，我已经买了 26 号的机票。

我们帮你退。

3 折票，退不了。

这是小问题。明天的奖你领不成，还赖在这儿干啥？

还有很多朋友没见，很多台酒没喝，好不容易来一趟，风头没出成，却被警察押回去，你说窝不窝囊？

正好我们也没吃饭，就陪你喝嘛。喝得麻糊糊的，再打道回府，如何？

我是犯人，你们是警察，哪还有心情一块喝酒哦！

老廖，这话说得不够意思，我李航啥子时侯把你当犯人了？

总之，我不陪你们喝工作酒。想趁着麻糊糊，弄我回成都嗦？干脆点，把手铐摸出来，我就没得商量跟你们走；否则的话，交道多年，大家都知根知底，我自己也担保不了走到半路，哪根筋胀起了，就会搞点意外动作。

你想咋样？我也亮一下底牌：你不可能呆到 26 号。大家都换位思考，相互体谅。

既如此，那就明天起程。

一言为定，明天早上。

起不来床，明天下午。

就依你，明天下午。

好。那我们暂时散伙，明天再见。

不行，你我是朋友，肯定在一起。老廖，住宾馆嘛，住宾馆安逸哦。

都是男的，安逸个球。还是把我当犯人嗦？哪我就不走了。

龙门阵到了一定火候，领头的黄胜开腔拍板：好，老廖该住那儿还住那儿。我们小警察嘛，就随便在老廖住处附近找一个地方，将就一晚黑。

讨价还价结束，双方起身，奸商一般冲对方笑，然后一团和气地出门。持冷兵器的风从底楼直窜二楼，激得大伙直打寒战。李航和我耳语：老廖啊，天寒地冻的，跑到这儿干啥子嘛？少给北京的这伙子打堆嘛，最终吃亏的还不是你。

我懵懂道：吃啥亏了？我跟刘晓波两口子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是文学朋友，可以说从小混到老，吃啥亏了？

夜色中，北京和外省的警察握别，彼此客客气气。我木桩一样插在当中，好似拉拢两地关系的万恶的皮挑客。梁家辉还拍了拍我的肩头：老廖，一回生二回熟，以后到北京玩儿啊。我缩着脖子，一脸茫然。满大街都是车和人，满大街都是风和瑟缩的霓虹灯，我却不可能走进去。我再次记起右派流沙河说过：太幸运了，廖亦武，如果在老毛时代，你早就死无葬身之地。

是啊，社会真进步了，警察更“人性化”，一个稍有知名度的异议作家的押送规格也由此提高——这是多少泪珠和尸骨堆砌起来的进步！作为“记忆工作者”，我不忍回头，却不得不一再回头；我不忍看四周有多少无名的反抗者倒下去，却不得不看。我从内心感觉疯狂，感觉累。可我的本性却是多么爱笑，多么向往轻松，甚至虚脱般的忘我的轻松。在狱中回忆录《证词》里，我曾有感于一大批六四蒙难者的遭遇，而写道：

死了的，白死；活着的，白活。我们与毛时代、邓时代，甚至蒋时代的政治犯没有质的差别；与特务、农民皇帝、《扫荡报》记者没有质的差别。我们是土壤，是为流芳百世的大树提供养分和背景的土壤，我们被践踏、玷污，泪往根上流，历史老人却听不见永恒黑暗下的哭泣。

约半个小时后，我被警车载回亚运村，并与 3 位警方老乡在新开张的“川码头”共进晚餐。黄胜的话说得舒服：在哪儿都是消费，老廖，就去照顾你哥们的生意嘛。

堂子敞亮，4 人抵中央落座，黄胜点了本店当家的干锅鸡杂，我则拿出舌战群警的骁勇，亲自去吧台要了两瓶“金六福”，50 度以上的白酒，单价 288 元。反正不是自己掏钱，就腐败一把，希望作风正派的读者同志们见谅。

先碰大半玻璃杯烧酒，再夹菜吃，我的舌头哗啦一下木了，哪还品得出滋味？俺老廖在江湖上厮混多年，向来属于有酒胆无酒量的角色，相逢知交一二三，干杯四五六，拍桌子打板凳，忘情忘我忘死，可尚能一次次还魂，鼓琴吹箫，快意恩怨；可在不少场合，沾酒，甚至闻酒即倒。何也？意气阻隔，话不投机，抑或郁闷伤神也。不如诸位警兄先天有量，加之在后来的日常事务中，千锤百炼，自然而然，即成屡屡乘兴深入敌后的酒神。

所以，在李航和黄胜的轮番夹攻下，我败像立现，张口结舌，任两位大谈其和谐社会，警民一家亲。在另一桌招待朋友的忠忠见状，立即拢来救驾，平常滴酒不沾的他，也举起一个白酒杯子，先干为净。然后坐下来道：你们远道而来，也辛苦了，费心了，感谢你们对廖亦武多年的关照，他是我永远的朋友，是中国最牛屄的作家，可也是中国最傻屄的不懂政治的作家，正因为最牛屄又最傻屄，所以我喜欢他。

我相信，酒精中毒的死鬼听了这等好话，也会立马爬起来，而在我的记忆里，赌徒忠忠，这个前先锋作家，现餐馆老板从来没说过我什么好话。所以我被折腾了多时的身心为之一振，极其无耻地哈哈大笑一番，舌头顿时顺畅：你李航，管了我 7 年，算最久的；在你之前，是小宋，不错的文学青年，因立场不稳，被调去弄法轮功了；在小宋之前，是科长曹建，在青海当过兵，身世坎坷，后来患急性胰腺炎，抢救不及时。我刚出狱那段，他隔三岔五拜访，偶尔是任务，多数时侯不是任务，只为听听我吹箫，仅此而已。我和他都很寂寞，甚至很潦倒。虽然他也带队传讯过我，可有一天得知他的死讯，我还是莫名其妙地难过。那是十几年前的往事噻，你们

后来入行的，已经体会不到那种东西。曹建的继任者要狠得多。可总的说来，警察作为个体，都不算太坏，除非这一个体被种种欲望，特别是权力的欲望所驱使。你李航是本分人，撒谎都不太利索，这些年，你没帮上我什么忙，可也没害过我，不错不错。我相信 2002 年抄我家那次你真的不在，你出差去了。

黄胜道：老廖，过去种种恩恩怨怨就不提了，警察也是人，但愿人与人打交道，有个好的开始。现在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都不同，现在讲究和谐社会，减少矛盾，你过得好，气顺，我们的工作量也就不大，成都人从古至今都是喝茶嘛，吃饭嘛，能帮忙就尽量帮嘛。如果你这位朋友，愿意到成都来开餐馆，帮你老廖转型，给我打个电话，放心嘛，搞得定。

李航也敲边鼓道：只要在底线以上，啥子都好商量。

我不以为然道：底线？那护照算不算底线？我申请了 9 次，有啥子理由不给办？

李航道：主要是你的户口压在涪陵，那些土老坎，不开化，有啥子办法？

黄胜也点头：如果在成都这样领风气之先的地方，早就不成问题。

我道：我的管理方在成都，我的户口在涪陵，那你们肯定有建议的权利，你们那个部门不是通的吗？莫蒙人了，我的律师滕彪，北大的法学博士，很厉害的，他的分析结果是，只要成都敢承担责任，小小涪陵算个屁。

李航坚持道：我的确给涪陵出入境部门打过电话，那个科长卓树明，很难说话的。

我冷笑道：永远卡我嘛，没啥。我还会一次一次去申请，就当玩行为艺术。这不是我要炒作，而是你们在炒作我。我还会得更多的奖，我的书在西方的发行量还会大增。这很有意思么？

黄胜道：莫说气话，老廖。我们回去再商量，再商量。

心情一沉，酒劲顺势就上，我几乎连椅子也坐不住了，可黄胜和李航却正在状态中。勉强又与他们碰了一杯，眼皮就开始打架，啄木鸟似的额头，几乎磕着对面李航的眼镜。我往虚空挥了挥手，却也见一个黑衣女子摇晃而来，高跟鞋音嘀嘀嗒嗒。定睛一认，却是我分手了 1 年多的女友金琴。稍后我才晓得，她是得知我被警方带走的消息后，特地赶过来。

做过黑酒吧老板娘的她，面色苍白，笑容迷人。此刻就直直地立在酒桌边，左手扶着我的肩，右手高高端着玻璃杯道：我是廖亦武的女朋友，我代他敬 3 位警察哥哥。然后一饮而尽。

警察们连忙应酬，却只沾了一点点。

金琴亮杯底道：我这可是白酒啊。

于是干杯。金琴再一一满上，再率先一饮而尽。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这个沾酒即醉的弱女子是酒鬼，因为 4 两烧酒下肚，她还风度翩翩地颔首道：我不在的时侯，感谢各位照顾了廖亦武。

警察们醺醺然、醋醋然地起哄道：老廖太有艳福了！美女一个接一个。

我却从地震余波中醒转，一把抓住金琴的手，极其无耻地哈哈大笑。我口齿含混道：这个美女可不一样，我们要结婚的！

金琴闻言俯下身子：老威，你可当真？

我道：当真。

金琴道：好。我就想有个家。

刹那间，我眼泪差点就下来了。可我曾离过两次婚，已经患有严重的“婚姻恐惧症”！在前妻宋玉因缺乏安全感而出走后，刘晓波同志曾谆谆教导：老廖，黄种女人不适合你，就憋足劲儿找个蓝眼睛！你渴望已久的自由和热闹不就都到手了吗？于是在相当一段时期，我与万千渴望转眼之间改变身份的中国人相似，努力酝酿对白种女人的好感。我甚至仗着酒胆约会两次，近距离接触，却毫无

零距离体验的冲动。咋办？世上没有不上床的“洋插队”，反之，也没有无代价的自由和热闹。

但是 80 后的不成熟的金琴，与我一起飘零两年多、仍继续飘零、有若干缺点错误的金琴——我曾一再拒绝，可如今想都没想，就答应成家！为什么？4 两烧酒？

我老廖乃一穷寇，除开肉棒槌，身上别无长物，在这个节骨眼上，人家竟能如此待我，弱女子强出头！既是苍天有心，乘着醉意塞我一老婆，哪怕就是大脚农妇，也不能辜负于她。罢罢，犯不着同世间俗物一般，看似花前月下，内里却转花花肠子了。

次日中午起床，匆匆收拾行装，然后下楼直奔川码头，用完餐，警察们就已经在门外守候了。忠忠和金琴将我送至车旁，拱手作别。40 多分钟以后，3 警 1 民抵达北京机场。16 点登机，17 点，原定颁奖会的开头，我却鬼使神差，升至万米高空，与警察黄胜云里雾里地交流思想。另两位警察疲惫之极，正沉沉入梦。天黑尽，我们终于落脚在阴气沉沉的故乡成都。桑塔纳轿车接站，我两天里的第三次，如大腿间的某个器官，被夹在 4 个警察当中。

沿途堵车。抵家门口已是 8 点多钟。黄胜道：老廖，今天冬至节，跟我们吃羊肉去。我摇头：老妈还在等呢。于是开锁进门。空荡荡的屋里，老妈起身相迎，并埋怨道：二毛啊，在外头鬼混啥子嘛。我答：没鬼混，领奖呢。

时光刹那倒流至 1994 年，我出完狱，离完婚，光棍儿一条重归故里。老妈也是起身相迎，并一把扯住道：二毛啊，在外头鬼混这些年，把妈担心死了。我答：没鬼混，坐牢呢。

一晃近 14 年！地球和国家机器还在照常运转，可父亲已故，母亲及儿子均老去许多。

2007 年 12 月 25 日至 2008 年 1 月 11 日。成都。

【完】